

欧洲共产主义 的希望

〔美〕卡尔·马扎尼著

吴章彬 刘芸影译



東方出版社

出版说明

本书著者卡尔·马扎尼出生于意大利，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一度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战后曾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监禁过三年。马扎尼是意共的同情者，1977年和1978年在意大利作了几个月的考察，研究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写出本书初稿，又于1979年再次赴意，向各界人士征求意见，然后于1980年正式出版。

本书分为三部分，共十三章，论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起源、历史背景、理论观点和现实意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在意大利的实践等等，还对攻击欧洲共产主义的言论作了分析和批驳，并展望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前景。

本书出版以后，曾被认为是有关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中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本。为了供我国理论界研究参考，特将全书翻译出版。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础	1
第一章 苏联霸权的终止	3
第二章 欧洲共产主义、民主和国家	31
第三章 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欧洲社会主义者	53
第四章 梵蒂冈和欧洲共产主义	85
第五章 意大利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贡献	132
第二部分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164
第六章 妇女举足轻重	167
第七章 菲亚特的艰苦岁月	195
第八章 为什么天民党这匹马开始喝水	233
第九章 如何盗窃一个国家	269
第十章 拯救农业	305
第十一章 拯救经济	332
第十二章 对位法的政治(1978—1980)	356
第三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前景	393
第十三章 理论与实践	395

第一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础

第一章

苏联霸权的终止

同其他共产主义的形式(苏联、中国、古巴等)相比较,欧洲共产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它强调民主的程序,包括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民主程序。对于列宁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民主”不过是欺骗工人的一种手段,使他们不清楚谁是社会的支配者;一向被誉为保护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法案》,不过是掩盖经济压迫的一块遮羞布。对于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人权法案》是走向自治的一个重大步骤,伴随着经济民主的实施,它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一个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完全民主的唯一例子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尽管它还不完善,马克思曾称赞它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样板。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没有一个社会的公民在政府和生产方面拥有直接的发言权。例如,美国在政治民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在经济民主方面却只有微小的进步。而南斯拉夫的情况正好相反。苏联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倒退到国家独裁主义。同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苏联还对所有共产党施加支配性的影响,把既非社会主义又非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强加给它们。对于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那么对苏联权威的挑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苏联霸权的终止是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而且是一个

不容易实现的前提。

苏联霸权的逐渐瓦解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标志着苏联走向屈服道路的四个事件：1948年6月，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1964年2月，中国同苏联公开决裂；1976年7月，全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当然，每个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苏联——南斯拉夫冲突的发展是缓慢的：不论是斯大林还是铁托都不希望关系破裂，当事情发生时，双方各自都感到意外，认为是被出卖了。他们两人中间，斯大林有更多的理由感到懊悔，铁托是共产国际的一位次要人物，他在1937年被共产国际挑选担任爱争吵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总书记^①。作为党的总书记，铁托建立了一个由年轻人（多数是二十来岁的青年）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年轻人都称呼四十五岁的铁托为“斯塔里”（老头子）。在他的领导下，党在全国的组织网加强了，当希特勒于1941年4月入侵南斯拉夫时，党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行动。

希特勒原来并没有计划要入侵南斯拉夫，当时计划的焦点是入侵苏联。但是，当希特勒逼迫南斯拉夫保罗王子的右翼政府依附于轴心国时（1941年3月25日），人民起来造反。贝尔格莱德发生大暴乱，军队站到暴乱者一边，一批军官发动了政变，组织了新的政府。希特勒大发雷霆，原来准备对俄国发动闪电战的飞机、部队和坦克都转向南方。南斯拉夫遭到侵略，军队被摧毁了，政府流亡国外。整个作战行动虽然只用了十天（4月6日至16日），据丘吉尔判断，这次作战行动使希特勒对俄国的入侵推迟了五个星期。如果对俄国的进攻是在5月15日开始而不是在6月22日开始的

^① 见F. 麦克林著《异教徒》一书第三章。铁托从1927年到1934年被关在南斯拉夫监狱里，因此他同党内派别斗争或同共产国际的争论没有牵连。

话，莫斯科很可能沦陷，整个战争局势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就很可能发生根本变化^①。

南斯拉夫人一直认为他们 1941 年的起义是援助苏联的一个具体行动。铁托组织游击队同德国人作战是对苏联的进一步援助。开始时，游击队人数很少，但到了 1943 年底，游击队人数已超过十万人。他们牵制了五十万德国军队和傀儡军。南斯拉夫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全国人口一千六百万，死亡的人数就有一百六十八万五千人，也就是说，每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死亡——他们的伤亡率与苏联人一样。共产国际给他们的电报说：“你们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我们苏维埃国家将永远不会忘记。”^②

战争结束时，铁托已不再是 1935 年时共产国际的次要官员了。他已经是南斯拉夫的总理，一支拥有二十五万名久经战争锻炼的战士的军队元帅和一个由青年男女组成的饱经风霜的共产党的领袖了。他为自己的人民和国家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独立的领袖。斯大林开始发火了。他仍然把铁托看作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次要官员，来自一个力量微不足道的小国。苏联有数以十计的元帅，有数百万的军队，它的伤亡人数上千万。铁托自夸他打败了德国人，但是苏联的一个军团帮助他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如果没有苏联军队在三千英里长的战线上向前推进，包围了在南斯拉夫的德国军队并迫使他们后退，铁托决不可能获胜。

而且，铁托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民族主义和不妥协的态度使苏联感到讨厌。尽管斯大林强烈地提醒铁托，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① 丘吉尔，《伟大的联盟》（波士顿霍顿·米夫林 1950 年版）第 192 页。

② 麦克林的《异教徒》一书第 9 章和第 10 章，详细叙述了德国的军队，伤亡人数和共产国际的电报。

应当先同苏联商量，但铁托却我行我素：他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同盟军对抗；他打下了侵犯南斯拉夫领空的美国飞机；他帮助希腊游击队，从而破坏了斯大林同丘吉尔达成的谅解。^①

同样重要的是铁托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保持独立。他拒绝建立苏一南联合股份公司，它是苏联为了控制它的卫星国的计划而试验的一种办法。他还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顾问和警察顾问，而同英国保持战争时期建立的联系。而且，他未经同俄国人商量就同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缔结条约，他对这些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时还受到人民的激动人心的欢呼。铁托已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他的独立可能具有传染性，是到了整治他的时候了。

斯大林指示他的特务机关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间谍网，设法接近不满的军官和渗入党政机关。他们成功地对一名中央委员进行讹诈，使他成为一名告密者。同时，作为遮眼法，斯大林放弃了联合股份公司，而向南斯拉夫提供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并给予南斯拉夫人一大堆荣誉。在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葬礼（1946年5月）上，南斯拉夫被邀请派仪仗队参加守灵。铁托是被挑选来在列宁陵墓平台上同斯大林和政治局全体成员站在一起的唯一外国贵宾。

斯大林策划来控制南斯拉夫和其他卫星国的另一个工具是共产党情报局。它包括所有的执政党和意大利及法国的共产党，表面上是一个情报机构。总部将设在贝尔格莱德，并在那里出版一个期刊，主编将由某一位叫做尤金的俄国哲学家来担任，他原来是一名苏联内务部的特务。南斯拉夫人不久也派人监视尤金，亦即

^① 麦克林书，第11章到第13章。麦克林的大部份材料是根据南斯拉夫和英国的文件以及他自己广泛的切身经历。

监视间谍。

当南斯拉夫人知道苏联的隐秘活动时，他们提出强烈抗议。1948年初，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互相致信争吵，并立即上升为激烈的对骂。他们争吵的显然是一个民族独立问题：铁托和他的同事愿不愿意屈从于苏联的控制？铁托坚定不屈，终于在1948年6月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接着煽起了一场诽谤铁托的大规模运动，说铁托是英国间谍，把南斯拉夫出卖给资本主义，等等。同时，苏联和它的社会主义卫星国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制裁。由于南斯拉夫的贸易大部分是在社会主义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它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斯大林确信铁托是完蛋了。他对赫鲁晓夫说：“我动一动我的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将会垮台。”^①但事实证明斯大林错了。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军队和人民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团结在铁托和政府的周围。英国给了南斯拉夫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美国国务院也步英国之后尘，为了铁托的背叛而接受他的共产主义。铁托主义的存在使铁板一块的斯大林主义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缝。斯大林采取行动来抑制造成的损伤：1949年搞了一系列审判，许多国家的独立的共产党领导人遭到诬陷、审讯、谴责和处决。东欧的民族主义动乱被消灭了——更确切地说，是被赶入地下。

但斯大林无法阻止这股潮流：对苏联权威的损害是永久性的。铁托被革出教门之后继续存在下来，开始了苏联霸权的逐渐瓦解。铁托主义的挑战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被削弱了，而且还由于它对南斯拉夫国内形势的

① 美国国务院1956年6月4日发表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据传是陶里亚蒂把这份报告传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见科拉多·莫塞蒂的《赫鲁晓夫报告，从陶里亚蒂到中央情报局》，载1978年8月4日《欧洲人》杂志。

影响。铁托为了团结人民和从西方取得进一步的援助，不得不使他的统治自由化，约束特务警察，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允许旅行自由，对来自西方的报纸、书籍和思想意识实行开放。在意识形态上，铁托、卡德尔、皮扎德、吉拉斯等人反对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枯燥无味的教义问答。在国际上，铁托倾全力于发展新兴国家（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势力。他同尼赫鲁合作，开始把不结盟国家联合起来，这些不结盟国家同南斯拉夫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关心减少冷战。

最重要的也许是铁托有能力使一个共产党国家能够为西方所接受。他性格开朗，沉着冷静，讲话生动，头脑清醒，轻而易举地成为传奇式的勇猛战士。他扮演了反对苏联巨人哥利亚的大卫的角色，吸引了对他表示欣赏（渗杂着自身利益）的西方，从而掩盖了南斯拉夫政府的一党制的本质和它公开声明的共产主义方向。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采取行动来改善同铁托的关系。1955年5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访问南斯拉夫，向南赔礼道歉，赫鲁晓夫在到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时发表了低声下气、表示歉意的讲话，他把过去对待南斯拉夫的过错归罪于贝利亚（已被处决的秘密警察的头目）。铁托态度冷淡，无动于衷，他没有答话，而是挥手请这些俄国领导人上车。经过了两天谈判之后，铁托和布尔加宁作为两国首脑（未提共产党）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国内的组织、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等问题……〔应当是〕纯属各国自己的事情”^①。

异教徒胜利了。二十年来斯大林主义依靠的是独裁和一贯正确这两根支柱。现在独裁者去世了，克里姆林宫也承认了错误。苏联的霸权终止了……在名义上。事实上，又过了25年，苏联政府

^① 麦克林书，第6章。

才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赫鲁晓夫和铁托同样重要。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政权的黑暗面,他用文件清楚地证明了这个政权的恐怖性和夸大狂。即使知道斯大林的冷酷无情的苏联高级官员,对于党内大批人遭到杀害的程度也感到震惊。^①

赫鲁晓夫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和幻想的破灭。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失去了25万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外国代表,过去曾经因为反对铁托的斗争造成的分裂以及因为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捷克的斯兰斯基、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的被杀害而感到不安,现在则感到迷惑不解,感到被出卖和被玷污了。这些代表现在更迫切地感觉到需要进行独立思考。意大利的代表维多里奥·维达利1974年发表的日记,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

维达利生于1900年,1917年加入社会党,1921年加入共产党。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受到监禁和苦刑,后来逃往美国,于1927年被驱逐出境。他化名卡罗斯·康特拉斯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战斗,担任传奇式的第五团的组织者和指挥员,这个团后来成为重建共和国军队的样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意共中央委员、意共参议员和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意共代表。虽然他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感到愤慨,认为是片面的诋毁,但他又无法否认斯大林罪行的事实。二十大以后,他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在日记里写道:

^① 赫鲁晓夫报告中的一个例子: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1934年)有1,966名代表,他们全是斯大林的坚决拥护者。他们当中,百分之六十是工人,百分之八十在1921年以前入党并参加过国内战争。在随后的4年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捕。这次大会选出了139人的中央委员会。在四年内有98人(占70%)遭到逮捕和枪决。

“拉伊克？斯兰斯基？科斯托夫？哥穆尔卡？以及其他许多人？此时此地我们看到，领导国、模范党、和领路人的观念正在从历史上消失。这一切是应当结束了。至少以下这几点是有用的：我们应该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讲我们自己真正相信的事，学会说不。”^①

“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石。可是面对苏共二十大造成的后果，苏联领导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有时是血腥的殊死的战斗来维护苏联的霸权。他们恫吓波兰，并派坦克进入匈牙利。

被铁托成功的异端和赫鲁晓夫自己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释放出来的离心力，使赫鲁晓夫感到惊慌。他在1957年召开了一次世界会议，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大多数的党表示异议。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表达了大家的看法。

“当前不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需要的是高度的自主权，使各党能够决定各自的战略和同本国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合作的形式……”^②

陶里亚蒂讲话时赫鲁晓夫走开了。俄国人对意大利代表团十分冷漠，但是许多代表（包括波兰人在内）私下都支持陶里亚蒂。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有意对意大利人表示热诚。尽管毛表面上默认苏联的领导地位，但他无意接受可能从远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任何组织^③。

1957年的会议是苏联为了重建其霸权而策划的一系列会议的第一个会议。事与愿违的是，由于中苏的冲突支配着每次会议，每

① 维多里奥·维达利，《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第18页。英文译本将由劳伦斯·希尔公司出版。

② 同上，第86页。

③ 同上，第153和161页。

次会议都进一步损害了苏联的权威。

造成中苏分裂的原因很多，正如苏联同铁托的冲突一样，主要的原因是苏联要求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拥有一定的权威，这是同中国的民族独立不相容的。毛(泽东)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很恼火，他认为这样重要的事情应当同他商量，他不同意报告的调子，认为斯大林的贡献被大大贬低了。他开始对苏联的政策表现出一种批判的然而友好的态度。1957年，他支持波兰的哥穆尔卡反对赫鲁晓夫(他认为哥穆尔卡是一位好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苏联干涉匈牙利(他认为纳吉是共产党的叛徒)。即使是这种支持也含有微妙的指责：赫鲁晓夫的干涉还不够快。总的说来，他对苏联是支持的，他在1957年的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可能这种敬意是用来换取苏联一个月前答应给中国的大量援助。^①

1958年中苏冲突尖锐化了。毛计划夺取台湾，他要求苏联公开保证给予援助。赫鲁晓夫拒绝了，他担心同美国发生核对抗。1959年8月，中印由于边界争端发生战斗，赫鲁晓夫保持中立——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叛卖。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去美国同艾森豪威尔谈判(关于缓和)，这再一次被认为是叛卖。于是赫鲁晓夫到北京去并直率地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对中印关系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带来十分消极的后果。”他还公开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从而进一步激怒了他的主人^②。

1960年4月，中国人以牙还牙，发动了一场群众性运动，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和它的权威。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莫斯科渴望缓和，一方面表现他们极端害怕核毁灭，另一方面表现他们对于同

① 维多里奥·维达利，《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第160页。

② 哈里·格尔曼，《中苏冲突》，第264页及以下诸页概述了这方面的事实。

帝国主义共存抱有幻想。苏联的政策正在损害着共产党的革命战略，束缚着世界各国的解放运动，客观上加强了帝国主义。中国人的这场运动开始不久，发生了U—2（侦察飞机）事件，更加强了毛的立场，因为这个事件暴露了美国的侵略者面目，他们嘴上谈论和平不过是为了哄骗苏联。中国幸灾乐祸地嘲笑赫鲁晓夫是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农民。一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以激烈和敌意的语言攻击苏联的政策。

赫鲁晓夫提议摊牌。他要求在十一月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来消除中苏之间的分歧，毛同意了。这是六月初的事情。到了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苏共散发了一份攻击中共的通知书，并组织了发言来支持这份通知书。俄国人指责中国煽动战争，是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印冲突问题是民族沙文主义。在随后的几个月内，苏联报刊宣布“和平共处”政策对所有共产党都具有约束力，不言而喻地把莫斯科的权威强加于社会主义集团。

苏联并没有把这种攻击停留在言论上。1960年7月，莫斯科单方面调回所有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在一个月之内，成千上百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携带数以千计的蓝图、手册和技术图纸离开了中国。这是一个蛮横暴虐的行动，其强迫性的意图昭然若揭。^①数以十计的工厂还没有建设好就停下来，造成劳力和物资方面令人震惊的浪费。对于辛辛苦苦、精打细算地使用着不丰富的资源的俭朴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大规模的贩卖。

大概赫鲁晓夫以为中国人会屈服。如果中国人不来参加十一月的会议，苏联就可以操纵会议把他们革出教门。但是赫鲁晓夫打错了算盘。如果这真的是他的计谋的话，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落

^① 见维达利书，第173页。

空了。中国人没有屈服；他们的确参加了会议。而且他们对苏联进行了反击，双方战斗相持不下。双方都没有赢得必要的支持，经过调和签署了一项模棱两可的文件。在关于民族独立的主要问题苏联失败了。文件没有谴责“宗派”（指中国人）活动，也没有承认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权威。中国人满意了。他们称这次会议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改变了过去那种不正常的状况，过去对苏共领导的错误是一点也批评不得的。”^①

到了这个时候，苏联霸权的瓦解（它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具有根本的意义）大大加快了，意大利人也同中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一道公开对抗苏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1957年的会议上，陶里亚蒂对苏联提出的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放了一炮。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分析提出疑问。陶里亚蒂在《新议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赫鲁晓夫论“个人崇拜”）是太简单化了；苏联党和苏联官僚机构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蜕化”。^②

除了民族独立的政治问题外，中苏冲突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结束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建立起来的教皇的权威。毛的著作修正了列宁的理论，但斯大林出于谨慎，未予理会，对毛仍平等相待。斯大林逝世后，毛自认为是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自命不凡是荒谬可笑的。在随后发生的论战中，已经很清楚的是，不存在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欧洲共产主义党在理论上同它的对手具有同等程度的影响。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接近，比起铁托和陶里亚蒂更加列宁主义化。

① 《中苏冲突》，第280页。

② 陶里亚蒂，《答复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九个问题》。

然而毛摧毁了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从而促进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

陶里亚蒂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都很清楚，必须对中苏争端进行调解，因为它削弱了共产主义阵营而有利于帝国主义阵营。铁托和陶里亚蒂是最合适的调解人：在关于热核战争的危險和外交上必须谨慎从事的问题上，他们站在赫鲁晓夫一边；而在关于民族独立和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停滞不前的问题上，他们则站在毛泽东的一边。

调解失败了(虽然它提高了陶里亚蒂和铁托的形象)，中苏终于在1964年发生公开的决裂。这种决裂还由于个性的冲突而恶化。赫鲁晓夫缺乏文化修养，性格外向而行为粗鄙，使毛泽东很反感。毛泽东对古老的文化造诣很深，性格内向，有诗人的才能。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似乎是一位大空想家，一个摩西^①，他能够在革命时期领导人民，但却不会管理社会主义社会；在外交方面是一个固执和危险的新手。

这种性格上的冲突反映了文化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俄国人同其他“高鼻子”的白人——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一样不好打交道，有优越感和野蛮。俄国人方面也有他们的怨言。他们认为中国人态度冷淡，桀骜不驯，中国人对于苏联作出巨大牺牲给予的援助不大感恩。中国人没有象尊重共产主义的老大哥那样尊重俄国人，俄国毕竟是第一个起来闹革命，第一个建设成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国家。他们打败了希特勒，并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满洲”，从而对毛主义的胜利作出贡献。

在这类事情上引起的恼怒和冲突也许能够调解，但在对外政

① 摩西是基督教《圣经》中传说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译者

策上产生的深刻矛盾却是无法调解的。苏联希望通过追求缓和使热核战争的危险减小到最低程度，中国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绥靖政策。毛争辩说，共产党集团的力量已比帝国主义集团的力量强大，缓和只会给美国一个喘息的机会，让它扭转局面。毛在1957年会议的一次重要演说中指出：“东风压倒西风”。他列举了十条理由来说明这个判断，其中包括中国革命的胜利，殖民帝国的瓦解，苏联在把两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方面已居于优势，而美国连一颗土豆也发射不了。美国是一只纸老虎，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核战争。如果发生核战争，资本主义将会灭亡，即使中国损失人口的一半，也还有三亿中国人可以创建新的文明。^①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毛的这种见解是失去理智的。他们自己清楚，他们在人造卫星方面的优势只是一个例外，他们在工业技术和军备等总的方面仍居于劣势。而且，俄国和欧洲对于一场能够毁灭他们国家的战争是不能泰然处之的，即便是有三亿中国人活下来的话。如果中国的冒险主义使世界陷入一场热核战争之中，苏联将首当其冲遭到毁灭。因此中国人的对外政策必须服从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他们的国家独立的不可容忍的干涉。僵局是很清楚的。然而中国人越是坚持独立，就越使其他共产党加强要求平等独立的决心。

到了1964年春天，分裂已达到无法弥补的地步，中国人就在世界各地发动攻势。一些国家的老共产党内的小派别转而效忠于北京，并被北京承认为唯一“真正的”和“革命的”党。如果说托洛茨基曾经建立了第四国际，那么现在毛打算建立第五国际。陶里亚蒂意识到，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不可挽回了。8月间他到莫斯科去，再作一次最大的努力进行调解。陶里亚蒂不同意毛主义

^① 维达利的书，第157—8页。

的路线；他被毛在1957年的讲话吓呆了，据说他抱怨说：“他头脑发热了！”^①但是他也不同意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时采取的高压手段，并且有充分信心利用自己的国际威望去说服他。他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受到勃列日涅夫的迎接，当时赫鲁晓夫已到东部未开垦的处女地视察农业方面的伟大试验。他们建议陶里亚蒂去雅尔塔等候赫鲁晓夫回来。

陶里亚蒂在雅尔塔起草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准备交给赫鲁晓夫作为讨论的基础。他在8月12日写完了备忘录，第二天突然得了脑溢血病，于1964年8月21日逝世。备忘录的一份副本送到罗马，尽管遭到苏联的反对，全文还是发表出来了。备忘录的结论是模棱两可的：

“我们觉得，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长时期之内，民族感情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一个经常性因素。经济的发展不会消除这种感情而只会助长这种感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我们必须防止把同一模式强加于人的作法，我们应当相信，在多样化和各国完全自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和保持团结。”^②

陶里亚蒂的遗书无意中却成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文件，它既是终点又是起点。苏联霸权的逐渐瓦解从南斯拉夫人开始，秘密报告加快了这个进程，最后由中国人来完成。苏联霸权的瓦解是欧洲共产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欧

① 陶里亚蒂的这个说法常常在新闻报道中被引用，但我始终未能找到第一手材料。当毛泽东讲话时坐在陶里亚蒂身边的维达利写信告诉我说，他没有听到这个喊声，但是他说：“陶里亚蒂可能是在会后说这个话，如果他没有说，他肯定是这样想的”（维达利1979年12月23日从的里雅斯特给作者的信）。前《团结报》驻莫斯科记者博法说，他从来没有听到陶里亚蒂讲这个话。他后来同约蒂谈了这件事，她“断言”陶里亚蒂决不会讲这个话（博法1980年2月20日给作者的信）。维达利在政治上是不受约束的。

② 见1964年9月5日《再生》周刊。

洲共产主义的完全确立，必须同苏联达成和解。为此还需要十二年的时间 and 再召开两次国际会议。

第三次共产党国际会议定于1968年年底举行。可是1968年春天，苏联军队开进了捷克。这次入侵引起了许多共产党（由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党带头）的严厉和直接的谴责，使苏联处于一种危险的孤立境地。

会议于1969年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南斯拉夫、越南、北朝鲜、阿尔巴尼亚和荷兰等党拒绝参加。出席会议的各党只有60个在会议的最后声明上签了名，不表示反对或保留，这个数字比1960年在第二次国际会议声明上签名的党少了21个。苏联的一个卫星国罗马尼亚第一次表示重大的保留。意大利人拒绝在声明上签名，因为苏联不肯接受关于赞成社会主义有不同“模式”的提法。意共成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反对派的领袖，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对这条路线作了最明确的阐述，不久这条路线就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①

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三党越来越接近于共同的立场。1971年他们共同批评苏联对一批想离开苏联的列宁格勒犹太人的审判；1973年他们批评苏联不发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1975年他们抗议把数学家莱奥尼德·普柳什关进精神病院。莫斯科进行反击，特别是攻击西共，因为它公开批评苏联，同时也因为它是三党中力量最弱的，莫斯科还推动召开另一次共产党国际会议——自1957年以来的第四次国际会议。

三个欧洲共产主义党（当时已开始使用这个称呼）提出反建议，要求召开全欧洲会议，因为他们在欧洲有更大的份量。莫斯科最初拒绝了。但是随着争论的尖锐化，苏联在许多争论中的处境

^① 费尔南多·克劳丁，《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第43—45页。

开始变得十分不妙^①，苏联领导人终于让步了。1974年10月在华沙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

在随后的两年内，经过内部的争吵和公开的活动，最后在1976年7月举行了柏林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共产主义成熟了：意大利共产党主持了两次会晤，第一次是1975年7月在利沃诺同西共的会晤，另一次是1975年11月在罗马同法共的会晤。在利沃诺和罗马的声明中，三党对欧洲共产主义作了最明确的阐述，并在罗马声明中最后接受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②

柏林会议标志着苏联霸权的正式结束。苏联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迄今外间无法得知两年来内部谈判的情况，是一位参加者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次会议上告诉我的。^③

1977年10月，我同斯捷潘·伏依库坐在一张桌子的斜对角。伏依库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理论刊物《社会主义时代》的主编。他身材矮瘦结实，大约六十来岁，有一小撮灰色胡子。我们用法语交谈。伏依库先揭开话题，他说他很欣赏我从纽约发出的每周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是我在1958—1960年期间为《自由罗马尼亚报》撰写的。我告诉他我收到每栏十二点五美元的稿费，它使我在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艰难时刻得以维持生活。然后我们就转入正题。

我开始说：“马利查告诉我，你参加了罗马尼亚代表团，罗马尼亚在会谈中起了主要作用。”

伏依库不耐烦地摇头说：“我可以进一步说，罗马尼亚起了决

① 欧洲共产主义党也仿效中国党的新做法，公开发表它们同苏联共产党来往的书信。

② 同上书，第50页；马克斯·戈登主编：《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联合声明》。

③ 关于柏林会议的情况，还可参阅塞·斯福扎和恩·纳西的《欧洲共产主义》，伊·德洛古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欧洲道路》，以及伯·瓦利主编的《欧洲共产主义者》。

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他往后靠一靠，紧握着双手交叉在胸前，把脑袋扭向一边。“我喜欢无拘束地谈，行吗？但因为牵涉到很多人，话说多了怕会用词不当。所以不要提名字，也不要直接引述各党的看法。同意吗？”

“同意。”

他说，他很高兴向我介绍会议的情况，因为应该有人作出正确无误的记述并对罗马尼亚作出应有的评价。的确，西班牙党建议召开全欧洲会议，意大利党和波兰党迫使苏联接受这个建议。可是，一旦筹备开始，却是罗马尼亚代表团在一个个争论的问题上顶住苏联。南斯拉夫人也是富有战斗精神和直言不讳的。然而会议结果却使意大利人获得更多的赞扬。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伏依库依然抱怨这件事不公平。他婉转地说，意大利人在对外联络方面比较老练。我没有说什么，但我可以想象意大利人对记者们比较开放，如向他们透露有趣的新闻，这种作风在执政党看来是过于随便了。

我对伏依库指出，这次谈话将有助于“以正视听”。他注意到了这一点。

柏林会议（人们这样称呼它）之前，1974年10月在华沙先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从而开始了各党两年时间的互相争吵。苏共领导人企图重建他们旧日的霸权，进一步实现他们的目标——开除中国人，在苏联的领导下恢复各党的团结。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代表团带了一份很长的文件来到华沙。文件的措词立即引起了争论。对一个门外汉来说，许多词汇听起来就象古代学者在争论有多少仙女能在一根针尖上跳舞一样地玄奥（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团结”有什么区别？）。但是事实上，这些法典式的词汇表达了能够带来重要结果的政策，因而出现了在术语方面争论的坚韧性。

由于党太多和政策太多,经常变换联盟对象,此分彼合,需要花费许多星期来解决纠纷。许多代表当即表示不接受苏联的文件。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罗马尼亚代表团建议过两个月再开会,到时候每个代表团可提出一份意见书。这个建议得到一致同意,会议定于1974年12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这些意见书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一方面是包括的范围不一样,另一方面是分歧很大。由于缺乏一致意见,苏联想方设法要使它的意见书被接受,尽管这份意见书有着跟早先提出的文件一样的缺点(如孤立中国、提出勃列日涅夫主义等等),而且对战后历史作了利己的分析。南斯拉夫人提出尖刻的批评,认为如果要讨论过去的事情,他们有许多话要说,因为有许多事件的发生,既不是南斯拉夫人也不是帝国主义者的责任。

苏联建议会议于1975年5月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纪念日在柏林举行。他们想早些开会以迫使反对他们的代表团接受苏联的意见书。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指示罗马尼亚代表团接受这个日期,但不接受苏联的意见书;要在这段时间内解决矛盾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这个日期也就毫无意义了。

苏联建议东德代表团(亲苏的)起草一份综合各种意见书的文件,交由一个八党委员会审核,这八个党包括两个欧共党。伏依库不肯列举这八个党的名字,只提到其中有意共和罗共。德国人起草的文件证明它不过是苏联意见书的翻版。出乎苏共的意料,委员会拒绝了 this 文件。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比预料的还要强硬。苏联回击了。它坚持委员会应扩大为十六党,以便使其“代表性较为均衡”,加进来的党里面有葡萄牙和丹麦。坚持独立的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退缩。

至此双方阵容已经分明:一方是亲苏的党,一方是由于增加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两个东欧党而得到加强的欧洲共产主义集

团。一些迄今采取骑墙态度的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独立性。苏共发现自己处于守势，但是它对自己的力量很自信，对下面两点毫不动摇：重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谴责“反苏主义”。这些是表示莫斯科在对外政策上握有最高权力和免受批评的法典式词句。意大利人断然拒绝“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而提出“无产阶级团结”的反建议；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抵制“反苏主义”的提法，而建议代之以“反共主义”。

1975年8月，在起草的决议中吸收了赫尔辛基协议和其中的许多条款，但是关于苏联的最高权威和免受批评的根本问题却未能解决。苏联开始对其他党讹诈说，要不然会议就不开了，这样非共产党世界将会看到共产党世界闹不团结。这倒是一个有效的恫吓，有些代表团开始动摇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罗马尼亚代表团在1976年4月讲话了。它表示决不同意它所不相信的事情，如果要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会议的召开，那就放弃吧。南斯拉夫、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代表团支持罗马尼亚，于是会议破裂了，也许是永远地破裂了。

伏依库说，事实上，面对着中国人的挑战，正是俄国人最不能容许表现出欧洲的不团结。经过一些日子，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来举行双边会谈以求打破僵局。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伏依库说：“一个小国要对抗一个大国是不容易的。而且，可以这么说，我们党长期以来又习惯于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别人。”他苦笑了一下。“的确，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最后，俄国人屈服了。柏林会议将在欧洲各党之间取得新的谅解的基础上举行。作为一种安慰奖励，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最后草案中亲笔填写了一句话，大意是有关各党对反共主义和对苏联人民的一切诽谤表示愤慨和拒绝。伏依库说：“俄国人对此似乎感激不尽，虽然这句话不是他们原先提出来的那句话，措词

不同，上下文关系不同，含义也不同。”

伏依库滔滔不绝地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事情很清楚，当他重温那两年的争论和斗争时，他感到自己参与了一项决定性的大事——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他为他的党和他本人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

他给我预备了一扎柏林会议记录，一些重要的发言、新闻稿和其他有关资料。他说：“读一读这些发言，它们比那些决议能够使你对柏林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请记住：东欧国家有一党制，这种一党制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结构。这种状况在一个长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你们在美国不会认为它是民主的。也许用你们的话说，它是不民主的。但不要忘记，是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他们的政府往往被诽谤为极权主义）为欧洲共产主义敞开大门——争取未来团结的民主左翼和争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老式的夸夸其谈，然而没有华丽和浮夸的词藻，而且，完全可能是真实的。

苏联屈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文件中得到反映^①。在强调和平共处问题时，取得一致同意是比较容易的，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四个主要原则却引人注目地消失了，即：没有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没有提“反对反苏主义的斗争”。意共的“国际团结”的提法被采纳了，欧洲共产主义的论点也被采纳了，即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思想为基础，但要严格

① 扎格拉金主编，《欧洲和共产党人》，第68—114页。书中列有参加柏林会议各党发表的决议、公报或党报社论。核对一下某些惯用的词汇，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人们可以看到，在参加会议的29个党中，有17个支持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

维护各党的平等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各党在争取社会进步改革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①

比这个文件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卡里略、贝林格和马歇的讲话，他们的讲话为这次会议定了调子。这几位领导人断言，社会主义、自由和民主是互相依存的，他们给民主所下的定义使苏维埃正统观念无立足之地。即使关于共处问题，马歇宣称共处“不应当等同于接受我们国家的现状，也不等同于把世界划分为强国支配下的势力范围。”^②

在欧洲共产主义者当中，卡里略是最直率的。他说：“过去莫斯科曾经是我们的罗马，如此而已。现在我们不再承认有一个指导中心，有一条国际纪律……我们不能接受恢复以前国际主义时期的概念或结构。”在谈到“今天威胁着我们的最大危险”时，他列举了“帝国主义的野心”（猛击华盛顿）和“追求霸权”（猛击莫斯科）。他指出必须“彻底接受我们的运动的多样化，抛弃任何反对这种多样化的阴谋企图。”^③

从此，欧洲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与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平行的一种潮流而坚固地确立下来了。贝林格为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辩护说：“它不是我们的发明，……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欧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他们想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取得了相同的结论。这些趋向一致的意见已体现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同志们不久以

① 克劳丁书，第 54 页。

② 同上书，第 55 页。马歇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在阿富汗问题上支持苏联，法共并于 4 月 28 日在巴黎主持一次东西方共产党的会议，反对北约组织部署新导弹。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有点虎头蛇尾，其他的党只派了第二流的官员参加。（见 1980 年 5 月 3 日《经济学家》杂志）

③ 同上书，第 54 页。

前联合发表的声明中。”^①

直到这次开会之前，苏联和它的支持者，特别是捷克人和东德人，一直在攻击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柏林会议上，他们被迫吞下这个概念。

1977年春天，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出版了，卡里略第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独裁主义的条件下，苏联能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反应是强烈的。莫斯科的《新时代》(1977年6月23日)大骂卡里略，并开始区分“好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坏的”欧洲共产主义^②。《新时代》说，虽然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不祥之词，但不可否认，“一些西欧国家的党，更广泛地说，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在战略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基础。”然而《新时代》又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列宁很注意民族的特点。简而言之，尽管“好的”欧洲共产主义有错误，在同志之间还有争论的余地。但是对于卡里略之类的“坏的”欧洲共产主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新时代》攻击卡里略，并对他的书进行歪曲说：“它的目的是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它的第二个目的是给那些已建立新社会的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抹黑。它的第三个目的是拒绝欧洲各国共产党共同的结论……为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事业而斗争。〔卡里略〕对此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纲领，它等于是坚持欧洲分裂为两个军事集团，甚至更坏的是去加强北大西洋公约侵略集团。”

莫斯科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言论上。它曾经试图在恩里克·李斯特将军(内战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的领导下在西班牙建立一

① 克劳丁书，第56页。

② 指“反对欧洲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利益”(《新时代》)。

个敌对的共产党，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现在它又试图孤立卡里略。1977年11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俄国革命六十周年的大会上，卡里略遭到冷落并被阻止在会上讲话。尽管莫斯科在所有文件上都签了字，它仍然不同欧洲共产主义和解。

但是运动是遏制不住的，区分“好的”和“坏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以莫斯科的进一步退却而告结束。这个策略不仅需要接受“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而且需要赞同象贝林格这样“好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并请贝林格在会上充分发言。

贝林格抓住这个机会，在一篇得到卡里略完全赞同的击中要害的讲话中，阐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意义。贝林格在克里姆林宫的讲坛上宣称：“今天的民主不仅是我们可以迫使阶级敌人退却的领域，而且是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据以建立的历史上必不可少的社会准则。”他接着列举了民主的特点，包括一切公民自由，出版自由，多党制，等等^①。第二天，勃列日涅夫赞扬了贝林格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工作。^②“好的”欧洲共产主义得到正式承认。这一方面是由于意共的力量（它随时可能参加意大利政府），一方面是由于意共真诚地尊重苏联的成就（革命、工业化、打败希特勒，等等），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政治上的老练：如果你不能揍它，就要同它相处。

莫斯科打了一场败仗。欧洲共产主义赢得了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波兰（较为谨慎地）的支持。东德似乎也受到影响。1978年1月，东德的一些匿名党员发表了一个文件，宣布成立一个“民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声明说：

① 贝林格，《社会主义运动和意共的历程》。

② 《克里姆林宫会议后勃列日涅夫同贝林格的会见》，载1977年11月4日《团结报》。

“创造性的和非教条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正在发展中。共产主义的封建制度正让位于复兴的和开明的制度，它将使我们能够再一次赢得德国工人的信任。”^① 虽然没有再听到关于这个同盟的消息，但问题在于它甚至在控制最严的亲苏政府中已引起了骚动。

使欧洲共产主义得到加强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中国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的转变。一度被中国人骂为主要的修正主义者的铁托，1977年秋天在北京受到超乎寻常的接待。一年后，1978年9月，华国锋主席进行回访并且作为南斯拉夫的真正朋友在贝尔格莱德受到欢迎。他站在铁托的旁边，南斯拉夫领导人称中、南两国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② 使俄国人大为不安的是华国锋还在罗马尼亚停留，进行国事访问。两个月后，同年12月，罗马尼亚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不同意增加军备预算或将罗马尼亚的武装部队置于华约的控制之下。1979年10月，华国锋再次访问欧洲，并在罗马两次会见贝林格。1980年4月中，贝林格前往北京，受到热烈欢迎，意共的政策也受到赞扬。^③

苏联的霸权还受到约翰·保罗二世统治下的梵蒂冈政策的进一步破坏，正如教皇访问波兰时教会和国家的相互支持，以及教皇在1979年6月意大利大选中保持中立所证明的那样。苏联霸权的瓦解是不可改变的，欧洲共产主义党拒绝苏联的模式是真正的

① 黛安·约翰斯通：《社会党人逼迫共产党领导人解释列宁主义》（《在这些时候》，第9—10页，1978年3月3日出版）。

② 《华（国锋）继续前进》，1978年9月9日《时代》周刊第25页，报道了这次会晤。

③ 亨利·坦纳：《华出访最后一站来到罗马》（1979年11月4日《纽约时报》）；关于贝林格访华，安莎社的珍妮·萨马在北京通讯稿中对意共的历史作了长篇报道，有关于贝林格同中国高级领导人会晤的文章和相片（1980年4月14—16日《意美关系进展》）；还可参阅利娜·坦布里诺在1980年4月25日《再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和永久的，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不论各国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发展结果如何，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是肯定要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发生剧变。被普遍接受的教条（不论是毛泽东、斯大林、列宁或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地发生动摇了。这种变动只会促进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最后必然要渗透到苏联社会中去。贝林格在克里姆林宫讲话后一个星期，在威尼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次会议是由“宣言派”主持的，会议的主题是“革命后社会的当权派和反对派”。宣言派是由个人组成的，其中有许多人是老党员。该派领导人之一卢齐亚那·卡斯特利那是一位议员，入党已经25年，曾经同总书记贝林格密切合作。这些同志多年来要求推行一条更为敢闯敢干的路线。当他们作为个人进行活动时，党容许他们在党内外有言论的自由。但是当他们组成一个活动的派别并出版期刊《宣言》时，党就把他们开除出去了。这批人组成一个党和办了一个刊物，用的就是原来这个刊物的名称。1976年他们同“继续斗争”派^①和其他小集团成立了一个叫做“无产阶级民主”的竞选联盟，获得150万张选票，有6名议员当选。宣言派同意共仍保持着良好关系。参加这次会议的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些是世界闻名的，如路易斯·阿尔都塞、费尔南多·克劳丁、K. S. 卡罗尔、安德里亚斯·赫格居什、查尔斯·贝特尔海姆，还有来自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古巴的卡洛斯·

① “继续斗争”派和“自主”派是极左派中最大的两个组织。他们的成员是学生和一些青年工人。“继续斗争”派组织得好一些，有自己的报纸，它在理论上主张非暴力，虽然它的报纸被看作是经常在煽动暴力，但当发生暴力行为时，它又拒绝承担责任。该组织的成员聪明然而狂热。“自主派”使用暴力（如冲散游行队伍，等等），但它不是恐怖主义者。然而，他们为恐怖主义组织吸收新成员提供了基础。

弗朗基、捷克的吉里·贝利康和卢德维克·卡维尔、南斯拉夫的德詹·波兹纳维奇、俄国的里昂尼德·普柳什、匈牙利的伊斯特万·麦斯扎罗斯以及波兰的埃德蒙·巴卢塔。苏联用最尖刻的语言攻击这次会议，意大利共产党温和地表示不赞成这次会议，但一些著名的党员（如布鲁诺·特伦丁、隆巴多·雷迪斯、朱塞佩·博法）在会上发了言。^①

会议地点离我住的旅馆不远，开会时我尽可能参加。在仙境般的威尼斯步行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越过主运河上的斯卡尔齐桥，绕过两条点缀着玲珑小桥的水胡同，橈船轻轻地晃荡，河水拍打着门前的石阶。会议在建筑学院举行，这是一所石头楼梯的古老的宫殿，环绕着一个阴暗的庭院，到处是摆着论文作品的桌子和忙忙碌碌的年轻人。到会听众大概有一千人，约有四百人在会议厅里，其余的分散在休息室和楼梯上，他们从那里可以通过闭路式电视观察会议的进行。在会议厅里，人们可以用耳机听到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同声翻译。作为一个极左的派别，宣言派的成员干得很出色。

这些论文的质量和涉及的范围是很不平常的。这里有社会主

① 见阿尔都塞在宣言派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略谈马克思和列宁》。作者手头有大多数发言全文和其余发言摘要的油印稿。

大会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能不能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为吉拉德·查利安德的《第三世界的革命》所写的前言中对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论证说，不应当根据单个国家来理解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应当理解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向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关于这个论点的讨论，请参阅罗勃·伍德对查利安德的评论，载《社会主义评论》第35期（1979年5—6月）第168页。同期还刊有费尔南多·克劳丁的一篇文章，论述最近十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更新，但他提出警告，唯恐把这种研究变成纯学术性研究，而不去同群众组织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义和共产主义的内部情况，从法国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的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到意大利历史学家朱塞佩·博法（意共党员）的多少有点亲苏的立场。他们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极权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是否在逐渐形成一个“新阶级”和一种新的经济制度？“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这个概念是否恰当？欧洲共产主义是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伪装的形式？等等。许多发言者都提到“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但只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认为这个危机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存在了。“马克思主义在三十年代就被一些公式和斯大林强加的路线‘固定化’和阻塞了”，但把一切归咎于斯大林是错误的，因为“每当我们为了弄清被斯大林窒息的马克思主义而研究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证据面前低头：我们自己的理论传统（包括列宁在内）充满了缺陷和矛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让马克思主义发挥它的解放作用”。

来自东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发言也具有同样的自我批评精神，但他们没有人拒绝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他们主要的自我批评是认为党的领导没有充分联系人民群众。捷克的卡维尔说，“杜布切克春天”是由党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虽然在党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苏联干涉之后，有60万党员被开除出党，占党员总数的40%），但没有深入到党外的工人群众中去。波兰人埃德蒙·巴卢塔的讲话更增加了上述看法的说服力。巴卢塔曾经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关闭了什切青的船坞，迫使波兰共产党的首脑盖莱克为了解决罢工找上门来。

虽然与会者的多数对欧洲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从左的立场提出批评），但没有四十年来左翼集团之间关系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敌对性质。由于意共参加了这次会议和态度友好，表明了意共

对莫斯科的独立性和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因而他们对势力强大的意共的怨恨有所缓和。其结果是加强了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奉民主与言论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

前杜布切克政府的宣传部长吉里·贝利康提供的新情况大概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了。他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之后，我们才了解并摈弃了斯大林主义的歪曲。但直到我们开始研究葛兰西之前，我们还不能清醒地思考，不能制订出一条积极的路线。”

当然，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先驱者。

第二章

欧洲共产主义、民主和国家

欧洲共产主义反对苏联霸权。铁托主义、毛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也是如此，但人们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欧洲共产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同其它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无论是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它都强调民主。

在斯大林和毛以后，把民主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似乎是荒诞无稽的，把民主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似乎是不调和的。然而，欧洲共产主义把它的前途押在它坚持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双重主张上。它争辩说，这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本来的立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理所当然地是互相依存的，在他们看来，〈美国人权法案〉所提出的民主，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主要武器——非常好的武器。事实上，他们一度认为，正如英国大宪章主义派所认为的那样，经过激烈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到的普选权，不只是民主的一个进展，而且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对于无产阶级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就等于政权。……因此，在英国贯彻实行普选权，是一个比欧洲大陆上冠以社会主义称号的任何事物更为社会主义的措施。”^①

^① 拉尔夫·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第7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赞成民主，而且他们希望看到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他们批评资本主义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受到限制和被歪曲。妇女没有选举权，法律只适用于有财产、权力和地位的人，因而在实际上，富人有富人的法律，穷人有穷人的法律；白人有白人的法律，黑人有黑人的法律；非犹太人有非犹太人的法律，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法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争取把“资产阶级”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并把“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尽管资本主义民主有各种缺陷，它比起以前的制度有着巨大的进步。他们敦促工人阶级参加这个民主的进程，以完成必要的改革。1864年，马克思称赞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说，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①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不是关于争取改革的问题，而是这种改革能不能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能不能通过现行的制度（议会、工会、法庭等等）实现这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在建立新的制度之前要不要废除这些现行的制度。在这个大问题里面有一个更狭小、更尖锐的问题：能不能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或者说，掌权的集团亦即资产阶级会不会运用它所控制的军队和警察来摧毁工人阶级的合法权力？支持后一种理论的人认为党应当为进行武装斗争做好准备。这些争论使马克思主义分裂为“改良主义”派和“革命”派。

这种分裂的潜在可能性是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的分析中固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恩格斯两人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们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页。

是和平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把暴力理想化。他们同十九世纪的把暴力理想化的许多运动进行了斗争，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米海尔·巴枯宁、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布朗基和俄国民粹主义者塞吉·聂察耶夫的追随者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布朗基所主张的武装政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考虑的暴力是人民武装的表达方式，就象法国和美国革命那样。马克思说过，以往的一切历史，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都是通过暴力，通过战争和流血的革命来实现的。暴力是历史的接生婆，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说：“工人……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他接着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象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们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①

马克思是在1872年根据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的情况作出这个判断的：一方面，这些国家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和强有力的地方自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有一个比较小的官僚机构和人数很少的常备军。随着情况的变化，马克思改变了这个判断，认为在一切国家里，还是需要暴力的。以后，德国的情况变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合法政党，它在选举中所得的选票逐渐上升。到了1895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写道：

“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有 225 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所写的这段话多少有点模棱两可；它虽然强调了渐进主义，但“决战的一天”一词却含有革命突变的意思。而且，恩格斯抱怨这篇导言曾被删节，使他看来象是一个“和平守法的崇拜者”。然而，正如拉尔夫·米利班德教授令人信服的说法那样，即使按照恩格斯的未经删改的原文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武器。^② 他的确坚持革命的权利，但又补充说：“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更加坚定了。随着情况的变化，许多理论家特别是列宁修改了这些理论。大战以前，同沙皇制度相比较，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有强烈的好感。他在 1908 年称美国和英国是“有充分自由”的国家。他在 1913 年写道：“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609 页。

② 拉尔夫·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第 80—81 页。恩格斯的这段引语，是左翼“语录战”流行病的一个例子。参阅马·戈登对保·斯威齐（1977 年 6 月《每月评论》）和曼德尔对卡里略在他们的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著作中的论战。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609 页。

进的国家如瑞士、比利时、挪威等，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在真正民主制度下几个自由民族怎样和平共处或者和平分离的榜样。”^①

战争的令人厌恶的屠杀和镇压扫除了他的这些保留的看法。“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就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上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着重号是作者加的）^②

上面引文中加着重号的话强调说明，在列宁看来，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1917年以后，这些条件就消失了。如今，“打碎”国家机器，亦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组织机构（银行、军队、官僚、警察）的必要性，已经不再有一个国家是例外的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更加强了列宁的论点。从此以后，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打碎”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议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完全接受了这个论点。

欧洲共产主义对这个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俄国革命的仔细查考表明，“打碎”国家机器的说法是有些夸大其词。的确，官僚机构失去了一层高级官吏，然而在革命胜利6年后，仍有一大批官吏担任着他们在沙皇时代所担任的同样职务^③。严格地说，甚至军队也没有被“打碎”。军队在德国人的冲击下瓦解了，因为军队的指挥和装备都很糟糕。由于屡吃败仗，成千上万的士兵开小差，“逃之夭夭”。布尔什维克重建军队，在政治委员的管制之下任用了数以千计的沙俄军官。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看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支民主的军队，一支士兵有发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页。

③ 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244页：“内战之后不久，大约有五十万前沙皇官员为苏维埃政府所雇用。”

言权的军队，他们不会象在共和的西班牙发生的那样，接受新的管制形式。在今天的荷兰，士兵们组织了联合会；在意大利，士兵们组成了拥有生活管理权的选举机构。意大利的警察在一个较小然而相应的水平上组织了真正的工会。

欧洲共产主义者为了探讨围绕着“打碎”国家问题而发生的争论，他们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这个理论一向是复杂和不明确的，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任何其他人一样，对这种混乱负有责任^①。他们有时把国家看作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有时又看作是超越阶级的一种权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仲裁者。在另一个时候又把它看作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也就是说，不仅捍卫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捍卫整个民族的利益，例如，在一场独立战争中。有时又把国家看作是采取经济措施的机构^②。

正因为把国家看作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所以必须消灭作为它的强制性工具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这就是“打碎”国家。在这里，比以前更加混乱。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一度认为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可以利用官僚机构和其他组织机构为自己服务。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他们修改了这个论点。列宁沿着同一条轨道行进，并得出结论说，现存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必须摧毁，从而关闭了和平变革的大门。

欧洲共产主义者重新打开了这个大门，他们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它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这个制度的制约。欧洲共产主义者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如果要维持和扩大民主，对国家

① 见理查德·亨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

② 米利班德书，第90页及以下各页。

的组成部分就不可能进行根本的改革。例如，在意大利，卫生、福利和就业津贴的管理机构，以前一直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现在已把权力下放到各个大区、城市和居民区，并由地方议会管起来，从而削弱了中央官僚机构。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的警察，他们现在正在成立工会组织。

同民主的作用和“打碎”国家机器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会怎么样，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资产阶级经常用来攻击共产党，“证明”他们的独裁意图的一个词。这个词和诸如“人民民主”等词一样，被斯大林主义玷污了。意大利共产党是第一个停止使用这个词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其他党也跟着这样做。马克思爱好发音响亮的拉丁语而用了这个词，它的意思只是说，一旦人民的大多数取得了政权，人民——无产阶级——将防止旧的统治集团起来推翻新社会。但马克思很少用这个词，而是恩格斯对这个词作了最明确的解释：“你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当然，1871年的公社是民主参与制的榜样。

在1919年，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个词并不包含斯大林所发展的那种专政。葛兰西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将吸收压迫阶级体制上的经验，工人和农民阶级的社会生活将形成一个带有普遍性和严密组织的制度。”^②

列宁挑选了这段话，并稍微缩小了它的含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由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发明创造、斯大林传播而欧洲共产主义者加以抛弃的用连接号连接的哲学）的必要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

② 葛兰西，《新秩序》（1919—1920），第13页；《政治文选》（1910—1920），第68页。

罗莎·卢森堡批评了列宁，她论证说，按照他所主张的这种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将是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作为一个公认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她的看法是具有权威性的。她钦佩和赞颂布尔什维克的勇气、大胆和革命热情，但她反对他们“对立宪会议、普选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冷漠和蔑视，简而言之，即对人民大众全部的基本民主权利的冷漠和蔑视。”^①

她的著作充满了经过观察以后发表的见解，托马斯·杰斐逊^②可能也会这样写：

“只给予拥护政府的人们自由，只给予一个党的党员自由，无论人数有多少，根本不是自由。自由永远和专门属于持有不同想法的人。”^③

她的警告具有预见性：

“为了取代普遍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了规定，苏维埃是唯一真正代表群众的机构。从总体上看，由于国内的政治生活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命力也必然越来越削弱。没有普遍选举，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一切公共机构的生命力都消失了，只剩下仅有的外表，唯有官僚机构依旧是积极的因素。”^④

卢森堡在1919年被杀害了。她的警告在强调同盟国干涉和俄国内战声中被遗忘了，斯大林继续巩固他的权力，而使她的担忧

① 罗莎·卢森堡：《政治文选》，第250页。

② 美国第三任总统，民主主义者。——译注

③ 《罗莎·卢森堡言论集》，第289页。应当指出，她不是反对纪律，而是对集中制集中的程度不明确。参阅米利班德的书，第125页。

④ 同上书，第391页。罗莎·卢森堡的言论是不能用几段节录来概括的。这里节录的几段话，只是用来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价值的思想的连续性。她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许多作者（包括葛兰西在内）起了媒介作用。

变成现实：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人专政。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霸权逐渐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或者废而不用（如意大利共产党），或者直言不讳地予以否定（如1976年的法共和1979年的西共）。

柏林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文件完全删去了这个词。不再用这个词当然不意味着它所代表的现实已不再存在。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左的或右的批评，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争论的大问题。右的方面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虽然不用了，但欧洲共产主义党一旦掌权，它将同现在掌权的党一样搞独裁。左的批评则认为，不用这个词不等于消灭了阶级斗争的现实。正如资本主义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控制一样（多少是隐避的“资产阶级专政”），任何社会主义政府必将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控制（多少是隐避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名称如何，问题依然存在。^①

欧洲共产主义者回答说，“资产阶级专政”及其对立面“无产阶级专政”等词，不论在语言上或内容上都是有缺陷的。这些词过于简单化了。否认资本主义政府之间有着意味深长的差别，按照“资产阶级专政”的套式把它们（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到罗斯福的新政）混为一谈，等于是放弃了政治分析。欧洲共产主义者引用列宁的话来回答列宁主义者：

“在德国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英国也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在奥地利，以及美国和瑞士也都有。如果一个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看不到民主主义程度上的差别，看不到民主主义形式上的差别，那他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②

① 左翼和右翼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在理论上的争论，参阅巴拉巴尔、阿尔都塞、曼德尔和德尔·诺斯等人的著作。

② 米利班德的书，第81页。作者引用的这段话未注明列宁著作的出处，译者是按照原文直译的。

欧洲共产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专政”一词应该留给象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弗朗西斯哥·佛朗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等等之类的政权，而“资产阶级领导权 (hegemony)”一词应该用于民主政府。葛兰西常用 Hegemony 这个字，按照韦氏新国际词典的解释，它的意思是“领导权，占有优势的影响或有权威”。这个字长期以来已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专用字，但中国人又用它（按中文又译为“霸权”——译者）来反对俄国人，这个字也被收进美国人的外交词汇。事实上，亨利·基辛格声称他首先采用了这个字而后中国人袭用了^①。

当意大利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宣称他们正在本国争取实现“文化的领导权”时，他们的意思是说，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传统的社会准则正在向社会渗透。同时，他们正在为实现“政治的领导权”而努力，在这方面，工人阶级政党将引导议会着手进行为社会主义打开门户的经济改革：劳动人民的经济领导权^②。

这种领导权既不存在也不希望使用暴力；相反，它的目标是实行更深入更积极的民主。民主联盟没有理由诉诸暴力，相反，它的问题是要防止绝望和被摈弃的阶级（现在掌权的上层集团）采取暴力。对于发展这个理论已有三十年的意大利共产党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意大利共产党人把民主看作是重建国家的主要杠杆。我在一

① 威廉·萨菲尔 1979 年 12 月 16 日在《纽约时报》驳斥了基辛格的说法，证明毛（泽东）在很长时间以前就用了这个词。这个词是通过葛兰西传播开来的。当然这个词源出古希腊文。

② “Hegemony”一词曾经是许许多多讨论和翻译的题目。参阅佩里·安德森的《A·葛兰西的自相矛盾》；E·P·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第 72—77 页；J·康梅特的《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第 204—5 页。

次访问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学院时对这一点有深刻印象。学院设在一个叫做弗拉托切的市镇附近，距离罗马30英里。弗拉托切（这个名字已成为学院的同义词）是意共的研究院，有四名专职教授和一批管理人员^①。它建筑在一座宽阔和优美的庭园里，有若干给人深刻印象的现代建筑，有教室、宿舍和餐厅。这座庭园原为一个有钱的意大利犹太人所有。他把这座庭园和别墅卖给共产党人，因为“只有他们能够不受商业发展的引诱，而使这座庭园维持符合他的心意的状况”。^②

学院院长是卢齐亚诺·格鲁皮，一位五十开外的人，身材瘦小，沉默寡言。格鲁皮是意共中央委员和党的文化委员会主任。他是一位有学术修养的哲学家，精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葛兰西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并且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干部。他的书《陶里亚蒂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出版于1976年3月，引起了莫斯科愤怒的反应，它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直接攻击格鲁皮。意共党报《团结报》给予尖锐的回答，指出对格鲁皮的攻击实际上是“反对意共和其他西方共产党选择的基本政策”，并指出苏联作者的“奇怪的公式”把列宁的思想歪曲成为“一系列永远固定不变的教条”。

我告诉格鲁皮，我对共产党人为使工会结构民主化和通过权力分散使政治民主化所作出的努力有深刻的印象。我还注意到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和学校的民主化，使教师、家长和学生都有发言权。而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共产党的工作“作风”——他们互相之间以及他们同天主教徒和其他非党人士打交道时的自由自在，毫不拘束，领导人不浮夸和不自命不凡。

① 意共在意大利共设有7所这样的学校。参阅本书第八章有关注释。

② 学院开学不久，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到此访问，他认为这座学院“过于雅致”。（波卡：《陶里亚蒂》，第402页）

我参加过意共的会议，我发现有一种在欧洲少见的美国人的风格。毕竟，欧洲人不知道美国人所理解的民主——不只是议会制度，而且在日常生活和思想习惯方面。例如，英国直到今天还充满等级观念，而美国人则比较平均主义。

格鲁皮既表示同意又提出异议：“毫无疑问，通过你们的电影、杂志和书籍，使我们的人民受到美国人与人之间关系作风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你们的种族主义，你们的帝国主义，你们对越南、智利等等的干涉。我们认为你们的人权宣言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知道，在美国，它经常遭到践踏——对黑人、妇女、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和一般穷人——但是我们相信，补救的办法是扩大人权宣言的规定和增加经济民主。”

我问格鲁皮，意大利共产党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一种修正。

“我们力图扩大和分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来反对资产阶级。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者。我们是修正列宁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必须‘打碎’的主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国家与革命》的主张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要使工人斗争从属于议会斗争。今天我们在议会已拥有不容忽视的力量，我们可以同议会外的群众斗争取得联系。而且，随着现代国家越来越走向独裁主义，如戴高乐主义或尼克松主义，恢复议会的威信本身可以说是朝着民主前进了一步。这是意共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且，当列宁在1917年写他这本书的时候，他还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与国家的压迫机器一起的还有一个经济机器不应该打碎，相反，社会主义者应当接管过来加以利用。①

“让我换另一个方式来说。改良主义者宣称：我们不用摧毁这个制度，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正统的革命者说：争取改革的斗争不是革命，因为它没有改变这个制度。二者都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二者把争取改革的斗争同夺取政权的斗争隔裂开来；结果他们都成了机会主义的变种。”

在分手的时候，格鲁皮给了我几份学院的教材和一份附有注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论述民主的文献目录，包括卢森堡和葛兰西的著作。他说：“扩大民主是赢得社会主义政权的关键，共产党人应当是导师和组织者。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要靠水来养活。我们就是这样教导的。”

左的方面(如《每月评论》)利用关于“打碎”国家机器的问题，批评欧洲共产主义说，意大利共产党人抛弃了这个观点和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英国工党一样“出卖给”资本主义制度。不论人们站在哪一边，跟现在盛行的语录战是毫不相干的。^② 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有一点是无可辩驳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随着周围现实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对具体情况必须进行具体研究。^③ 语录战并没有改变这个必要条件。这个问题简单说起来是

① 列宁和陶里亚蒂(通过葛兰西)都很关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见格鲁皮：《陶里亚蒂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②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它的经典著作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的语录有启发性，但不大解决问题。正如米利班德所说的，“有许多比‘人人都有自己的马克思’更坏的口号，因为到头来没有什么‘权威性的解释’——而只有个人的判断和估计”(《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第5页)。

③ 葛兰西喜欢援引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人们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就算已经充分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英文版《狱中札记选编》，第472页，以下简称《狱中札记》)。

这样的：欧洲共产主义是不是认真地试图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变革，以便为走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果真如此，它会不会取得成功？第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只有等到将来才能得到答案。

意大利为第一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试验场，因为意大利共产党已在设想实现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策略，本书的第二部分将检验其结果。来自左的批评强调一种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就是党在制订迎合中间阶级的政策时，将会损害党的工人阶级基础。1979年6月意共在大选中遭受的挫折表明这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拉尔夫·米利班德教授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这本杰出的评论中谈到这个危险：

“基本论点是，资产阶级民主和立宪主义产生了对革命运动的约束力，并把运动引向可以称为相互补充的立宪主义……”

对于那些抱有强烈竞选野心的党，不论他们想超越资本主义结构的最终意图是多么真实，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试图去扩大他们的要求，强调他们直接（不是十分直接）目的的相对温和性。”^①

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充分意识到这个危险并正在探索解决的办法。他们可能会失败，如同巴黎公社失败了一样，但这不能证明，他们注定要失败。米利班德并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阐述人，他在这本书的结尾明确指出：

“这一战略变幻莫测，充满陷阱、危险和困难；也可能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最好还是对可供抉择的办法有清醒的认识而不要用口号代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由于它的阶级局限性而被削弱，并且经常处于受到保守势力进一步削弱和严重损害的威胁之

^① 米利班德的书，第162—3页。

中,特别是在持久的严重危机的时期更是如此。然而,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组成部分的公民自由(尽管不充分和靠不住)是人民群众不懈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任务就是要保卫这些自由权利,并通过消除它们的阶级界线来发展和扩大这些权利。”^①

米利班德的书并不是没有受到批评的,但书中同我们关系最大的论点,即和平过渡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是经过他深思熟虑并证明是有价值的。这个结论应当使许多争论平息下来。当然,什么是共产党的正确的战略还是一个值得辩论和验证的问题。例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认为,工党在1945年应当奉行它所制订的利用改革的战略,作为实现变革的社会的踏脚石。

当时这样一个战略能否行得通很难说。但是工党如果这样做肯定不会象它在1979年大选中那样糟,它的许多追随者把票投给了玛格莱特·撒切尔。很有意思的是,民族传统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竟然同具有新黑格尔主义(通过贝内德多·柯罗齐^②)民族传统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合到一起来了。这一点在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中看得特别清楚。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上层建筑的概念不仅包括政治(我们在本章已经涉及),而且包括艺术、宗教、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即称为“经济基础”的经济和生产范围以外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关系、工艺术、自然资源、所有制,等等。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数,社会上的一切都受它的制约。数十年过去了,这种见解被庸俗化,成为一种紧身衣: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这种决定论使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宗教、文化作了错误的分析。葛兰西同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决裂,恢复了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的独立性,并

① 米利班德的书,第189—190页。

② 柯罗齐是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译注

开始按照各自的本来意义作出分析。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年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他在1910年左右成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1921年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成为该党总书记。他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着了迷并有非凡理解力的人。他的著作充满了一种精神振奋感。

这种精神的振奋在那些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甚至在那些后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是不足为奇的。克利福德·奥德茨有一次对我说，马克思主义对他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只不过让我转了一圈”。我想起《等候左倾分子》一文所表现的热情，文章最后对“革命的海燕”发出的呼吁，我禁不住发笑。“我懂了，我懂了，”我说，“转了一小圈——一直转到银河轨道。”

一个觉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小圈是很少被超越的。不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存在什么缺点，毫无疑问，无论在什么地方，包括梵蒂冈在内，它的方法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辉煌的成就。在意大利，既精通托马斯主义经院哲学又精通辩证法的高级教士，人数出乎意料的多。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提出的见解是如此令人神往，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对理论十分尊重——几乎达到迷信的地步。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反对者在理论上的争论有着如此重要份量的原因。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尊重，同时也说明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所以如此顽强地进行理论研究的原因。^①

葛兰西于1926年11月被捕，并于1937年4月在监狱中死亡。他

① 葛兰西的顽强意志在获得书籍报刊方面对检查官和看守人也起了作用。他（在狱中）建立了一个藏书百卷的图书馆，其中包括有大约二十卷马克思主义著作。详情可参阅阿蒂洛·巴尔丹的《三十年的历史学家葛兰西》，以及朱塞佩·卡蓬的《葛兰西的狱中图书》。

在那十年监狱岁月里写下了总共100多万字的33本笔记，这些笔记由他的姨子塔蒂亚娜·舒茨特在安排丧事时从他的牢房里取出来。这些笔记本后来被送往莫斯科。

这些笔记本树立了葛兰西作为一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可以同列宁以后时期的毛泽东相比美。（1917年毛泽东是24岁，葛兰西是26岁。）他们两人都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塑造出来的，都是列宁主义者，然而他们两人都抵制“俄罗斯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符合他们本国的民族特点。

葛兰西被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如果不任意乱用的话，这个说法是合适的，因为葛兰西在欧洲共产主义盛行之前40年就已经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是一位列宁主义者。他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纪律，并拒绝渐进主义。然而，他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他的著作勾画出欧洲共产主义发展的大概轮廓：拒绝理论的僵化和共产国际的独裁主义，强调民族文化、党内民主，强调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和研究自由。

葛兰西对国家的性质以及对宗教、科学、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媒介机构的研究，有独到和深刻的见解。他的非凡的才能受到广泛的承认。他受审讯的时候刚31岁，检察官对法官说：“我们一定要使这个人的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①这是经常发生的一个历史的讽刺，监狱给了他空闲的时间来使他的头脑工作。

葛兰西最有成果的思想大概是关于武装力量在工人阶级战略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为革命实质上就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武装力量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依靠枪杆子和武力产生的政权是历史的接生婆。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国内战争。随着热核战争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xxxix页。见D·朱卡罗编：《特别法庭对意共领导人葛兰西的审讯》（罗马联合出版社1961年版），第109页脚注1及第219页，检查官称葛兰西是“共产党的头脑”。

的出现,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内战已变得十分危险,因为它可能引起超级大国的对抗和《共产党宣言》所想象的“敌对双方的毁灭”。由于资本主义处于守势,这种局势给了统治阶级一把讹诈的利刃,它必然要使工人阶级取得的任何进展化为泡影。正是在这节骨眼上,葛兰西的思想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提供了种子。

葛兰西分析了夺取政权的问题,他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分为两种方法——运动战和阵地战。^①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是指列宁和俄国革命的方法,米利班德教授称它为“暴动的政治”。另外有人称它为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激进主义的方法”。在这种不同的方法中,一个有组织纪律的党,在社会崩溃和统治阶级晕头转向的时刻(往往是由于战争失败的结果),可以依靠武装力量夺取政权。革命得到有同情心(不一定有阶级觉悟)的人民群众的拥护。这就是十月革命。

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是指资产阶级制度和组织机构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而逐渐瓦解。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问题越来越无法解决,工人阶级抛掉了从属的阶级的自卑感,学会成为统治的阶级,建立起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可是,葛兰西仍然认为,要对资本主义堡垒发动最后的攻击,武力还是不可缺少的;革命的大突变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国家必须用革命的打击来加以摧毁。然而如果出现没有人敢于使用武力的情况,那么和平过渡就成为生存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于是葛兰西的阵地战就导向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和平过渡的思想。

葛兰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欧洲共产主义。他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一方、陶里亚蒂和贝林格为另一方之间的桥梁。西班牙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229—239页。这些现已闻名的关于“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段落,最初是分别写在几本不同的笔记本上的。

牙内战期间，当陶里亚蒂还在巴塞罗那的时候，就收到葛兰西笔记的影印本，他在轰炸声中凭借烛光进行工作，着手研究这些材料以便出版。^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计划终于实现了，笔记的最后一卷是1954年在意大利问世的。葛兰西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宝贵财富。^②

对于欧洲共产主义来说，同葛兰西发展的新思想一样重要的是他的人道主义的遗产和专心致志于一般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启蒙运动。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是以往一切最优秀成就的继承者和保管者。与斯大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控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做法截然不同，他主张思想与创作彻底和无条件的自由。^②

按照马克思本人的伟大的欧洲文化传统，葛兰西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思想开放的思想家，在探索真理方面严肃认真。葛兰西主编的《新秩序》周刊刊头载有一句格言：“讲真话就是革命”。今天，当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缺乏正直诚实的影响的时候，葛兰西的严正朴实是令人感到清新和受到鼓舞的：

“我们不应当把科学讨论设想为法庭的诉讼。在那里，有一个被告和一个起诉人，后者为了履行他的职务，必须证明被告是有罪的，因而应当停止活动。科学讨论的前提是把注意力放在探索真理和推动科学的发展上面。因此，最“先进的”思想家是这样一种人，他懂得他的对手可能表达一点真理，哪怕微乎其微，也应当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来。

实事求是地理解和估价对手（有时这个对手是代表过去的全部思想）的立场和道理，的确意味着自己从意识形态的牢狱（就其

① P·斯普里亚诺，《意共党史》，第三卷，第156页。

② 见米利班德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他大量援引了毛（泽东）的语录，第62—64页。

坏的意义上来说是盲目的狂热性)中解放出来,从而有了批判的精神。这是科学研究唯一富有成效的态度。(着重号是作者加的)①

对于葛兰西来说,创造力和现实主义是未来工人国家必不可少的。他写道:

“从被压迫阶级取得政权,创建一个新型的国家的时刻开始,必须创建一种新的道德精神秩序,也就是说,创建一个新型的社会。这就需要发展更带有普遍性的思想,更精练和更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武器。”(着重号是作者加的)②

他接着写道:

“在争取领导权的阶段(取得政权以前),主要是发展政治学;在取得国家政权的阶段,必须发展一切上层建筑,否则国家本身就可能崩溃。”(着重号是作者加的)③

葛兰西充分意识到,在过渡社会中,旧思想的影响很强大并且在起作用,需要好几代才能消失④,用排斥和审查的办法(正如天主教会在它力所能及的任何地方所做的那样)以及由国家限制自由讨论的办法来消除这些旧思想,这种诱惑力是很大的。葛兰西的态度毫不含糊。他说:

“在我看来,不可避免,探索新的真理……应当让科学家个人去自由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即使科学家们继续重新审查那些看来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前提,并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也罢。”⑤

葛兰西的思想,特别是在意大利,对共产党同妇女、工人、神甫和自由职业者的关系有深刻影响。意大利人,不论他们之间有什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43—344页。

②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88页。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04页。

④ 在许多基督教地区,尽管经过许多世纪的镇压和根除,异教徒的势力仍很强大。

⑤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41页。

么分歧，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一致认为共产党人是严肃认真的^①。葛兰西的道德观加强了这种看法：

“革命需要的是头脑清醒的人，不会使面包店缺少面包的人，让火车跑动的人，为工厂提供原料的人……保障人民的安全和自由、制止罪犯袭击的人……不会使人民陷于绝望的人。如果以上任何一个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甚至是在一个只有百把居民的村子里），光有口头上的热情和天花乱坠的词句，只会让人发笑（或哭泣）。”^②

葛兰西说到做到。他刻苦顽强地工作，肺结核病毁坏了他的身体。他患有失眠、出血、昏厥和精神错乱。从他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他早期的笔记字迹整洁，用清楚和正常的书法书写；快到末期的时候，他的手摇晃，笔迹错乱、虚弱和没有规则。但他的思想还是那样清晰、锐利和朝气蓬勃；保持着自信和内行的风格，幽默讽刺，显示了熟练地使用语言的天才。

葛兰西于1937年4月27日逝世。他逝世时，法西斯和纳粹的军队正涌进西班牙。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到处在前进，得意洋洋。8年以后，当春天再度降临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倒挂在米兰的一个煤气站。

葛兰西的思想和榜样依然存在。他的开放的、创造性的马克

① 外国观察家曾经再三指出，意共的“严肃认真”和“对民主的承诺”在意大利是普遍公认的。我仅举两个例子：伦敦《泰晤士报》的彼得·尼科尔斯曾经写道，当需要的时候，共产党人“有较好的准备，较多的办法和较高的效力……他们坚持学生要负责地学习和行动。”再者，意共“以卓越的管理而享有盛名。”（《意大利的决定》，第133页）

黛安·约翰斯通（《在这些时候》的记者）写道：“近几年来，作为意大利立宪民主的中流砥柱的意共观点实际上已发展成为意大利的一致意见。”她援引天主教神学家B·波佐的话说：“今天的意共比任何其他社会团体更加捍卫意大利国家的民主性质。”（1978年10月11—17日）

② 葛兰西：《新秩序》（1919—1920年），第377—8页；米利班德的书，第181页。

思主义,首先是在意大利,接着是在欧洲,以后又慢慢地扩展到世界各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假如欧洲共产主义实现了它的诺言,大部分成绩应当归功于这位墨索里尼的囚犯。

第三章

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欧洲 社会主义者

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多数批评，不论是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都认为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对抗：雇主们会不会对经济进行破坏？军队会不会保持中立？官僚机构会不会分裂？工人会不会俯首听命？等等，等等。我对上述问题不作任何最低估计。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能够达成阶级团结吗？阶级团结象块磁铁，能够吸引来自其他集团的同盟者——自由职业者、农民、小商人。如果工人不能和他们并肩同行，其他人也不会和他们并肩同行。在二十世纪，这种缺乏团结的现象已被迫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它是使希特勒得以上台统治的许多灾难性因素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资本主义世界制订政策的人没有忽视工人阶级团结的重要性，他们在运用古罗马人关于分而治之的格言方面都是一些老手。由于社会党比较不受纪律的约束，所以对他们比较容易施加影响，但是共产党也并不是不会被渗透的。

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一个同它对立的运动——欧洲社会主义也发展了，后者的目的是要在欧洲左翼中保持社会党的领导权。受到许多条件的支配，社会党利用欧洲议会的第一次直接普选（1929年6月）来检验它的力量。当前各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

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和千差万别的。

在历史上，二十世纪的社会党和共产党起源于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共同的组织遗产——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①第一国际是一些激进的小集团的松散联盟，由于卡尔·马克思同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米海尔·巴枯宁之间的冲突而破裂，实际上在1871年就被埋葬了^②。随后的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成为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党遍及全欧洲，并于1889年组织了第二国际，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领导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当时69岁，是该党公认的理论家和政界元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左翼分裂出去另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但第二国际依然存在^③。成立共产国际是列宁的主意。它是在预料革命会在全欧洲发生而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成立的。以下几个因素对它的形成和章程起了作用：第二国际的背叛，德国革命迫在眉睫，列宁主义党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共产国际的诞生和兴亡是欧洲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一个党认为自己是社会党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党，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英国工党。虽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它独立发展并恢复为宪章主义者。最近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贝蒂诺·克拉西试图宣称他的意识形态的鼻祖，是普鲁东而不是马克思，他的这种突然袭击被认为是一种论战手法，值得同情而不是嘲笑。

② 关于各个不同的国际的历史很多，我主要是采用克劳丁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情报局》一书以及《英国大百科全书》。现在关于第三国际的书目很多。有关文件，可参阅简·德格拉斯主编的《共产国际文件集》；H·格鲁伯主编的《列宁和苏俄控制共产国际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以及A·阿戈斯蒂的《第三国际文献史》。

除克劳丁的书外，关于国际的其他历史书还有：F·博克瑙的《欧洲的共产主义》（纽约哈珀出版社1953年版）；H·塞顿—沃森的《从列宁到赫鲁晓夫：世界共产主义史》（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60年版）；对意大利特别重要的有J·拉吉奥聂里的《第三国际与意共》和《列宁与意大利》。

③ 第二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寿终正寝，并于1951年在法兰克福复活（指社会党国际——译注）。

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的背叛行为是出乎意料和破坏性的。第二国际当时拥有巨大的力量，它在各国的成员党有数百万名党员和成千上百的议员。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上，第二国际领导人斩钉截铁地宣称：

“如果不问一切情由爆发了战争，社会党人的责任就是要使战争尽快结束，并尽一切力量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醒民众，从而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灭亡。”^①

在哥本哈根(1910年)和巴塞尔(1912年)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不是左翼社会党人的法国领导人让·饶勒斯在巴塞尔大会上说：“我们决不同我们的弟兄们作战！我们决不向他们开火！如果不问一切情由燃起了战火，那么将会有另一条战线的战争——将会有革命。”^②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社会党都支持本国政府。

共产国际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在列宁看来，迫在眉睫的欧洲普遍革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逃离战败的德国后，列宁(1918年10月)在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写道：“在一个星期内，国际革命是如此迫近，以致可以认为在未来几天内会发生事变。到了春天，我们就会有一支300万人的大军来援助国际工人革命。”(着重号是列宁加的)^③

共产国际形成的第三个因素是列宁指导的俄国革命的威望——它是人类历史上由职业革命家领导的第一次革命。这些革命家自觉地进行训练并献身于这个任务。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民主党在战争

① 引自E·曼德尔的《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第9页。

② 同上书，第9页注释。

③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情报局》，第53页。

爆发时的背叛行为，跟着在大战结束时又进行了第二次背叛。当时德国的革命被巧妙地纳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社会党政府的轨道上。艾伯特同兴登堡将军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军队将支持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将肃清革命活动。这项秘密交易的结果之一就是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两人被害。^①在这双重背叛中流出的鲜血培育了组织共产国际的左翼社会党人的仇恨。主要敌人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民主党。

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有缺陷，这些缺陷是那些对列宁有影响的人造成的。急急忙忙的成立使共产国际欠成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仇恨使它在工人运动中成为一支分裂的力量；一党制的观念使它过于集中。俄国的模式证明是一种阻力而不是鼓舞力量。罗莎·卢森堡早已预见到这个问题。她写道：“布尔什维克以他们坚定的革命立场，行动的榜样力量，以及他们对国际社会主义牢不可破的忠诚……已在那样险恶艰苦的条件下作出了他们所能作出的贡献。”接着她警告说：“只有当他们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做，并且想要用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恶劣的环境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策略凝结起来的时候，危险才开始出现。”（着重号是作者加的）^②

虽然列宁极力支持中央集权制和纪律，但他深切意识到十月革命的特定条件。在逝世之前，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① “就在当时当地，这位社会党领袖（艾伯特）和德国陆军的第二号人物（格罗纳）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这个协议虽然过了很多年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却要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艾伯特答应要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格罗纳则保证陆军支持新政府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它的目标……兴登堡和格罗纳催促艾伯特履行诺言。”（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纽约西蒙—舒斯特公司1960年版，第54—55页）。

② 罗莎·卢森堡《政治文选》第250页；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情报局》，第92页，并参阅L·梅纳什的《布哈林论列宁》。

(1922年)上告诫共产党人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俄国的经验并强烈要求他们要学习：“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对我们大家（俄国同志和外国同志一样）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坐下来学习……从头学起。”^①六十年后，西班牙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克劳丁赞许地援引卢森堡和列宁的话，并对共产党人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表示遗憾，他写道：“正当最需要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时候，十月革命提出了理论上的自满自足。”^②

事后来看来，共产国际最大的缺陷是它强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组织。在战争烈火中，精神上的军事状态和军队的隐语是很平常的。阶级战争把军队的隐语从比喻的说法变成现实的概念。因为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所以列宁主张组织全球性的工人运动，由一个能够使人们绝对服从的总参谋部来领导。

第二国际的两次背叛加强了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制止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而共产国际制定的21条加入组织的条件过于严格，以致于把许多赞赏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集团拒之门外。根据这些条件，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都是这个组织的支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解除各个支部领导人的职务和干预各个支部的国内政策，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权独立地采取行动。^③章程还明文规定要执行军事纪律：“在现今内战激烈的时

①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情报局》，第70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③ 这个时期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众所周知的。很少人象意大利共产党人那样，对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或“国际主义”，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因为意共比共产国际的任何其他“支部”经历了最早和最长时期的秘密状态。正如U·塔拉齐尼在1925年7月所指出的：“共产国际在成立宣言中的确向劳动群众显示它不是各党的联合组织，而是一个划分为若干国家支部的世界党……每个支部不仅是运用自己的经验而且是运用整个国际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纲领和解决各自活动中的问题。”（共产党档案303—3册53页/第28号通告[1925年7月]）。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阅M·L·萨尔瓦多里的《葛兰西与民主历史问题》，第23—4页。

代,共产党只有建立起尽可能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组织,只有普遍执行铁的纪律,只有党的领导中心……有力量和权威并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力,才能够完成它的任务。”^①

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把保卫俄国革命作为它的主要任务;但它的创始人(包括列宁在内)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保卫的策略应当由俄国人来制定,也没有想到共产国际会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附属品^②。到1930年,情况就是如此。斯大林在苏联居于统治地位,完全控制了共产国际并把它变成他的对外政策的工具。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任意撤除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后,在1943年他解散了第三国际。他想要使他的资本主义盟友消除疑虑,表示他已无意在战后挑动革命。

无可置疑,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经历——共产国际的俄罗斯化,马克思主义陷于矛盾和混乱,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破坏了他们对斯大林的忠诚。早在斯大林逝世以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就很愤慨并悄悄地抛弃斯大林主义,这种态度是促进欧洲共产主义诞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今天来批评那些男人和女人的默不作声和俯首帖耳是容易的,然而,那是纪律和团结精神至高无上的时代,那是反革命和法西斯的时代:沈阳(指九一八事变——译注)、阿比西尼亚、维也纳^③、格尔尼卡、慕尼黑。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进行了战斗并取得了值得赞誉的

①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情报局》,第106页。

② 列宁曾期望共产国际的总部有一天会设在柏林。但结果莫斯科成为唯一安全的地点,俄国的影响在短期内变成是至高无上的。

③ 1934年2月,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建立了半法西斯政权,用大炮来对付被围困在住房建筑内严阵以待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左翼被击溃了;接着在同年6月,亲希特勒的法西斯分子刺杀了陶尔斐斯,为希特勒接管奥地利铺平了道路。

成就——派去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在殖民地世界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培训了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共产党领导人。

从1919到1943的24年内，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各党之间的关系是从公开的敌对到互相猜疑的合作。一直到1935年，这种敌对的情况依然持续不断，并对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希特勒的崛起使人们从这场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清醒过来。193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达成了一项团结公约，法国共产党人向社会党人提出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终于在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转而采取一项合作的政策，结果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了人民阵线。陶里亚蒂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设计师，大会选举了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为领袖。^①

总的说来，谈到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没有一个集团或党在历史法庭面前不受到谴责。斯大林另当别论。社会党人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对1920年“卡普暴动”^②和1923年希特勒与鲁登道夫的“啤酒店暴动”^③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们对1934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对意大利的陶尔斐斯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以莱昂·布鲁姆^④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人对西班牙采取不干涉主义和在慕尼黑出卖捷克的行为负有特别责任。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仇恨具有朋友之间感到自己被对方出卖时常有的那种狂热的性质。这种仇恨由于共产党有责骂人

① 季米特洛夫是审判国会纵火一案的英雄，他在法庭上使戈林几乎处于昏厥状态。

② 1920年3月，德意志祖国党人卡普(Wolfgang·kapp)发动军国主义者和国防军军人搞政变，失败后逃亡国外。——译注

③ 1923年11月，希特勒在军国主义者鲁登道夫将军的支持下，率领国社党党徒，围困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里集会的巴伐利亚邦政府领导人，发动政变，企图夺取政权，最后遭到失败。——译注

④ 布鲁姆说他“怀着羞耻的宽慰心情”接受了慕尼黑协定。

的传统而加剧了，这个传统是马克思首创而由列宁正式化的。马克思是一位易动感情的人，他责骂人的话是辛辣尖刻的。列宁把这个特点变成一种政治武器。他说：

“我有意选择这种语气是想要引起听者的仇恨、厌恶和轻蔑……这是一种语气，一种公式，不是为了说服人而是打乱对方；不是为了纠正对手的错误而是要消灭他，把他从地球上扫除出去。”^①

诸如“马屁精”、“害人虫”和“资产阶级走狗”之类的形容词是使人不会很快忘却的。这类语言加上使人更加不可原谅的行为，遗留下来的是在各国程度不同的互相猜疑。最剧烈的是在德国，最沉寂的是在意大利。即使在暂时沉寂的地方，任何一方也会突然燃起愤怒的火焰，如1975年在葡萄牙、1978年在法国和1979年在意大利发生的那样。从表面上看，社会党人不相信欧洲共产主义者会信守民主。象费尔南多·克劳丁这样敏锐的观察家也认为这个问题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争论的中心问题。

1977年10月，我坐在马德里布拉多博物馆后面的一家酒吧馆里，同共产国际的西班牙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克劳丁共进快餐，克劳丁已写了四本书，其中包括一本关于共产国际和一本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书，每本书都着重论述党内事务和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他是一位富于哲理性的人，他的著作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样有其独特之处，理论和实践融合为一个激发人们兴趣的整体，作者所分析的事件都是亲自参加过的。

克劳丁多年来曾经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由于“不成熟的欧洲共产主义”而于1965年被开除出党。他讽刺地说，这给了他

^① V·戈尼克：《美国共产主义传奇》，第250页。

“时间和思考的自由，按照我的知识和经验去探索”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导致斯大林主义的产生。

我们会面是为了讨论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他给我带来了他写的关于欧洲共产主义一书的第三版，刚刚发行，其中最新的一章写到1977年9月——表现了作者考虑周到的特点。我们两人岁数差不多，气质有点相似，互相之间很快就毫无拘束了。他有隽永机智的幽默感，常常是针对自己说的。我们两人过去和现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觉得他有点过左，他觉得我有点过于“美国式”——这是他对“天真”的文雅的说法。）但他对我很有帮助。他写的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书，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展的观点来看，是英文书中最好的一本。

克劳丁强调共产国际对于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理解那些年头马克思主义如何被弄得荒谬可笑，我们才能估价现在正在发生的改变。正是共产国际的独裁性质损害了许多共产党。因此，民主的问题对于树立欧洲共产主义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在克劳丁看来，欧洲共产主义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充分谴责苏联缺乏民主。

他认为要树立欧洲共产主义的信誉需要开展三方面的工作：承认东欧国家政权不是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对西方社会党及其盟党拥有领导权；共产党的内部结构的民主化，也就是抛弃所谓“民主集中制”。

我认为第一个条件同密切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工作关系是毫不相干的；第二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共产党人不能宣称自己比社会党人更加“马克思主义”；而第三个条件也许是不必要的，这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讨论表明，克劳丁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要比他的著作所显示的更少教条主义。

自从我同克劳丁谈话以后，情况的发展使我更加相信，社会党人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取决于他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中的两个条件。对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来说，东欧国家政权是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是漠不关心的。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认为这些国家正受到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朝着内部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社会党人对共产党自命拥有领导权的确是恼火的，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各国有所不同。法国共产党至今仍然是最顽固的，自称是工人阶级独一无二的党。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对社会党的情感比较协调，共产党的报刊客观地发表了反对意见，反对者的书也得到公平的评论，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

“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比较复杂。社会党人的确攻击民主集中制，但是这种攻击似乎属于竞选的争论而不是对欧洲共产主义民主的原则性的怀疑。许多社会党也断断续续地实行过民主集中制。民主工会（不论属于什么意识形态）就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这就是，经过自由讨论和自由投票后，多数人的决定对少数人具有约束力。这个原则使意见的一致具有力量：使各种创新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发表，使安定的局面具有充分的延续性。一般地说来，政党的方向是各不相同的，把有纪律的民主集中制引入政党之内是列宁对政治的一个贡献。在几个主要的欧洲共产主义党（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这个原则得到重新肯定。

归根到底，决定一个党的党内民主的不是口号、章程或结构，而是日常的工作和工作作风。葛兰西是一位鼓吹思想和行动自由的人，他在大约五十年前就看得很清楚。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而且，一个党的所作所为可以作为识别的标准。当一个党是进步时，它‘民主地’（民主集中制）开展活动；当一个党是退化时，它‘官僚主义地’（官僚集中制）开展活动。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党只是一

个单纯的、不动脑筋的执行者。在法律意义上说,是一个警察的组织,‘政党’的名称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性质的隐喻。”^①这是对斯大林主义党多么敏锐的洞察力!难道因为有一个贝蒂诺·克拉克西或一个哈罗尔德·威尔逊的狂犬吠月,就把这种洞察力抛掉吗?欧洲共产主义者从这位思想家那里找到共鸣,并维护他的理想:

“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一个灵活的公式,它可以包含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只要它得到体现并不断适应需要,它就具有了活力。它存在于从表面的多样化中求同一和在表面的一致性中求差别的批判性研究之中……这种在国家和地方的现实中区分‘国际的’和‘一国的’因素的不断努力,实际上是促使历史前进的真正的政治行动和唯一的活动……它需要理论与实践、知识界与人民大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有机地统一。”^②

在欧洲共产主义党内部,越来越多地用葛兰西的语言来阐明民主集中制^③,西班牙更是如此,法国最少。在意大利,意共的艺术家和作家表达方式的自由是最充分的,在其他党员中间也有很大的自由,而且在日益发展。下面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1979年10月和11月间,意共元老阿门多拉和总书记贝林格就工会问题公开在报上展开激烈的争论。^④这场争论在意大利引起人们的巨大兴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英文版第155页。葛兰西把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从党内的体制扩大为社会纪律的广泛问题。他在《组织的集中制和民主的集中制:纪律》的小标题下写道:“我们所说的纪律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词象征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为了实现集体的意志而形成的一种持续和永久的关系?当然不是消极地和因循地接受命令……而是自觉地和清醒地吸收要实现的指示,……纪律并不取消个性和自由:‘个性和自由’问题的提出,不是纪律本身,而是‘宣布纪律的政权的本源’。如果这个本源是‘民主的’……而不是‘独裁的’……那末,纪律就是民主秩序和自由的必要的因素”。(意文版《狱中札记》第1706—1707页。)

② 葛兰西:《狱中札记》,英文版第189页。

③ 请参阅1979年8月10日《再生》周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讨论。

④ A·米努齐:《菲亚特“提前了”?但我们不是在五十年代》,1979年11月3日《团结报》;1979年11月5日《全景》杂志。

趣,但没有一个人感到惊讶或反感。照我看来,任何欧洲共产党大概不会放弃民主集中制,我也不认为民主集中制是阻碍社会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工人阶级团结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不同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选民、党内的权力集团、领导人野心的冲突,等等。除非这个团结问题得到解决,否则通过现行制度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将仍然是空想。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诸如费尔南多·克劳丁、埃内斯特·曼德尔、《每月评论》的编辑们等等,他们怀疑社会党和共产党能够在原则基础上达成团结。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欧洲共产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理论上都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很多社会党都要管理而不是废除这个制度。更确切地说,在社会党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左和右的潮流,欧洲共产主义内部的分歧在于经济变革的速度,而社会党内部的分歧则在于经济变革的性质。^①例如在1978年法国大选中,左翼联盟显然在究竟应该有多少企业收归国有的问题上发生破裂。

工人阶级团结的障碍的根子在于资本主义习俗,因而是不容易消除或回避的。这些障碍是不能通过教条的争论得到解决的,比如争论欧洲共产主义者是不是充分民主,或者社会党人够不够急进。这些障碍也不能通过达成管辖范围的协议来求得解决,如欧洲共产主义者负责组织工人,社会党人负责组织中下层群众。工人中间有人只希望实行小的变革,自由职业者中间有人十分急进。左翼领导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要使小厂的工人相信他的雇主

^① 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第103—4页;那波利塔诺:《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9—30页。

是潜在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它要向厂主证明增加工资（这是厂主反对的）不会使他的利润额同原料的垄断价格（这是他无法反对的）一样受到侵犯。双方应当了解这种剥削的程度和性质，从而能够取得妥协和成为同盟者。特别是，中产阶级应当认识到，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从这个制度得到好处，但他们在一些不太明显但重要的方面也受到损失，这些损失只有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才能补救。

资产阶级的积极破坏也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大障碍。一些社会党人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心情，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缺陷，左翼各党和领导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使资本主义势力得以乘虚而入。这些势力千方百计施加他们的影响——不排除采用贿赂、恫吓、诽谤和经济操纵（如在某一个城镇开办企业）。每个国家在斗争中会出现一些无法预言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策略。我认为，稍为研究一下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就能明了工人阶级团结和统治阶层干扰的问题。

我们先从西班牙说起。

在今天的西班牙，几个左翼大党的政治活动受到三个历史事件的制约：内战，40年的半法西斯主义，和工业化。内战是一场饱受创伤的经历（死亡50万人），它对老一代和中年一代至今仍有影响，使这大部分人在政治生活中沉默寡言和易动感情。除了年轻人以外，西班牙人都不愿意谈论战争，我曾经亲身体会到他们如何本能地害怕回想起内战的事。

1977年冬天，我的妻子和我去西班牙，重访我年轻时代到过的战场，埃布罗河沿岸的村庄——皮纳、卡斯佩、奥塞拉，我们曾经在这里挖掘战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2英里外的城市萨拉戈萨，正如乔治·奥威尔所描写的，城市的灯光闪耀，“象一条长长大船的

舷窗”。壕沟早已蚀溃，河的两岸野草丛生。我们的部队（无政府主义者杜鲁蒂纵队）的指挥部设在布加拉洛兹，这是一座有白色城墙和意想不到的拱门的小镇。我记得指挥部好象是设在大广场的一座大别墅里。当我最后来到广场的时候，看不到有别墅，只剩下一些有宽阔门户的三层楼房的尚未破损的正面。

那是为期两周的皮拉圣母节的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钟，人们或者在家里或者上教堂。我在寻找一些年纪较大、能记得起内战的人，我有三次问了几位我认为能向我提供情况的人——一位妇女和两位男人。当他们一听到内战两个字，就摇摇头急忙走开。我领会到这不是由于害怕而是有意疏远，他们不愿意想起这件事。最后我追上第三个人，大约六十来岁，脸色阴郁，头上戴着一顶蓝色贝雷帽，我诉苦地说：“先生，我是美国人，我恳求你的帮助……”他停留好长一段时间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曾经参加杜鲁蒂纵队，问他是否知道指挥部的地点。“拱门旁边的房子。”他低声含糊地回答后就匆匆走开了。我记忆中的别墅原来是一排房子。

“你是不是要去按门铃”，我的妻子说，“然后作自我介绍，说你是征用他们的房子的哪些流浪者中间的一个？”

“不，”我说，“我要自我介绍，我是挽救了他们的高贵家具的人。”的确，是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把家具全给锁上了，把二楼作为集体宿舍。

一位约摸30岁的年轻人开了门。他是房主吗？不是，房主住在马德里。他是看守房子的人。当我告诉他我所关心的事，他立即请我们进屋，并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出来。门厅正是我所记得的样子：嵌花式的地板，装饰的墙壁，弯曲的大理石楼梯。原来二楼的集体宿舍已经不见了，代替它的是有三间房（卧室、餐室和起居室的）豪华套间，备有十八世纪的高贵的镀金家具，东方地毯和锦

缎帷幕。

我竭力寻找厨房，我记得那是一个6呎见方的大房间，有一个凸起的炉灶和用砖砌成的帽盖。我们曾经在那里，围着一堆劈拍作响的柴火，啜饮着黑咖啡。现在厨房也没有了，堆满一些破旧的现代用品。它已成为看守人的住所，被分隔成了三个小房间，其中一间有一个洗涤槽、一个电冰箱和一个丁烷煤气炉，房间干净、狭窄、阴暗。卧室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缝纫机。

我在房间里遇见看守人的妻子，她是一位女裁缝。我可以看出他们一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床的上头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图象，在洗涤槽和炉子的上头有圣母玛利亚的雕饰，在电冰箱的上头有已经枯萎的复活节棕榈叶。在梳妆台上放着一张两个穿白色服装小女孩的照片——“他们领圣餐”，母亲微笑地说。

我们退回到过道。在交谈了一会儿之后，看守人突然问道：“你们纵队有没有一位以前的神甫当了杜鲁蒂的秘书？”我们的确有，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是一个胖胖腼腆的人，不敢用眼睛看人，而且似乎永远等待着会挨人一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杜鲁蒂是一位强烈反对教权的人，战前他就曾经枪杀了萨拉戈萨的主教。杜鲁蒂饶了这位神甫的生命，条件是他必须结婚——神甫照办了。

当我说我认得这位神甫时，看守人的妻子露出笑容说：“他是我们村子的神甫。战后他的婚姻被取消了，他又回到村里当神甫。他去年刚去世。他写了一本书，描写他在纵队里的生活。”她的丈夫笑道：“虽然他的书是反对杜鲁蒂和反对共和的，但在西班牙无法出版。他的书是在安道尔出版的。”

他们对内战的事问个不休。他们还要他们的孩子来听。他们无法知道太详细的情况。尽管他们是天主教徒并受到佛朗哥40年的统治和灌输，但显然他们仍然用他们的父辈和叔辈的眼光来看

待埃布罗的共和国军队。当然，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内战有一种传奇色彩和高尚行为。后来我在马德里看见许多青年人群集在书摊周围，书摊上摆满有关内战的书籍，我想起看守人和他的妻子那种热切的心情。我意识到老一辈和年青一代之间态度的不同，这种不同的态度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共产党的政策。

在欧洲共产主义党当中，西班牙党在言论和行动上是最温和的，这主要是因为它力图消除内战遗留下来的暴力和不妥协的形象。现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曾经是负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当时只有21岁），右翼报纸至今仍指责他跟共和政府方面的不负责任的分子所犯下的暴行有同谋关系。

卡里略对苏联使用激烈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同内战的记忆有关系。弗朗哥主义30年的宣传留下了影响，一般人都认为苏联为了自己的目的操纵了西班牙战争。即使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也接受了弗朗哥的另一宣传，即苏联决心搞世界革命，而西班牙人需要的是和平和安宁。

根据党内民主化的情况，西班牙共产党在欧洲共产主义当中属于中间偏右，它允许党员有发展不同意见的广泛自由。《纽约时报》驻马德里的记者詹姆斯·马卡姆报道了上一届西共代表大会说：“卡里略采取的试验性措施已使西共成为共产党当中最开放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党。他们公开争论，互相揭短。它同大多数政党一样看来是一个由各种不同力量组成的联合组织，而不是磐石一块。”^①

西共党内的一项自由措施是最高领导层存在党内反对派，集

^① 《纽约时报杂志》，1978年11月19日，第158页。

中表现在半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党。该党领导人曼努尔·萨克里斯坦粗暴地攻击卡里略的政治方针说：“只要人们认真对待，欧洲共产主义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相反，它是自1917至1921年失败^①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最近的一次后退。”^②

长时期的法西斯统治对左翼也是不利的。虽然镇压促使人们渴望自由和民主，但是它也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恐惧和消极情绪。甚至到现在，人们对维新国王卡洛斯一世控制下的军方还普遍存在恐惧情绪。卡洛斯国王意识到经济进步需要有很大的自由。要求变革的西班牙人倾向于投社会党人的票而不是投共产党人的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拥有124个议席，西班牙共产党只有24席），而社会党内部是处在右翼势力的控制之下，正如1978年菲利普·冈萨雷斯同左翼摊牌时所证明的那样。^③冈萨雷斯不喜欢共产党人而比较喜欢中间派的苏亚雷斯，但他又觉得有必要同西班牙共产党在市政选举中进行合作。所以说，西班牙共产党的影响不如法国共产党或意大利共产党；然而它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因为二十年来的工业化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共产党人在工会中起支配作用，他们取得了这个基地，就能够同社会党人竞争，从苏亚雷斯政府那里取得让步。

欧洲共产主义在西班牙的前途并不是暗淡无光的。在基层群众中，社会党同共产党的团结日益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就阶级关系而言，地方上的问题更加尖锐；另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分权（它也

① “1917至1921年的失败”，指俄国革命未能扩展到全欧洲。

② 《纽约时报杂志》，1978年11月19日，第162页。

③ 西班牙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78年5月16—20日在马德里举行，大会一再投票赞成采取比它的领袖F·冈萨雷斯更左的主张，于是冈萨雷斯辞职，大会任命了一个看守小组（《纽约时报》1978年5月21—22日）。1978年12月召开了另一次代表大会，经过取得一些妥协，冈萨雷斯恢复他的领导职务。（《全景》杂志，1979年11月5日。）

在发展)削弱了全国性的竞争。1979年4月4日举行了自1933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主要城市和大的市镇取得了巨大胜利,获得42%的选票。《纽约时报》在报道这次投票结果时说:“这个胜利似乎预示着这两个党将走向更密切的合作。”^① 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将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团结,意大利共产党和西德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共同市场内也在走向一定程度的合作。

回头看看法国的情况,我们发现法国的欧洲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同西班牙的欧洲共产主义几乎截然相反。例如,对于俄国熊来说,卡里略好比虻虫,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有如镇痛药膏。在柏林会议以前的长期争吵中,法共一直支持苏联人;它是欧洲共产主义党中最后一个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它依然是意、法、西三个欧洲共产主义党中最僵硬的一个。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党正在考虑建立中间偏左的多党政府,而法国党则指望建立左翼政府。这个政策有其历史根源:法国的阶级结构划分得比较明确,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扎的根比较深。从德雷福斯事件^②到维希政府时期,存在着两个法国,即右翼的法国和左翼的法国。在反对维希政府和德国人的斗争中,主要力量是左翼的抵抗运动。^③ 当然,还可以从历史上追溯到1789年的革命,它使法国打上了雅各宾的烙印,而西班牙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意大利则落后一个半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研究1789年事件的法国主要

① J·M·马卡姆:“西班牙左翼为城市选举的胜利而兴高采烈”(《纽约时报》,1979年4月5日,第A—6页)。

② 德雷福斯是一位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1894年被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为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判处终身苦役,反动派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动对德战争。1899年被政府宣告无罪。——译注

③ 当时法国有两个抵抗运动,戴高乐领导的和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二者力量都较弱,人数大约有数千人,共产党较为强大一些和活跃一些。

历史学家是共产党的一位有威望的 知识分子艾伯特·索博尔。①

索博尔有六十来岁，是一位精力充沛、性情温和、意志坚定的人。他接受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虽然也保留一定的怀疑态度。他认为意大利人的策略过于迁就，而卡里略对苏联的攻击是没有道理的。1977年秋天，他友好地在他的住所会见我，并向我谈了他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关系的评价。

“我们有一个盛衰无常的历史，”他讥讽地说。“撇开二十年代的积怨不说，我们的确在1943年联合反抗法西斯，并且是第一个实现人民阵线的国家。在西班牙问题上有过紧张的关系，在慕尼黑问题上发生过争吵。我们在反对维希政府和德国人时再次紧密团结，在冷战时期又争吵了。最后，到了1972年双方似乎已取得互相之间的一些谅解，我们成立了左翼联盟并制定了一项共同纲领作为选举联盟的基础。各党同意在第二轮选举中互相支持。”②

他给我倒了少量波兰伏特加酒，然后沉思地说：

“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的团结是政治的磁铁，它从我们的天然盟友贫农、小手工业者、店主、政府工作人员那里吸取选票。在1973年，左翼联盟的票数从34%上升到40%，在1976年的市政选举中，票数又上升到45%。预计在下次选举中左翼的选票可能达到55%无疑可以组织政府……直到后来在共同纲领问题上发生了这该死的破裂。”

“噢，”我温和地说，“是共产党开始提出共同纲领的问题吧。”

“当然，”索博尔不耐烦地说：“共同纲领已有五年历史，需要重

① A·索博尔是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教授，他以研究巴黎人的急进的共和主义的杰出成就而闻名。

② 根据戴高乐拟订的宪法，选举分两轮举行，相隔一个星期。每次选举，如果候选人获得多数票即当选。如果未能获得多数，即由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在第二轮中竞选。这实际上意味着一名左翼候选人和一名右翼候选人为最后争取其他集团的支持决一雌雄。

新修订。密特朗同意了。可是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是一个圆滑的家伙。”

我的确知道，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是一位傲慢、思想保守的人，他很晚才接触社会主义。在五十年代，他担任海外领地部部长时，曾经是殖民主义的忠诚捍卫者。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担任司法部长。他自己的党不信任他，共产党也不信任他。虽然他无法拒绝共产党关于重新修订共同纲领的建议，但他却想方设法限制讨论。1977年6月在南特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他说：“原先谈判共同纲领时仅仅用了两个星期，我认为要使共同纲领反映最新情况没有理由需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谈判应当在暑假以前结束。”^①

共产党总书记马歇立即作出反应：“我们不准备给密特朗先生一张空白支票。我们本国的工人有权利现在就知道，左翼政府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在什么时候。”^②

谈判不仅没有在暑假结束，而且延续到9月。1977年9月22日午夜破裂是谈判的顶点。主要的障碍是确定哪些公司应当收归国有。1972年的共同纲领曾经设想只对9家企业群实行国有化。社会党坚持只有母公司的股份占有98%的子公司才应当国有化。共产党则主张占有51%就实行国有化，否则有些公司就会放弃某些股份，逃避国有化而仍然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按照第一种标准，将有200家子公司实行国有化，按照第二种标准则有1,000家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后来共产党作出让步，把收归国有的公司数目减为729个，可是密特朗态度坚硬。争论激烈化了，右翼高兴，左翼生气。我曾经有机会看到这两种态度在起作用。

① W·施瓦茨，〈曼彻斯特前卫周刊〉1977年12月8日。

② 同上。

在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译注)附近的一间雅致的办公室里,我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现在政府电视部门工作的让—克劳德·塞尔旺—施雷伯进行交谈。让—克劳德是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让—雅克·塞尔旺—施雷伯的表兄弟。让—克劳德和我在1937—1938年曾经是牛津大学埃克塞忒学院的同班同学,我们聊了一会儿往事,然后转入政治。让—克劳德是一位戴高乐主义者,他在南方的尼姆市竞选国会议员。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位共产党员,现任该市市长和国会议员埃米尔·乔丹。“我在1973年仅以200票之差败给了他,”让—克劳德用完美无误的英语愉快地说,“但是这一次,由于发生分裂,我将击败他。埃米尔是一位好人,诚实能干,我们是好朋友——然而尼姆是我的市镇,我的祖母曾经在这个区当选为上议员。”

我问他是否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破裂能够弥合。他俯身在书桌上有把握地说:“情况大概是这样:密特朗如果当选,要求有放手处理事情的权力;马歇则想事先用一项协定来钳制他。没有调和的余地。我每星期周末到尼姆去进行政治活动。我到处找人谈话——共产党的干部非常不喜欢密特朗。他们说他是利用法共作为踏板来取得自己的胜利。争吵会更加激烈,使人民感到厌恶,左翼的选票会下降,我会当选。就是这些,完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让—克劳德都说对了,只有他自己的竞选没有说对,他得到和1973年差不多的票数而失利。

几天以后,我有一个机会来估价共产党干部的态度。我访问了科隆布市共产党市长的家。科隆布是邻近巴黎的一个有七万人口的工人阶级的小市镇。市长多米尼克·弗雷洛特以前是一位机械师,现在是共产党的议员和市长。在他的朴素的起居室里,他攻击社会党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他说,“他们在我们这个市议会

里是少数，可是他们却要求分得一半职位，一半人事权，样样要分一半。而现在那位巴黎警察密特朗却不同意让我们分担部长职务！”（“总而言之，”一位发牢骚的前共产党员说，“社会党人的所作所为跟共产党人一样。”）

1978年3月的选举使社会党人受到惩罚。他们所得的选票降为22.5%。共产党人的选票仍保持20.5%。双方都互相指责，但有证据证明，双方都打错了算盘。现在知道，共产党人不指望密特朗会作出多大让步——毕竟他是想当总理。另一方面，密特朗是破坏谈判的人，他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他认为共产党人为了取得胜利会改变原先的态度。相反，共产党人对自己说，如果密特朗在成为总理之前就这样干，那么在他当了总理之后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①

社会党人指责共产党人应对这次失败负责。密特朗在广播电视中暗示共产党仍然听命于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想要巩固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地位，以作为抗衡西德—美国优势的力量。《世界报》总编辑雅克·福韦支持密特朗关于“莫斯科的手”的假设^②。另一种比较普遍的推测是说，共产党人担心如果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力量上升，自己会沦为左翼当中力量较弱的老二党。这些解释看来都不充分，因为第一，这同密特朗中断谈判的证据是相矛盾的；第二，共产党人充分意识到左翼联盟将会吸引在中间摇摆的选民，他们投社会党的票会多于投共产党的票。事实上，一年以后，

① W·施瓦茨，《曼彻斯特前卫周刊》1977年12月8日。施瓦茨引用密特朗的话来证明他有意中断谈判，并引用接近马歇的人士的话来证明马歇感到诧异。

② 黛安·约翰斯通，《在这些年代》，1978年3月22—28日。以前A·方丹曾经争辩说，早在1974年苏联政府就曾经偏袒法国保守派。（《曼彻斯特前卫周刊》，1977年10月9日）

当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了参加市政选举而重新建立团结时，他们取得了巨大胜利，共赢得 54.6% 的选票，社会党得 33%，共产党得 17.3%，其余为一些小党派所得。^①

基本问题并不是预料中的社会党力量的上升，而是两党之间的权力关系。国有化问题是关键。因为共产党指望通过国有化来抵销社会党的选举力量。扩大国有化将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力量，提供庇护和组织的渠道，从而补偿共产党人为密特朗的政治领导权付出的代价。^② 双方都有意要把这个问题搞混，单纯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提出来。事实上，他们完全有理由取得一致。共产党的要求最多也只不过代表法国劳力的 8% 和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5%。例如，国有化的程度不如奥地利，或者低于意大利通过“国家参与”控制企业公司的百分比。^③

权力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十分微妙的。密特朗作为总理大概会为他的党保有最有威望或敏感的部门（外交、国防、内政、财政），而把经济部门（运输、农业、能源、公共事业）交给共产党，共产党至多只能通过国有化“以政府补助的形式维持”这些部门。然而，在民众的心目中，法国共产党被认为应当对分裂和失败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法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的僵硬和好攻击别人，使这种指责似乎更加有理。当我前往巴黎“红区”之一，位于贝勒维尔的

① “法国向左转，左翼在地方选举中获得 54.6% 选票”。（《纽约时报》1979 年 3 月 27 日）

② V·佐尔扎在《为什么国有化对于共产党人是事关紧要的？》一文中指出，1972 年的共同纲领要求消费者、工会和政府委任同等人数组成国营企业管理委员会。有一名共产党的部长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对管理委员会的控制就有了保证。

③ 这个数字见 G·马蒂厄：《国有化：左翼要走多远？》。马蒂厄还罗列了赞成和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主张的论点。

法比安上校广场^①的共产党总部时，我对这种心理有亲身感受。贝勒维尔在1871年公社时期以富有战斗精神而闻名。

这座新总部是由奥斯卡·涅梅耶设计的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有二十层楼高，蓝色玻璃窗的曲线的表面反映出树木和云彩。这是一座十分雅致的建筑，很象希尔顿饭店或一个公司社团总部。我想起多烈士和意共中央党校弗拉多切，如此豪华的总部恐怕多烈士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宁。大楼前面还在施工，我从边门（这里可以俯瞰汽车库的斜坡道）进去。这是一个令人蹙额、望而生畏的入口处，有一座用整体式混凝土修造的象堡垒一样的灰色大桥，使我脑中立即浮现出“马奇诺防线”几个字。上了电梯，眼前立即换成凉爽、清洁和优雅的景象。这个景象连同长长弯曲的走廊和色彩柔和的关闭着的门，给我一种巨大而集中的行政机关的感觉，使我想起了五角大楼。这种马奇诺防线和五角大楼的形象使我皱起眉头，意识到不会是同志式的。但我用不着担心，……我遇见的共产党干部热拉尔·斯特雷福不需要同志情谊。

在马德里和罗马，我受到曼努尔·阿斯卡拉特和塞尔焦·塞格雷友好的欢迎（虽然不能说是同志式的态度），他们是中央委员会主管外事的委员。在法国共产党内职位和他们相同的雅克·桑迪不在。他的助手，一位一本正经、学究式的人物，对待我就好象我是一位掩盖得十分巧妙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一样：非常有礼貌，冷淡，正确而疏远。

当我问他，他认为谁对共产党立场的批评比较令人感兴趣。他态度生硬地回答我：“先生，我们不替我们的敌人做公开宣传。”在

^① 这个地方以法比安上校命名。法比安是抵抗运动的一位英雄，他的真名叫皮埃尔·乔治，出生于贝勒维尔。17岁时，他参加国际纵队到西班牙作战；23岁时，他是第一个（在地下铁道）开枪射击一名德国军官的抵抗运动成员；26岁时，巴黎解放以后，他在洛兰前线阵亡。

罗马和马德里，他们列举了一些名字，作了评价和简略的描写，自然是当作一件愉快的事。

恰巧那天早晨《世界报》刊登了费尔南多·克劳丁的一篇分析社会党和共产党分裂的文章。它给我的印象是态度公平和客观，把共产党放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我问斯特雷福是否把克劳丁也列在法共的敌人的名单里。他一时被窘住，但立刻振作起来。“没有，”他傲慢地说，“但是我们认为他的分析不准确。”

法国共产党的僵硬态度激起了党内的批评和不满，这是欧洲共产主义影响的一个迹象。社会党也受到影响，随着选举的失利而幻想破灭。1978年4月29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全国性大会上，密特朗被迫向左转，以阻止野心勃勃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密歇尔·罗卡尔的攻击。在社会党人之间，语言的尖刻讽刺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共产党人之间也是一样。《世界报》在整个四月份刊载了一系列来自共产党知识分子、学生和群众的信和文章，其中包括路易·阿尔都塞的四篇批评文章。最严厉尖刻的攻击是来自历史学家让·爱伦斯坦，他要求结束宗派主义，重新同社会党结成联盟^①。

开始，马歇采取轻蔑的态度。他对爱伦斯坦的建议回答说：“伪造！无知！”但是要求自由化的压力越来越大，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的干部麻木不仁。马歇如同社会党人一样开始转变态度。于是达成了脆弱的和解。1979年3月在市政选举中的胜利证明这样做是对的。1979年5月中，法国共产党举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时，马歇再次向知识分子（包括爱伦斯坦）和高级干部如

^① 关于两党的骚动和争论，见黛安·约翰斯通的《在这些年代》（1979年5月17日—23日）。并参阅J·坎德尔的《法国难得一瞥共产党队伍内部的不满》（《纽约时报》1978年4月5日，第A—2页）。

巴黎工联的亨利·菲兹本(他曾在1月份退党)讨好。马歇毫不含糊地声明,唯有同社会党人重新结盟,法国的变革才有可能。密特朗8月21日在安格莱的讲话中看来作出了良好的反应。9月,马歇亲自打电话给“无知的伪造者”爱伦斯坦打电话,要求他参加每年一度的《人道报》节,为报纸筹募资金^①。不过法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僵硬,要使欧洲共产主义的时代精神贯彻下去还需要一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第一次直接普选是一个警告,它向各地的左翼表明欧洲向右转已达到什么程度。

当我们转向我们议论中的第三个国家时,我们发现意大利的经验完全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我在本书第二部分将详细论述意大利,这里只作简要概述。

意大利社会党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它没有沾上社会民主党背叛的坏名声。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遭受苦难,所以它们很早就认识到共同合作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性,正如1934年8月17日的团结公约所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内战使这些流亡者进一步密切合作,彼特罗·南尼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都直接参与其事,他们互相尊重。关于南尼,在参加西班牙内战的部队中,人们称他是社会党人当中最诚实和最可靠的人。关于陶里亚蒂,南尼说:“他是在那些盲目行动的人们当中唯一眼光敏锐的人。”^②

除了这种有利的历史背景外,意大利人向来具有宽容的品质。如果说他们是玩世不恭,那是诽谤(参加投票的选民达到90%决不能说是玩世不恭),但人们可以说意大利人对那些自称一贯正确的

① 关于法共代表大会,见记者P·阿维斯的信(《曼彻斯特前卫周刊》,1979年6月10日)。更详细的记述(包含大选失败后的18个月)见J·鲁塞的《马歇重整旗鼓》,《快报》,1979年9月15日,第42—43页。

② G·波卡,《陶里亚蒂》,第363页。

人是厌恶的。对于一个在共产国际的环境中成长的人来说，陶里亚蒂是比较宽容的。例如，他在1962年重新接受阿尔方索·利昂内蒂入党，利昂内蒂1930年被开除出党之后多年来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陶里亚蒂还发表了一些党的主要领导人早期的书信，其中有些段落是对陶里亚蒂的尖锐批评——这一行动在共产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①正如奥丽亚娜·法拉奇（意大利名记者——译注）所证实的，随着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意共党内的宽容有增无已。^②

然而，比上述这些理由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德国的武装抵抗运动。意大利和法国不同，这不是表面现象。参加武装斗争的意大利游击队人数达数十万，包括有：天主教徒、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其他派别的人。虽然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多于社会党，但他们没有进行令人讨厌的比较。这种在战斗中结成的兄弟般的关系在当代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留下了牢固的传统。社会党领袖南尼有一次说道，他对那些没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任何政治人物从来不感到十分放心^③。

战后，南尼和陶里亚蒂重新缔结团结公约，它经受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压力，意大利工会的分裂，甚至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而依然存在。只是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以后这个公约才被打破。南尼在盛怒之下把他的斯大林和平奖金转献给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团体，并开始主动向天主教民主党提出接触的建议。意大利共产党对南尼的突然转变态度（意共也有份）没有进行指责，但觉得他政治上的幼稚，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世界抓住赫鲁晓夫的报告

① 写信的有陶里亚蒂、葛兰西、斯科奇马罗、特拉奇尼、塔斯卡等人，这些信刊登在陶里亚蒂的《1923—1924年意共领导集团的形成》。

② 奥丽亚娜·法拉奇，《历史性访问》，第313—4页。

③ P·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140页。

企图在全世界打倒和孤立共产党。正如彼特罗·英格拉奥指出的，南尼不知不觉地为资本主义所利用。^①

然而，当时南尼以为他在政治上是敏锐的。他使意大利社会党同天主教民主党取得和解，于1963年加入中左政府。社会党开始干得不错，逼使政府将电力工业收归国有和实行行政地区的划分，但随后就陷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圈套。社会党人不但没有反对贪污和任人唯亲，没有对他们所控制的部门进行改革，而且除了南尼等少数人之外，社会党人同其他贪官污吏已无法辨别。选民们对中左政府表示了他们的厌弃，1972年的大选对社会党是一场灾难。他们所得的票数从14%下降为9.6%。共产党的票数则上升为27%，赢得了两分。

于是社会党退出政府并靠拢共产党。工会团结实现了，虽然难以估量，但是工会团结和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和好，对于1974年左翼在关于离婚问题的公民投票中取得的压倒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75年的地方选举中，社会党由于同共产党合作竞选，得票率上升为12%，共产党的得票率则上升为32%。社会党由于自信其力量正在增长而仓卒地投入1976年的大选，结果得票率又退回到9.6%。^②而共产党的得票率则达到历来的最高点：34.5%，同天主教民主党只相差4分。

1976年的失败损害了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弗朗塞斯科·德·马尔蒂诺的威信。右翼攻击他对共产党过于友好；极左派则攻击他不比共产党激进。^③

在1976年7月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新的结合体。贝蒂

① P·英格拉奥：《群众与权力》，第132页。

② P·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决定》，第108页；C·基尼：《变化中的意大利》，第526页。

③ G·加利：《对意共的看法》，第114页。

诺·克拉克西，一位坚定的反共分子，当选为总书记。克拉克西首先关心的是肃清马尔蒂诺的追随者，逐步建立起他自己的政治机器，把职务不偏不倚地分给右派和极左派。社会党的最后一个重要职务——党报《前进报》的总编辑则由克拉克西本人于1978年春天接任。于是克拉克西就在两条主要路线对意大利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持续的攻势：第一，攻击意共的欧洲共产主义立场是骗人的——说意共依然是列宁主义党，反民主的党；第二，攻击意共出卖工人以讨好天主教民主党。

克拉克西的个性是不讨人喜欢的——自我陶醉、浅薄、虚荣心很重。他发起了一个自我扩张运动，为了哗众取宠而采取机会主义立场，例如：他对阿尔多·莫罗被绑架事件（1978年3月16日）的态度，在莫罗被杀害（5月9日）后玩弄的花招，以及他在选举新总统时（1978年7月）施用的诡计。有一段时间他作为一位未来的年轻领袖（45岁）似乎正在取得进展，到头来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1979年初没有能够当上总理。他在莫罗事件中冒犯了天民党的左翼。1979年6月的全国选举，社会党的成绩不佳，更进一步降低了他的威信。

目前天民党右翼正在支持克拉克西，并引诱他参加天民党——社会党政府，以便把共产党孤立起来。克拉克西愿意参加这样的政府，但他必须冒风险，因为这个政府将是一个比六十年代遭到惨败的中左政府更加保守的集团。

克拉克西虽然在选举中力量薄弱，但他在意大利如同密特朗在法国一样，政治上很有影响。从天民党到意共这个政治的拱门中，他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不包括社会党在内，任何联合政府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克拉克西和密特朗一样，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把欧洲社会主义看作是它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认识到这两位领导人是仅有的能够使欧

洲社会主义符合工人口味的领导人。

第二国际(这里指社会党国际——译者)在1951年重建之后,已完全受西德社会民主党的支配,而西德社会民主党把变革资本主义的任何伪装都扔掉了。他们跟英国工党一样,宣称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他们能够得到工人的支持。为了这个最后的目的,第二国际需要克拉克西和密特朗,因为他们表面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是通过西德总理施密特这条渠道来起作用的。他是1977年波多黎各会议的一个关键人物,在这次会议上,卡特决定,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参加政府,将对意大利施加经济压力。施密特又是1978年12月瓜德罗普会议的关键人物,在这次会议上,意大利明显地被排除在会议之外。1980年2月在罗马举行的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西德社会民主党继续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华盛顿曾经重申反对意共参加在一月份组成的政府,西德社民党总书记赫尔穆特·科尔^①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应邀发表讲话,他表示强烈反对天民党和意共合作^②。

欧洲社会主义是否可能成为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堡垒是成问题的。欧洲对施密特总理并不太喜欢,甚至在自己党内,他的政策也遭到攻击。更重要的是,在欧洲议会6月选举中,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以49.2%比40.8%的票数超过了西德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是弗兰兹·约瑟夫·施特劳斯^③,他如果不是一位新法西斯分子的话,也是一位合格的复制品。这是相当令人

① 原文如此,赫尔穆特·科尔应为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译注

② 卡特总统1980年1月24—26日同意大利总理F·科西加会晤时,重申美国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全景》杂志,1980年2月14日)。关于赫尔穆特·科尔的讲话,见《意美关系进展》,1980年2月17日。

③ 原文如此,施特劳斯应为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人。——译注

震惊的事情，特别是考虑到欧洲共同体内部全面向右转，左翼现在已以3与5之比居于少数——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共获155席，其他政党共获255席^①。由于存在这些弱点，要美国继续支持西德社会民主党是成问题的，西德社会民主党到处寻找强大可靠的同盟者，明摆着的一个就是意大利共产党。贝林格决心伸出友谊之手同西德社会民主党合作^②，意共已负起责任在欧洲共同体内开展工作，以便使欧洲更加独立于美国和苏联。它愿意把经济领导权交给西德(无论如何西德已有这个领导权)来换取欧洲的政治独立，特别是全体一致向左转。

当我1979年6月在罗马同一些朋友讨论欧洲选举结果时，我回想起1977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谈话。谈话人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外交事务专家亚历山大·格利奇科夫，他负责处理欧洲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

“社会党的政治时兴时衰。”他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样碰到许多困难。我们站在近处对自己的困难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忘记了社会党的困难同我们一样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话。在全欧洲，社会党党员都十分疏远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求变革，要求得非常迫切。不管愿意不愿意，社会党领导必须向左转，否则就会被抛在后面。”

他的话在1980年似乎是有预见性的。英国工党发生了一场混乱，结果导致工党决定性地向左转，正如1979年9月布赖顿年会授权对党的结构进行改革所表明的那样。与此同时，共同市场的激烈反对者英国的威茨伍德·本和法国的乔治·马歇似乎也在改变策

① L·帕吉：《处于欧洲危机之中的左翼欧洲主义》。

② 贝林格1978年10月15日在《快报》记者的访问记《克里姆林宫的友谊》中指出，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会晤，意共和西德社会民主党同意在欧洲共同体内互相支持。

略而向意大利的观点靠拢。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共同市场将会加强欧洲反对美国的经济倾向。

欧洲共产主义是生气勃勃的，意大利依然是它的试验场所。虽然欧洲共同体的问题对于左翼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但它会越来越显得突出并可能在最后对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成功或失败起决定性作用。它已经在促使人们重新检查它的基本原则之一——党与党之间的明显的区别。取消共产国际的中央集权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程度的合作，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共同制订政策显然是很必要的。法国左翼联盟的破裂对意大利选举产生影响，意共对法共的策略表示不满。^①197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选举对欧洲议会6月9日的选举都产生影响。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问题是政策互相矛盾的另一个例子。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参加，意大利共产党支持西班牙参加，而法国共产党则反对。意共认为西班牙参加将会加强欧洲左翼和进一步推动欧洲共产主义关于使欧洲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中立的战略，而民族主义色彩更浓的法共则担心西班牙的竞争将会损害法国的农业（它对意大利农业的损害将更大）。

表明欧洲共产主义正在从青春期进入成熟期的证据，不仅在于许多共产党在本国起着更大的作用，而且还在于他们的政策、活动和问题对欧洲社会党的影响，从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欧洲发展的性质。在八十年代，不管出现什么迂回和挫折，人们将体会到欧洲共产主义的存在。

^① 《贝林格和法国左翼》（《曼彻斯特前卫周刊》，1978年11月1日）。

第四章

梵蒂冈和欧洲共产主义

大约35年前(在人们看来似乎是另一个时代),斯大林轻蔑地问道:“教皇有多少支部队?”他是在一个范围很小、只有三名成员的俱乐部里讲这番话的,要参加这个俱乐部必须拥有一支数百万名士兵的军队。

这是一句索然无味和讽刺挖苦的话,因为正如斯大林所知道的,天主教会不需要依靠军队发挥重要作用来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梵蒂冈支持同盟国(包括苏联在内),这对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反共的人们有很大影响。今天天主教会的权力是无可争辩的。它在第三世界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七亿天主教教徒中,有一半以上居住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它在第二世界(包括社会主义世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选出波兰教皇以后,这种重要作用更加强了。因此必须认识到,自1962年以来,天主教会经历着十分深刻的变革,以至于构成一场教会的革命。这场革命所涉及的范围只有用历史观点来考察才能作出正确评价。

一直到君士坦丁大帝颁发米兰敕令(公元313年)为止,天主教会曾经是地下墓穴和殉教者的教会,穷人和被压迫者——反对奴隶制度和搞颠覆的人的教会。这个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原始教会、圣经教会、使徒教会。敕令颁布后的16个世纪,教会越来越关心浮华和权力,越来越注重等级制的僧侣统治和中央集权。尽管有过

许多变化和挑战，它依然是一个皇室的教会，学者们称它为“君士坦丁教会”。后来，在1961年圣诞节，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从此教会就不再象以前的样子了。

当时有过行动主义的暗示。1958年约翰被选为教皇之后不久，他就打开他的梵蒂冈住房的窗户并预言道：“是让一点空气进来的时候了。”随后，他又把这句话转为直截了当的语言：“我们必须把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积聚在圣彼得宝座的皇室的灰尘抖落干净。”^①

这位改良的教皇是一位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威尼斯大主教安吉洛·朗卡利在77岁高龄被选为过渡性的教皇(为人和蔼、慈善、谦逊)，他是一位能使他的皇位继承者地位稳固的人。朗卡利并不是教皇当中最杰出的。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贝尔加莫省)山村一个贫穷、虔诚的佃农家庭里。书籍是稀罕的东西。他6岁就帮助父亲在地里干活；10岁上学，要来回走12英里，冬天的时候走路更是受罪，他的手指都长了冻疮。^②

朗卡利并不缺乏优良的品质。他担任主教和教皇时的秘书路易斯·卡波维拉，称朗卡利是一位旧时代的神甫——虔诚、贤明、因循守旧^③。他的农民出身并不是不利因素。天主教会通常是从出身好或有教养的上等阶层中挑选；要末是良种马，要末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马。朗卡利在严厉的庇护十二世的领导下享有善办外交的好名声，他任威尼斯大主教时，他的富有同情心、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以及他不用放弃传统的价值原则而能巧妙地解决问题

① G·巴利斯特里埃里：《教皇乔万尼》(米兰马佐塔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

② 影片《木鞋树》是在朗卡利的故乡拍摄的，由当地的农民当演员，它生动而准确地描绘约翰苦难的童年。

③ 《教皇乔万尼》，第24页。

的能力，一时被传为美谈。总的说来，他是适合当教皇^①的杰出人才，很容易地就被选为过渡性的教皇。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召开是一个晴天霹雳。新教皇必须克服梵蒂冈官僚机构的反抗，然后克服教会统治集团最上层的冷漠、保守和公开反对。尽管教皇约翰有权威，但他决不可能依仗压倒的力量来完成他的任务，而是依仗他个人的道德力量，依仗使他可能当选为教皇的品质。他的确以他的仁慈博爱的榜样使红衣主教勒卡罗转变了态度。

勒卡罗是波洛尼亚的主教，是在教会统治阶层中一位有权势的人，一位顽固的因循守旧者，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并成为教皇得力的左右手。他是一位反共的顽固分子，多年来激烈反对他故乡的红色政权。新教皇使勒卡罗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致于在他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了队伍到车站去欢迎他。当他接受共产党市长朱塞佩·多扎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时，他们对他欢呼。有意义的是，勒卡罗任命40岁的主教路易吉·贝塔齐为他的助理和参加梵蒂冈会议的“代理人”。贝塔齐今天已成为教会统治阶层中最大的进步势力之一。

教皇约翰准备了充分条件，任命了筹备委员会，增补了33名红衣主教，使总数达到85名，从而打破400年来的传统。^②在这些新增补的红衣主教当中，有德国耶稣会会士奥古斯丁·贝亚（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和坦噶尼喀的劳林·鲁甘布瓦（第一位黑人红衣主教）。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教皇约翰对人员和问题作了妥善安排和处理，使他的全世界性的宗教会议成为现代化（使天主教会现代化）的工具。

① “适合当教皇”的意思，不仅是指“品质好”或“有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也就是说，他的经历、品质、性格和政治倾向能够吸引其他红色主教的选票。

② 教皇西克史图斯五世(Sixtus V)于1586年曾使罗马教廷主教团人数达到70名。

在天主教会的历史上,全世界性的宗教会议的巨大影响同会议的难得召开是成比例的。在教皇约翰之前,在500年间只开过2次,在2000年间总共只开过20次。最后两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应付天主教会的两次严重危机:特伦特会议(1563年结束)是第19次全世界性宗教会议,这次反对改良的宗教会议是为了制止路德教和新教。^①

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第20次全世界性会议)是在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于1870年接管罗马时,为了处理罗马教皇暂时失去的权力而召开的。教皇庇护九世把自己关在梵蒂冈(自我宣布为囚犯),在第一次梵蒂冈会议上公布罗马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并禁止天主教徒参加意大利议会,违者将被革出教门。那是一个危机时期。

1960年没有这类明显的危机,然而在天主教会内部确实存在着困难,存在着诸如避孕、堕胎和离婚等尖锐问题。世俗化、社会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在增长,修女和神甫的人数在逐渐减少^②。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处传播:一些天主教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已成立了共产党政府。教皇约翰的前任教皇庇护十二世是极力反对共产主义的,他也感到不知所措:“我很不能

① 特伦特会议是红衣主教波罗梅奥策划的,后来被宣布合乎教规。圣卡洛·波罗梅欧是教皇约翰的亲信,他是从研究圣徒起家的。它使这位年轻的神甫得以同Ambrogiana藏书的档案保管员艾基利·拉蒂接触。1922年拉蒂成为教皇庇护十一世,他将朗卡利带来罗马。

见S·C·洛里特的《教皇乔万尼的一生》,第39页。1906年,朗卡利在米兰发现了一位居住在贝尔加莫的圣徒的文件,他着手进行编辑。52年后,在他成为教皇约翰十三世之前三个月,他完成了《圣卡洛·波罗梅欧到贝尔加莫的使徒之行》的第五卷亦即最后一卷。

② P·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229页。1966年意大利教士有47,000人;1970年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有43,000人。这种下降是全国性的,从1963年每1,000名天主教徒有一名教士,下降到1979年每1,700名天主教徒有一名教士。

适应新的情况，”他对法国大使说，“来解决由于共产主义的存在和扩张向天主教会提出的问题。我只有希望上帝召我回去，让一位较年轻的继承人来接替我的职位。”^①教皇庇护十二世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任期快满了。教皇约翰和他是同一代人，受到同一教会的造就，但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于1962年10月11日举行。一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队伍开进会议举行的地点圣彼得教堂，当天晚上（一个平静可爱的夜晚）教皇从他的窗户发表讲话。群众在广场上静听，广场上海洋般的火炬在风中摇曳，米凯朗基罗的山墙和贝尼尼的廊柱在聚光灯下闪现，双喷泉的瀑布般的泉水在火光中闪耀。教皇的话简单有力：“让我们继续互爱吧……抓住能使我们团结的东西，把可能制造困难的一切抛在一边。我们是兄弟。”他用下面的有代表性的语言结束了讲话：“当你们回到家里时，你们会看到你们的小孩。爱抚他们并对他们说：这是教皇对你们的爱抚。”

当会议还在讨论的时候，教皇约翰公布了两个通谕，定下了这样的调子：《慈母和导师》阐明了天主教会最新的社会信条；《人世和平》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使冷战失去危害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教皇约翰十三世于1963年去世，梵蒂冈会议由他的继承者保罗六世继续主持，于1965年10月28日结束。最后发表的文件《欢乐与希望》实际上是这次会议的总结，它对教会具有约束力，并且贯穿着教皇约翰的精神。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天主教会内的重要意义或它转变为反对顽固派的重要性，不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内部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1978年的两次教皇选举是为了解决内部斗争，而约翰·

^① A·桑蒂尼，《天主教问题，共产党问题》，第26页。

保罗二世的出现标志着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改革措施是不可改变的。^① 在他当选之前的16年(回到会议开始之时),对今天所产生的影响相当于过去的1,600年。过去常用的词汇是君士坦丁教会(Constantinian Church),现今常用的词汇是主教会议教会(Conciliar Church),它表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威力。

本书主要是论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政治上的影响,但应当指出,它最大的影响是在教会方面。例如,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消除了过去诽谤犹太人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说法——这是在宗教上反犹太主义的实质内容^②。它承认天主教徒对于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分裂也不是没有过错的^③。它修改了君士坦丁教会关于唯有天主教会是救世者的基本信条。它还改变了对妇女的态度,教皇庇护十二世曾经要妇女留在家里做男人的附庸^④。

《人世和平》的通谕是直言不讳的,主张在家庭内应当“男女权利义务平等”。而且,它欢迎“妇女参加社会生活。……在妇女身上,自尊心越来越明确和起作用。她不允许自己被当作工具看待,而是要求被当作人看待。”^⑤ 虽然在天主教会内还继续存在性别歧视(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最近在美国的讲话中举例说明的那样),决不应因此而否定《人世和平》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① 卡罗尔·沃伊蒂瓦是参加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最年轻的主教之一,他精力充沛地参加了会议。B·索格先生说他是第一位成为“宗教会议的儿子”的主教。见A·比斯卡迪和L·利乔里编《人面教皇》,第39页。

② 《教皇乔万尼》,第97页。礼拜仪式使这种诽谤永久化:“让我们也为背信弃义的犹太人祈祷,请求上帝医治他们的蒙昧的心。”

③ 同上书,第85页。庇护六世在《错误梗概》第38条中宣称,“说罗马教皇的独断专行造成了教会的分裂,这是一个严重错误。”教皇约翰作了纠正:“有一部分是他们的责任,但大部分是我们的责任。”

④ 同上书,第36页。庇护十二世说过:“同男人享有平等权利,导致(女人)抛弃家庭,在家庭里,女人象王后一样统治着……是男人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⑤ 同上。

教会内部，特别是在美国，正在进行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例如，修女琼·齐蒂斯特正在领导一场争取消除圣歌、宗教仪式和文件中歧视性别的语言。她是妇女宗教会议领导机构的前任主席，这个机构是美国一百多个男性宗教团体的负责人的组织^①。她的工作是艰苦的，特别是在约翰·保罗访问美国之后。美国主教派教会于1979年11月举行会议，拒绝了要把礼拜仪式中的“全体男人”改为“全体人民”的建议。^②

但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对解放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它对陈腐的蒙昧主义和政治反动派的挑战。下面是最后一位发言人都灵大主教佩勒格里诺红衣主教讲话的主题，《天主教文明》把他描绘为“梵蒂冈会议的主教”。法国《世界报》强调了他的讲话的重要性。

“一个高级教士如此年轻和才华横溢……被挑选来结束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辩论，决非偶然。它让我们从这个选择中看到一个象征：教会正在走向革新之路，信任它的更为生气勃勃的会员……”^③

佩勒格里诺不得不说的话在教会里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肯定了思想和研究完全自由的必要性，不仅对于俗人如此，对于教士也是如此：应当鼓励他们在理智方面作出更大努力，不仅“按照信念……而且对当前一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必须加以解决的历史现实有明确的见解。”^④

① 合众社电讯，载1978年2月14日《圣胡安星报》。

② K·A·布里格斯，《妇女和天主教会》（1979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第A—13页。这个建议特别是针对礼拜仪式，在礼拜仪式中声称基督本人为“你们和全体男人”自我牺牲。这句话是从阿拉米语翻译过来的，它原来没有说“全体男人”，而是说“全体人民”。这个建议虽获得多数票，但未能达到获得通过必需的三分之二的票数。

③ M·佩莱格里诺，《多元主义和天主教徒面对马克思主义》。引自《世界报》的这段话被编辑们作为文章的前言。

④ 同上。

从政治立场出发，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核心是两个文件：《人世和平》和《欢乐与希望》。第一个文件为天主教徒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敞开大门；第二个文件（在保罗六世的主持下）重申这种对话的必要性并使它为人们所接受。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虽然崎岖不平，荆棘满途，但如果没有这些文件是很难行得通的。《人世和平》在世界政治中起了卓越的作用^①。教皇约翰有很大的功劳，同样的功劳也应当归于那位为天主教会的转变铺平了道路的人。他就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葛兰西逝世以后担任党的总书记。

朗卡利和陶里亚蒂应当作为一个新国家的缔造者载入意大利史册，就象这个国家的两位缔造者加里波第和加富尔^②（热心人和有头脑的人）一样。这种比拟不应当过于牵强附会，但在意大利，这种比拟并未引起人们的奚落。^③

约翰和陶里亚蒂有十分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有独立主见的人。两人都是这个制度的栋梁，都不知不觉地起来造反和等待时机。传统主义者的约翰成为一个古老制度的革新者；斯大林主义者的陶里亚蒂则成为分享民主制的倡导人。

两人非变不可，尽管朗卡利讨厌法西斯主义，他曾经摇摆不

① 《人世和平》在美国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它应当（并期待）称得上是一篇博士论文。这不仅在于它对一位天主教徒总统所产生的影响，还在于它为保护他开始实行的缓和步骤、使之不受僧侣统治阶层攻击而采取的方式。这方面可以看看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5年3月在纽约市为《人世和平》举行的仪式，它受到首席大法官华伦、副总统汉弗莱、参议员富尔布赖特、凯南大使等人的祝贺（1965年纽约出版的袖珍本）。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加富尔（1810—1861）是意大利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

③ 历史学家波卡可能会接受对约翰的这个估计而不同意对陶里亚蒂的估计。然而他写的陶里亚蒂传记，尽管有许多褊狭和贬抑之词，但它结尾的无条件的赞颂支持了我的判断。

定,支持墨索里尼并为埃塞俄比亚战争祝福:“这场战争将给我们亲爱的国家带来幸福和繁荣。”^①他也曾经支持庇护十二世对希特勒的绥靖外交^②。他还在1946年为君主政体竞选:“为了人民,我认为君主政体比共和国更可取。”^③直到1956年,正统的朗卡利还制定了这样的法律:“我们必须抵制社会主义思想……思想自由非常好……但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每个人要守住自己的岗位:该指挥的人指挥;该服从的人服从。”^④

正如朗卡利完全是君士坦丁教会的人一样,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的人^⑤,他对斯大林是无条件服从的:“如果你觉得在党和共产国际的意志面前你是微不足道的,那末你就按照党和国际要求你做的去做吧。说‘我接受,在党和国际的面前我是恭顺的。我将保持安静并签字。’”^⑥他参与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些最恶劣的暴行,如消灭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⑦。

他们两人受到如此彻底的限制,而两人又的确都变了,这是很难得的。他们转变的过程很少人知道,也许是深不可测的,但显然早期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贝尔加莫城市对朗卡利就产生过这种影响。他从10岁到19岁就进入那里的神学院,当时贝尔加莫被《罗马观察家》报称为“所有城市中最天主教化的城市”,甚至到了20年

① 《教皇乔万尼》,第25页。

② 桑蒂尼的书,第25页。

③ 《教皇乔万尼》,第30页。

④ 同上,第27—28页。

⑤ 当然,陶里亚蒂参加共产国际时已经成为一个思想行动更加自由的人。他对斯大林的服从是政治上的服从,而不是理智上的服从。

⑥ 波卡:《陶里亚蒂》,第192页。

⑦ 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决定》,第100页。一位前共产党领导人R·米埃利写的书,指责陶里亚蒂参加了对波兰人的审讯。陶里亚蒂的一位助手D·拉左洛以此同陶里亚蒂对质,后来他写道,这位党的领袖面色苍白,心烦躁乱,证实了这个指责。

后，葛兰西还用它作为富于战斗性的天主教的例子。^①从1870到1904年，这个城市是天主教会内“不妥协派”和“调和派”大规模冲突的中心——它几乎是65年后的今天，“整体主义派”（integralists）和“主教会议派”（conciliaris）争斗的预演。^②

贝尔加莫的斗争起源于庇护九世对1870年意大利统一的反应：天主教徒不参加选举——不投票和不推出候选人。贝尔加莫最听话，在1890年的选举中，整整80%的有投票权的选民拒绝投票。如果说他们的服从是坚决的，那末他们对那种把政治领域让给俗人和反教权势力的政策，批评也是激烈的。贝尔加莫在天主教会内领导斗争，连续向三任教皇（庇护九世、莱奥十三世、庇护十世）提出论据和派遣代表，要求解除禁令。最后一次有说服力的请求是在1904年选举前夕由一位贝尔加莫的使者提出来的，教皇庇护十世终于让步了。几天以后，贝尔加莫派出第一位“官方的”天主教议员到议会去^③。

那个时期的争论同现在的争论是相似的。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参加政治争论的各方本身在关于社会问题上分裂成“强硬”派和“温和”派。因此，在贝尔加莫，调和派内政治上的“强硬”派反对社会主义者，指责不妥协派的“温和”派搞颠覆。例如，1900年贝尔加莫的主教是一个不妥协派，他竭力捍卫教皇的政见和教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又放手让调和派在他的管区广泛地组织进步

① J·康麦特，《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第131页。葛兰西责备一些同志由于害怕会被教士们接管而不肯在贝尔加莫组织工人委员会。

② “整体主义派”分子是一个极端因循守旧的天主教徒，通常对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不满；“主教会议派”分子则全心全意赞同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切勿把“主教会议派”（conciliaris）同贝尔加莫时代的“调和派”（conciliators）混淆起来。

③ 洛里特的书，第30—35页。当然，几乎所有其他议员都是天主教徒，但不是选出来的。

社会机构,其他地区的群众是亲社会主义的,而天主教在贝尔加莫则先占领地盘。

正当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朗卡利于1900年离开贝尔加莫去罗马。他深受当时争论的影响。现在又重新出现和当时争论类似的矛盾倾向:“主教会议派”的神学家在政治上是“整体主义派”,“整体主义派”的神学家在政治上是“主教会议派”。^①

1977年10月我在罗马的时候,接触到这种矛盾倾向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教皇保罗六世任命瓦莱里奥·伏尔皮尼为《罗马观察报》(梵蒂冈官方机关报)的主编。《晚邮报》的一则新闻报道了沃尔皮尼的背景情况。他是一位文艺评论家、教师和新闻工作者。报纸提到他最近出版的《卑鄙的天主教徒》一书使教皇感到满意,并可能对他的任命起了作用。虽然书名含有讽刺的意思,但这本书原来却是为天主教的政策进行精神辩护,是十足的整体主义派。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教皇本人在整体主义派和主教会议派的斗争中谨慎地保持中立。不过,他显然是梵蒂冈会议的教皇,忠于教皇约翰的观点。他怎么能任命这样一位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呢?我断定教皇是打算向左转和保护他的两翼。

我把我的这种马基雅弗利式的分析告诉奎多·波德拉托,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和讨人喜欢的人,是天主教民主党的年轻领导人之一,一位“对话的”能手。他哈哈大笑说:“卡洛,你越来越象罗马人而不象美国人了。这正是罗马人的想法——只不过不真实。就其思想和在争论中的态度来说,伏尔皮尼是一位强硬路线的整体主义

① 这是一个听起来很象当代语言的典型的贝尔加莫的引语(摘自洛里特的书):“用叫喊和说教来反对社会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有勇气供认我们自己的社会罪恶。”

派。他藐视马克思主义，但他在同共产党人合作方面思想是很开放的，正如教皇约翰常说的‘共同行走’^①那样。伏尔皮尼是一位佃农的儿子，在抵抗运动中是一位闻名的游击战士，他曾经同共产党合作并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而且，我亲爱的美国化的罗马人，你应该懂得教皇不需要保护他的两翼——永远不需要。”

都灵市之对于陶里亚蒂，就象贝尔加莫市对于朗卡利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灵市工人是意大利最富有战斗精神和阶级觉悟的工人。他们占领了菲亚特工厂并建立起“工厂委员会”——意大利的“苏维埃”。工人的纪律和自治能力表明了分享民主制的巨大威力，这种最广泛的民主是意大利前所未有的。那个时候陶里亚蒂才二十五、六岁，他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经验。

葛兰西除了影响工人之外，也影响了年纪比他小两岁的陶里亚蒂。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在1911年的夏天相遇时，两人都是一、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当时正在卡洛—阿尔贝托学院应付学位考试。他们两人都成功了，而且一直到1926年葛兰西被监禁为止，两人学习和工作在一起达15年之久。关于葛兰西对陶里亚蒂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在斯大林主义的最大压力下，陶里亚蒂仍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使他避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他是一位有远

① “共同行走(Comminare insieme) 可能被一位亨利·基辛格译作“同路人”，虽然意大利文含有平等旅伴的意思。教皇约翰很喜欢这个概念并以多种方式使用这个词。

佩莱格里诺红衣主教的一封写给教区教友的著名的信(1972年) 题目就叫《共同行走》。这封信得到教皇保罗六世的赞同，他表示“满意”，并讲了一句有代表性的话：“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加以评论。”这句话已成为同意共合作的政治准则。当天民党右翼领袖于1977年12月表示希望转向赞成对话时，他谈到他如何同教皇约翰同在一列火车上看到一些走路的人。教皇对范范尼说：“你看到他们吗？要到任何地方，我们必须共同行走”。莫罗(总理)遇刺后，范范尼又转回极右的立场。我仅以此言献给本书。

见的人，”一位本人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传记作者写道：“在他的一生中，人们觉察到他坚持不懈地努力（往往是悲剧性的）来挽救他的理智的尊严。”^①

关于天主教，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合作者看法完全一致。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里对天主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被监禁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做了分析。葛兰西看出基督教同共产主义的相似之处。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世俗的宗教，而是把基督教看作“在充分发展的时候是一种革命……创造一种新的有独创性的道德、司法、哲学和艺术关系的体系。”^②从1919年起，葛兰西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天主教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同天主教的农民结成联盟的一个必要政治条件。陶里亚蒂完全同意这个判断。当他1944年重返意大利时，他带回了一个坚定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共产党都不要攻击梵蒂冈。

陶里亚蒂回到意大利不久，就找到一条直接同罗马教廷联系的渠道，成为天主教宗教法庭顾问朱塞佩·德·卢卡的朋友。后来由于教皇庇护十二世统治时期的坚决反共，他的这种联系受到了批评。陶里亚蒂反驳道：“一种无益的反对是政治上绝望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定形势下找不到出路的人们的态度。”又说：“教会在一些基本文件（有些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时代和中世纪）中确实

^① 波卡：《陶里亚蒂》，第2页。

^② C.马扎尼：《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第8页。当然，葛兰西还指出这两种世界观的巨大差别，并广泛地论述了“这两种文化”。关于葛兰西对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文化的比较，特别是二者对教育的不同态度，请参阅H.波特利的《葛兰西和宗教问题》，第204—216页。最近编入“历史性妥协”文选中的还包括有青年时代的葛兰西的文章《意大利天主教》（1918年12月22日）；《焦利蒂和人民党人》（1922年2月22日）；《一位波洛尼亚同志》（1920年3月20日）；《人民党人》（1919年11月1日）；P.瓦伦扎编，《历史性妥协》，第63—74页；葛兰西的《梵蒂冈与意大利》（第二版）。

公布了若干(关于教会和国家)原则规定,(而且)教会本身作出的这些原则规定是不可改变和绝对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任务是在新的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证明这些原则规定的内容能够而且适用于完全不同的状况……”^①

通往梵蒂冈的渠道打开了,陶里亚蒂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天主教问题的著作和讲话,以对教会统治阶层施加影响,教育他的党,也教育人民。例如,他在1945年1月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和天主教的良心》的文章中写道:“在为争取建立新秩序和满足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谋生的人们的愿望的斗争中,我们相信同天主教工人和知识分子建立广泛和持久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有人认为在天主教的良心中有些东西是同这些愿望背道而驰的,就让他公开说出来吧;但不要说我们要同天主教的工人阶级合作的愿望……是损害天主教会的计划的一部分。说这种话的人不仅冤枉了我们,也冤枉了天主教会。”^②

使自由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感到沮丧的是,陶里亚蒂拒绝攻击1929年天主教会同墨索里尼签订的契约。在意大利解放(1945年12月)后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知道这个契约是一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契约……它必须经过双方同意才能修改……我们的明确立场就是避免引起任何可能损害我们党同意大利天主教会的关系的误解。我们党不要宗教战争。”^③在同一代表大会上,主席路易吉·隆哥强调指出:“共产党一向谴责、现在仍然谴责反教权主义。”^④

① 波卡:《陶里亚蒂》,第443—444页。

② 桑蒂尼的书,第104页。这篇文章载《我们的斗争》。瓦伦扎的文选包括有陶里亚蒂对天主教与共产党对话的最重要的文稿(第57—134页)。有关对话的其他作品有《加斯贝利的业绩》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

③ 陶里亚蒂选集,第442页。

④ 桑蒂尼的书,第113页。

两年后，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宪法第七条规定天主教为意大利的国教。在议会表决时，赞成者 350 票，反对者 149 票。由于共产党在议会有 104 席，所以他们的票是关键性的。在投票之前，陶里亚蒂在议会大厅对一群愤怒的社会党议员和自由派议员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忘的讲话说：“我们需要宗教和平，我们不允许这种和平受到任何干扰。我还要指出，我们的责任要比我们的社会党同事大得多……你们读一读今天早晨在米兰举行的总工会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共产党人得了 327,000 票，社会党人得了 152,000 票，天主教民主党人 106,000 票。好了，我们不希望同那 106,000 位工人关系破裂。”^①

没有人怀疑陶里亚蒂的真诚。他所做的就是用那个宗教契约来换取一个进步的宪法。（回头来看，陶里亚蒂得到比天主教民主党更大的好处。在 1974 年公民投票以后，天主教民主党自己开始谈判修订那个契约。^②）

共产党仍保持对梵蒂冈的压力。1954 年，陶里亚蒂在一次讲话中向天主教建议制定一个保卫人类文明、反对原子战争威胁的共同行动纲领。^③ 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响应。一年后他又重复这个呼吁，梵蒂冈仍然保持沉默。^④ 相反，在五十年代，梵蒂冈自己采取麦卡锡式的镇压行动，如压制和放逐那些主张同社会党人和共产

① 波卡，《陶里亚蒂》，第 449 页。

② 这个“交易”是明显的。据陶里亚蒂说，加斯贝利曾向他明确表示，如果宗教契约被废除，他将寻求另一次公民投票来推翻那个拒绝君主制的决定。共和国处于危险之中。此后宗教契约一直在修改中，草案一个接着一个，逐渐转向更为世俗化的立场，特别是在降低教会的地位、削弱教会的否决权和对公共教育的其他监督权方面更是如此。宗教契约五十周年时，《团结报》（1980 年 2 月 11 日）发表了 C. 卡迪亚的一篇长文，对最后一个草案提供了许多细节。

③ 陶里亚蒂选集，第 644 页。

④ 同上，第 684 页；桑蒂尼的书，第 135—136 页。

党人对话的进步神甫和社会名流^①。结果使反对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反共主义的地下抵抗运动不断增长，共产党的温和立场助长了这个抵抗运动。

当1958年10月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就位时，气氛发生了迅速和戏剧性的变化。开始，共产党对于是否信任他犹豫不决。他的通谕《慈母与导师》(1961年)被申斥为新资本主义，它所主张的社会措施被解释为支持福利国家^②。但是当梵蒂冈证明了它的中立态度，对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向左转变没有进行干预时，共产党才在思想上有了重大转变。

1962年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质的进步。由陶里亚蒂起草并经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明确主张：“我们应该懂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切愿望，不仅能够存在于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当中，而且那些在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面前，宗教良心受到折磨的人也会激发出这种愿望。”^③一个共产党放弃了“人民的鸦片”哲学而重新找到人们比较不熟悉的马克思的段落，使它同现代条件发生共鸣，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④。

虽然梵蒂冈官方没有作出反应，但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学者和高级教士却很关心。从来没有完全受到压制的天主教徒和马克思

① 例如，以朱塞佩·托塞蒂为首的一群天主教人组成的“社会纪事派”被解散，托塞蒂退出了公共生活；《现在》双周刊受到宗教法庭的新闻检查，后来被迫停刊，在撤除主编普里莫·马佐拉里之后才允许复刊；天主教行动会的青年部在1954年遭到清洗，多数领导人(包括一位基诺·包利神甫在内)被撤职。

见R·帕齐：《争取社会主义的天主教徒》，载《从抵抗运动到今日的天主教徒》，第225—240页。

② 波卡：《陶里亚蒂》，第663页。

③ A.切基：《意共历届代表大会史》，第247页。

④ 马克思曾经写道：“宗教的贫困同时也是真正的贫困和对真正的贫困的抗议的表现。宗教是受压迫的人的叹息，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的思想感情，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黑体是作者用的)

主义者之间的对话现在又大大增加了。3个月后,1963年3月20日,共产党在教皇约翰喜爱的城市贝尔加莫举行了一次讨论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的会议。奇怪的是,陶里亚蒂的讲话已经预见到通谕《人世和平》的格调,当时这个通谕虽已写好但尚未发表。这是纯粹出于直觉,还是陶里亚蒂通过他的渠道获悉这个通谕的某些内容?没有人知道,但是选择贝尔加莫作为会议的地点如果完全是出于偶然的话,那就似乎太过于完美了。陶里亚蒂谈到要求天主教和共产党合作实现和平与社会变革的愿望。他说:“关于宗教信仰,我们不再接受那种天真和错误的思想,即社会结构的变革就足以实现社会的变革。这种思想是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派生出来的,它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现实是更为复杂的;变革的根源要深刻得多;改造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现在越来越清楚,我们互相之间必须有深刻的了解——从此以后,合作。”^①

过了20天以后,《人世和平》的通谕发表了。它修改天主教会的原则的情况甚至要比共产党改变他们自己的立场更加激烈得多。它把《慈母和导师》通谕中允许在社会领域中合作的合法性扩大到了政治领域。而且,它还有三大进展:它对“错误和犯错误的人”的传统界线重新作了不同的解释。“错误和犯错误的人”指的是教徒和非教徒应当共同寻求真理^②。其次,它划清了“人的本质、血统与命运和宇宙的虚假的信条”和那些“起源于这些信条,至今

① 桑蒂尼的书,第137页。

② 以往,天主教信条区分错误和犯错误的人,目的是为了改造犯错误的人。它不意味着他们有任何权利。根据约翰的解释,错误仍然没有权利,但犯错误的人享有同批评他们的人一样多的权利。在政治上,这意味着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在探求真理和为探求真理而共同合作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特别是在探求和平方面。

仍从这些信条吸取灵感”的历史上的运动的界线；它把允许对话的领域从国际一级(梵蒂冈一直在这个领域活动)扩大到包括一国之内的不同政治潮流。^①

《人世和平》在哲学上和实践上为对话敞开了大门。事实上，发布通谕是为了把努力争取和平的“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光是天主教徒——团结在一起。这个通谕是在大选之前几个星期发布的，人们预料共产党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进展。人们激烈批评教皇发布通谕的时间：为什么不再等一个月发布呢？显然教皇是要使梵蒂冈疏远政治——这个做法同他的前任完全背道而驰。

教皇约翰于1963年6月去世。过了一年多时间，陶里亚蒂在1964年8月逝世。陶里亚蒂在突然病危的前夕，完成了他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强调要宽容和忍耐：“在教皇约翰在世时期，天主教的群众和组织有左倾的趋势。现在，在中央却退回到了右的地位。但是在基层，始终存在着向左转的条件和势头。我们对此必须了解和给予帮助。为此目的，旧的无神论宣传是毫无用处的。”(黑体是作者用的)^②

参加这两位“对话”和“合作者”的建筑师的葬礼的人非常多人山人海。大概为教皇流泪的共产党员和为陶里亚蒂哭泣的天主教徒一般多。红衣主教勒卡罗(皈依宗教的反动派)说：“如果我们不认真检查一下，我们大家为什么这样不理睬(约翰)，我们的赞美就会(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快地)为虚伪所笼罩，堕落和无所作为。”^③关于陶里亚蒂，他的终身的对手和社会党的传记作者焦吉

① 据红衣主教罗伊说，《人世和平》这些解释被梵蒂冈认为是正确的。见L.阿卡特利的文章，载《从抵抗运动到今日的天主教徒》，第130页。

② 陶里亚蒂选集，第1176页。

③ 《教皇乔万尼》，第105页。

奥·波卡说：“《备忘录》是一份有最高气质的文件，是同陶里亚蒂的整个一生相符合的——一位头脑清醒的意大利人被召唤来领导一个思想感情不是那么清醒的群众运动。我指的是人们的希望、正义和团结。”^①

时间将证明这两位建筑师打下的基础是牢固的，但在短期间内，自从梵蒂冈会议以后，天主教会内部的巨大反对行动表面化了。在梵蒂冈会议期间，在一千多名主教（许多人对罗马教廷不满）的帮助下，约翰和保罗同他们的拥护者取得很大的进展。他们依靠说服、恩赐和教皇的权威，能够把他们集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来支持任何论点。但是这些论点总起来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激烈的方针，它使大部分主教管区感到不安。

当人们开始感觉到改革的时候，各级教会统治集团的反对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了。在法国，大主教马塞尔·勒费弗尔的反抗是如此广泛，以致使他接近于被革出教门。保罗六世担心教会发生分裂，越来越屈从于保守派的压力。他没有能力来改革罗马教廷，没有能力来改革教会法规，没有能力来贯彻在教会中成立牧师会组织的原则。^②

然而与此同时，他在神学和政治上谨慎地支持梵蒂冈会议的主要路线。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于1965年12月批准的最后文件《欢乐与希望》，专门用了“对话”这个词并表示赞同：“天主教会虽然坚决拒绝无神论，但它承认所有的人，教徒和非教徒，应当对建

① 波卡：《陶里亚蒂》，第682页。并参阅F.罗达诺的《天民党问题和历史性妥协》，有助于了解这两位建筑师，他称他们是“伟大的前辈”。（见该书第288页以及以下诸页。）

② G.麦约因：《核心人物》，第27页。本书对1978年初还活着的每一位红衣主教都有一篇简历。本书是受一群有关的天主教俗人的委托而编写的，他们想要确保选举教皇的红衣主教秘密会议充分了解会议的参加者。

立一个公平的世界作出贡献，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在一起，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坦率和谨慎的对话肯定是不行的。”（黑体是作者用的）^①

1968年，天主教会的一个文件，总结了宗教会议取得的进展，谈到“基督教徒打算同不同信仰的人进行对话，不论是为了在各个不同领域里探求真理，还是为了通过合作来解决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这个文件实际上发展了主教会议的思想，声称“即使对话者只在少数几件事情上同意，对话也是可能的”，以及“宗教的分歧本身并不排除在世俗领域里取得一致，这个领域是独立自主的。”（黑体是作者加的）^②

共产党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在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路易吉·隆哥建议，关于宗教的积极促进因素的思想不仅适用于个人及其良心，而且适用于整个教会：“我们正在观察和帮助超越那种使宗教变成人民的鸦片的保守派的主张——这种超越是通过宗教和基督教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于教会面临世界实质问题的新情况）来进行的……”^③

保罗六世的小心谨慎的确使意大利下层教士的紧张情绪得到缓和（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位保守派的教皇），但却不能使反动派满意（他们把他看作是进步主张的坚定的支持者）。在罗马发生的两件小事足以说明最后这一点：一件发生在我的母校，另一件发生在西斯廷教堂。

我曾经重访在罗马圆形剧场附近的我的母校安吉罗-马伊学

① 桑蒂尼的书，第129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同上，第132页。

校，它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学，有圆柱门廊的庭院显得很荒凉。我站在那里，充满了童年时代的回忆，我看到远处门廊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人，于是我向他走去。他是一位矮胖的家伙，穿着一套蓝色哗叽的西服，一件过分花哨和俗气的衬衣和领带。他看来好象是一位穿着节日服装的看门人。“校长在吗？”我问。

“我就是校长。”他说，“我叫弗拉·安布罗吉奥。”

我吃了一惊，脱口而出：“你穿着便服在干什么？”他甚至没有穿戴神甫的硬领！我感到震惊。

“时代变了。”他若无其事地微笑道：“学校开学后我就穿上神甫的黑长袍。”

我告诉他我是一位美国教授，以前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立即显得和蔼可亲，而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刚从困惑中恢复过来——我的童年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有许多感想。事实是，他已失去了尊严。黑色长袍表现出谦逊，而哗叽服装则表现出商人的谄媚。

我们闲聊起来。为了引他说话，我谈起教皇约翰如何受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的爱戴。

“是的，他为人热情，是一个慈善的教皇。”安布罗吉奥说，他的语气缺乏感情并装出超然的样子。“你觉得保罗（教皇保罗六世）怎么样？”他问。

“在我们看来，他有点冷若冰霜。”我回答。

“是的，他是一位外交家，有头脑的教皇。”他的语气已比较热情，他的话暗含着下面的意思却是清楚不过的了：天主教会需要一位有头脑的教皇。这位名牌私立学校校长不想讲得太露骨，但他明确地认为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安布罗吉奥接受保罗，主张强硬路线的俗人会说他是一个叛

徒，一个十足的犹太。我在意大利的最老的朋友（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在一起）曼利奥·巴贝里托，喜欢中世纪西克斯图斯五世的罗马，而非常讨厌保罗。有一天我们去西斯廷教堂。游客们通过曲折小径，狭窄的石梯和壮丽的拉斐尔画室（里面有许多拉斐尔的油画）来到教堂。

最突出的颜色是天蓝色。我立即品评教皇西克斯图斯一定喜欢蓝色。“那个时期是幸福的，”曼利奥痛苦地说，“现在的教皇喜爱红色。”“你说的是教皇约翰？”我问。“是的，保罗也是这样。”他抱着如此敌对的态度提到这两位教皇，使我吃了一惊。多数罗马人认为保罗本质上是保守的。我问曼利奥有多少天主教徒同意他的看法。“不多，”他简单明了地说。^①

教皇保罗六世于1978年8月去世，在位15年。尽管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仍然忠于教皇约翰。在保罗去世之前不久，《上层核心人物》的作者加里·麦克奥因教授作了这样的评价：“教皇约翰和梵蒂冈会议建设了一个友谊的首都，教皇保罗六世保持完整无缺，如果说在某些方面有所损失，在另一些方面又得到补偿。”^② 损

^① 曼利奥·巴贝里托和我都是1912年出生的，相差仅两个月。我们的经历惊人的相似。我们两人都是经济学家。他30岁的时候任墨索里尼的大学督察长和农业部副部长。我30岁的时候离开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师的岗位到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我们1945年初在罗马相遇。他没有悔悟之意，墨索里尼选择了错误的一方，然而美国必然会走向法西斯化。

我笑他，但三年后我进了监狱，而他却是一位企业组织的高级官员。1960年我在罗马再次见到他，麦卡锡主义和冷战已在衰落中，曼利奥告诉我，他已成为一名“英国型的自由分子”。1977年他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1979年他陷于绝望之中。他对我说：“卡洛，一切都过去了。共产党占了上风，成吉思汗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每个角落将会有行刑小队。”他隐居在罗马从事古代文物研究。童年岁月和友好感情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他的这本书对我有很大帮助，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检验物，对于他的预言，我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就往往正确多于错误。

^② 《核心人物》，第13页。

失的是一些行政事务，而补偿的则是政治和理智方面的事情。在他担任教皇的时期，天主教的思想家建立了一种主教会议的领导权，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对话十分活跃。^①整体主义派无法反对这个趋势。自从保罗任职以来，比约翰走得更远，他在1971年的通谕《第八十个基督降临节》(Octogesima Adveniens)中使这种讨论合法化。这就使整体主义派处于守势。波洛尼亚大学一位整体主义派的教授基安弗兰科·摩拉对我说：“我们必须反抗，牺牲在所不惜。”当我把这句话讲给一位主教会议派的权威路易吉·佩德拉齐教授听时，他哈哈大笑并讥讽地说：“要成为烈士需要两个人，我没有看见地平线上有任何刽子手。”

在对话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友好关系，已恢复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前所梦想不到的程度，这是毫不奇怪的。例如，一位天主教的领导人(俗人)拉涅罗·瓦莱能够在共产党的竞选名单上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竞选并当选。而且，保罗六世心照不宣地批准共产党人参加1978年初政府的议会，并且巧妙地欢迎贝林格出席遇害的阿尔多·莫罗(意大利政府总理)大祭司的弥撒。教皇的宽容态度反过来又对教会统治阶层产生影响。1977年意大利主教会议(有成员大约300人)分裂，整体主义派和主教会议派旗鼓相当。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前，要找出二十来个赞同共产党的主教是很困难的。^②

整体主义派以极大的痛苦作出反应。《最后的秘密会议》的作者马拉奇·马丁在《国民评论》刊物上发表文章，谈到保罗时说，“他的恢复友好关系的政策取得预期的结果。有选举教皇权的红衣主教、河内的郑(约瑟夫·马里)去年9月在越南说：‘我们是马

① 《从抵抗运动到今日的左翼天主教徒》，第136页。

② 贝塔齐同作者的谈话。

克思主义者。我们坚信列宁主义。我们又是天主教徒。’去年6月，四位有选举教皇权的法国红衣主教……坚持在政治和经济上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马丁指责保罗为其继承人作好了准备，“就要安排同西欧四个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的共产党政治家(应读为：欧洲共产主义)取得和解。”^①

一位比较严肃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写道，保罗“如果当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教皇，他一定会瞠目结舌，然而他却是认识到这样一种过渡的合法性的教皇。”^②对于意大利半数的主教管区来说，这是应该诅咒的，而1978年教皇之死倒是一个及时的宽慰。这是改变政治倾向、削弱现有改革和终止认真贯彻执行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决定的一个历史性机会。麦克奥因教授颇有预感地写道，“梵蒂冈会议取得的成就还不巩固；相反，强大的对抗运动已经开展了。”^③

随着保罗的去世，一场巨大的思想冲突发生了，这是至福千年的教会史上最有戏剧性的插曲之一：在10个星期内，有一百多位红衣主教分开举行了两个秘密集会，选出两名教皇(其中一名死了)。1978年的这两次秘密会议是高水平的戏剧，比诸如《渔夫的鞋子》之类的小说更耸人听闻，它们包含有在谦恭有礼的掩盖下的激烈争斗。教会的前途，教会对共产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被决定下来了。

虽然态度大相径庭，但两个秘密会议和两位教皇都是教皇保罗六世的工具，在有投票权的115位红衣主教中，有110人是保罗六世挑选出来的。^④然而保罗的政策是如此自相矛盾，他在左右之

① M.B. 马丁：《教皇的最后的手法》(1978年4月28日《国民评论》第30期，第532页)。

② 桑蒂尼的书，第83页。

③ 《核心人物》，第13页。

④ 罗马教廷主教团有130名红色主教，根据教皇约翰制订的教规，其中有15名由于年龄关系没有投票权。

间搞平衡又是如此小心谨慎，以至于同样的红色主教在同样的问题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却出现不同的结果。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位对选举最有影响的、互相对立的红衣主教都是保罗六世的门徒，他们是：佛罗伦萨的红衣主教贝内利和都灵的红衣主教佩莱格里诺^①。我有幸见到了他们两人。

红衣主教佩莱格里诺退休后隐居在一个叫瓦洛—托里内斯的村庄。他的家就在山坡上，可以眺望距离不太遥远的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优美景色。这是一间小别墅，布置简单朴素，有一个有顶棚的门廊和一座花园，由教区交给他使用。他有一位秘书和两三位清洁工、厨师和园丁。他似乎还有点钱。对于一位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来说，这是一个质朴而优雅的环境。佩莱格里诺在意大利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关头来到都灵任大主教的。使企业家们感到沮丧的是，他在公平对待工人方面作出了榜样。他在1973年6月对主教派教会会议的讲话具有代表性。他对他们说，当出现罢工威胁时，他打电报给工会、劳工部和工业家联合会（类似美国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前两个单位给了回电，最后一个单位却毫不在乎。佩莱格里诺对工人很热情，对共产党人彬彬有礼，对天主教民主党则采取超然的态度。因而获得“红色主教”的昵称。他受到人民的爱戴，受到各方面的尊敬，没有同任何人为敌，许多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也对他有好感。因而他以“梵蒂冈会议的主教”闻名，被教皇保罗挑选来担任审议的主要角色。

佩莱格里诺在政治上继承教皇约翰的传统，在教义方面坚定不移，愿意同一切善意的人们合作。“关于意识形态方面”，他有一

^① 佩莱格里诺红衣主教于1977年初辞去都灵的职业。

次说道，“我们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很清楚的。至于其他，在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一切方面进行合作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一种义务。然而对无神论思想和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任何屈服，都是同基督信仰不相容的。”^①当然，这是经过保罗六世批准的梵蒂冈会议的坚定信条，也是对那些攻击佩莱格里诺是约翰和保罗的代理人的整体主义派的强烈谴责。当我同他见面时，我能够了解整体主义派对他的敌视，因为这位红衣主教不仅思想跟教皇约翰一样，而且在外形甚至在精神上更有一些相似之处：宁静的虔诚，温柔的单纯，善良，精明，虚心坦率——是一位永远是春天的人。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样子很疲倦，他委婉地谢绝同我进行讨论。他柔和地说，他已经退休了，他想说什么都要先写在纸上，他会把抄本送给我。我当他是打发我走，只谈了15分钟我就离开了。根据他的身体条件，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嫌麻烦要见我。我估计是出于礼貌，但我错了。作为都灵的一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佩莱格里诺讨厌外行人。他想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对教会的态度是否严肃，对对话是否关心。我回到纽约后，收到了一大批小册子、神甫的信和讲话稿，特别是他在梵蒂冈会议上的插话。我深受感动。他虽然疲劳，但仍乐意助人。

红色主教贝内利是佩莱格里诺的对立面。佩莱格里诺是一位学者和哲士。贝内利是一位行政官和实权派。他们两人都是保罗六世的信徒。他们不是同一代人——到1978年一个是78岁，一个是57岁。年岁大的是受十九世纪欧洲文化的熏陶——深思熟虑，沉默寡言；年岁小的是受二十世纪美国化的影响，敢作敢为，容易使人误解的活泼愉快——一位能干而有进取心的人。然而就他们两人来说，佩莱格里诺对于时势的变化思想比较开放，并能冷静

^① G.莫拉：《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第311页。

地面对未来，依靠过去的经历作为新收获的土壤。相反，贝内利比较焦急不安，意识到他是在进行一场后卫战，指望从过去的经历得到安慰。

贝内利为就任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的盛况而扬扬得意。我听说他在一次大概有100位虔诚的知名人士集会上讲过话。他身穿红衣主教的华丽服饰，站在大教堂（壮丽的佛罗伦萨大教堂）中央凸起的讲坛上一张大理石长桌的后面，在两侧大烛灯的照耀下，从讲经台上宣讲。在他的后面，有二十位穿着淡紫色法衣的神父、主教，教廷官吏围坐成半圆形，穿紫红色的主教助理坐在中间。贝内利的鲜艳的红色长袍在淡紫色和紫红色的衬托下令人目眩。

贝内利是在悼念已故的佛罗伦萨的主教们，特别是最后一位主教埃利亚·德拉·科斯塔。怀念之情是很明显的。贝内利不仅为已故的主教们哀悼，也为时光的流逝而哀痛，过去医院、学校和慈善事业是教会的关心所在，基督的教导得到实现；而现在国家首先占有了这些职务和机构，把它们世俗化。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正在慢慢地渗入到这个国家来，体育运动取代了弥撒，电视取代了天主。他感到非常绝望。

过了不久，我遇见一位年轻的主教，他是贝内利的狂热崇拜者，曾经跟他在一起工作过。我提到那次布道，认为它多么落后于时代。“不，不，”他说，“那只是一个纪念的场面。主教阁下是非常非常现代化的。他当教皇保罗的左右手达十年之久，他支持现代化。但决不以放弃基本原则作为代价，不以向共产党人投降作为代价。不，绝对不会。”

我问他为什么贝内利比其他红衣主教更强烈地反对共产党。“比谁？”他问。“比如佩莱格里诺。”我回答。

“红衣主教佩莱格里诺是超凡的，一个圣人，象教皇约翰。红衣主教贝内利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主教阁下不害怕马克思主义，他怕的是国家，世俗的国家。社会的世俗化象恶魔，它是文明的破坏者。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征兆；自由派一样坏，由于他们更加反对教权主义，所以也就更坏。”

“然而你们同自由派合作，为什么不同共产党合作？”

“因为他们更有战斗力。他们很聪明，恶魔似的聪明。他们能够操纵人，唤起他们最邪恶的本能。我出生于托斯卡纳区的一个村庄，我的父亲是市长，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基督教徒。当陶里亚蒂在1948年遇刺时，我刚11岁，我永远忘不了一群暴徒烧毁了我们的房子，这是一群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暴徒。”

“那是30年前的事了。如果今天共产党和天主教不合作，意大利是没有出路的。……失业、骚乱、恐怖主义得不到解决。社会将陷于四分五裂。”

“我不同意，”他客气地说，“果真如此，那是上帝的旨意。”

“战争与和平怎么样？”我争辩说。“欧洲共产主义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这对缓和有利。”

“这是幻想，”主教说，“缓和是俄国人的花招。”

“那末你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不知道。决定于上帝的旨意。”

“你认为共产党会参加政府吗？”

“不会，如果我们有办法的话。”

“如果他们参加了，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他停了一下，态度很诚恳，使我难忘。他说：“教会将无忧无虑地走向未来……但信心不大。”

红色主教贝内利是1978年第一个秘密会议中影响很大的有选举教皇权的人。他很有才能，被认为当教皇年纪还轻了些。尽管

他思想保守,在他担任教皇保罗的执行官的十年(1967—1977)中,他个人在罗马教廷的三十多个部门里树敌甚多。但是他有两股强大的力量:他强烈反对共产党,因而受到罗马教廷的宠爱(只要他本人不是候选人);他同第三世界的红衣主教们关系很好,他们几乎全都是在贝内利担任保罗的助手时被保罗提升的,这些主教对于罗马教廷的任何成员要当教皇候选人是不听指使的,他们赞同由担任主教的、非外交官的高级教士来当教皇候选人。贝内利有一个候选人可以使两个营垒的人都感到满意,这个人就是威尼斯大主教阿尔比诺·卢齐亚尼。

卢齐亚尼作为教皇候选人有值得赞赏的优点:他不得罪人,实际上默默无闻——为人朴实虔诚,脸上挂着适于上电视镜头的微笑。他温和文静,八面玲珑。贝内利把他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罗马教廷和第三世界。他得到罗马教廷派的选票,他向他们指出,极右分子不可能获胜,而缺乏经验的卢齐亚尼主持梵蒂冈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威胁,而且卢齐亚尼是强烈反对共产党的。贝内利对第三世界的红色主教则奉献卢齐亚尼的仁慈的微笑,指出他是属于人民的人,对穷人富有同情心,是一位社会党砌砖工人的儿子。卢齐亚尼不喜欢热闹场面和财富,他会使教会转向简朴和谦逊。

贝内尼的这种结合,以及不大出名的卢齐亚尼,使进步人士大为惊奇。在第三轮投票时,卢齐亚尼当选了。他采用了约翰·保罗一世的称号。这是有点蛊惑人心的宣传,因为它含有约翰·保罗一世将继续执行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政策之意,其实,他充其量不过是限制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进展,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如对待同共产党对话的态度)。贝内利的随行人员中的一位神甫说。贝内利对约翰·保罗一世的欢心同他对后者的期望是一致的。“他的福运象大教堂一样是广大无边的,”贝内利随行人员中的一位神甫说。老资格的记者毛罗·兰齐西在《全景》杂志上写

道，“贝内利谈到新教皇的政策时很自信，使人毫不怀疑他对卢齐亚尼将有很大的影响。”^①

在教会内外，右派欢欣鼓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保守派的胜利有多大，而以浮夸的语言大吹大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平民》杂志的一篇社论，这个杂志同意大利新法西斯党“意大利社会运动”有密切联系。《平民》杂志认为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姑息（如果不是更坏的话）共产主义。社论说，现在一切都要改变了，约翰保罗的当选意味着“天主教左翼形形色色渣滓的失败。

社论接着说：“在秘密会议以前，天主教内部的这个左翼联盟似乎非常强大，有些人说它已成为教会的主宰者……当情况危急时，左翼就原形毕露了。……少数人被迫投降……约翰二十三世的政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至今仍然够我们受的。……现在约翰保罗一世当选，应当使天主教徒们作为罗马教会的富有战斗精神的信徒，而不是作为陷入讨好《真理报》的东方政策圈套的教皇的追随者，全力投入这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②

《平民》杂志知道它能够指望贝内利对卢齐亚尼占有的支配地位。过了33天后，教皇约翰保罗死了。该杂志哀叹“原本能够办到的事情未能办到。”它为失去一位教皇而哀痛，这位教皇的“大众文化今天却遭到反对，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天然敌人，因为知识分子认为它更便于成为‘提高觉悟的源泉’。”

《平民》杂志尽管有错失良机和悲痛之情，但它仍然相信右派还能保持它的势头，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的政策将会遭到第二次选举教皇秘密会议的拒绝。

“卢齐亚尼是在蒙蒂尼^③（保罗六世）的哈姆雷特式的政策……

① M.兰齐西：《贝内利的指头》（1978年10月10日，《全景》杂志第46—7页）。

② M.特德斯奇：《回到教士那里》（1979年9月3日《平民》杂志第7页）。

③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曾描绘蒙蒂尼是“我们最杰出的红衣主教哈姆雷特”。

和约翰的骑士外交之后出任教皇的，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徒出现在人民的面前……证明卢齐亚尼是真正执行教皇职务的事实是，卢齐亚尼在位的33天取消了蒙蒂尼的15年。事实上，今天已没有人说，‘让我们回到保罗六世的时代’，人人都说‘我们应当再找另一个卢齐亚尼。’”(黑体是作者用的)①

第二次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以令人震惊地推翻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决定而告结束：同一个红衣主教团竟然选出两个如此截然相反的人物似乎是不可能的。从各方面来看，除了虔诚和朴实之外，卡罗尔·沃伊蒂瓦是卢齐亚尼的对立面。他年轻，体格健壮，是一位有坚强意志和独立判断力的人，一位精通行政管理和外交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看来似乎存在着两个罗马教廷红色主教团，一个已经硬化，一个反对偶像崇拜——产生了五百年来第一个非意大利人的教皇，第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皇，也是一百多年来最年轻的教皇。第一次选举反映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懦弱，用过去来作庇护；第二次选举表现了善于处世，大胆，对未来充满信心。虽然红衣主教团看来奇怪地分裂成两派，事实上它却真正反映了哈姆雷特式教皇的分裂的灵魂和教会内部的冲突。红色主教团以明确的政治家风度作出集体决定：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是不可改变的。沃伊蒂瓦的年青和坚定，保证局势不会倒转，因为他大概会任命下次秘密会议的全体红衣主教。主教会议派胜利了，约翰二十三世总有一天会被列在基督教《圣经》的正经中。

右派的恼火是可想而知的。当新教皇结束了他的第一次讲话和祝福之后，一位失败的选举人朱塞佩·西里红衣主教大踏步跨进他的轿车，满脸怒容。当一位记者问他对教皇的讲话有什么感

① M.特德斯奇：《教皇卢齐亚尼的信念，15年和33天》(1978年10月8日《平民》杂志)。

想时，他厉声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听！”^①

《平民》杂志大发雷霆。主编因为不能攻击一位活着的教皇而采取一种不道德的手法：它攻击教皇的祖国。社论发出一种特殊音调说：“波兰一直给欧洲带来危害，这个欧洲的文化、道德和精神的疆界止于普鲁士（即东德共和国），普鲁士违背自然规律，脱离了它的德意志祖国。”（黑体是作者用的）^② 这种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卑劣地掩盖了一种种族主义的论点：斯拉夫人不配作欧洲人。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进步人士的欢乐。美国的梵蒂冈权威安德鲁·格里莱神甫报告说，巴西的红衣主教洛斯切德“喜气洋洋。米歇尔·佩莱格里诺也一样，容光焕发。他的热情、漂亮的脸孔充满喜悦。”^③

佩莱格里诺容光焕发是完全有道理的。正如红衣主教贝内利是第一次选举的设计师一样，佩莱格里诺是第二次选举的灵魂。他同约瑟夫·苏伊伦斯、海亚辛特·西安道姆、弗兰兹·哥尼格及其他几个人对第二次秘密会议的策略作了安排。他们拥有否决右派选举的票数。同时，他们在第一次选举中的通情达理，使他们在第二次选举中赢得了中间派的尊重和同情。在初次团结支持约翰·保罗的一阵兴奋之后，许多红衣主教认识到卢齐亚尼不会强大到足以同罗马教廷的势力相对抗，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觉到是受人操纵了，他们责备了贝内利。随后约翰·保罗之死对贝内利产生了不利的影晌。没有一点迷信的红衣主教是不多的。约翰·保罗的突然死亡似乎是来自上帝的一个神迹，贝内利被抛弃了。大家都知道沃伊蒂瓦在天主教會的教义方面是保守的，虽然他忠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对于诸如禁欲、修女的合乎体统的服装之类的

① 《一位“外国”教皇》（1978年10月30日《时代》周刊第86页）。

② M.特德斯奇，《新教皇怎么办？》，1978年10月22日《平民》杂志，第457页。

③ A.M.格里利，《教皇的产生》，第225页，1978年。

事情是很保守的，因而得到许多红衣主教的好感。^①最后，他们中间有些人重新考虑，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和西欧的共产党正面顶撞是否明智。毫无疑问，佩莱格里诺的精神境界，他的智慧和虔诚，人们都有感受。所有这些因素加上其他因素，为近五百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的教皇上台开辟了道路。正如我在约翰·保罗二世（即沃伊蒂瓦）当选的当天晚上，为《民族》周刊所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的：“如果没有贝内利红衣主教悄悄地闪电式地选出那位短命的教皇，红衣主教团决不会取得重新考虑后常有的那样明晰的结果。千百万意大利人既相信辩证法也相信上帝。他们会认为，贝内利红衣主教8月的胜利注定了他10月的失败，是恰当的和正常的。”^②

约翰·保罗二世在当选的一年内，描绘了他的教皇职责的轮廓：没有一个重大问题他不表态。他对社会、宗教和神学的许多问题采取的保守立场常常使教会内的进步分子感到苦恼。^③在他就任一周年，一位天主教主要神学家、瑞士的汉斯·孔，写了一份长篇备忘录表达了他的疑虑不安。^④梵蒂冈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针锋相对。到了1979年年底，包括汉斯·孔在内的三位神学家遭到审查或处分，耶稣会会士遭到严厉申斥，教皇正在把更大的权力交给称为“上帝事功派”的权力集团。^⑤

① 教皇访问美国时坦率地发表了他的保守观点，使美国天主教徒大为震动。但是研究教会的人对这些观点是很清楚的。见《教皇的产生》，第242—244页。

② 关于格里利神父，见《教皇的产生》，第213页：“如果贝内利不是那么卖力和有效地操纵卢齐亚尼的选举，他是不会遇到如此强烈的反对的。”

③ 见M.莱昂论教皇的文章《加罗林王朝》，1979年10月29日《全景》杂志第235页及以下诸页。

④ 汉斯·孔，《教皇约翰·保罗的头一年》。

⑤ 教皇亲自驳斥耶稣派（1979年12月7日《纽约时报》）。拥护正统教义的红衣主教会议（前称宗教法庭）谴责美国神甫A.科斯尼克编辑的一本关于性的书（1979年12月9日《纽约时报》），召见荷兰神甫E.希莱比克进行审查（1979年

十分明显,沃伊蒂瓦有独裁主义的坚强决心,他倾向于在天主教会教义中采取严格正统的立场,进步神学家们认为这是倒退。他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立场还要等着瞧,因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这场争论对于天主教会来说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汉斯·孔已提出挑战,拒绝放弃他的传道师的岗位。1980年1月28日,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推理严密的文章中,为他自己的天主教教义辩护,反对罗马的解释,“从中世纪及以后向内发展起来的罗马专制政治论”。他尖锐地指出,“‘罗马天主教’是晚近才有而令人误解的一个新词。”孔的论点在天主教会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他决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神父。

引起这场争论的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这方面与我们有关的,只是它在意大利国内对梵蒂冈政治立场冲击的程度,以及它对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的一般态度。例如,梵蒂冈如果逼迫人们就堕胎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如同它在离婚问题上所做的那样,那么,沃伊蒂瓦本人对堕胎的人所共知的看法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尽管教皇对主教管区和红衣主教贝内利管区极力要求举

12月14日《纽约时报》)并禁止瑞士神甫汉斯·孔讲授天主教神学(1979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结果引起一阵抗议的浪潮,但沃伊蒂瓦显然不打算改变态度。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于行使自己的权力是没有顾虑的,人们料到他会加强“上帝事功派”作为抗衡耶稣派的力量。“上帝事功派”被称为“神圣的黑手党”,它是Y.维兰特的一本书的书名。“上帝事功派”是保守的专业人员、商人、政客和中间人士的中坚组织,有成员72,000人,分布于87个国家,在它影响或控制下有497所大学,52个电视台,694家出版物,32家报社和10家影片制造或发行公司,据《全景》杂志估计,它至少得到15名红衣主教的支持,他们投票选举约翰·保罗二世,现在正在策动解除各国僧侣统治阶层的管辖权,使它只对教皇负责,从而同耶稣派的自主权相竞争。尽管遭到自由派的阿根廷红衣主教皮罗尼奥的反对,全部教规都被通过了,这个方案只等待教皇的签署(S.安德烈斯和M.莱昂的《上帝事功派:沃伊蒂瓦的神圣的黑手党》,载1979年11月26日《全景》杂志第84—92页)。

行公民投票的运动发表了强硬的声明，但却没有迹象表明梵蒂冈要进行声讨。在政治上，教皇是很谨慎的。^① 在诸如修女的作用和授予妇女圣职等问题上，天主教会内部是有反抗的。这种反抗在教皇访问美国时表面化了，许多城市的妇女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华盛顿设立纠察线，女修道院长特丽莎·凯恩不同意教皇的看法，表现了尊严和勇气。^②

虽然在天主教会内，约翰·保罗二世在神学上是保守的，但是他同外界的关系，特别是在政治上，似乎善于接受改革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反动派的大发雷霆和《平民》杂志社论的哀鸣看来是完全有道理的。

《平民》杂志警告说，“让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教皇卢齐亚尼的笑容、乐观主义和信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教皇沃伊蒂瓦给我们带来的是受迫害的和模棱两可的天主教，是那些不信奉正统宗教者的天主教……**最可能的假设和最令人焦虑的是**（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已被说服必须同共产主义妥协。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明天意大利变成共产党国家，一位象沃伊蒂瓦这样的教皇知道他该干些什么……前景是远远不能令人高兴的。”（黑体是作者用的）^③

《平民》杂志所说的“可能的假设”不久被一位会议的参加者达喀尔的大主教和非洲主教座谈会主席、红衣主教西安道姆证实了。

① 据 1979 年 1 月 2 日《信使报》报道，教皇“小心谨慎，不让人们找到借口来进行公民投票的斗争”，红衣主教贝内利恰好相反，他不断发动一场要求对堕胎进行公民投票的运动。

② 见 G. 维克赛，《祈祷仪式集中于决定不让妇女帮助分发圣餐》（1979 年 10 月 1 日《纽约时报》，第 A—9 页；《在划分天主教妇女的教会中追求平等》（1979 年 10 月 2 日《纽约时报》第 A—12 页；《教皇在美国》，载 1979 年 10 月 13 日《时代》周刊第 14 以及以下诸页；以及 1979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时报》。

③ M. 特德斯奇，《火的日子》（1978 年 10 月 28 日《平民》杂志），第 519 页。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选不久，他在接受《信使报》的采访时，对选举结果表示满意。当问他“挑选一位波兰的红衣主教是不是一种反共行动？”时，他回答说：“绝对不是。如果问题只是在于物色一位反共的红衣主教选举就会快得多了。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特别是（它的最后文件）《欢乐与希望》要求同一切善意的人们对话。会议并不期望对某一个集团进行斗争，而是期望同任何地方、任何人进行忠诚的合作，以便发展自由、正义、和平与进步的价值。我们生活在这个前景之中，虽然我们对保卫宗教自由是坚定不移的。”^①

约翰·保罗二世当然是反共的。但他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任命保罗六世的东方政策设计师卡萨罗利红衣主教担任国务卿的主要职务。1979年6月，教皇访问波兰时，他让广大群众证实天主教会的威力。他表现和蔼可亲，在离开波兰时，还吻了波兰总理^②。电视转播的这个亲吻的镜头，给予一个表示感谢的政府以它所十分需要的合法地位，当然代价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年的时间内，天主教会得到了许多重要的让步（见1980年5月25日的《快报》）。

大概关于约翰·保罗二世的最重要的政治事实是他极力承担起社会正义的责任。他访问美国期间在联合国的讲话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种承诺必须根据梵蒂冈内部的一股值得注意的潮流来理解，这就是：天主教会正在慢慢地脱离资本主义及其现有的制度

^① 1978年10月19日《信使报》。

^② 法共和意共也得到类似的合法地位。1980年6月1日的《纽约时报》震动了读者，它在头版刊登了教皇在巴黎同乔治·马歇握手的照片，马歇扭扭地咧嘴而笑，沃伊蒂瓦则露出诡谲、逗人的微笑。第二天，电视播放了教皇返回罗马的新闻，教皇同共产党副市长（在市政选举前一个星期）亲切地握手。教皇陛下是不同魔鬼的门徒握手、不吻反基督教的人的，因而这个信息很清楚：共产党人是受欢迎的人。

和组织结构。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主意,但我认为这是真的,路易吉·贝塔齐主教阁下最先给了我一些暗示。如果没有他,我会跟所有外国观察家一样忽略了这个趋势。

这决不是说天主教会已越来越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远非如此。甚至也不能说教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但它确实说明,教会确信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慢慢地下沉,教会无意同它一起沉没。

贝塔齐在他的《一个人的成长》一书中毫不含糊地写道:“今天不是在……共产主义和民主(一个反对基督教,另一个是基督教)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一种对一些人有利,其他人则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制度和一种扩大平等权利的方针之间进行选择……根据《福音书》和教会最近发表的文件,这个选择是明确的:建立在绝对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同基督教是不能和谐共存的。”^①

贝塔齐在交谈中对我说:“有一些教会文件有很进步的观点。例如,有一份梵蒂冈正义与和平委员会的文件,是为海洋权利问题国际会议准备的,会议将拟订一项海底条约。文件说:‘从天主教—基督教的观点出发,主要的问题不是财产权,而是尘世财物的分配。如果私有财产的制度能做到这一点,那很好。但是如果对一些人给得太多,而对其他人则进行剥夺,那么私有财产应当废弃。’”^②

贝塔齐告诉我再看其他文件,例如保罗六世的通谕《人民的进步》(“它非常进步,对资本主义大肆批判”),特别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最后文件《欢乐与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主教会议派教会的章程。一个文件说:“上帝注定,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东西是供一切人和一切民族使用的……根据公平的标准,……经济的

① L.贝塔齐,《做一个男子汉》,第87页。

② 同上,第92页。

发展不应当……交给拥有巨大经济权力的少数几个人或集团或少数几个强国独断专行。”^①文件没有点帝国主义的名字，它说：“首先，和平要求消除不和的因素，从消除不公平开始。许多因素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支配的精神。”^②

随同这个通谕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得更加清楚。它谴责“把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多国集团手中”，它导致“商业的不平衡，工业国产品价格的悬殊，在国内和国际上，无法使经济发展同公平分配结合起来，失业，在原料和原料的消费方面存在着不公平待遇。”^③

在教会(它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和日益发展的运动，如基督教徒赞成社会主义的运动。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乔治·豪丁写道：“今天渴望改变社会的天主教徒不是少数人，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同基督教信仰是不相容的。”^④

这种同资本主义制度分离的运动在意大利和教会的开始发展是有深刻根源的。意大利的农民阶级(教会的核心力量)基本上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风俗习惯也是古代的：最高福利不是利润而是工作。直到今天，在意大利，工作劳动被认为是善，投机买卖被认为是恶。意大利宪法开头一句话就是：“意大利是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共和国。”教会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就是1870年以来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它一直认为新教和资本主义是双胞胎。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吉安尼·巴盖·波佐(意大利最有势力的一位红衣主教西里的顾问)出版了《天主教党、共产主义和激进社会》(1976年)一书。这本书改写了过去在这个领域发生的争论。他是对话

① 桑蒂尼的书，第172页。

② 同上，第173页。

③ 同上，第170页。

④ 同上，第37页。

的支持者，这决不是偶然的。^①

由贝塔齐开头的这种对教会的深入了解，促使我同意共的一位学识最渊博的人——艾尔塞斯特·桑蒂尼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桑蒂尼是《团结报》驻梵蒂冈的记者，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第一流的记者。

桑蒂尼和我第一次见面是1977年在梵蒂冈的新闻处，它位于主教会议路的顶端，这是一条很有气派的宽阔大街，另一端是圣彼得教堂广场。这是一条庄严的、几乎是正规的通道。梵蒂冈新闻处的隔壁是一个出售宗教物品，其中包括经过教皇祈神赐福的念珠（售价要比没有祈神赐福的念珠贵得多）。我觉得这种光图赚钱的做法有损尊严，很想知道教皇为什么要参与其事。后来曼利奥告诉我说：“你不了解，卡洛，我相信教皇也有同感，但意大利人是贫穷的，而旅游者有钱。教皇作为罗马的主教，不能不关心他的广大教徒的物质需要。”

桑蒂尼原来是一位四十来岁、穿得很体面的人，相当漂亮。他样子象一位中等企业公司正在上升的董事。当我对他谈到关于教会同资本主义分离的感想时，他说我谈到的这种趋势是对的，但不能指望有很快的发展。教会同欧洲和美国的大企业有很牢固的关系。不过的确存在一股推动力，其根源就在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实质。教会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保护穷人、病人和被压迫者——再一次成为耶稣使徒时代的教会。他表示可以给我几百个参考例子来论证这个论点。^②

① 红衣主教西里是教会里头最狂热的整体主义派。他竟然挑选一位主教会议派的神学家作他的顾问，这是在意大利生活中常见的反常现象——外国观察家们容易被弄糊涂。

他接着说，整体主义派也不反对这个趋势；他们跟教会统治阶层其余的人一样，一向不喜欢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对资本主义也没有坚定地承担教会的义务。教会统治阶层成员出身于劳动家庭的越来越多。50年前，虽然教会向来吸收的教士大部分是来自城市和农村的贫苦人，但是上层却充满了来自上等阶级的青年人，象朗卡利这样的穷人被选到最上层是非常罕见的。今天上等阶级已不再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教会来，他们的儿子也不愿意去。因此象朗卡利和贝塔齐这样的人必然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和第三世界高级教士的冲击，意味着教会统治阶层必然要向好的方面转变。

大约过了两年以后，1979年6月我又见到了桑蒂尼，这一次是到他的家里吃饭。我向他提起上次讨论的事情，并问他在这方面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有什么想法。桑蒂尼谨慎而肯定地回答说：“当他去墨西哥时，我跟他同机。当然，我听到他在普韦布拉和其他地方的讲话。他是一个果断的人，但又是一个谨慎的人。例如，我认为他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想要治愈极右派（象拉弗费尔这样的人可能会制造严重的麻烦）的创伤。至于资本主义，我总感到他并不喜欢。他看到资本主义如何对待穷人，肯定想要使教会同这种制度的明显罪恶割断关系。但现在要作出断定还为时过早。”

我问桑蒂尼关于教皇和意共的事。“他是很正确的。你可能还记得在他的第一次讲话中，他说他不打算进行政治干预，他信守自己的诺言。我们6月举行全国大选时，梵蒂冈没有插手。事实上，当时教皇在波兰。他在飞机上还说过，‘投共产党票的天主教徒

② 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巴西的保罗·埃瓦里斯托·阿恩斯在1974年第四次主教派教会会议上说：“教会应当站在被剥削者的一边，支持那些受苦和被关在监狱的人，消灭那些压迫者和监狱看守人。”

依然是天主教徒，他们的选择同宗教信仰和道德的原则是始终一致的。’^①他友好地对我说，他每天早晨总要先读我的报纸。他非常清楚，他这样做是让我抢先得到新闻。^②我应当说，他是非常可爱的——直率、热情和超凡的魅力。”我告诉桑蒂尼，来自普韦布拉的消息报道，把教皇置于想要取消麦德林主教派教会会议（1968年）的反动的教会统治阶层的一边，那次会议是进步派占优势的^③。桑蒂尼表示异议：“我知道，报纸企图给人这种印象，沃伊蒂瓦的确坚决不容许天主教神甫当游击队领导人和使用暴力。但说他想推翻麦德林会议是不真实的。他强调要保卫被压迫者是坚强有力和严肃认真的，他使教会承担了左派所能期望的最大的义务。我听他在墨西哥说过，剥削人的制度是非正义的。^④事实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宣讲福音”。教皇曾反复使用这个词，左派也用了这个词。他们说：‘我们在领导社会斗争中所做的一切是宣讲福音，教皇要我们这样做。’实际情况是，进步派的主教们满意了；传闻教皇曾重新改写了从罗马带来的讲话稿。”

① 桑蒂尼对作者抿咀笑道，罗马教廷曾力图取消教皇的这个声明，但对于他们来说，不幸的是教皇的话被一位记者用磁带录音机收录了。

② 桑蒂尼打电报给报纸，第二天早晨报纸用八栏的大标题报道说：“教皇首先阅读《团结报》”。

③ 1968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受急进的神学家们的控制，他们制定并通过了所谓解放神学。十年后，在墨西哥普韦布拉举行类似的会议，保守派有了较好的组织，他们否了解放神学（很可能是得到教皇的支持），桑蒂尼不同意这种非黑即白的做法，一位前耶稣会派的彼得·赫普尔思韦茨（牛津沃德姆学院讲师）支持他的看法。他写道：“据说（取决于你所读的报纸）教皇攻击和维护解放神学……（事实上）约翰·保罗二世曾经承认解放神学的渴望的合法性，又批评它的一些方法。与此同时，他反对践踏人权的有力声明将会使维德勒将军和皮诺切特将军感到不安。”（《教皇将如何改变世界》，载1979年5月8日《绅士》杂志第25—36页。）

④ 我后来找到了原文：“要建设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意味着……将不允许有人剥削人或国家剥削人的制度存在。”（摘自1979年1月15日在墨西哥圣托多明哥的一次布道，在教皇访问美国时，重刊于1979年10月的《新闻杂志》）

我同桑蒂尼谈过话不久，遇见了巴托洛缪·佐尔格神父，他和贝塔齐同是拥护对话的最先进的分子。佐尔格对教皇很热心，并向我吐露教皇常找他商量事情。我问他关于外间传说教皇在墨西哥重新改写讲话稿的事。佐尔格明确地摇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些讲话稿是在这里计划和撰写的，没有修改。我知道，是我帮助撰写的。”^① 佐尔格给我看了一本刚出版的书《人面教皇》^②，书中有许多作者，包括佐尔格本人在内，都谈论教皇。第一章是教皇写的，毫无疑问，教皇的矛头是指向继续对话，同时表示不同意唯物主义和消费主义。实际上这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掩蔽形式。

一个星期以后我访问了住在艾弗里亚的贝塔齐主教阁下。他为人热情宽厚，用美酒佳肴盛情款待我。贝塔齐和佐尔格的想法完全一致，都认为教皇是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尽管他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保守立场。贝塔齐坚信目前教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将会发展和扩大，约翰·保罗二世将会专心致志于超越目前富国与贫国之分，“他有深挚的同情心，才智过人，精力充沛——今后还将统治一个长时期。”

我自己的判断是，约翰·保罗二世将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讨价还价者，他将从社会主义集团榨取许多让步。他将为自由化不断施加坚定但和善的压力，与卡特总统发动的利己的“人权运动”截然相反。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前途来说，这种压力只会带来好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教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冷淡态度和他对国家

① 见索格神甫关于普韦布提会议的报告（载1979年4月7日《天主教文明报》），它证实“福音传道”已成了社会行动主义的代用词。

② 人面教皇的书名是取自吉安尼·波佐的一篇文章。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概念的讽刺意味：杜布切克之春（即布拉格之春）就被称为“人面共产主义”。

之间和一国之内经济贫困情况的关注。沃伊蒂瓦的个人经历促进了这种同资本主义制度分离的强大趋势，它也反映了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群众的压力。它反过来又影响了象美国教会统治阶层这样的保守集团。随着教皇访问美国之后，美国的主教派教会会议的主席、旧金山大主教约翰·奎因在会上说，教皇“对我们美国天主教徒的真正挑战是在扬基体育场的布道。他号召我们要超越老一套的慈善事业而去‘探索促进或造成各种各样的贫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原因’，在世界各地和在我们美国。”^①（黑体是作者用的。）

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教会统治阶层同资本主义制度分离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1980年3月，巴西主教全体大会发表了一个文件，指出土地问题“只有在我们的社会心理状态和社会结构改变以后才能解决。只要还存在着有利于一小撮资本家赚钱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多数劳动人民权利受侵害和受剥削的状况就无法改变。”起草这个文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奥兰多·多蒂神甫用了“资本主义剥削”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状况，接着说，“佃农们的反应即便是激烈的也是合法的。”^②

更有戏剧性的是尼加拉瓜主教管区给教友的公开信，1980年2月这封信在这个国家的所有教堂都宣读了。信中保证“教会一定站在那些为改革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生产而斗争的人们一边，以便人们能够生活下去并使我们的尼加拉瓜成为一个公平、团结、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如果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主教们）不反对。”主教们又说：“如果社会主义的意思是使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公平和传统的不平等越来越少，如果它意味

① 1979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

② 桑蒂尼在1980年3月4日《团结报》上的文章。

着工人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从而克服经济上的异化,那末基督教同这个过程是毫不矛盾的。”^①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支持这些观点,并且破例地公开批准。1980年3月,他接见了统治尼加拉瓜的军政府的两个成员维奥莱塔·巴里奥斯和丹尼尔·阿维德拉司令,并明确提到上面这封给教友的公开信,祝愿尼加拉瓜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取得“最高成就”。他在为未来的扫盲运动祝福时,敦促全体天主教徒“教育工作者参加这项事业”,并且接着说,“不论在尼加拉瓜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教会鼓励作出一切努力以改善个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②

许多自由派分子由于沃伊蒂瓦在教义上的保守主义而同他分离,他们会怀疑我的分析是痴心妄想。因此,当我发现一位法国著名观察家安德烈·方丹为《世界报》写的文章中对教皇作出类似的评价时,我感到很高兴。他写道,“当你离开这个(宗教教义的)领域而进入政治领域的时候,约翰·保罗二世(致联合国)的祝词证实了罗马教廷方面的巨大进步。”他援引詹姆斯·赖斯顿的评论,说教皇的访问“把我们带回到自然的四大要素,并阐明了它的意义:“基本要素是世界应该和谐相处以便分享它的资源,而不是为了争夺原料和能源而准备战争。这是教皇巧妙的招数,选择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作为他谴责‘把极度富裕的少数人同赤贫大众分隔开来的深渊’的地方……大概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曾经如此卖力地向美国人,并通过他们向世界舆论坚持建立另一个世界的绝对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个世界将不会象今天的世界这样不公平和荒诞不经。”^③

① 1980年3月5日《圣胡安星报》刊登的纽约时报新闻稿。

② 桑蒂尼的文章,同前注。

③ 1979年10月21日《曼彻斯特前卫周刊》。

进一步肯定我的分析的正确性的是另一份我意想不到的材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出版的《评论》杂志。《评论》是以假自由主义传统为掩护的一份美国最反动的出版物，它能够在这个行星上的任何地方（包括梵蒂冈在内）嗅到反资本主义的异端邪说。1979年12月，它发表了迈克尔·诺瓦克的一篇题为《约翰·保罗二世的政治》的文章，虽然文章用一些恭敬的词句来伪装，但它对教皇的世界经济观点进行不懈的攻击。教皇在联合国的讲话中说，战争的根源在于“决定我们社会历史的制度”。诺瓦克先生说这句话“使人怀疑不是个人的话，是宿命论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且，教皇的“关于更公平地分配世界的财物的建议看来是在鼓励敲诈勒索。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要求西方国家转让3,000亿美元时，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教皇的话……”总而言之，教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是不符合实际的。”^①对不起，诺瓦克先生，他们看来是正中目标的。而且，教皇有时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事实只能表明他是一个严肃的哲学研究者。例如，在选举他任教皇的秘密会议期间，他正在阅读一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②

意大利共产党似乎对教皇的态度有深刻的印象。在1979年11月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卢齐亚诺·格鲁皮指出，“虽

① 1979年12月《评论》杂志，第56—61页。诺瓦克在攻击教皇时必须有所节制，所以他采用指桑骂槐的手法。他的六千言的文章有四分之一是对美国神甫J.格雷米林的猛烈抨击。格雷米林编了一本六百页的书《和平与正义的福音》（纽约马里诺尔奥比斯出版社1975年版）。诺瓦克说，“这本书对民主资本主义的偏见是很深很明确的，有时是很荒谬的。”这本书只收集了教会的官方文件，因此，诺瓦克事实上是在攻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教皇保罗六世，红衣主教罗伊（他是和平与正义特别委员会的头头），“基督的和平”组织的贝塔齐主教，底特律的冈布莱顿主教（“基督的和平”组织美国分会的头头）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教士。

② 赫普尔思韦茨还指出，沃伊蒂瓦对马克思主义概念很在行，并常常使用（见《教皇将如何改变世界》）。

然这位教皇在教义和纪律问题上保守的和因循守旧者，但是他勇敢地提出人的权利和社会正义的问题。因而给了我们一个同他影响下的群众互相了解和进行对话的广阔领域。”^①

意共虽然没有排除教会从长远来看演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它目前仍然采取谨慎的态度。正如一位意共高级干部半开玩笑但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他不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比较不大关心我们国家（对他来说是教区）的政治。他喜欢旅行，我们应当鼓励这种爱好。”

意共在小心谨慎方面做得好，深知沃伊蒂瓦的作风，既刚愎自用又诡计多端，包括在教会内部满不在乎地利用职权：最新的例子是严令强迫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罗勃·德里南放弃他的政治生涯。然而，除了宗教事务外，教皇仍然是进步的：在支持穷人和被压迫者、支持第三世界和为防止热核战争而斗争方面，他是坚韧不拔和毫不含糊的。

教皇是独立自主的。1980年6月访问巴黎期间，他赞扬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会晤，尽管美国对这次会晤很恼火。他虽然极力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对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友好的。他在政治上公开表示中立，并在1979年意大利全国大选和1980年地方选举中采取低姿态。

然而，生活是复杂的，梵蒂冈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冲击政治。堕胎和离婚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最近轰动一时的事件是涉及恐怖主义的根源的问题。右派把事情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共产党则把事情归罪于失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败。大多数社会学家承认的事实是，恐怖主义分子既包括狂热的天主教徒，也

^① 桑蒂尼：《天主教徒运动的呼吁：要谈判，不要导弹》（1979年12月3日《团结报》）。

包括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事实是对梵蒂冈的诅咒，使它处于守势。官方报纸《天主教文明》1980年4月19日发表社论说，“暴力崇拜的基础是意识形态，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教皇也参加了争论。教皇在都灵的讲话稿事先油印散发给新闻记者。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除一家外）都用大字标题刊载了关键的一段话：“人们可以说，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同现代恐怖主义各种派别内部的实利主义要求所造成的极端后果联系起来。……”

《团结报》进行反驳。该报记者阿尔塞斯特·桑蒂尼断言教皇没有讲“恐怖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只说“同各种派别内部……”桑蒂尼是正确的，因为梵蒂冈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才知道，红衣主教佩莱格里诺敦促教皇不要提这个联系，因为这是不公平和挑拨性的。都灵曾经遭到重大损害，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市政当局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领导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①

我没有过份乐观。我认为梵蒂冈同欧洲共产主义取得和解是可能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很深的，但双方在许多领域里有着共同的利益。毕竟，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独立于莫斯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原则是不会使一位波兰主教不高兴的。

^① 我称呼教皇为“梵蒂冈的元首”，因为他毫无掩饰地行使权力。教皇却平静地辩护说：“正如圣托马斯常说的，用权为了行善”（1979年11月26日《全景》杂志）。关于政治中立，教皇没有对1980年2月的天民党代表大会发表任何声明，其他高级教士也没有人发表声明，包括通常坦率直言的红衣主教贝内利在内（1980年2月12日《共和报》）。关于教皇对反战和争取新经济秩序的支持，有他在波兰、联合国、普韦布拉和他访问非洲、美国时的讲话。在巴黎，他在四次重要讲话中又强调了这两个主题，一次是在巴黎布尔热机场对50万群众的讲话，一次是在王子公园体育场对10万青年的讲话，一次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的讲话，还有一次是对法国主教团的讲话。关于这几次讲话的摘要和他同德斯坦总统的会晤，见1980年6月2日和3日的《纽约时报》和《意美关系进展情况》。M.莱昂在1980年5月12日《全景》杂志上，提到教皇把话题转向恐怖主义。

第五章

意大利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贡献

1948年7月14日上午，众议院举行例行会议。议会大厦就在科索（罗马第五大街）附近的庄严的蒙蒂西托里奥宫。当议员们分散离开的时候，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同他的亲密战友尼尔德·约蒂（两人都是共产党议员）碰见内阁部长乌戈·马尔法。马尔法向陶里亚蒂问好并说：“我有经济任务要到莫斯科去。”陶里亚蒂开玩笑说，“真的，你有什么办法得到美国大使的许可呢？”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微笑并摆了摆手，从边门走出去，刚走了几步就被3发手枪子弹击倒了。当约蒂扑身掩护陶里亚蒂时，陶里亚蒂双膝跪下，滑倒在地上。他低声呻吟。约蒂事后回忆说，他咕哝了“有关安德雷奥尼的文章的事”。凶手犹豫了一下，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就逃走了。时间是上午11:30。^①

不到两个小时，行刺未遂的凶手在一所廉价公寓的房间里被抓获了。他是一个年轻的西西里岛人，名叫安东尼奥·帕兰特，在家乡同黑手党和众所周知的法西斯分子有联系。在他的柜子里找到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一本发泄民族主义感情的日记。他在受审讯时说，他枪击陶里亚蒂是因为他“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最

^① 波卡：《陶里亚蒂》，第509页。关于这次行刺及其后果的叙述，大部分来自波卡的这本传记。前陶里亚蒂的秘书M.卡普拉最近写了一本《谋害陶里亚蒂》的书，值得注意，1978年7月11日的《全景》杂志有一篇书评。

危险的分子，他作为一个外国特务的活动阻碍了国家的革新。”

迄今没有人知道凶手的行为是不是完全出于自己的主动。显然，帕兰特是在冷战将要转入热战的时刻响应教会和右翼报界的反共歇斯底里的。报刊和广播对共产党的攻击变得十分猛烈。一位名叫里卡多·隆巴迪的神甫发动了一场运动，在一系列集会和广播讲话中号召对“共产党-卖国贼”采取暴力措施。一位著名的主编卡罗·安德雷奥尼称陶里亚蒂为“俄国人”，说他应当被钉在墙上。^①大概陶里亚蒂遇刺时脑子里记得的就是这篇社论。

陶里亚蒂被救护车送去综合医院。他神志还清醒。他对一位老共产党领导人毛罗·斯科奇马罗说，“要镇静，不要慌乱。”他作了两小时又一刻钟的手术，有数百名对他表示良好祝愿的人前来献血。有两人被选中了，一名厨师和一名方济各会修道士（安吉洛·帕里尼）。手术获得成功，但死亡的危险依然存在。当行刺的消息传开以后，由于最初误传陶里亚蒂已经去世，人们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于是一场自发的总罢工使国家陷于瘫痪。历史学家乔吉奥·波卡说，“这是意大利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一次总罢工，罢工使意大利许多大城市的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在政权出现真空期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②城市的警察局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人民群众占领，有些地方，警察局长向共产党总部报告请示。工厂也被接管了，包括米兰菲奥里的菲亚特汽车厂在内，公司老板维多里奥·瓦莱塔和全体职员也被扣作人质。前游击队战士到处在发号施令。一度被用来对付德国人的机关枪和火箭炮又被从隐藏的地方取出来，枪炮上的保护性滑润油脂被擦洗干净，安放在警察局和宪兵总部对面的屋顶上。武装巡逻队在城市和公路上设立了检查站，武装

① 波卡的书，第 511 页。还可参阅 M. 斯帕洛内的《在陶里亚蒂身边二十年》，第 30 页。斯帕洛内曾任陶里亚蒂的私人医生达 20 年之久。

② 同上，第 512 页。

的矿工占据了南北意大利主要交通枢纽的艾巴迪亚-圣萨尔瓦多。

法西斯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办公室遭到多次袭击。这些党的工作人员遭到殴打，有些人的房子被烧毁。各大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人数在五万以上，挤满了街道和广场，群情激愤。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向政府进军。国家正处在内战的边缘，只等待共产党采取行动。

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党似乎处于用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有力地位。来自极左方面的批评指责说，以前党就有过两次机会。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党控制着一支由久经战斗考验的游击战士组成的军队，人数估计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鉴于他们是抵抗运动的英雄，他们肯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人们这样争辩说）。

第二次机会发生在一年以前，1947年6月，当时共产党人被粗暴地撵出政府，有些人非法地保留职位。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美国的命令之下被赶出来的。后来加斯贝利（当时任天主教民主政府总理——译注）直率地说：“除了意大利的传统政党之外，还有一个第四党……能使我们瘫痪……他们有金钱和经济势力。”^①这一次，来自极左方面的批评争论说，加斯贝利的专横行为，法西斯分子对他的支持，以及美国干涉对民族自尊心的侮辱，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足以使人民支持一场起义。

对这两次机会进行的批评是幼稚无知的。由于美国和英国的军队驻扎在意大利，1945年根本不存在举行起义的可能性。波卡

① 驱逐共产党人的事是在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前一个月发生的。见波卡的书，第467页。

把意共排挤出政府的事发生在1947年6月1日。马歇尔计划是在6月3日提出来的，莫洛托夫于7月2日加以拒绝。直到7月7日，陶里亚蒂准备在取得某些保证的条件下接受这个计划。见1947年7月7日《团结报》。

写道：“任何稍为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一场起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①至于1947年，大多数意大利人不但对美国的经济援助不感到愤慨，而且表示欢迎，即使代价是建立一个右翼政府。

但是1948年7月14日，气氛却不同了。总罢工的自发性、迅速性和广泛性却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包括共产党的领导在内。菲亚特汽车厂的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巴蒂斯塔·桑瑟亚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和瓦莱塔都很惊讶。桑瑟亚又说：“在那段时间，瓦莱塔没有说一句话……他显然很焦虑不安，我们应当承认，他是被吓坏了。”^②

都灵牢固地掌握在共产党半军事性组织的手中，整个皮埃蒙特区的大城镇也是如此。陆军兵营、空军和宪兵队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打电话说：“我们已做好准备，武器也准备好了。”卡塞麦托空军基地的飞行员准备好在约定信号发出时就举行起义。

在米兰，社会党市长受到示威者的敌视，只有共产党的朱塞佩·阿尔伯甘蒂能够在大教堂广场发表讲话：“罢工今天不会结束——明天也不会结束。”“红色小组”闯入由警察保护的两家工厂，警察当了俘虏。有30人受伤。在热那亚，警察局被攻占了，所有的警察当了俘虏。5辆警察坦克车被群众阻拦，年轻的共产党人跳上车去，打开炮塔，逼迫他们投降。到了5点钟，有十万工人上街，其中有许多士兵行握拳礼。当天傍晚有一个纵队的议会特别警

① 见波卡的书，第470页。陶里亚蒂在1944年告诉卡德尔，起义“将会是冒险主义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可能要付出重大代价。”（D.皮利克和G.英弗尼齐，〈当铁托成为铁托的时候〉，载1980年3月2日《快报》，第54—63页）

② 同上，第512页。

卫^①和宪兵队企图控制米兰市中心，遭到炮火的袭击而撤退，有3名警察受伤，6名卡宾枪手和他们的军官被俘。米兰街上的标语口号同都灵一样：“政府暗杀犯滚出来！”14日下午《团结报》出版号外，在头版刊登了这个口号，并要求政府辞职。北方各地发生了冲突（仅在米兰省就有40人受伤），陆军部署了三个营的山地部队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威尼斯，工人占领了工厂、广播电台和主要桥梁。意大利全国各地都发生冲突，如皮翁比诺、塔兰托、弗拉拉、卡格利亚里、摩德纳、拉斯佩西亚。在罗马，所有交通都停顿了，公共汽车又开回车库。埃塞德拉广场上的庞大的示威群众对共产党的演讲者喊道：“下命令吧！让我们去！”但是意共党内第二把手路易吉·隆哥看见警察坦克已整队待命，他没有准备。于是他建议队伍静默地游行到综合医院去。

到了5点钟，陶里亚蒂睁开眼睛对他的儿子（他从都灵来到医院）微笑。接着，四位高级领导人被允许进来看望他。他们是：路易吉·隆哥、皮埃特罗·塞恰、毛罗·斯科奇马罗、马西莫·卡普拉拉，前3人是强硬路线派。陶里亚蒂对他们说：“镇静，我请求你们不要干任何蠢事。”他还说了些什么，没有记载。第二天隆哥和塞恰对紧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说明不可能举行起义的原因。命令发出去了：遏制热情，让事情平静下来，结束罢工。^②

总理加斯贝利迅速采取行动，安抚左派。他谴责暗杀的行为，并立即将审讯凶手的记录副本及警察局掌握的其他情况公诸于

① 议会特别警卫是天民党内政部长M.塞尔巴为了对付示威游行而建立的。他们象高度机械化的地面部队那样，利用装甲吉普车围绕着群众转，加以限制，然后冲进去，把群众队伍冲散，分成若干小组，然后又围绕着这些小组转，加以限制，使徒步的警察得以对付这一小群人。

② 波卡的书，第510—515页。

众。他没有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军队留在兵营里，只有个别地方由于地方指挥官自行其是而出了一点事。政府向全国发出的指示是：镇静，不要干任何蠢事。

毫无疑问，是陶里亚蒂的声音起了决定作用。陶里亚蒂身体虚弱，不大能说话，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仍牢固地坚持他自1944年“萨勒诺转折”以来所发展的政治路线：不搞起义的战略。^① 党接受了陶里亚蒂的克制，它标志着欧洲共产主义兴起的一个紧要关头，因为它使意大利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相信意共对民主进程的支持是根深蒂固、不可改变的。如果说，共产党没有抓住这次机会（一切因素看来对它是有利的）用武力来推翻政府，那末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大概永远不会试图这样做。陶里亚蒂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可能认识到他们大概永远不会再有各种力量这样有利的结合。他们对于现在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不抱幻想。他们也许会被解除武装。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

当紧急罢工过去以后，加斯贝利冷嘲热讽地指责意共搞武装起义计划，许多战士被长期投入监狱。接着又发动了一场政治迫害运动，持续了整个五十年代：许多工人、教员、政府雇员被开除或列入黑名单。^② 统治集团心惊胆战，他们的反共情绪由于工人的战斗精神而更加强了。然而，奇怪的是，他们终于被共产党的克制行动说服了，相信共产党无意依靠武装暴力来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可以信任的，他们会遵照宪法来管理国家。我在意大利度过的几个月内，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包

① “萨勒诺转折”是意大利共产党1944年在萨勒诺会议制定的路线，从原来的反对君主制转为同君主制暂时合作。

② 据波卡的书记载（第531页），下面是1948年6月至1950年6月被镇压的受害者的数字：62名工人（其中48人为共产党员）死亡；3,126人受伤（其中2,367人为共产党员；92,169人被捕（其中73,870人为共产党员）。

括贝内利、摩拉和曼利奥在内)对于共产党一旦参加政府会奉公守法这一点私下表示过不同意见。当然,在公开场合,右派散布了一大堆竞选的花言巧语,不幸的是有些外国记者却轻信了它的表面价值。^①

陶里亚蒂反对搞起义政治是经过长时间酝酿考虑的。“萨勒诺转折”是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反应,它是受到十年来重大事件影响的结果。早在1935年,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使陶里亚蒂认识到一切民主人士团结的必要性。他终于能够说服斯大林,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说服的结果。西班牙内战证实了陶里亚蒂的判断,即民主(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是动员人民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向他证明,内战会破坏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并可能把超级大国牵连进去。超级大国之间的摊牌可能使欧洲在物质上遭到毁灭,而原子弹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当1944年3月27日陶里亚蒂从莫斯科回国时,他碰到了复杂和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同战争的命运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意大利的失败,盟军的进展,德国的干预。几个月以前,1943年7月,国王伊曼纽尔三世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职务,后者被逮捕并关进监狱。国王组织了新的极权主义政府,由皮埃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担任首相,新政府在人民中间没有多大权威。

巴多格里奥政府遵照同盟国的指示,勉勉强强地允许成立政党: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自由党,行动党和民主工党。到

^① 1978年1月13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特别新闻。1977年12月基辛格来罗马逗留四天,我当时也在罗马。他显然是来找我材料以便对欧洲共产主义表态。他在罗马同所有的党都交谈了,唯独没有同他调研的对象意共交谈。

这使基辛格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特别新闻节目中的货色显得更加可鄙,他说:“当共产党取得政权,他们决不会放弃它。”由于当前争论的是意共参加政府的问题,正如1946年那样,所以他是有意进行宣传。

了9月，所有这6个政党联合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民族解放委员会拒绝承认国王、王储或君主制的任何摄政者。

根据同盟国的协议，英国负责主管意大利解放区的军事政府。^①丘吉尔顽固地拒绝抛弃君主制。出现了不祥的政治僵局。没有民族解放委员会，巴多格里奥政府无法统治意大利，无法控制北方的游击部队，无法取得参战友国的地位——这一切对于意大利的政治独立是至关重要的。英国方面只同意把政权交给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政府。在此期间，由纳粹上校奥托·斯科尔泽尼指挥的一支敢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并把墨索里尼从监狱堡垒救了出去，迅速而神秘地把他送到北方的萨洛镇。墨索里尼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纳粹傀儡政府——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提出了蛊惑人心的社会主义口号。^②这就为在罗马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增加了一条理由。

这个政治僵局被陶里亚蒂打开了。他争辩说，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重新赢得政治独立，从同盟国军事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合法的本国政府。如果代价是接受一个君主政府，就应当付出这个代价，争论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起来，留到战后解决。他在10天时间内说服了自己的党和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其他5个政党。经过若干次谈判，一个新的巴多格里奥政府成立了，所有政党都参加。国王退位并任命他的儿子王国的中将、王储亨伯特继位。

在国外，自由派人士抗议保留受法西斯主义毒害很深的君主政府。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当时我接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将要到意大利去，我前往哈佛大学向我的老朋友和辅导老师盖塔诺·萨尔维米尼教授辞行。这位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非常生气，他指

① 波卡的书，第378页。

② 参阅最近出版的关于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书，S.贝托尔迪的《沙洛：意大利共和国的存亡》和G.波卡的《墨索里尼的共和国》。

责陶里亚蒂，在他看来，陶里亚蒂是在执行莫斯科的政策。^①

另一方面，我发现1945年的意大利完全接受陶里亚蒂的政策。他不仅说服了自己的同志，而且说服了其他五个政党的强硬、明智的领导人如：皮埃特罗·南尼、弗鲁奇奥·帕里、卡洛·斯福扎、朱利奥·罗蒂诺。陶里亚蒂的主要目标是获得一个新的政府结构和一部新宪法。一切都从属于这个目的。有一件事情说明了他的警惕性和坚韧性。4月6日，巴多格里奥提出了一份包含各方妥协商定的文本。在各项规定中，有一条提到“一旦战争结束，意大利人民将选举一个众议院”。陶里亚蒂把这一条改为：“一旦战争结束，意大利人民将选举一个立宪会议”，从而保证战后意大利的第一项议事程序将是新的政府结构。几年后，当人们问陶里亚蒂，他认为他当时的贡献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在语法上作了一点改进。”^②

在陶里亚蒂的语法课以后制定的意大利宪法是欧洲最先进的宪法，例如同美国宪法相比较，它没有包含妨碍社会主义的因素，美国宪法规定商业合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合同的不可侵犯性是在法律上对资本主义的基本保护，统治阶级非常清楚这种条文主义的重要性，并为之拼命争取，甚至只言片语也不放过。例如在意大利立宪会议上的一场重要斗争是关于婚姻是“牢不可破的”一词。天主教会和右派要把这个词放进去，而共产党领导的斗争则要求取消它。左派胜利了，大约25年后（1970年），当世俗离婚法成为法律的主题时，在宪法上就不再有任何障碍了。

① “萨勒诺转折”的确适应了斯大林的政策（他曾同丘吉尔达成协议，让意大利留在资本主义阵营），但它是陶里亚蒂独立分析的结果。不过，斯大林的路线使陶里亚蒂的任务比较容易执行。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酝酿有一部分功劳应当归于斯大林。

② 波卡的书，第373—374页。

根据意大利宪法,一切契约合同受国家的制约,任何契约合同如果被证明对社会有害可以被宣布为非法。将人权置于财产权之上不利于资本主义而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梵蒂冈采取同样的立场时,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了这个地步,欧洲共产主义政治就会比较容易实行了。

今天的意大利,诸如向富人征税,或制定关于投资的法律(那怕是严厉的法律)已没有宪法的障碍。管制投资是欧洲共产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关键,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家一样,都称资本主义是利润制,这个描述是正确的,但容易使人误解,因为听起来好象获得利润是决定性的要素。事实并非如此。决定性的要素是投资。的确,投资是为了期望得到利润。如果利润落空了,资本家就要破产——许多资本家正是这样。意共的经济学家们不大十分关心利润,因为一方面有强大的工会,另一方面有国家的征税权,将使一个进步的政府有办法处理利润问题。他们极其关心的是管制投资。他们要对企业公司说,你们不可以对撒丁岛绿宝石湾多层公寓楼进行投资(可能获得20%利润),但你们可以对西西里的鞋厂进行投资(可能获得6%利润)。当然,这也意味着对国外投资的管制。

这种经济地位在政治上有极大重要性,因为小商人通常只投资于自己经营的业务,他没有大笔剩余资本。只有大企业有大量资本和能约在国内外进行投资选择。因此,管制投资的法律对小商人没有多大损害,工人阶级可以争取他们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这些法律受到大企业的诅咒,大企业仍然是意共的死敌。^①

^① 管制投资、计划和国有化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措施。它们可以被利用来加强垄断资本主义,正如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那样。在较小的程度上,战后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问题在于政权;看这些措施究竟对谁有利?

意大利宪法的重要性一般为外国人所忽视，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它却是社会、政治和经济上至为重要的财产。^①例如，宪法规定把国家的行政权分散到各个大区（这大概是改造国家的最大力量）；还规定男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妇女拥有投票权。

宪法的制定决不是一件小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在抵抗运动中锤炼的团结以及梵蒂冈的支持。而梵蒂冈的支持又应归功于陶里亚蒂的老练和敏锐的判断力，他使梵蒂冈和意共之间达成一项心照不宣的交易，从而使宪法第7条保留了1929年罗马教皇与政府缔结的契约。陶里亚蒂关于天主教的高瞻远瞩和他对民主政治的贡献，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天主教民主党的两位受尊敬的天主教领导人乔吉奥·拉·皮拉和朱塞佩·多塞蒂当时同陶里亚蒂在一起工作，他们证明说：“第7条并不是出于策略或操纵利用的考虑，……要了解第7条的深刻的原由，人们必须记住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全部葛兰西的背景，它是陶里亚蒂的思想根源。”^②

其他反对共产党的人也表示赞扬。一位自由派的历史学家皮埃罗·卡拉曼德雷记述了1944—1945年的事：“如果在那两年内……民族团结和共和国顶住了（右派的）欺骗和挑拨行为，我必须指出，大部分的确应归功于共产党领导人的坚定、稳健和爱国主义。”以敌视共产主义闻名、对陶里亚蒂既尊重又明显地厌恶的波卡，赞许地引述了卡拉曼德雷的话，并加上自己的判断说：“共产党

① 诺曼·科根的《意大利政府》一书载有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的英译本（见该书第188—215页）。另一关于意大利政府体制的重要评论是P.A.奥勒姆的《意大利——没有政府的共和国？》，还可参阅P.巴里莱和C.麦琪泰拉的《宪法的症结》。意共创始人之一U.特拉齐尼（他在法西斯统治下，是作为政治犯被监禁年头最长的纪录保持者）是立宪议会主席。请参阅他1978年的“答记者问”，《宪法的产生》。

② A.桑蒂尼：《天主教问题，共产党问题》，第134页。

代表了一种进步力量,由于它的出现而使资本主义有所改良,使民主(在意大利)得到加强。”^①

当人们考察今天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时,人们对于陶里亚蒂使宪法成为抵抗运动和解放战争的顶峰所表现的耐心和先见之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鲁皮认为它“可以称为一次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和人民大众的革命”。格鲁皮接着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宪法及其原则深深扎根于大多数人民的思想觉悟之中。宪法已成为民主斗争的统一的法律宣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②

如果认为陶里亚蒂在1946年就能够预见到1980年的形势发展那是过于简单了,如果看出“萨勒诺转折”和欧洲共产主义之间的直线联系那也是过于简单了。然而二者之间的确存在有机的联系。我们有南斯拉夫共产党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在1979年逝世之前,他一直是铁托的亲密合作者)的证明。他在1980年2月出版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论述了陶里亚蒂及其思想。^③卡德尔在1944年10月16日和17日在罗马会见了陶里亚蒂。他回忆说:“他当时已经发展了那些今天被称为‘历史性妥协’的论点,虽然当时没有用这个词汇。他认为共产党为了保卫民主制度,不仅应当同社会党结成联盟,而且应当同其他一切社会力量结成联盟,因为共产党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工人阶级在意大利的地位并使它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卡德尔接着把陶里亚蒂描绘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当我回想(1944年)陶里亚蒂对我说的话时,我不能不得出结论,他非常明确地阐述了那些后来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

① 波卡的书,第472—473页。

② L. 格鲁皮,《历史性妥协》,第18、20页。

③ 卡德尔回忆录,《新南斯拉夫争取承认和独立的斗争(1944—1957)》。

论点”。^①

卡德尔有一半是事后的认识，可能评价过高。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不曾是，将来也不会是一条一帆风顺、平坦的大道；相反，它曾经充满了迂回曲折、弯路和沟壑，严重的挫折和中断，如莫罗的被暗杀和1979年意共选票的下降。但是人们可以说，陶里亚蒂的远见和事态发展是连贯的，在陶里亚蒂逝世10年之后，由贝林格提出明确的公式。

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上的两次重要的沟壑或中断，第一次是出现在二十年代的葛兰西和四十年代的陶里亚蒂之间；第二次是1956年以前的陶里亚蒂路线和1956年以后到他逝世这段期间的路线之间。第一次中断同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性质有关。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谈到了：葛兰西是一位列宁主义者，他接受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在1944年则开始从事建设一个以民主和多党制为基础的新型的群众性政党。陶里亚蒂反对内战，但是多年来他容忍了（如果说他没有鼓励的话）一个半军事网的存在。这个半军事网是抵抗运动遗留下来的，它由以前的游击战士组成，他们把武器隐藏起来。这条路线被意大利历史学家波卡^②称为“doppiezza”，直译成英文是“duplicity”（意为表里不一或两面派），英文的意思似乎太重了些，因为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并不是什么秘密。Doppiezza最好译成“双轨政

① 卡德尔回忆录的这些节录见D.皮利克和G.莫弗尼齐的《当铁托成为铁托的时候》（1980年3月2日《快报》，第54—63页）。

② 对于波卡来说，陶里亚蒂的“双轨政策”开始于共产国际七大（1935）并一直延续到抵抗运动时期和战后。但波卡没有责备陶里亚蒂，陶里亚蒂的路线“不是陈腐的两面派行为，也不是出于卑鄙狡猾，而是由于需要而不得不同时维持两条政治路线，一条人民阵线的民主路线和一条苏联神话的革命路线。”（请特别参阅波卡的《陶里亚蒂》第381、388、404及414及以下诸页）

策”；一方面信奉民主；另一方面有能力诉诸武力。1947年意共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退出政府之后，冷战有可能变成热战。陶里亚蒂1948年7月10日在众议院的讲话中向政府提出明确的警告说：“如果我们的国家被拖入一场战争，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对于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是一场保卫和平、独立和我们国家前途的起义。”

《人道报》的主编、社会民主党人卡洛·安德雷奥尼答复说：“对于俄国人陶里亚蒂所说的起义，我们说……在共产党人能够实现他们的叛国之前……共和国政府和大多数意大利人民将把陶里亚蒂和他的同犯钉在墙上……我们这决不是隐喻。”^①

然而，1956年以后，这种“双轨政策”逐渐退缩，最后完全消失了。今天意共所设想的武装斗争只是作为法西斯政变的回答，不仅仅是意共自己而且是全体人民的回答，是抵抗运动的重演。在1964年陶里亚蒂逝世的时候，天主教群众同左翼之间结成联盟的路线已经被放在坚实的位置上。陶里亚蒂的学生贝林格在1973年9月创造“历史性妥协”一词时，他不过是明确阐述他的老师的长期政策罢了。^②

“历史性妥协”的词汇和政策在意大利国内外引起广泛的误解。它被狭隘地解释为一种议会的策略，一种由天主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内阁——一种共同统治国家的权力，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党必须唯命是从，别无选择。而且，由于这个词是贝林格在分析智利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新法西斯政变时创造的，它被这些事件所渲染，并被看作是意共为防备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可能的破坏而采取的策略。意共强调议会的联盟，1978年尽管有种种挑拨，它仍不愿搞跨政府，使人们有点相信这个分析，以致

^① 波卡的书，第511页。

^② 贝林格：《共产主义问题》，第637页。

1979年6月3日当意共在大选中失掉4%的票数时，几乎所有观察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历史性妥协”完蛋了。

完蛋的说法是太夸大了。1979年8月，贝林格在《再生》周刊的一篇社论中和答德国杂志《明星》（《时代》杂志也转载了）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历史性妥协”生气勃勃并且依然是意共的基本战略。他再一次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性妥协”。它不是一种议会的策略。他对《明星》杂志说：“历史性妥协不是意共和天主教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政府的公式。历史性妥协是一种战略，没有共产党和天民党在政府内部的合作它也能够向前进。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谅解和意大利生活中伟大的群众潮流汇合在一起：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天主教民主党只不过代表一部分天主教徒。”^①

贝林格在《再生》周刊的社论中回忆陶里亚蒂33年前在同一刊物1946年8月的一篇社论中的话。“陶里亚蒂解释‘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的两翼’（进步的和保守的）之间的‘明确的妥协’一词。他作出保证说，解放战争、共和国和制宪会议‘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其他一切目标之前首先达到的目标。’……陶里亚蒂断言这个妥协已经确立并推进‘作为整体的国家民主化’的前景……”（黑体是贝林格用的）^②

“历史性妥协”是葛兰西的深远见识的最新表达方式（它是经过50年的斗争才形成的），即在意大利生活中的群众潮流——天主教、社会党和共产党——必须和解，如果国家要团结，人民的福利要有保障，反动派要被孤立的话。^③ 陶里亚蒂在四十年代和五十

① 《这就是真相，全部真相》，1979年9月1日《时代》杂志，第23—25页。

② 贝林格：《回忆陶里亚蒂1946年的一篇社论：现阶段的妥协》。

③ 葛兰西在入狱前写的几篇文章勾画了这个政策的轮廓，见格鲁皮的《历史性妥协》第33—46页。

年代、隆哥和贝林格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这个见解赋以血肉。尽管出现各种曲折和中断，从葛兰西到贝林格的这条红线虽然被磨损了，但还是清晰可见。而编织这条红线的手就是陶里亚蒂的。^①

陶里亚蒂是一面理想棱镜，通过它可以了解欧洲共产主义，折射出它的起源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和细微差别。他的政治生活是处于斯大林和葛兰西两极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个人（斯大林和葛兰西）成为列宁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大对手。当然，陶里亚蒂决不是孤单的：他有一个党（往往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党），但他以他的才智、品格和政治上的老练压倒对立面。例如，他采取步骤深入地传播他的思想。陶里亚蒂说，“理论工作不能够也不应当脱离政治斗争。”他回国后首先办的一件事就是创办意共理论机关刊《再生》，由运动中最有才华的青年人担任编辑。^②同时，他采取行动培养年青的一代，如尤根尼奥·里莱、保洛·里奇、皮埃特罗·英格拉奥、乔吉奥·纳波利塔诺，还包括一位25岁就当了共青团头头的年轻人，他就是恩里科·贝林格，今天意共的总书记。

1948年以后，意大利人民越来越转向共产党。共产党的影响直接上升，从1946年的得票率19%上升到1976年的34.5%。它在1979年的大选中票数下降，但在这之前，有30年的时间，它在每次大选中票数都是不断增加的。^③票数的增加反映了共产党在

① 例如，1944年陶里亚蒂说：“‘萨勒诺政策’的真正的要旨是……肯定新的民族团结，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并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G. 瓦卡，《论陶里亚蒂》，第313页。）

② 波卡的书，第371—372页。《再生》保持了高质量，它成为促进意共在文化上的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③ 从1946到1976年的不断增长中，有一个内部的变动。从1946到1963，意共选票增加6%分；从1963到1976，增加9%分，或增长率翻一番（每年0.35增为每年0.70）。1979年的下跌已在本书正文中作了分析。

意大利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在增长。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学校或工厂，地方工会或体育俱乐部，没有一个单位没有几位共产党员的。一切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网，不论是教会、国家或大企业所有，对共产党人都很尊重，对他们提出的建议都加以讨论并给予应有的考虑。意大利大多数艺术家和作家如果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最低限度也要投共产党的票。教授、医生、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员也是如此。葛兰西所强调的文化领导权已成为事实。今天的意大利只有两种哲学：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意大利的每一个人，从教皇以下，似乎都读过或正在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如波卡和卡拉曼德雷所承认的，这种领导权同人们普遍相信意共致力于民主进程是齐头并进的。本书第二部分将详细叙述意共扩大民主的种种方法，但是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威力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通过波洛尼亚市的一位天民党政治家的眼睛看到了这一点。波洛尼亚是由一位共产党市长管理了30年的一个城市。

我步行来到“阿库西奥宫”的庭院，这是波洛尼亚古老建筑的珍宝，是市政府的所在地，有市长办公室，大礼堂和市议会会议室。正面大门是青铜造的，样子新式，洁净无瑕，它的唯一装饰是形状象市府大印的粗大的门把。一进入里面就象到了另一个世界：外面是古式的圆形石柱的门廊和中世纪的鹅卵石；里面则是优雅的现代装饰，铺了地毯的楼梯和精致的铝制的扶手，柔和的灯光，洁白的石膏墙壁。只有大礼堂还保留古色古香，有一架用美丽的锦缎装饰的电影放映机，红地毯和金色的座椅。

前一天，我曾同共产党市长雷那托·桑格里谈过话，他曾向我建议，作为一种消毒方法，我应当去同市议会反对派天民党领导人

科莱塔先生谈一谈。^①第二天晚上市议会开会，如果我到得早一些，他就会同我交谈。

科莱塔准时到达，引我进入礼堂，然后关上门。我们坐在这宽阔空荡的礼堂里一条长桌的一角，象两位互相警惕的外交官——他是因为桑格里给他安排了这个约会；我是因为希望他毫无拘束地畅谈。我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当我提到红色波洛尼亚以管理完善的城市闻名于全欧洲时，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

“当然，管理完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天民党反对派使共产党人不能自行其是。我们象老鹰似地监视着他们，报纸也是这样。他们不敢干出丑事。”我不禁向他指出，在天民党管理的其他城市和中央政府，虽然也受到人民和报纸的监视，但却出现没完没了的丑闻——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行贿受贿，贪污挪用以及各种各样的诈骗行为。他回答说，“当然，有一些丑闻——正如你们美国也有丑闻一样，但情况被大大夸大了。^②此外，我们也在向贪污腐化进行斗争。”

“可是你们已经执政30年了。为什么你们从前不这样做呢？”

他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接着说：“共产党人会告诉你，他们在波洛尼亚所做的一切美妙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你他们花了

① 一位共产党市长担任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议会的主席，他们自1947年以来就统治了波洛尼亚。1975年，意共获得绝对大多数，在60个议席中占有31席，社会党6席，天民党14席。但社会党同共产党的联盟仍保持不变。

② 远远没有夸大。天民党的丑闻又大又多，司空见惯。《天主教文明》称它们为“连锁丑闻。……天民党如果要重新得到意大利人的信任，就不应当掩盖这些丑闻，这种信任今天已经发生根本动摇。”彼得·尼科尼斯用了同样的词句：“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不断地产生一系列丑闻。”参阅1974年12月7日《天主教文明报》，第489—497页。

多少钱。光我们的公债利息一项一年就达6,000万美元^①！因为我们试图缩减开支，就事论事，我们就受到攻击。”

“但是天民党政府管理的其他城市不也有同样的情况吗？”

“当然，这都是共产党引起的。你瞧，如果共产党的城市修建一个公共游泳池，相邻的城市也要修建一个。如果天民党的市长不给修建，他们就要选一个共产党市长。如果共产党搞日托托儿站，天民党也得搞。这是一种讹诈。”

把人民迫切要求他们的市政府发展社会服务事业比拟为讹诈的想法，在美国人听来感到奇怪，但我没有说什么。我的确注意到这种竞争的升级听起来好象是一个全国性联盟为完成节约而提出的好理由。

“决不会，一旦你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他们决不会离开。”

我问他是不是认为他们会动用武力来呆在政府里。

“噢，不，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聪明的。如果这样做人民会转过来反对他们，军队也会反对他们。不会的，他们会采取民主的做法。他们会挑出一个争论的问题，如管制投资（它意味着私人企业的结束），如果我们投票反对，他们就会说我们是支持大企业，从而为他们自己捞取更多的选票。”

“那么天民党应当怎么办呢？”

“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撵出政府。他们一直在一点一点地蚕食我们。我很了解他们，他们象恶魔般地聪明。”他一时控制不了自己，满腔仇恨。“他们在1948年的总罢工中烧了我父亲的房子，因为他是这个城市的市长。”^②

^① 市长桑格里在一天前就告诉我同一数字。他承认他们花了一大笔钱，但天民党管理的城市也花了大笔钱。他说：“区别在于，我们花的钱有物可见，而他们花的钱却无物可见，全被贪污腐化和不善消耗掉了。”

^② G·德罗沙：《组织政府的两个月》（1974年12月7日《天主教文明报》，第489—497页）。

科莱塔属于天民党的右翼，他们虽然已经失势，但在党内中等阶层仍有强大的势力。教会和官职授予权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一对支柱，而这些中等阶层深受整体主义派的影响。可以说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整体主义派在教会统治阶层内部失利，象科莱塔这样的人无疑地会走向更为调和的立场。目前整体主义派处于守势。不管愿意不愿意，由于这些城市和大区是在共产党的管理之下，主教们必须同他们打交道。这使他们不得不想一想。当我同双方人士——整体主义派的教授阿德里亚诺·包索拉、基安弗朗科·摩拉及奥古斯托·诺斯和主教会议派的红衣主教佩莱格里诺、主教贝塔齐和佐尔格神父——交谈后，我对他们争论的高水平有深刻印象。

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是两种世界观，一个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一个是超然于宇宙之外，在理论上是势不两立的，但在实践中，教皇约翰的渊博的智慧已把教义同历史上的运动区分开来。《人世和平》的通谕中说：“教义一旦作出精心推敲和阐明，就永远保持不变；但是运动（历史上的运动）却根据历史的形势不断演变，无法避免时代的影响，因而不能不发生变化，甚至发生根本的变化。”接着是实现自我抱负的伟大预言：“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昨天被认为是不合时宜或无发展前途的一个具有实践性质的事件或遭遇，今天或明天就会变成合时宜的和有发展前途的了。”^①

明天就在今天，耶稣会主办的主要理论杂志《天主教文明》主编佐尔格神父在一篇报道中这么说：“迫切需要明确天主教期望的事物，和其他方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期望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① 见桑蒂尼著作，第31页。

的确,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人类所想象的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的最伟大的期望……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在世界上促进解放的希望,它本身是真实的和美好的,这决不应当弄错。它的致命的错误在于它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建立一个新社会,一个否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一个人人参与和宽宏大量的社会,它本身就是美好的和真实的。”^①

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这类深奥莫测的措词可能是平淡无奇的,但对于意大利天主教徒却有如地覆天翻。想想看,居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不管对它施加什么限制!

佐尔格的态度受到整体主义派的诅咒,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主编的地位使他的意见具有威信和影响。而且,耶稣会教士是教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向目光远大,并且认识到天主教会的力量和前途在于适应——整体主义派的反对立场。^②整体主义派的格言可能是:宁可决裂而不屈从;而约翰教皇和耶稣会的格言则可能是:宁可屈从而不决裂。

摩拉用严厉的口气对我说,“佐尔格神父是在天主教会里头唯一争夺各种职位的人——根据他的耶稣会的传统。你在佐尔格神父身上将会找到一切,包括其对立面。请原谅我直言不讳。”

摩拉教授今年47岁,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经常在梵蒂冈电台发表讲话和作品,随时准备应战。他已预感到失败。他给我一本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说:“这本书分析了一切事

① B·索格:《耶稣会派的决定性选择:把今天人们的希望坚持下去》(1977年9月15日《天主教文明报》,第454—468页)。这段话引自索格根据1975年耶稣会代表大会的教会,在1977年8月巴都阿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② 虽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斥责耶稣会教会过于世故,但是索格作为《天主教文明报》的主编的地位看来还是牢固的——这是了解教皇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索格是参加对话的一人。

情——意大利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的变化，天主教徒拥护社会主义——，所有这些事情造成了今天的形势。”他用启示录的语言来观察未来，他在书中写道，“宗教的命运看来是困难的和悲剧性的。它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或者同现时代妥协，把它的宗教性质抛在一边，从而在精神文明中获得一个小小的不起作用的地位；……或者继续坚守自己的超自然的天职，为它的始终一贯的忠诚和英勇行为付出受摧残和受迫害的代价。”^①

反对共产主义是坚定不动摇的。但仇恨是对着四百年前的启蒙运动和在1870年以建立世俗国家而告终的基督教改革运动。情况同美国南方很相似，一直到最近以前，内战还在进行，这些人是在重新进行过去的战斗。社会的世俗化是现代的罪恶，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产物。

在整体主义派中间谈论启蒙运动时，他们的现实感是令人吃惊的。人们差不多能够听到他们用同伏尔泰和卢梭辩论的同样措词，同今天的自由主义的反教权的人进行辩论——如共和党的参议员尤金尼奥·里尔等人。我上面提到的整体主义派的主教对我说：“使我们担心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自由主义者。人们总是能够同共产党人讲道理的。”

尽管摩拉的立场顽强不屈，但他还是很有帮助的，他不仅把我介绍给其他整体主义派的人如包索拉和德尔·诺斯，而且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对手如路易吉·佩德拉齐、朱塞佩·拉扎蒂（天主教大学校长）、红衣主教佩莱格里诺等人。这种知识分子的骑士风度在意大利是很普遍的。共产党人向社会党人和天民党人门户开放，后者对前者也是如此。保守派的曼利奥称赞在共产党人名单上的议员和经济学家路易吉·斯帕文塔；共产党的纳波利塔诺也称赞整

^① G·莫拉，《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第14页。

体主义派的德尔·诺斯是“一位有才华、很值得见一见的人”。

奥古斯托·德尔·诺斯是公认的整体主义派的精神领袖。^①他住在罗马的帕里奥利区，这是上层人士居住的地区，他的寓所完全是十八世纪的样子，有镀金的椅子和一个镀金的钟。他是一位肥胖和活跃的人，使我联想起阿尔弗莱德·怀特赫德教授。当我告诉他纳波利塔诺曾经称赞他时，他高兴地象一只山雀摇着头说，“他真的这样吗？噢，噢，他真的这样吗？”我心里想：“卡尔，你亲眼见到文化领导权在起作用。”

我们边喝纯威士忌酒，边争论得难解难分。他想要知道，人们如何同热衷于葛兰西的代替理论的共产党人合作？葛兰西曾经认为，正如天主教扎根于人民的常识之中，成为人民的世界观一样，人民也会通过他们争取改善生活的日常斗争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争论说，总有一天，马克思主义会扎根于人民的智慧之中。

我的反应是，葛兰西怎么认为是不重要的：“如果有上帝，而上帝反映在人的灵魂中，那么共产党人在想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决无法扫除上帝或人们的灵魂。殉教只会加强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帕斯卡的逆定律^②，天主教会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我同意，”他说，“但是如果他们掌权，他们会使用高压手段——我们又何必冒殉教的风险呢？”

“听我说，他们并没有掌权。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各党派的联合

① 关于德尔·诺斯的人物简介，见S·马拉特斯塔的《葛兰西——反动派》（《全景》杂志，1978年10月10日，第100—103页），以及马拉特斯塔同L·科莱蒂谈德尔·诺斯：《德尔·诺斯没有过错》，同上，第103—105页。

② 帕斯卡是法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强的“帕斯卡定律”。他晚年兴趣转向神学方面，从怀疑论出发，认为感性和理性知识皆不可靠，从而得出信仰高于一切的结论。——译注

政府。他们说过，他们反对使用暴力和反对专政，难道你对他们有怀疑吗？”

“我不怀疑他们是真心实意的。不，我不怀疑。但是我怀疑他们的理智。我认为他们会被迫采取高压手段来整顿经济，等等。”

“那个时候天主教民主党会把他们撵走。”

“如果他们不走呢？”

“1948年他们走了，当时他们手中还有武器。而且，你们有军队、宪兵和警察。”

“警察，”他轻蔑地说，“他们正在组织一个左翼的工会。”

我笑道，“你们应该付给他们能够满足生活需要的工资。”

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我们谈得很愉快。当我同他分手的时候，他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欧洲共产主义和意大利》，并在上面题词：“给卡洛·马扎尼，我们在1977年12月13日的一次令人愉快的会见中发展了充满生气的友谊。”

我把这本书翻阅一遍，它收集了作者1975年在天民党报纸《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德尔·诺斯说，“范范尼（当时任意政府总理——译注）建议发表这些文章为1976年的大选做好宣传。”我心里想：这些教授，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①。

在主教会议派方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衣主教佩莱格里诺和艾夫里亚的主教路易吉·贝塔齐。他们是近邻，相隔大约50英里。我会见佩莱格里诺的当天也拜访了贝塔齐主教。

艾夫里亚是奥利维蒂的老家和现在总公司所在地。奥利维蒂

^① 德尔·诺斯的《欧洲共产主义和意大利》一书在书店里很难找到，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用的是假名，该书是由天民党作为竞选材料印发的。

是分布范围很广的大公司，它以制造打字机起家，进而发展到经营计算机、电子计算机和大量的现代精妙电子仪器设备。^① 它的第一个工厂厂房是 19 世纪的粗陋的砖头建筑，现在还在使用。这个城市高度工业化，仍保留过去的色彩，主教管区办公室是一所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就在一个教堂的后面，要经过一个有围墙的庭院。主教的起居室在楼下，我在他的书房同他会面，这是一个宽敞、雅致、凉爽的房间，有从天花板到地面的高大的窗户。

贝塔齐的外表、言谈、举止是完全现代派的，正如佩莱格里诺使人想起另一个时代一样。他的言谈直截了当而不隐晦，举止富有朝气而不沉着。他表现友好而不是仁慈，他倾向于尽情欢笑，而不是淡淡地微笑或抿着嘴有礼貌地笑。然而他和佩莱格里诺虽然相隔一代，但两人思想开放，观点大胆，对前途无所畏惧，深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仁爱、慈悲和恩惠。贝塔齐现年 50 多岁，他在 40 岁时就受到佩莱格里诺的很大影响。他继承他的前辈的工作，他是一位机灵的人，有卓越的政治理解力，他全心全意献身于教会，并为通过现代化来拯救教会而努力。

在神学方面，他和摩拉一样毫不妥协。事实上，摩拉在他的书中引用他的话说：“主教应当告诉共产党人（至少应当告诉那些同情共产党的天主教徒），既相信上帝又信奉无神论的唯物主义，那是荒谬绝伦的。”^②

贝塔齐满怀信心地行走在正统的天使们不敢迈步的地方。正是他促进了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之间继续大辩论，这场辩论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并对共产党和天主教会双方施加了压力。在这场大胆的冒险行动中，贝塔齐的不大可能的合作者是意共总书记恩

① 见 N. 金兹堡：《家话》，介绍了奥利维蒂家族的背景。

② 莫拉：《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附录。

里科·贝林格·贝塔齐在1976年大选以后立即写一封给共产党的公开信(一封推理严密、谦恭有礼的长信,提出一些批评性的问题);贝林格在一年后复信(也是一封推理严密、谦恭有礼的长信),对这些问题作了批评性的回答。这个二重唱使人回想起教皇约翰和陶里亚蒂之间的交锋,只不过贝塔齐和贝林格是直接对话。不管怎样,它迫使天主教会统治阶层和共产党双方重新检查和考虑各自的立场。而且把广大人民群众也卷了进去。^①

过了几天,我参加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两次辩论会:一次是在维尼托区的科尼格利亚诺,另一次是在皮埃蒙特区的法布里佐。在这两次辩论会上,发言者是一位天主教民主党人,一位共产党人,一位社会党人和一位意大利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的成员,听众差不多是左右各半。双方交换书信为讨论共产党的意图问题提供了基础。科尼格利亚诺的会议变成天民党议员利诺·因诺生蒂阁下(一位短小精悍、老练的议会雄辩家)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兼大区书记里诺·塞里(一位年近40的人,消瘦、敏锐)之间的一场很吸引人的决斗。议员利用那两封信作为出发点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是不能相容的;他接着说,当然,如果意大利共产党抛弃马克思主义,天主教徒将在理论上同共产党人合作。他从这个立场出发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被击败,如何保证他们会和平地下台?”

^① 贝塔齐和贝林格的书信载于卡尔·马扎尼主编的《教会和党:意大利天主教与共产党对话文件》,还附有《罗马观察家报》的评论和编者的引言。这些书信还刊载于贝塔齐的《在外边……在里边》一书的附录,以及《共产党与今日天主教世界》。

社会党的参议员回答了天民党发言人提出的论点，他也用语录来回答语录，然后谈到共产党的真诚问题。他说，他在抵抗运动中曾经同他们一起战斗。他们是严肃认真的人和无可争辩的爱国者。至于和平地离开政府的问题，他们在1947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员塞里把保证的问题放在一边。意共30年来的所作所为应当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投了共产党的票，党还能作出什么保证呢。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阐述信中提到的第382条法律^①，接着强调国家面临的危机并详细具体地说明共产党准备怎么做。

最后，他谈到共产党正在发生变化的事实。他对坐在旁边的因诺生蒂说，这是确实的，正如因诺生蒂所指出的，共产党改变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他想直接问因诺生蒂：“我们已经改变了并且正在改变，那么你，你们天民党，什么时候才改变呢？”

在这之前，听众的掌声是有派性的，但是这个时候却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跺脚声，这是把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团结起来的一种明显的政治示威。

随后，塞里和大约二十名地方党组织的男女领导人到了一家餐馆的后厅，围坐一桌，要了酒、面包、蚕豆汤和冷荤。当时已经是午夜了，塞里整天还没有吃饭。他虽然累了，但很活跃，很有精神。我对他说：“你象一只老战马。今天晚上又让你再次冲锋陷阵。”他象街上的顽童似地咧嘴笑道：“的确如此，的确如此。我们今晚在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你听到掌声了吗？”当我说我认为至少有一

^① 第382条法律延续了国家行政权分散的进程，赋予大区管理教育、卫生和福利机构的权力，至于哪些以前由教会管理、国家津贴的机构，现在应该移交给大区，有一大堆问题双方不断在讨价还价。

半听众是天民党人时，大家都表示同意。

塞里问我，是否觉得他对因诺生蒂的态度过于粗暴。我说没有，我认为他说话尖刻但没有敌意。他满意地点头说：“你知道，我抑制自己，我不想触怒他。他是一个正派人，他今晚来参加辩论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觉得他们的人思想有准备，他对我们的态度还会更加坦率。”

这个即兴的集会直到早晨3点钟才结束，一位同志开车送我们回威尼斯，路上走了45分钟，当他们还在谈论党内事务时，我打起瞌睡来，偶尔听见开车的同志自豪地说：“我在弗拉托切（意共中央党校——译注）干了6个星期。”在威尼斯，塞里和我乘坐一艘汽艇在我住的旅馆附近上岸，这个地方离塞里的住家也很近。他在渡头上对我说：“中午请到我们党部来。有一个人你应当见他。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还在意大利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的全国理事会任职，他最近才成为党的干部。”在互道晚安时我问他：“贝塔齐的信对党有很大的帮助，是吗？”他点点头。我说，“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塞里平静地说：“因为他是一位好天主教徒和一位好意大利人。”

贝塔齐的信充分赞赏共产党的诚实正直和献身精神，注意到在共产党竞选名单上的“天主教”候选人，并提到教会统治阶层对这种新现象的谨慎反应。他对共产党不受“外国经验”约束的独立性有深刻的印象，并希望这种情况能够继续下去。他在信中的某个地方插了一段随意的但很重要的话，他要求共产党不要把天主教的机构（学校、医院等等）扣作抵押品：“我不是作为一个主教而是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公民提出这个要求。”贝塔齐的所谓“扣作抵押品”是指第382条法律，那条法律规定大区可以管理天主教的慈善机关。

贝林格过了一年之后作了答复，显然他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政治形势，例如1977年“六党协议”产生以后意大利出现的那种形势。而且，第382条法律已经在实施，迫切需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贝林格对这位主教彬彬有礼，他指出意共第五次代表大会（1946年）通过的党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一个党员只需要接受党的政治纲领而无需接受它的意识形态：“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是否明确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呢？正如上面已经明确说明的那样，我的回答是：否。”^①

关于“扣作抵押品”的关键问题，他作了毫不含糊的回答：旧的自由主义国家对于人民的需要漠不关心，因而许多私营机构（世俗的和宗教的）在教育、托日所、医院、诊疗所、养老院、各种福利事业方面填补了空白；但是共产党所设想的民主国家将承担这方面的全部责任。因此私营机构已没有活动余地^②。他又说，然而国家机构将实行民主管理（教师、学生、医院职工、病人等等全部参加），在这些机构中，教徒们和教会统治阶层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和参与。

双方意见的交流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罗马观察家报》告诫说，贝林格的答复表面上是针对贝塔齐，实际上是针对主教团，因此主教团应当作出回答。贝塔齐对我评论这件事说：“我不能同意更多了，这正是我所期望的。”梵蒂冈的报纸指出，“党章第二条说，任何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可是贝林格没有谈第五条，第五条敦促党员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遗漏

① 《政治与组织》，第153页。

② 当然，贝林格的意思不是说教会资助的机构（例如神学院）不能存在，他指的是那些对公众开放、由国家津贴的机构。

太引人注目，决不能用简单的疏忽就打发掉了。”^①

罗马天主教会的机关报提到党员的性质问题，表明了意共和天主教的共生关系。正如共产党在影响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也在影响共产党。共产党已经从它的著作中去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在1979年5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词连同党章第五条全都去掉了。^②

现在的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群众党，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如同鱼是大海的一部分一样。在创建一个群众党时，陶里亚蒂最清楚地表明他的国家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他把一百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射进有两千年历史的天主教教义，只有一个意大利人才能完成这一项炼金术。陶里亚蒂能够在斯大林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决不是偶然的，他内心保留着一种超然、批评和判断的精髓，也决不是偶然的。^③

陶里亚蒂是经历3,000年不间断的政治生活、饱经沧桑的意大利人的继承者——他们在不同时代是征服者或者是被征服者，是帝国的缔造者或者是可怜的移民，是江湖贩子或者是天才。意大利人的怀疑论、好奇心和对美的爱使欧洲有了文艺复兴，从那个时候以来，意大利在艺术方面已不是微不足道的文明国家了。正是在政治艺术方面，无论是罗马法律还是政治理论，它已确立了明显的优势——如恺撒^④、马基雅弗利^⑤、维科^⑥、帕累托^⑦、葛兰

① 马扎尼：《教会和党》。

② 《政治与组织》，第150—1页。

③ 波卡的书，第435—436页，409—410页，269—271页。

④ 恺撒(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 古罗马的将军、政治家、皇帝。——译者

⑤ 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以搞政治权术闻名。——译者

⑥ 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

西。意大利历史把政治当作一种全国性的娱乐。

饱经沧桑的3,000年造就了一个急躁、热情、现实主义的民族,在意大利历史上,很少唐吉珂德式的人物,也很少桑乔·潘萨式的人物。伴随着这种现实主义的是一种对理智的深切赞美和欣赏,“这也许是意大利人民沙文主义的唯一形式。”这是葛兰西的意见,人们会了解为什么英国人民科尔斯说今天的意大利“可能重新发挥它深刻地影响其他西方世界的历史性作用。”(黑体是作者用的)⑦

葛兰西把这种历史性作用看作是一种延续,用现代的话来说,是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宇宙神教的延续。他在尼科尔斯之前45年就写道:“意大利人民就全民族来说是最关心国际主义的人民。不光是工人,还有农民,特别是南方的农民。以统一的方式来合作发展世界经济是意大利历史和意大利人民的传统……意大利人民建设文明社会的使命只不过是现代的和最先进的形式来恢复古罗马和中世纪的世界主义,让它成为一个无产者的国家,之所以是无产者的国家,因为它曾经是外国资本家的后备军……恰恰是这个原因,所以它必须把自己安插在现代斗争的前列,同时去改造非意大利的世界。”⑧

在9月的一个天气温和的下午,我同一位亲密朋友包拉站在罗马广场上,一阵微风使太阳的暖热变得温和。我们站在导向地

⑦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译者

⑧ 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决定》,第7页。葛兰西:《狱中札记》(意文本)第1201—1202页。“意大利人的固定不变的性格(是)对聪明和聪明人本身的天真和狂热的赞美,这是符合意大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概这是在意大利盛行的沙文主义的唯一形式。”葛兰西接着说,那不勒斯人是这种沙文主义者中最坏的。

⑨ 葛兰西:《狱中札记》(意文版)第1190—1191页。

下罗慕路斯墓^①的铁梯平台上。我的脑袋正好露出地面，可以眺望广场的周围，广场朝着—座小山不断往上伸展。

从平台往下看，大约距离15英尺的地方，可以看见—块粗凿成的黑色墓碑(大约公元前700年)，然后是〔古罗马〕共和国元老院大厦的凝灰岩砖石(仍旧是公元前)。再往上几英尺是恺撒时代的庙宇的大理石圆柱、山墙及其他残迹。顺着山坡逐步往上看，可以看见欧洲中世纪的盘旋的鹅卵石路，—个深褐色的中世纪教堂，—个十八世纪的宫殿，最顶上有—所现代的别墅，简直是—幅高比基埃(Corbusier)的画。

只要往四周扫视—下，差不多对整整—代的文化就会有具体的感受。当伦敦、巴黎和布拉格还是破落的村庄时，罗马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我内心禁不住产生—种出身自豪感：我是文明的罗马人！当我望着西塞罗^②痛斥喀提林的地方——元老院，并想起它的延续性(甚至包括它的印章^③)时，我对我的朋友说，我可以看到西塞罗和葛兰西之间有—条直接的联系线。

包拉是—位纽约妇女，嫁给了—个意大利人。她对意大利和意大利的语言、艺术和历史有丰富的知识，她表示同情地笑道：“好，这是—个可爱的文人的奇想。”

“不，不，”我说，“这话是当真的。”

“噢，别胡诌了，这是废话。”

① 罗慕路斯(Romulus)是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据说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勒莫斯(Remus)都是战神马尔斯之子，由母狼及牧人之家喂养长大。——译者

② 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前43)是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公元前63年任执政官，他在元老院发表演说痛斥大法官喀提林阴谋叛变并予以镇压。——译者

③ 罗马元老院的印章“S.P.Q.R”至今仍是罗马市的印章，罗马市政府的财产都盖上这个印章，如锅炉入口的盖子，公园条凳，自来水总管的阀等等，S.P.Q.R，是意文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缩写。

“不是的。”

我们在广场的萨克拉路(圣路)上散步。当我们走到尽头，登上那古老的砖石台阶时，包拉在我前头几步，她停下来带着一点怒气转身对我说。

“不要固执了，卡洛！你全神贯注于葛兰西，你将会发现他和耶稣基督之间有一条直接的联系线。”

“这也是，”我说，“虽然不太直接。可是你听我说——你自己也不要太固执。如果没有维科、帕累托和马基雅弗利，也就不会有葛兰西，你同意这个看法吗？”她表示同意。“好，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城邦和他们的政治，那末也就不会有马基雅弗利，这一直可以追溯到但丁和《帝制论》——甚至《神曲》也是一本政治小册子。”

“了不起的小册子！”

“嗯，如果没有教会，肯定不会有但丁，这就把你带到君士坦丁大帝，然后通过历代皇帝追溯到朱利叶斯·恺撒，于是你就找到了西塞罗。”

我的朋友笑道：“你是一位耶稣会会士。”

“根本不是，”我说，“我是一个罗马人。”

(教士，我承认我有过失，我的过失是过分骄傲。不是为宗族而是为文化感到骄傲，不是为我的家庭而是为我的出生地感到骄傲。)

第二部分

意大利走向
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六章

妇女举足轻重

妇女在意大利从来是二等公民^①。尤其在意大利南方，女人成了丈夫的私有财产。可悲的是，妇女愈是把贫穷和失业的重担压在自己肩上，愈是做牛做马，勤俭持家，养儿育女，她的地位愈是无足轻重。她对国家的法律和习俗没有影响。1947年以前，妇女连选举权都没有，在这以后的几十年内，她的选票仍然一直控制在

① 这里所述妇女受压迫的详细情况并不只是意大利所罕见的，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许多州内的部分地区也是这样的。但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在意大利确实发展得比其他国家快，最近有许多出版物涉及妇女的作用和意共的女权主义。可参阅朱列塔·阿斯科利所著《选举一词的含义》，第25—49页；弗兰卡·皮耶罗尼·博尔托洛蒂所著《意大利的女权主义和政党（1919—1926）》；吉多·杰罗萨所著《竞选运动》；劳拉·格拉索所著《妇女竞选运动》；比安卡·朱迪蒂·塞拉所著《竞选运动：妇女参加政治的见证》，第2册；米里亚姆·马法依所著《政治学习：战后的意大利妇女》；达尼埃拉·帕斯蒂蒂所著《共产党和爱情》；卡拉·拉维奥利所著《妇女和意大利左翼历史》；梅基蒂尔德·梅费尔德所著《妇女的解放》；卡拉·拉维奥利所著《妇女问题：意共采访记》；恩里卡·斯克罗波所著《妇女的私生活和政治：意共21位妇女的历史》；阿德里亚纳·塞罗尼所著《意大利妇女问题（1970—1977）》；纳迪亚·斯帕塔和菲亚马·卡马林吉所著《意共政策中的妇女问题》；艾达·蒂索所著《共产党和妇女问题》。还可参阅一些老的女共产党员的自传如：阿代莱·法拉贾纳的《红石竹》；费利奇塔·费雷罗的《真理之石》；切西拉·菲奥里的《法西斯狱中的妇女》；泰雷萨·诺切的《职业女革命家》和卡米拉·拉韦拉的《三十年日记：1913—1943》。

丈夫、父亲、兄弟或教区神甫手中。

千百年来，世界是男人的世界。男法官把男人制订的法律随意曲解，甚至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举例来说，直到1966年，在米兰这样现代化的北方城市，其民事法庭第九处曾颁布法令，规定妇女若因要丈夫洗碗碟、做家务而严重损害丈夫的尊严，丈夫完全有理由向法庭提出离婚^①。过去的法律都是一边倒的，十分无情，如：通奸只判女方有罪，而不判男方有罪。妇女在正式离婚之后，还可能被前夫指控犯通奸罪而判3个月徒刑。已离婚的丈夫仍有权私拆前妻的信件，禁止前妻同自己所不同意的人来往，而自己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同别的女人同居。

妇女没有财产权，她若脱离家庭，连自己的结婚礼服都不准带走。在某些情况下，她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根据刑事法典第587条，男人若抓住自己的妻子、姐妹或女儿同别的男人在一起，可以将她杀死或打伤而几乎不受惩罚。^②男法官在解释这条法律时，对男性的宽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几百年来妇女逆来顺受，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适当的和公正的。

长期以来无足轻重、倍受压迫的半边天，居然使欧洲和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大男子主义受到深刻的震动，并为欧洲共产主义（当代对西方现状的最大挑战）打开了大门，这实在是历史的讽刺和嘲弄。意大利的经验关系到欧洲共产主义的成败。欧洲共产主义的许多思想是在意大利形成的，体现这些思想的政治战略是在意大利展现出它的前景，而实现这个战略的策略和组织也是在意大利受到行动的检验。

欧洲共产主义的长期战略是要最大限度地发展民主，从政治

①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

② 同上。

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在意大利，陶里亚蒂早在1944年发表的《萨莱诺转折》中就提出了这种战略，并巧妙而顽强地将它付诸实施。陶里亚蒂认为，通过扩大各个领域的民主参与制和人民群众的参加，可以迫使怀有敌意的梵蒂冈及其政治盟友天主教民主党同共产党和社会党结成联盟，而不管它们是否愿意。这个联盟将在意大利执政，改革国家机构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进展是缓慢的，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它可以通过人民在大选和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来衡量。1972年，共产党的选票上升到27%，然而当时天主教民主党仍有稳定的多数可以同右翼联合执政。1976年，共产党的选票达到34.5%，天主教民主党获得38.8%，任何一方若得不到对方默认就无法执政。^①伦敦《泰晤士报》驻罗马的记者彼得·尼科尔斯称这次投票如果不是战后最重要的一次大选的话，那么也是最重要的大选之一。这种情况驱使他写了《意大利人的抉择》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我在这里试图描绘一下这个异常复杂的国家历史中的这个特别复杂的时刻。这个时刻有可能使它再次发挥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作用。”（黑体是作者用的）^②

意共在1976年获得巨大进展的原因，是1974年就离婚法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在这次公民投票中，妇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将来要是意共进入政府，从而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决定性的考验，那么人们必然会把1974年的公民投票当作起点，把1976年的大选当作意大利政治的转折点。应该说，妇女对这一转折起了关键

① 本书所引投票情况除注明出处外，都引用切尔索·吉尼《变化中的意大利》一书，吉尼是意共选举统计专家，可参阅他从1946年起有关选举全面情况的著作《意大利投票情况（1946—1974）》和他对1975年大区选举的专题文章《6月15日的地震》。

② 彼得·尼科尔斯所著《意大利人的抉择》，第7页。

的作用。

大选后，意共赢得了众议院议长和议会几个重要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同六个政党结成广泛联盟（六党中三大党为天民党、意共和意社会党；三小党为意自由党、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没有进入内阁，它以在信任表决中不投反对票的方式来支持政府。当时的天民党主席阿尔多·莫罗是这个“半联盟”的建筑师。他同安德雷奥蒂总理和天民党政治书记贝尼尼奥·扎卡尼尼一起，领导这个顽固的党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愈来愈密切的合作。使华盛顿大为恼火的是，1978年3月，天民党同共产党加强了谅解，意共在议会里同天民党成了地位相等的伙伴，不再投弃权票。新闻记者把这届政府称为“多数派”，这里的“多数派”（la maggioranza）一词是指各党在议会里结成联盟但不在政府内分担职务。政府内阁全部由天民党组成。这是意共进入内阁的前奏，原来推测意共可能在1979年初入阁。人们一般认为这种部署是得到教皇保罗六世赞同的。

“多数派”议会开幕的当天，莫罗遭到“红色旅”绑架，随后被杀害。暗杀的目的是破坏莫罗的战略，使意大利的政局发生动乱。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天民党右翼迫不及待地耍了一连串花招，最后导致1979年6月的大选。本书第十二章还会对大选作详细的分析。这次大选实际上说明右翼并未得逞。历史性妥协依然存在，离婚法的公民投票仍然是八十年代意大利政治生活的起点。

妇女在这次公民投票中的作用，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就连尼科尔斯这样一个同意大利人结婚、同情女权运动、见多识广的人，对妇女的贡献也没有看清楚。意大利妇女联盟是妇女的领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组织。梵蒂冈忽视它，天民党蔑视它，共产党低估它。意大利妇女联盟完全有理由把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归功于自己。历史学家有义务并且将乐于肯

定这个评价。

在意大利，“离婚”一直是个肮脏的词。除了拿破仑时代的一个短暂阶段外，意大利法律遵从天主教的禁令，从来不支持离婚。天主教实际上是国教。天主教的这种地位是拉特兰条约和1929年教会同政府之间的协议定下来的，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七条又加以重申。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宪法还给教会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即给了妇女选举权。教区神甫在妇女思想上的支配地位是惊人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绝大多数妇女会受梵蒂冈的影响。

在离婚问题上，习俗和社会结构的力量加强了教会的影响。按照教会的教导，婚姻不仅是神圣和不能解除的，而且妇女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获得光荣的地位，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身份。妇女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就是当妻子和母亲，这是在她诞生时就命定的。妇女以结婚作为取得身份的象征，其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所谓的“活寡妇”（她们的丈夫已移居国外和另立家庭，不准备再回来）通常也不申请离婚。

离婚被看成是耻辱，而结婚则是生活之必需，不管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不管要受丈夫多少欺凌和打骂。在南方，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男人要想强迫一个不愿嫁给他的女人同他结婚，只要先强奸她，然后有意搞得满城风雨。女人既已“丢丑”，再也不能嫁给别人，只好同强奸她的人结婚。男人这样做是得到法律鼓励的，刑事法典第544条规定，强奸者若与被强奸的女人结婚可以不问罪。^①法律对强奸并不太重视。强奸不算侵犯人身罪，而是被列为较轻的侵犯公共道德罪。^②

①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38页。

② 妇女组织和左翼政党正在为使强奸案归入侵犯人身罪一类而斗争。1979年春，电视纪录片《一次对强奸犯的审讯》曾震动了意大利。电视拍出在一次对强奸案的审讯中法官们如何把受害的妇女变成了挑逗别人对她奸污的被告。

这种强大的习惯势力，加强了天民党的政治力量，因此人们认为在意大利永远也不会有离婚这种事。确实，从1948年到1968年，天民党轻易地控制了议会，因为意大利妇女绝大多数投天民党的票。共产党曾经开玩笑说，若他们不同意给妇女选举权，也许他们早就上台执政了。

然而，天民党在1968年却失去了优势。大选结果，左翼和右翼平分秋色，天民党再也不能阻止议会通过某些进步法律（退休金改革法、地租法、工人权利法，等等），包括争论激烈的离婚法。1970年12月2日，在经过通宵达旦的辩论后，终于以319票对286票通过了离婚法。

离婚法并不允许随便离婚。离婚的主要条件是，若无辜的一方反对离婚，则需在双方正式分居至少五年至多七年之后，才准许离婚。如果夫妇有一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对家庭成员犯有伤风败俗的行为，可以允许离婚。后一条是离婚法中的重要条款，是针对那些奸污自己女儿的男人（这一类事并不鲜见），这是不受约束的大男子主义的副产品。伤心的妻子由于担心自己的命也保不住，实际上是默许的。

妇女选举权问题是说明梵蒂冈办事有远见的许多事例之一，但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可以同它相匹敌。教会反对妇女选举权，因为妇女选举权从短期来看固然有利于教会，但却会吸引妇女进入国家生活和教育她们；共产党因为同样的原因支持妇女选举权，宁肯在短期内为之付出政治代价。

（这种歪曲真相的情况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并不鲜见。）这部电影曾在群众大会上放映，以动员舆论修改法律。我1979年6月在罗马参加过这样一次大会，当时报上作了很多报道。可参阅1979年6月8日《共和报》和1979年6月9日《团结报》。

1977年12月我站在位于意大利脚尖部分的勒佐·卡拉布里亚市的法院外面，看着戴有手铐和被锁在一起的两男一女。宪兵把他们押进法庭听候判决，他们被指控为犯有强奸罪和谋杀罪。年龄较大的一个男人约有三、四十岁，是个粗壮的农民，穿着一套粗布西服，显得很不自在。他一脸皱纹，看起来很聪明，下巴给人以执拗的感觉，眼睛里一股迷茫的神情。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也许比他年轻，但看起来却比他要大二十岁，穿着一件黑衣服，披着黑披肩，衣服皱成一团，一副殉难者的面孔，红肿的眼睛看起来已哭了好几个星期。这对夫妇有四个孩子，全是女儿，大的十七岁，其余三个为十五、十三和十岁。丈夫常常酗酒，每次喝醉以后就强奸三个大一点的女儿。最后大女儿怀了孕。婴儿生下来的时候是活的，后来却被身兼父亲和祖父的那个男人勒死了。他还强迫妻子帮助他埋掉婴儿的尸体。这件事偶然被人发现，导致作案人受到审讯和判决。另一个男人是十七岁姑娘的未婚夫。他同他的岳父一起奸污另外两个姑娘。他二十来岁，身体健壮，闷闷不乐的脸上显出一副蠢相。

在审讯时妻子出来作证，她泣不成声地诉说如何受到丈夫的恐吓，经常挨打，生命受到威胁。这真是一个充满仇恨、恐惧、淫欲和罪恶的可憎家庭。她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法官判丈夫终身苦役；判青年十年徒刑（因为他并没有参与谋杀案件）；妻子五年徒刑，暂缓执行。我们一起去的一组人（包括意共党员、工会工作者、律师和一个警官）都赞同这一判决，认为对男人的判决应当严一些，对女人的判决应当宽一些。在议论这件案子时，我们都认为村里肯定会有不少人知道情况，但竟没有人去向当局告发。我们当中的那位警官说：“有谁会去告发呢？部分原因是害怕，不敢告，更深刻的原因是老百姓保持缄默的惯例，要守口

如瓶，不得向警察告发。”

看到这种乱伦的罪行和妇女百依百顺的情况，教会居然抵制离婚法，实在令人吃惊。梵蒂冈并非不知道这种状况造成的不正义，然而结婚被认为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礼。新离婚法通过时，教皇保罗六世正在澳大利亚访问，他马上表示“十分痛心”。教会充分意识到，只要有 17 票转移（占 3%）就可以击败离婚法，因此它马上进行谋划，想予以废除。关键问题是动作要快。如果让离婚法生效一段较长的时间，人们就会感到习惯，尝到好处，并会认识到离婚并不象教会所预言的那样成为流行性传染病。（事实上，在离婚法实施的一年零八个月中，申请离婚的只有 71,678 人，被批准的为 40,830 人。^①其中半数以上是夫妇双方已分居十年以上的。）

教会要废除离婚法，还有另一条理由。如果教皇在自己的地盘上被击败，就会鼓励社会上的世俗力量。意大利主要的报纸《信使报》这样说过：“我们这个国家没有经历过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却遭受了反对宗教改革的一切消极后果。因此离婚法的通过，首先意味着意大利议会能够……重申意大利国家的自主性，反对一切对拉特兰条约的荒谬的解释。”^②这是一篇有预见性的评论，四年后天民党自己提出对教会和政府间的协议进行修改。

天民党政府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不得不推行它所憎恶的法律。它预见到离婚法有可能通过，因此在几个月前先制订了法案，对于怎样按宪法规定举行公民投票作出了规定。（天民党执政了二十三年之后，才出于害怕离婚法而颁布了这么一个法规。）

于是，在大多数主教的支持下，各种天主教团体纷纷出动，争

^①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 231 页。

^② 同上，第 232 页。

取举行一次废除离婚法的公民投票。他们毫不费力地为举行公民投票征集到比需要多一倍的签名。于是，1974年1月就确定在同年的5月举行公民投票。

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明达的舆论一致认为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数字会很接近，但反离婚法的势力有可能取胜。一般舆论的主要根据是：妇女处于公认的落后状态，尤其在南方；以及妇女对教会百依百顺。另一个情况是，在1972年大选中，天民党的保守派乔瓦尼·莱昂内当选总统，以及天民党和右翼政党获得明显多数，政局看来在向右转。

离婚法的后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含义。在公民投票前两个月，贝林格在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群众大会上警告说，宗教战争有可能威胁国家的民主基础。“我们要对付一种反动的阴谋，这种阴谋是要鼓励和动员社会上和教会内部最落后的蒙昧主义势力。”贝林格在这里是暗指教会内部那些反对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势力，他们不断施加压力要悄悄地否定这次会议。他接着说：“允许阿尔米兰特成为这次政治对峙的主角……那么在公民投票的对峙中，肯定会使意大利政治生活出现转向、分裂，甚至挑衅。”^①他最后还提醒听众说，共产党曾经竭力想避免举行公民投票，并提出过不少妥协的方案。

妇女听众并不需要这种提醒。她们一直坚决反对共产党提出的妥协，认为这样做只会进一步削弱这个已经不很象样的法律。意

^① 恩里科·贝林格，《共产主义问题》，第687页。乔瓦尼·阿尔米兰特（1914年生于帕尔马），从意大利新法西斯组织“意大利社会运动”1946年12月成立时起就是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法西斯时期为种族主义出版物《保卫种族》撰稿，并主编《特韦雷河》报。在1943至1945年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他在内阁中任大众文化部秘书。关于阿尔米兰特和意大利社会运动到1964年为止的情况，可参阅安吉洛·德尔布卡和马里奥·乔瓦纳的《世界述评，今天的法西斯》第126—173页。

妇联的一位领导人安妮塔·帕斯夸莱(她本身是意共党员)说,“我十分生同志们的气。他们简直是趴倒在天民党的脚下。我们妇女认为我们会胜利。不管怎么说,这种卑躬屈膝的姿态太可怜了。简直叫人讨厌。我们闹得他们受不了,才使他们骨头硬一点。”

然而,不管意共多么低声下气,天民党拒绝了一切妥协方案。教会态度十分强硬,坚持必须废除离婚法,认为不会再有这样好的机会。公民投票前的斗争证实了共产党的悲观的预见。定调子的是阿尔米兰特,他成了反离婚法联盟的最厉害的发言人,天民党也接受他作为发言人的身份。他说,离婚法问题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要拆毁家庭。共产党一心要统治国家,只有大家投赞成废除离婚法的票,才可以制止共产党。天民党的《人民报》刊登了天主教官方过去和现在的一些语录,包括圣汤姆斯·阿基纳斯关于婚姻神圣不可侵犯的语录,并且用“上帝的意愿”作为口号,意思既指婚姻不可解除,也指要大家投赞成票。天民党的招贴画大肆宣传“上帝在注视着你,请投赞成票。”^①

共产党方面则强调要保护儿童和强调离婚法符合宪法精神。他们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意共还攻击教会的统治集团。有一幅标语说:“既然教会一直有权废除或取消不美满的婚姻,为什么国家不能这样做?”这条标语还指出,由教会取消婚约并不能保护儿童和处于弱者地位的妇女,它最后写道:“在公民投票中,请投反对废除离婚法的票。”^②

教会动员了全部力量,从主教起直到教区神甫。梵蒂冈一反常态,公开登上政治舞台。梵蒂冈的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在头版登满了反对离婚的宣传,并告诫读者投票赞成废除离婚法。大

① 在罗马家庭中的谈话。

② 切尔索·吉尼:《变化中的意大利》,第69页。

约有三百名主教组成的意大利主教团会议发表了反对离婚的声明。一队队的神甫乘坐安上大喇叭的面包车到各区支援天民党的工作，人民群众管他们叫“飞行僧侣”。教区神甫提醒他的会众，谁要投了共产党的票（亦即投了反对废除离婚法的票），就要被革出教门。不少忏悔室内都贴出了禁止会众参加的组织的名单（包括工会在内），谁要参加了这些组织，就不许忏悔，除非他或她退出各有关组织并表示悔过。^①

在农村教区，妇女听到的是，离婚即意味着妻子儿女都会被当家的男人遗弃。匿名传单围绕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尼科尔斯认为，赞成离婚法的团体，都是依靠提供情况和进行教育，光明磊落地进行斗争；而反离婚法的团体则使用吓唬、诽谤和弄虚作假来赢得选票。后者的中心题目是反共。英国人向来不喜欢用夸张的语言，即使这样，尼科尔斯仍把这些做法说成是“受到教会统治集团支持的、充满恶意的极端主义宣传运动。”^②天民党和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宣传大大地搅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公民投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投票。

负责投票站的政府势力搞了不少鬼名堂，结果证明并不起作用。^③近60%的人投了反对废除离婚法的票，约90%有投票权的人都参加了投票。^④选举结果使所有的人，包括妇联在内，都惊诧不置。我在1979年9月抵达罗马后不久就去妇联总部访问。妇联总部设在罗马市中心一条小街科罗那·安东尼娜路上的五间一

① 在罗马家庭中的谈话。

②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14页。

③ 最流行的欺骗办法就是在把投票结果的报告交给中央统计局时把票数颠倒一下。如弗拉拉省的阿尔詹塔市送进来的报告上写明投赞成票的有446张，反对票36张，实际票数刚巧倒过来。从切尔索·吉尼所著《变化中的意大利》第475页可以看到上述的和其他的欺骗情况。

④ 切尔索·吉尼：《变化中的意大利》。实际上投反对票的占59.3%，参加投票的人数占全人口的87.7%。这是民主行动的榜样。美国与此是不能相比的。

套筒朴的办公室内。我在那里同妇联领导人安妮塔·帕斯夸莱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安妮塔·帕斯夸莱有三十七、八岁，外貌和性格都很吸引人——给人以美感，办事有条理，表达能力强。就是她强调妇女在公民投票中的作用，并指出左翼在1975和1976年的胜利来源于这次公民投票。“这是一次政治地震，使每个人都惊讶万分。这是妇女干出来的，尤其是南方的妇女。她们勇敢地面对她们的男人，她们投的不是票，而是她们的心。她们不会再俯首帖耳了，永远不会了。”她骄傲地说着，神情十分坚定。“她们已举足轻重了。在她们一生中，这是她们第一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后来我去各地访问，发现人们用敬畏的口气回顾当时情况时一再用“地震”这个词。12月间，意大利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的一个积极分子在威尼斯对我说：“我当然投了反对票，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获胜。后来我从无线电里听到特雷维索有48%的人投了反对票，我知道发生了地震，因为那个地方投左翼票的人从来没有超过1/3。我跑到街上大喊‘特雷维索，特雷维索，48%投反对票’。于是人人人都知道发生了地震。”

罗马有一位很有教养的女士，为人温文尔雅，她用动人的自责口气对我说：“我原来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结果，以为所有那些无知的妇女都捏在神甫手心里。象我这样的人都瞧不起她们。我们不应该这样。我知道不应该这样，我是共产党员，但我就是看不起她们。我的意思是说我过去看不起她们。以后再也不这样了。那些可怜的妇女，孤苦伶仃，与世隔绝，但是她们捉摸出了道理。她们自己在孤独和沉默中弄清了问题。她们使我感到十分羞愧，也使我感到十分十分高兴。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掉过眼泪，但那天晚上我掉了泪。”

意大利妇女联合会是唯一相信一定会取胜的组织。我问安妮塔：“这是不是出于女性的直觉？”她善意地接受了我的挑衅说：“很难这么说。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对手要妇女照他们的意旨去投票。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打算是会落空的。我们懂得这一点，而他们却未必，因为政治家们有时甚至同自己的妻子都不说话。而神甫们又怎么会真正了解妇女呢？有些人在忏悔时讲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过失……什么背后议论人，说个小谎，想了些禁止想的事，以及不经常去做弥撒等等……神甫们怎么可能了解妇女埋在心底的愤怒？这一点甚至连她们自己还认识不到呢。但是我们……我们是了解很多情况的。”她指了指胸脯，又拍了拍桌子说：“我们在妇联工作，对妇女们自己的事还是了解的。我们也找妇女们谈话。哼，我们谈得可真不少。我们有自己的刊物《我们妇女》杂志。每个月我们还会收到几百封群众来信。我们的会员人数一直在增加，现在已经有了十万多会员。听起来数目不大，但我们组织得很好，在各大城市和大一点的市镇都有小组。我们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感到妇女在起变化，对自己的问题愈来愈有觉悟，不再那么怕丈夫，愿意讲话。”

她正视着我说：“我的话听起来不着边际，很一般化，是吗？”我正开始否认，她却从桌子旁站起来走到书架边上，拿了一本平装书回来。这本书的封皮是米黄色的，略微带点粉色，中间凸起的花纹是生物学中雌雄两性的符号，书名《苦难的女性》是深红色的，下面还有个副标题“三万妇女对母性、两性关系和堕胎的答复。”^①

她说：“这里面都是资料。在公民投票后我们决定马上提出堕胎问题——利用我们的冲力、胜利感和力量，向议会施加压力。我

^① 塞索·阿马罗：《三万妇女对母性、两性关系和堕胎的反映》。

们决定让妇女们自己出来讲话,让全国各地,不论城镇还是山区乡村中各种年龄、各种生活条件的妇女都出来讲话,这是突出我们的要求的最好方式。”

她指着书说:“我们搞了这本书。我们并不认为民意测验、科学试点等等会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此我们利用我们的会员去进行采访,或者把妇女组织起来座谈,只要有可能就组织小组座谈,要是妇女们愿意就召开大一点的集会。你把这本书拿去吧。详细情况都记在里面。^①我们有可能时就录音,或者作纪录。1975年我们整整工作了一年的时间,随后我们又用了一年时间进行编辑和印刷,今年年初才出版。这本书的影响很大。”

她的手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形说:“我自己认识十来个议员。他们是那么受感动,为自己的男伙伴们感到那么不好意思,以致尽管受到天民党和教会的压力,他们还是投票赞成堕胎法。我们设法先让众议院通过,但最后在参议院只差几票没有能通过,这是因为有些同我们关系很好的朋友,象朱塞佩·萨拉加托没有出席会议。”她用十分鄙视的语气讲出这位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名字。社会民主党在口头上是支持堕胎法的。她又说:“但是,我们不会就此作罢,”她严峻地说,“不管是对他,对堕胎法,对参议院,我们都不会就此罢休。”^②

① 这种小组总数有 1250 个,参加的妇女有 115,000 人,涉及的大区有:伦巴第,利古利亚,艾米利亚,托斯卡纳,马尔凯,翁布里亚。大规模的集会总数为 380 次,参加的妇女有 18,000 人,涉及的大区有皮德蒙特,威尼托,拉齐奥,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向报界发表谈话共 380 次,大部分是在坎帕尼亚大区。从上述情况可见在南方小组座谈比较多,在北方群众性集会比较多。

② 她的话是对的。1978 年 4 月堕胎法得到通过。堕胎法规定怀孕三个月之后堕胎要有医生证明,十六岁以下的女子要经父母同意。这个法律本身是进步的,但是要付诸实施是一场无止境的斗争。有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一位保健所的官员对一个妇女说:“当然你可以免费堕胎,但是现在没有床位,排队等床位的人很多,你过一年再来吧。”法律还允许医生可以出于良知而“不干”

她说：“你读一读这本书，你就会看到妇女们的苦楚、受到压抑的愤怒以及日益强烈的反抗心。你会一再地看到妇女们说‘两年前我开始……’，‘三年前我开始……’，就象你们伟大的作家斯坦贝克所说的，“怒火之花成熟了。”她用很漂亮的英语讲了这句引语。我恭维了她几句。她说：“我只会几个字，这是赶时髦。”她调皮地笑了笑说，“在罗马，会讲英语是时髦，会喝威士忌酒也是时髦。不过，谢谢你的称赞，卡洛。”

我补充了一句，“搞政治也算是个时髦的职业。”

多数观察家并不同意妇联关于妇女在公民投票中起了特殊作用的提法。意大利社会党全国执委保罗·维托雷利认为天主教左翼起了主要作用。意大利共和党前主席乌戈·拉马尔法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应归功于左翼和世俗力量的人民阵线，这是老一套的政治概念。^③一向支持女权运动的尼科尔斯则对投票结果提出了一种新鲜的解释，认为意大利人最不愿作出决定，一旦强迫他们非作出决定不可，他们就感到不满。公民投票强迫他们决定赞成还是反对废除离婚法，于是压倒多数的人投了反对票。^④社会党作家乔治·博卡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认为选民们对天民党的丑闻十分厌烦，因此投反对票以示对天民党的惩罚。天民党的领导人则认为新法西斯力量的表现太引人注目，使老百姓起来反对他们。^⑤天主教的思想家则责怪社会愈来愈世俗化。他们什么理由都谈到了，就是不提妇女的功绩。不过凭良心说，这些男性分析

堕胎手术，有80%的医生已经这么做了，其中许多人乃由于社会压力。尽管如此，1979年仍有200,000人做了合法堕胎手术，其中南方1/3。（可参阅1980年5月12日《全景》杂志第30页）。

③ 1974年6月15日《新社会》杂志第35页。这是意共在都灵出版的双月刊。主编迪亚哥·诺瓦利在1975年后成为都灵市长。

④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14页。

⑤ 切尔索·吉尼：《变化中的意大利》，第481页。

家倒并不是拒绝把功绩归于妇女，只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转过这个念头。

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有人很不乐意承认妇女的作用。举例来说，意共对这次投票情况的正式分析，对妇女的决定性作用，只用了一句平平淡淡的套话：“妇女表现出她们在争取民主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中是一支伟大的力量。”^① 公民投票中有一件事十分有趣，值得专门提一提，那就是许多地方压倒多数的修女投票赞成离婚，因而受她们直接影响的妇女也投票赞成离婚。她们反对废除离婚法的比例大大高于一般居民——有的地方高达90%！^②

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意大利妇女在向左转。问题是：她们只是在离婚问题上向左转，还是整个政治态度向左转？妇联说妇女再也不会忍气吞声了，这样说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又预示着什么？所有的政治家都懂得妇女投票的变化会反映和进一步影响男公民的投票。因此，问题的中心是，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有没有变化？

1974年6月12日，公民投票后一个月，撒丁岛举行区议会选举。左翼第一次赢得多数，从1969年的43.4%上升为51.02%^③。五个月后，左翼在两个省议会选举中又得到显著胜利。^④ 到1975年6月15日区、省、市各级地方选举时，变化之大使人惊讶。几乎各大城市和半数大区都是左翼取胜，左翼的票数占全体居民的60%左右。共产党获得了32%的选票。^⑤

① 切尔索·吉尼：《变化中的意大利》，第479页。

② 同上，第467—68页。投票情况确认到修女身上有两个理由：一是投票区特别小；二是这个区里大部分是修道院和由修女任职的机构，如卫生所和孤儿院等。

③ 同上，第484页。

④ 同上，第493和498页。这两次选举分别在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大区和阿维利诺省举行。

⑤ 同上，第549页。

1976年6月20日的大选，又肯定了这种趋势。共产党赢得34.4%的选票，天民党得38.8%。共产党比1972年增加了7%，而天民党则保持原状。^①但是右翼输了，天民党和意大利社会运动合起来只取得45%的选票。天民党若得不到共产党公开的或暗地的赞同就无法执政。

从1976年到1980年，当代政局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事实，即天民党顽固地拒绝意共进入政府，而共产党则寸步不让地逼天民党搞历史性妥协。都灵一位叫做祖科蒂的共产党干部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把天民党这匹马带到了水边，现在我们得让它喝水。”把这匹马带到水边的就是公民投票。尼科尔斯提到，“即使是支持离婚法最热心的人，也为他们取得的巨大胜利大吃一惊”。接着，他又明确地写道：“如果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过某一事件堪称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就是在离婚法问题上公民投票的结果。”^②

公民投票给教会以沉重的打击。最直接的、然而是出于无心的惩罚性后果，是鼓励了反教会的势力，从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到共和党参议员欧金尼奥·雷亚利都马上号召修改教会同国家的协议。不少天主教徒早就希望这样做了，天民党内不少人由于憎恨梵蒂冈的压力使他们在政治上遭到失败，也不再反对修改协议了。^③

在教会统治集团中，为失败付出最高代价的高级教士是佛罗

① 切尔索·吉尼：《变化中的意大利》，第727页。天主教民主党的选票总数未变，但盖住了它成分有变化的事实。它从自由党（现在是个保守党）和新法西斯分子中吸收了5%的选票，但丢了5%的选票给左翼。现在左翼的选票接近50%。

②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决定》，第14页。

③ 阿尔切斯特·桑蒂尼：《天主教问题，共产党问题》，第90页。

伦萨的红衣主教贝内利。他对公民投票鼓吹最力，^①从而使许多进步的高级教士同他疏远。公民投票的失败，又使过去支持他的人同他疏远。1978年10月的红衣主教秘密会议上，贝内利看来快要戴上教皇的王冠了，可是，红衣主教们的记忆力是很强的。

教会迄今仍痛感这次失败的创伤，这次失败加速了圣职人员同世俗人士的分歧。它在教会统治集团内部造成的紧张局面虽不那么明显，却更重要得多。这种紧张局面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潜力，要求教会变革，要求将第二次宗教会议的改革付诸实施，并要求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加强对话。

自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来，教会及其神学家们在关于夫妇感情、婚姻、节育和性生活等老的教义方面，一直存在尖锐的分歧。^②保罗六世在这些问题上是十分保守的，而许多高级教士不同意他的意见。

由于以上情况，当意大利主教团会议在1974年2月发表声明，公开使教会站到反离婚势力一边，引起了思想比较自由的教士们的强烈反应。^③反叛的人数虽不多，但一旦主教和红衣主教们公

① 马尔切拉·利昂纳：《加罗林王朝》一文，载1979年10月29日《全景》杂志第247页。

② 阿尔切斯特·圣蒂尼：《天主教问题，共产党问题》，第79—80页。神学家有以下一些看法，如主教马克西莫斯四世说，“教会的职责是发展儿童的道德感，不是把他们包围在处方和命令之中。”巴黎神学院道德系教授西蒙神甫说：“婚姻不应再被人看成是归宿，而是生活在社会和世间环境中的爱情故事。”彼得·达瓦克说，“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已不再适应……现代人。”那些以传种接代为基础的婚姻观念“不仅是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明显是可笑的。”

③ 时代已经起了变化。五年后的今天，不管约翰·保罗教皇个人对离婚和堕胎怎么看，意大利主教团已不会再那么露骨地介入政治事务。教皇少数任命的一项是要巴莱斯特雷洛红衣主教当主教团会议主席，这原是贝内利想要的位子。接替佩莱格里诺当都灵红衣主教的巴莱斯特雷洛是以他对政治持超脱态度闻名的。见莱昂内作品集第235页。

开出来反对教会的既定政策，这种反叛就非同小可。

反叛的共同出发点是认为主教团会议的声明从法律上来说对主教和神甫个人没有约束力。伊夫雷亚的贝塔齐主教、都灵的佩莱格里诺红衣主教、萨卢佐的安东尼奥·富斯泰拉神甫、诺瓦拉的阿尔多·德尔蒙特主教——上述几位都属于皮德蒙特地区——都立即指出主教团会议重申了教会的通谕，但对各教区并没有约束力。加埃塔诺·博尼切里不得不在报上承认，“地方各级人人都可以自由行动。”佩莱格里诺红衣主教没有参加会议，他公开发表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长篇声明来阐述自己的立场：“我们教区完全承认婚约不可解除这一教义，并积极支持这一基本价值观念，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站在那些希望废除离婚法的人一边。”他解释说，他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是“出于良心自由和社会和平的动机。”

阿尔多·德尔蒙特主教参加了会议并投票赞成声明。但他后来宣布说，他投票赞成的文件在公布前被删改，“文件中有三行字被删掉了，而恰恰这三行乃是我所支持的天主教徒选择良知的权利。”^①

世俗天主教徒的反抗是公开的，不论用个人名义还是通过无数慈善团体和社会、体育组织名义发表的。这些团体在神甫管辖的教区和主教管辖的教区形成一个密集的网状系统。仅在皮德蒙特地区，就有几十个神甫管辖教区出现天主教徒发表的呼吁书，号召人们投票反对废除离婚法，有不少神甫、天民党市长、天民党议员和其他组织在上面签字。有一份呼吁书说：“我们认为投反对票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和恰当的。”另一份呼吁书要求公民们“用投反对票的方式来拒绝那种企图将个人的信仰选择强加于多元化社会的做法。”^②这次反叛的最重要之点在于：不仅个人，而且是有组织

① 《新社会》三十一期（1974年4月15日），所有引言都出自那一期杂志。

的团体，都开始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合作，从而做到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影响。

从全国范围来说，天主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是全心全意投反对废除离婚法的票的。这个运动在六十年代后期发展到全国，它是由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小团体组成的，这些小团体已经觉悟到社会发展和个人宗教发展的中心是阶级斗争。1973年9月，他们在波洛尼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贯反对所建议的公民投票（当时举行公民投票还只是一种可能性）。^②这个组织在1974年5月的投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比天主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作用要大得多的乃是天主教的主要的组织“意大利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的变化。

意大利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在各地区设有书记处，全国设执行委员会。它成立于法西斯统治时期，1944年重新改组，成为教会在工会方面的左右手³，相当于教会在政治方面的左右手天民党以及教会在社会方面的左右手天主教行动会。它接受梵蒂冈大量的特别津贴，包括美国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的捐助。

天主教劳联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两件事来衡量：劳联的主席是教皇亲自选任的；其形成阶段的“保护人”乃是教会统治集团中“有希望的接班人”，即乔瓦尼·巴蒂斯泰·蒙蒂尼神甫，后来他成

② 《新社会》32期（1974年5月1日）。在诺瓦拉市，22个教士签署了号召投反对票的呼吁书。在伊夫雷亚，有四十位天主教知名人士，包括天民党市长在内签署了类似的呼吁书。在萨卢佐，天民党左翼“新力量”号召投反对票。在朗赫的波伦索教区中的“联合”团体在公报中宣称“我们坚持认为投反对票在政治上是公正的和正当的。”在阿尔巴，十几个天主教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文件，要公民们“用反对票来摒弃那种把个人信仰选择强加于多元社会之上的企图”。

③ 《今天天民党左翼的反抗》第199和228页。

为蒙蒂尼红衣主教、教皇约翰十三世的国务卿，最后成为保罗六世，“基督在世的代表”。天民党多数重要领导人，如鲁莫尔、谢尔巴、范范尼、格隆基、安德雷奥蒂等人的政治生命，都同天主教劳联有关系。①

天主教劳联的基层一向是有战斗性的，尤其在1968年学潮和工潮期间，战斗性更强，使该组织向左转。在离婚法问题上的公民投票，使这种不断增长的战斗性达到了高峰。天主教劳联的多数领导人和下属团体公开主张投票反对废除离婚法，从而与过去彻底决裂。事实证明，这种决裂是不可逆转的。②

例如，在威尼托的康尼格里亚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上，有一位发言人是天主教劳联的地区书记。他在1976年投了意共的票。他是在公民投票问题上第一次不按天民党的要求行事的。从都灵到巴勒莫，在整个意大利，我一再发现天主教劳联的成员投共产党的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机构中任职，有时还成了意共的干部。

我很难用文字来表达公民投票在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内心深处引起的激情，其破坏性影响之大堪称为良心危机；我也很难表达由于天主教徒向左转（这种向左转往往是持久的）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在他们心中的反应。我在波洛尼亚对此感受最深。在那里我遇见了波洛尼亚大学的路易吉·佩德拉齐教授。他和其他教师建立了“宗教史文献中心”。这个中心同时成为天民党的左翼“民主联盟”的非正式中心。这个中心设在一座古老的宫殿里，（不知有多少共产党总部和左翼团体座落在古老的建筑区里）。那次我原去采访一位青年管理人员，意外地碰到佩德拉齐教授进来找资

① 朱塞皮·帕西尼：《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的背景（1944—1948）》，第93页。

② 同上，第101页。

料。

佩德拉齐教授四十多岁，短小粗壮，有一张高高兴兴的脸和开朗的性格。在人们介绍我们相识后，我提出要找他谈谈。他说：“欢迎，但是现在我有约会，明天行么？”可是我第二天要去弗拉拉，接着就去威尼斯。他笑了笑说：“那么我们得现在就谈，是吗？”等他打完一个电话，我们就坐下来交谈了两个小时。他对政治和宗教有许多独创的和深刻的想法和评论，其中有一件事同公民投票有关。他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党派，但二十年来他一直投天民党的票。“公民投票使我改变了立场”。他向青年管理人员要了一份剪报集，给我看他在天民党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的谈话，标题是《宗教和政治赞颂天主教使命》。我翻来读了一段：“有一个时期，出于我迄今为止仍认为是正确的理由，我自己所作的决定同天民党的决定距离愈来愈大，因此，我在1972年投了弃权票，在公民投票中投了反对票，在1975年市政选举中投了社会党的票，1976年6月20日投了意共的票。”^①

1979年6月，我再次见到佩德拉齐。他邀请我到位于波洛尼亚小山顶上的家里去玩。他煮了一壶咖啡请我喝，他告诉我他又投了意共的票。他对意共选票下降感到关心，而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他指出选举中真正丢票的是天民党。在莫罗死后的一次地方选举中，天民党的票大增。于是天民党根据地方选举的结果，认为它在全国大选中可以获得42%—44%的选票，能使它和它的同盟者得到多数，因此，天民党强迫共产党退出多数派和提前选举。但是天民党的算盘打错了。它只增加了0.1%的选票。共产党虽然丢了票，但丢的票分给了其他左翼党，特别是激进党。天民党到手的只

^① 1976年8月3日《人民报》。

是把意共推到反对党一边，使它自己更加脱离工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反而害了自己。

我问他：“现在情况很糟，会发生什么事？”

“是很糟，卡洛。”佩德拉齐说，“但事情还可能变得更糟。”

如果说，公民投票最重要的结果是妇女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①其次是对教会内部的影响，那么其三则是对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形象的影响。意共表现为一个头脑清醒、可以信赖、关心民族利益、有资格执政的党。罗马大学的西洛斯·拉比尼教授曾经对我强调过这一点。他说：“公民投票结束了意大利政治生活中乱扣红帽子的做法。公民投票为张牙舞爪的新法西斯主义挖掘了坟墓，坟是右翼自己挖的，包括天民党右翼在内，是他们自己使共产党成为投票运动的主题。天民党再也不能同社会运动结盟了。就象贝林格所说的，乱扣红帽子已经不灵了。^②反过来，意共冷静应战当然使许多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不再对它持保留态度。意共通过妇联，可以联系几百万妇女。”

第二天我刚巧同安妮塔·帕斯夸莱一起吃午饭，我把拉比尼的话讲给她听。她对讲妇联同意共有联系这一点反应很强烈。她说：“这是瞎说，卡洛，他知道得很清楚。在我们的集体领导中，多数人不是共产党员，比例是七比五。况且我们从来不因为党派不同而闹分裂，一次都没发生过。我们一般都能达成协议，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坚决反对一项建议，我们就暂时把它搁在一边。”

“在妇联刚成立时，党确实帮过忙，提过建议，还提供了经费。

① 1976年议会中有六十一个妇女，其中共产党员有四十七人（上届议会为二十一人），天民党员有十一人（上届为九人）。尽管如此，妇女只占总数的6.5%。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12页。

② 贝林格：《共产主义问题》第746页。

陶里亚蒂在妇女问题上是很先进的。但是后来我们促使妇联完全独立自主，党也不反对。^①公民投票标志着一次彻底的变化。我们很生党的气。我就是使同志们日子不好过的人之一，但他们是好人，最后都转过弯来了。我们现在的关系是友好的和正确的。我们喜欢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也愿意这样。”

拉比尼教授还谈到，意共原想竭力避免一次力量较量，后来也没有因为胜利而对它在天民党中的对手大吹大擂，或夸大自己的功劳。贝林格在公民投票后立刻发表声明说：“这不是一个党的胜利”，并列举了所有赞成离婚法的力量。贝林格还强调天主教徒的贡献说：“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有不少天主教和天民党积极分子和选民，支持（离婚法），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并没有屈服。”^②

我问拉比尼他是否是共产党员。他说不是，他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他很尊重意共和意共的领导人。“人们曾多次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意共，但我一直没有成为党员。我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认为还是由于受了萨尔韦米尼的影响，他老是对党冷嘲热讽。”

“怎么？萨尔韦米尼？他是我的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是朋友，又是老师。”

“可不？对我也是一样。我们这一群学生建立了一个纪念他的基金会，出版重要的文章。”

突然在我眼前浮现了在诺门塔那路上那间堆满书籍的书房里这位可敬爱的老师的形象，雪白的山羊胡子，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话粗里粗气，讲起来没个完，还不断打手势。他是多么亲切，十分

① 见吉尼：《意大利人投票情况》，第467—469页。陶里亚蒂确实坚持妇联独立于党，见陶里亚蒂：《妇女的解放》，第49—71页。

② 贝林格：《共产主义问题》第739页和吉尼：《意大利人投票情况》第467—469页。

亲切和十分真实。西洛斯·拉比尼和我就是在那间书房里成了朋友。拉比尼比我年轻20岁，通过比我年长20岁的老师，同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我知道你说的冷嘲热讽是什么意思。”我说，“1937年我从西班牙出来，到了牛津大学。萨尔韦米尼带了罗赛利的寡妇和11岁的孩子到我家里过一个星期和平和清静的日子。^①我告诉他我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他很高兴。后来在1942年，我要他推荐我参加战时情报组织战略情报局，他对我说，“我不想讨论伦理问题。如果你是共产党员，我就不写推荐信。你是共产党么？”我说不是，我几个月前已经脱离共产党。他说，“那好，我可以写推荐信。”后来我问他，他怎么知道我讲的是真话——毕竟有些人设想共产党人行事是靠说谎、偷东西和搞谋杀。萨尔韦米尼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说，“别开玩笑，我们两个人都是诚实的人，不是么？”

拉比尼说：“妙极了，他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起去吃午饭，还继续谈话。我告诉他安妮塔认为妇女对公民投票起了决定性作用。拉比尼皱了皱眉头说，“决定性……我可不这么看。可以说是起了重要作用，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怎么不是决定性的？”我向他挑战。“特别是在南方，妇女的投票结果使每个人都感到意外。难道这不是一种独特的贡献？难道不是对胜利在质的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沉思地呷着酒，歪斜着脑袋，最后肯定地点了点头说：“嗯，

^① 卡洛·罗赛利是意大利一位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者。他建立了以社会主义为方针的运动“正义与自由”，并主编了同名刊物，用天真的办法走私到意大利，如用缩印版印在薄纸上，装在大沙丁鱼罐头里运进去。该运动组织了国际纵队中的加里巴尔蒂营。墨索里尼对他十分恼火。1937年夏末他同他兄弟内洛在法国被墨索里尼的特务暗杀。

也许……我从来没有从这方面去想过。是的，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但要比帕斯夸莱同志看得更深一层。是的，妇女是在起变化，但问题是整个社会都在起变化。公民投票象是黑暗中的一次闪光，它突然照出我们整个社会面貌起了多么大的变化。”

拉比尼表情丰富的脸上流露出热切的情绪：“确实，变化最大的是妇女，而她们反过来又加速了整个形势的变化。可以说她们在公民投票中起了先锋作用。但意共的重要性不能忽视。要不是意共的声誉，要不是它已经树立起正直和关心群众的形象，反共势力是会取得胜利的。此外，各工会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你应该研究一下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工会战斗力增强的情况以及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当然也要看到美国的贡献。”

他看到我吃惊的神情就笑了起来。“当然，我是指美国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各方面的影响。例如越南战争。实际上谁都讨厌这场战争，讨厌凝固汽油弹的暴行，讨厌难以置信的滥肆轰炸。一个大国欺负弱小的农业国。教皇出来讲了话，反对战争，教会对战争很反感。基督和平队派了两个代表团去越南，一个到北方，一个到南方。1973年9月在都灵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代表大会。^①你应该读一读会议的发言，特别是拉涅罗·拉瓦莱的发言。代表大会成了大新闻。佩莱格里诺红衣主教致了欢迎词。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记者喜欢他，他是写文章的好题材。”

我们一起喝着咖啡，拉比尼继续说：“越南战争对天民党不利，很不利。天民党存心要同美国站在一起。它二十年来一直强调同华盛顿的亲密关系。美国贷款一来，总是到天民党的手里；美国的援助食品一到，功劳也归在天民党头上。美国的装备、美国的电影、摇摆音乐等等，凡是意大利人喜欢的东西一到，天民党也会因

^① 《新社会》31期（1973年11月15日）。

美国得人心而沾光。越南战争以来，情况倒过来了。现在天民党要分担人民对美国的仇视。人们对美国的幻想已经大为破灭了。人们举行了成千上万次集会支持越南。我深信对越南战争的仇恨是公民投票得出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实质上说，这是投票反对天民党对美国叩头。”

“但越南战争只是美国影响我国政治的最明显的例子。而对整个意大利社会影响更为深刻的事实，是意大利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我们抄袭了你们美国的做法。我们搞了汽车大王。我们把我们的经济叫做‘美国模式的经济’，我们进口了你们的消费主义。你们的电影表明人们能如何舒适地生活，于是我们也试图模仿，过同样的生活。你们破坏了我们老的价值观念，使我们的社会世俗化，使组织小家庭和喝威士忌酒成为时尚，使妇女自由变成一种自然和正当的事。你们美国的影响经常在向教会挑战，譬如在婚姻和性关系问题上。我们的青年喜欢你们的家庭生活方式，你们人与人之间自由自在的关系，这是一股不尊重权威的潜流。请你相信我，美国最好的方面都反映在这次投票中；而不怎么好的方面，如你们的消费主义也反映在这次投票中。我们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模仿你们的习俗和态度。美国的一切都是时髦的！既然离婚是美国的伟大习俗，那么意大利怎么能反对离婚呢？”

他一边说一边笑，一半是逗我，但更主要的还是他作为职业社会学家发表意见。

“听我的话，卡洛，去同教会里那些神父和主教们谈谈，他们会同你谈世俗化问题。去同共产党人谈谈，他们会同你谈民主问题。更主要的是去同工会谈谈，了解一下他们在1948年是怎么分裂的，1972年又是怎么走到一起来，恰好赶上了公民投票。尽管妇女值得尊重，但如果工会不动员起来，反对废除离婚法的票是不会取得压倒多数的。”

我确实照他的话做了。我到都灵去找五金工人，他们是汽车工人和钢铁工人的综合体。当然，都灵既是菲亚特公司的老家，也是它的现代化堡垒。

第七章

菲亚特的艰苦岁月

11月中旬的一个阴冷下午，我站在一家店铺门前，落满灰尘的橱窗贴着上次大选的标语。这就是都灵城边米拉菲奥里地区的意共党部会址。

米拉菲奥里综合企业是菲亚特帝国的中心，而在都灵，菲亚特就是上帝。离这里不远，是一座有二十多层的难看的长方型灰色大楼，这就是企业的行政大楼。它阴森森地树竖在那里，带着封建领主的气势，在周围低矮的建筑物中间高高耸立。大楼顶上矗着FIAT(菲亚特)四个大字。“菲亚特高级轿车”的广告在夜晚闪闪发亮。远处是锯齿形屋顶的工厂，一片连着一片，鳞次栉比。每天有六万劳动大军到这里工作。占意大利全国菲亚特工人的三分之一。

这一片地区看起来好象是还未竣工的工地，星星点点地留着一些空地，有一处正在盖一幢高耸的住宅楼，有一片很大的娱乐场，一片独门独户的住宅和两层的公寓房。整个地区的建筑不象意大利的风格，倒更象洛杉矶的近郊。我心不在焉地左右顾盼，心中想着红色旅愈来愈猖獗的活动。前两天，《新闻报》的副主编卡洛·卡萨莱尼奥被四名恐怖分子开枪打中脸部。^①好久以来，红色

^① 1977年11月17日《晚邮报》。

旅经常出来抓人或开枪打人的腿，用意大利人的话来说，就是绑架或打断膝盖。我不禁打了一阵寒颤。我没有穿外衣，我的思想同气候一样冷。有一个人走了过来。

“您是马扎尼吗？”

“是我”。

“我叫里乔，是这里的书记，很高兴见到你。”这个人约莫五十岁左右，身体粗壮，一头蓬乱的红头发，表情严肃，目光友好。他穿着一件红方格衬衫和一件尼龙的风衣，打扮得象加拿大的伐木工。

“好冷的风，”他打开门说。门里面跟美国布朗克斯——或者同芝加哥、孟买、香港——的所有党部一样，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充分表现出“男性”的卫生习惯，让灰尘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墙上挂着最近发展党员的图表，标题的字一笔不苟，写着翻沙、车身、装配、维修等字样。图表标出去年的数字、今年的目标和现在的数字。过道的架子上堆着一些麦克风和扩音器。一座盘梯通到漆黑的地下室。

里乔开朗地说，“请别拘束。刚才大区党委来电话谈到你，说有一位美国的教授同志要来这里……”

“我知道，”我说，“他打电话时我在场。”

大区书记挂完电话对我说：“你运气真好。明天三点钟在米拉菲奥里党部开大会，我可以肯定他们将讨论为抗议卡萨莱尼奥遭暗杀而进行罢工的问题。这样的会现在很难得开，我们没有建立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因为太分散了。我们的同志一般分别在各自的工会大厅里开会，但我们有时也把他們召集在一起开开会，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他笑了笑说，“有些在工会中的同志容易忘记这一点。好吧，我该办事去了，我要去帮忙组织明晚的大会。请你一定来，在圣卡洛广场。”

近三十年来，意大利工会运动的历史相当复杂。它现在“统一”起来了，成立了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工会在内的工会联合会。它并不象劳联—产联那样把所有的工会合并在一起，而是一个真正具有联盟性质的组织，由三大工会领导人共同组成领导机构，每个工会都同一个或几个政党有密切联系。这三大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意大利总工会，天民党领导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由共和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共同领导的意大利劳工联盟。虽然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是一种政治性的结合，但参加各基层工会的工人则来自各党派。参加联合会的有产业工会和行业工会，如矿工、木工、纺织、汽车等工会，同我们的劳联—产联差不多。在意大利，这种工会被称为工种工会。

1944年天民党、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下的各工会的领导人，决定统一劳工运动。鉴于过去的分裂为法西斯上台帮了忙，他们组成了意大利总工会。在协商过程中，最大的分歧是工会内部究竟应实行民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共产党竭力主张尽量扩大民主。他们的对手真心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机构，工会组织员由上级任命，领导机构成员由现有领导人选举产生，尤其是要实行工会工厂制和在发工资时扣除工会会费的做法。

共产党领导人朱塞佩·迪维托里奥争辩说，反法西斯的工人讨厌受严格管制，他们应当有决定是否参加工会的自由，各自缴纳会费和自下而上地选举各级工会代表，^①当时有95%的工会会员参加了意大利总工会。梵蒂冈为了对抗而组织了天主教劳动人民

^① 卢恰诺·拉马：《迪维托里奥》，第68—72页。朱塞佩·迪维托里奥从意大利总工会组织时起就任书记。他生于切里尼奥拉·阿普利亚一个不识字的短工家里，八岁开始下田干活，十四岁起在切里尼奥拉组织第一个社会主义团体。1921年当选为社会主义议员。1924年带着他所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团体参

联盟。

1948年冷战全面展开,天主教的一派从总工会分裂出来,与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天民党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劳联勾结在一起。^②他们的借口是共产党一手操纵了1948年7月为抗议陶里亚蒂遭枪击而举行的总罢工。事实上,这次罢工是自发的,共产党领导人则采取行动加以遏制。新成立的亲天民党工会就是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③而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则变成了一种社会和体育性质的组织。分裂时,总工会会员占工人总数的79%,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占21%。翌年,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组织了意大利劳工联盟。此后十年,由于政府和菲亚特资方的镇压,总工会会员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21%,其余工人参加天主教工会和独立工会者大约各占半数。^④到了六十年代,工人战斗性加强了,比例也改变了,独立工会人数下降,总工会人数增加。今天,总工会又成为意大利力量最雄厚的工会,拥有四百五十万会员。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则有二百五十万会员。劳工联盟有一百万会员。独立工会有几十万会员。^⑤

加了意大利共产党,战时他被墨索里尼关在狱中。迪维托里奥是个全力以赴的积极分子,在工会组织内和在党内都十分得人心。最近出版了一些有关他的重要著作,有:阿尼塔·迪维托里奥所著《我同迪维托里奥的生活》;卢恰诺·拉马所著《迪维托里奥的意大利总工会1944—1957:迪维托里奥的著作和演讲》;达维德·拉约洛所著《革命的人道主义面目》;特别是米凯莱·皮斯蒂洛所著《朱塞佩·迪维托里奥》。

② 朱塞皮·帕西尼:《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的背景》,第137页。

③ 拉马:《迪维托里奥》,第78页。开始时天主教工会名称叫意大利劳动人民自由总联合会,后来改称意大利自由工会联合会,后来又把“自由”两字改为“劳动人民”。因此,它在参加三大工会联合会时已不带“自由”两字。

④ 意大利总工会新闻和研究负责人L.比尼亚米给作者的信。

⑤ 同上。1978年5月2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以下数字:意大利总工会,430万会员;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280万会员;意大利劳工联盟,110万会员。

1972年三大工会再次统一组成工会联合会。^①有三个主要因素促成统一：资方的无情剥削；工人战斗性的迅速增强；共产党领导人要求给工会在同政党的关系上更多的民主和更大的自治权。

正当我在总部东张西望时，工人们开始集合起来，互相打招呼，聊天，开玩笑。有一个衣着整洁、戴着钢框眼镜的瘦瘦的白发老人在同里乔谈话。这个人活象哈里·杜鲁门，只是比杜鲁门小一号。里乔招呼我过去，介绍说：“这是马扎尼同志，从美国来的一位教授。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们党的书。”他又转向我说：“祖科蒂同志过去一直是菲亚特的工程师，他是1952年被解雇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当时他在菲亚特已经工作了二十二年。”他笑了笑说，“你想不到他已经是七十四岁了吧，他是我们党成立时期的党员。”他的声音中带着骄傲和亲切的感情。

我们握了握手，祖科蒂彬彬有礼，带着不即不离的神情。里乔提高嗓门喊道：“有谁把灯开开，让我们开始吧！”下面的灯突然照亮了盘梯，工人们开始下楼。梯子弯度大，台阶窄，我们下去时都小心翼翼，块头大的人挤得够呛。我们最后下到一间有40英尺宽60英尺长的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房间里点着日光灯，顶端放着一张桌子，还有八十多把折叠椅。里乔和祖科蒂坐在桌旁，里乔让我坐在他旁边。我把椅子移到边上，这样我既能看得见祖科蒂，也能看到与会群众。

晚到的人陆陆续续地进来，房间很快就挤满了，已是座无虚席，有少数人坐在盘梯下面几层台阶上，有十来个人靠墙站着。已经三点钟了，工人们都是下了早班直接来的。使我奇怪的是没有

^① 卢恰诺·拉马：《意大利危机中的工会》，第37页。这本书是根据他1973年7月23日在《团结报》上发表的公告联合会成立的文章重新印刷的。

女的。

大多数工人都是二十七、八到三十来岁，稀稀拉拉地坐着一些老工人。到会的工人什么模样都有，有粗壮的，也有瘦小的，有机灵的，也有迟钝的，有不修边幅的，也有衣冠楚楚的，有健谈的，也有沉默寡言的，有一本正经的，也有嘻皮笑脸的，有沉思的，也有活泼的。有些已是菲亚特的第四代工人，也有些前几年才从卡拉布里亚山区和西西里平原来到这里。从他们的口音可以辨别出他们是哪个省的人，有的是皮德蒙特人，说话减少音节。有的是罗马人，子音特别重。有的是南方人，咬字不清。还有另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味，一种遍及世界各地的典型气味，那就是党的严肃认真气味。里乔敲了敲桌子，大家马上安静下来。

里乔介绍我是来自美国的一位信得过的同志，大家发言时不必有顾虑。他接着说，这次会议原来是要讨论房租管理法，但首先得讨论当前发生的问题。他让祖科蒂讲话。祖科蒂整理了一下讲稿，把它放在一边，胳膊撑在桌子上，用手托着下巴。他平静地讲着，眼睛扫视听众。

“两天前约摸就在这个时候，卡萨莱里奥被人开枪打中头部，现正在医院抢救，生死未卜。昨天晚上各政党和工会发起在圣卡洛广场举行示威，作为对恐怖分子的答复。示威集会由我们共产党自己选任的市长诺韦利同志主持。广场可以容纳五万人，而参加的人数最多不到一万五千人。我认为这件事很丢人。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参加了？”

中间有一个人举了手。祖科蒂点点头说，“不错，汉尼巴尔。你们有多少人动员别人去了？”

靠墙的一边有个年纪较大的工人举了手。

“大概你有朋友住在广场附近吧！”祖科蒂挖苦地说。有一两个人窃笑了几声，大厅十分安静，他们已嗅到要挨训的味道。

“不是的，”那个人委婉地答到，“是我女儿和她的未婚夫。”

“至少你将会有个好女婿”，祖科蒂回敬说。然后他仍然用交谈的语气说：“工会联合会号召工人今天早上举行一小时罢工。这只是停一下工，但只有五百人左右参加。六万人当中只有五百人参加。五金工人理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的语气已没有挖苦的味道了。“米拉菲奥里是钢铁和汽车工业的中心。然而，罢工却成了个哑弹。这叫我们怎么解释？你们说说吧！”

五金工人有三个工种工会，分属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在所有的工人中，五金工人组织程度最高，最有战斗力和政治觉悟，是控制经济的一支巨大力量。菲亚特工人是五金工人的中心，而米拉菲奥里又是菲亚特劳动者的核心。作为菲亚特的摇篮，米拉菲奥里是意大利工人斗争历史最悠久的地方，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1900年这里只有五十个工人生产二十四辆汽车，而1973年这里有十六万工人生产一百五十万辆汽车。^①

如果说五万六千名米拉菲奥里职工是五金工人的精华，那么其中参加共产党的工会会员则是精华中之精华，是一支团结一致的，发展中的力量。聚集在这个大厅里的意共工会会员的领导人，分属三个工会。他们是米拉菲奥里综合企业的大脑，包括主要的车间代表、申诉委员会主席和工厂委员会的头头。这个大厅里凝集着力量：智慧、组织和纪律的力量。

祖科蒂沉默了一会儿又提高嗓门说：“大家说话呀，讲一讲

^① 埃米利奥·普尼奥和塞尔焦·加拉维尼：《菲亚特的艰苦岁月》，附件第320页。
埃米利奥·普尼奥五十年代在菲亚特当工人。他现在是意大利共产党议员。

为什么罢工会失败，还有昨天大会的问题。你们都是有思想的嘛！”

参加了大会的工人汉尼巴尔开始发言，他年纪较大，带北方口音。“我参加大会了。会是开得不好，我同意。但是我看看周围既没有天民党的人，也没有卡萨莱尼奥的朋友，如医生、律师之类。几乎都是青年人，大多数是我们的人。还有许多同志不是米里菲奥里去的，而是镇上去的。当时不是说举行全市性的示威吗？为什么只有我们共产党人参加。他们自己的人受了伤都不在乎，又关我们什么事呢？”

会场各处有些人点头，有几个人举起手要求发言。里乔点了坐在后面脸黑乎乎、神情热切的青年，他没有站起来，但说话声音很响。

“汉尼巴尔说得完全对。大门口有些记者象兀鹰一样，缠住我们问为什么不罢工。我的伙伴，一个顶不错的天主教工会的积极分子对一个记者说，‘喂，记者先生，明天他们要是开枪打我，你们会为我罢工吗？’^①还有，我们都知道，我们这里的老板阿涅利也是《新闻报》的老板，我们可了解他了，他是狗屎堆！要是他的人遭到……”

“嗨！等一等。……”旁边有人抗议。可是发言人没理睬他。“好吧，好吧，我知道卡萨莱尼奥是抵抗时期的英雄，是真正的民主派。但他照样反对我们。难道他不是替阿涅利办报？他还不是拿阿涅利的钱？我们累死累活，该死的会又这么多，我怎么能让工人放弃休息时间去为老板的狗腿子斗争？”

不等里乔说话，汉尼巴尔又插进来说：“是呀！那天我听《新闻报》的主编莱维在讲，他怎么怎么为民主国家斗争，又说什么尽管

^① 1977年11月19日《新闻报》。

他是个犹太人也没有受到歧视。鬼话！你要是为阿涅利效劳，又有谁会歧视你，就算你是土耳其人也不会受歧视。什么卡萨莱尼奥是国家的公仆呀，什么他如何正派呀，等等，全是胡扯。谁的国家？阿涅利的国家？莱维有时也多少给人扣过红帽子。”有些人在下面开始低声说话，他挥了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说：“他是干过的，只是不那么张扬就是了。他说过，为什么会有恐怖主义呢，那是因为老的价值观念遭到了破坏，那是因为上街打架等等。他指的是我们，指的是我们的斗争、我们的罢工要我们负责。不是因为他们解雇工人，抬高物价，不是因为他们贪污盗窃！”他的语调带有奚落的味道。“把莱维给你们好了，还可以加上卡萨莱尼奥。”他表示不赞成地摆摆手说：“当然，他遭到枪击使我感到难过。我希望他能保住命。”

我听到这些发言感到很惊讶。那天晚上我参加了示威，广场看来半满，这个能容纳五万人的圣卡洛广场至少有二万人参加。发出通知不过二十四小时，有这么多人参加不算少了。广场上搭了一座讲坛。从上面的阳台挂下来一幅巨大的标语，用艺术体写的蓝底黄字（这是都灵市的颜色）：“都灵反对恐怖活动”。另外有一些横幅挂在广场中央骑马的人像上，上面写着：“不妥协”“不害怕”“打倒胆小鬼”，字迹不象出于专家之手。讲台上飘着皮德蒙特各个村镇的旗帜，都是些象早年英国工会会旗那样的老式旗帜，在红色或蓝色的底子上绣着金字，边上还镶着流苏和飘带。旗竿由各镇穿制服的警察举着。广场远处停着警车，车门上刷着各镇的名称。为举行这次集会，全市都贴满了油印的海报，还要把演讲人集合在一起，又要装上扩音设备等等。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完成这么多组织工作，在我看来是难以置信的。^①

^① 1977年11月19日《新闻报》。

此外，我当时认为阿里戈·莱维的演讲是好的。红色旅宣布说他们“处决了一个国家的奴仆”，莱维借题发挥说，卡萨莱尼奥的专栏就叫《我们的国家》。莱维强调说，这是指在抵抗运动中诞生的民主国家，是一个人民的国家，应该保护这样的国家，反对反动派，清除给恐怖主义分子帮忙的贪污腐化。我当时认为这些想法是无可指摘的。

关于莱维说自己是犹太人的事，那只是顺便提到的。莱维谈到卡萨莱尼奥打算辞职(他已经有七十岁了)，莱维又如何劝他继续工作下去。莱维讲到这里时，难过得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对不起。卡萨莱尼奥如果活着，他不会在大庭广众之前这么动感情。他是皮德蒙特人，而我是艾米利亚人，我是个犹太人，所以不可能象他那样控制自己的感情。”他随后讲了一两句关于对犹太人不加歧视的话。当时我认为讲话十分动人，然而，在这个大厅里我看到的反应是愤怒。他们多么憎恨菲亚特！

里乔指了指离我只两个座位的人说，“你，胖子”。这是个圆墩墩的家伙，一张凹脸，直头发，脖子上系着领带。这间屋里很少人带领带。他很年轻，态度十分认真，在那里记笔记。

“好吧，我说。同志们，我想我们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害怕。理由很充分，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在第十二维修组，今天早晨人人都罢工了，包括监工在内。一小时之后，在男厕所出现了一张手写的传单。”他掏出传单念了起来：“‘第十二维修组的早班是一窝同菲亚特勾结的共产党人。向你们提出警告，红色旅在监视你们。’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来找我，说，‘你瞧，我们都有老婆和孩子。我们是在冒风险。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大家看看该怎么办？要是我们不再斗争，那等于让黑手党打进车间里’。我认为我的话没错。但是，请相信我，这些人不会再参加罢工了。”

祖科蒂斜过身去同里乔低声说了几句话。里乔下了决心说：“再讲一个，你，阿马德奥。”

阿马德奥坐在后面，他站起身来发言。他个子瘦长，有一双粗大有力的手。他接过了前几个人的话头。他一开口就马上使人感到是位参加过许多党内斗争的老手，讲起话来字斟句酌，时间掌握得很好。

“同志们，工人当然害怕。你、我都看到这一点。但究竟为什么？这就需要研究！他们真是害怕恐怖主义分子么？但他们过去并不怕被开除，不怕工作上受歧视。他们过去并不怕被捕和坐牢，不怕警察和公司里雇佣的打手。他们在摩托化快速部队、在谢尔巴^①装甲车、机关枪和催泪弹面前临危不惧，难道还会怕偶尔出现的恐怖主义分子？”

他伸出一只刚强的手，渐渐地攥紧成一个拳头。“菲亚特工人是人，不是脓包。他们有胆量，渡过了菲亚特的艰苦岁月，击败了资方。他们不是怕，是感到困惑。他们不会确切表达自己的心情，就用了个怕字。实际上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对胖子说，‘你有什么办法’？这里的‘你’不是指胖子，是指党。是指党该怎么办？我告诉同志们，这句问话的后面是政治上的批评。”

他停顿了一下。身材修长、神情严肃的他吸引住了他的工友和听众。“同志们，我们应该注意呀！工人们说，党变得软弱起来，过去那股闯劲没有了。我们跟其他党一样，光是靠讨价还价，靠玩弄手腕。我们逃避斗争，却在‘非不信任’票这样的文字游戏上，同天民党搞幕后交易。我们让天民党执政一年，最后迫使他们达成什么六党公约之类的协议，结果怎么样呢？天民党政府许的愿一

^① 谢尔巴是天民党反动头子，五十年代初任总理时曾残酷镇压工人运动。——译者

个也没有兑现。我们的支持换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生活费用上涨，失业增加，税收加多，汽车票和火车票都涨了价，煤气费、电费也上涨了，只有一样东西下降了，那就是我们的士气。政府在取消对房租的限制，而老板们却在削减我们的实际工资，在篡改物价指数，使工资不能按期得到应有的调整。小伙子们感到失望，又回到教会和天民党那里去了。菲亚特的工人不是害怕，而是迷失方向，他们是被我们弄得迷失方向的！”

阿马德奥挺了挺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全身是一副挑战的架式，就象洛德把他的论文钉在教堂门上那副神情。“同志们，我们是迷失了方向。我们的策略没有成功。敌人在笑话我们。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政治路线。我并不是指革命，没有这么笨。我是说应该有一条进攻的路线。我们应该对政府说：你们应该按法律办事，不得破坏协议，要不我们就上街，停止生产。我们也得让他们多少有点害怕上帝。应该让他们惊慌，而不是我们自己惊慌。我们应该大胆地把这一点讲清楚，让我们党在罗马的领导人听到我们的意见。他们都是好同志，他们知道我们是站在第一线。但是我们应该真正大声疾呼，让他们能够隔着议会的墙壁听到我们的呼声。”

阿马德奥坐了下来。他发言时并没有声嘶力竭的喊叫，只是十分在行地有时稍稍提高一点嗓门，然而他奔放的热情却在我脑海中荡漾，他的信念有雷霆万钧之力。他发言时，不时有人点头。虽然不是每个人也不是对每句话都这样。但显然他讲出了许多在座者想说的话。

我的思想围绕着这次会议的含义在翻腾。与会者并不是那些在安安静静的房间里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也不是整天呆在办公室里的职员。他们是阶级斗争中的指挥官，驾驶着坦克的指挥员。这是共产党的英豪们在讨论党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同

天民党的历史性妥协。

一个月前，在我下榻的那家罗马旅馆内顾客稀少的酒巴间里，我同比意共更左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继续斗争派领导人莉莎·福阿交谈。她五十岁左右，瘦削的身体裹在朴素的黑衣服里。她坐得笔直，双手安静地叠在膝头，活象惠斯勒^①画中的《罗马的母亲》。

她用平淡的调子说话。“共产党背叛了工人，工人正在脱离共产党。‘历史性妥协’是一种背叛。意共已经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它依附于天民党，毫不抗议地接受警察国家。我并不是夸大其词。政府现在推行的是法西斯时期制订的警察治安法，使用的是墨索里尼批准的方法和程序。工人们不再信任意共。意共已经把自己出卖给阿涅利和工业家联合会。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通敌的党，一个象英国工党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阿马德奥发言时，我想起了莉莎·福阿。象他这样有才干的人不会凭感情说话。如果车间的工人没有感到不耐烦，那么他的话不会引起共鸣。我看了看矮小的祖科蒂。这个可怜的人对阿马德奥内心的信念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祖科蒂是那么衰老虚弱，这位年已七十四岁的老人怎么能辩得赢呢？他从成年以后一直永无休止地遭受打击。

祖科蒂开始发言了，语调缓慢却很有力。

“同志们，事情很清楚，我们表现不好，并不是由于害怕，也不是由于卡萨莱尼奥的政治立场。都不是。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热情。不管怎么说，胖子那个组里的人全都参加罢工了，我们在座各位谁也不会认为胖子的组织能力比自己高明。显然，大家对党的

^① 惠斯勒系美国画家及蚀刻家(1834—1903)。——译者

路线有怀疑，这是个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

祖科蒂擦了擦眼镜，两臂交叉，放在桌上接着说：“阿马德奥刚才说，菲亚特工人什么都不怕，他说得对。菲亚特工人1943年领导了都灵第一次反法西斯的罢工。你们当中有几个人参加了这次罢工，我也参加了。当时我已经是四十岁的老人了。我们周围还有不少当时的工人。既然那个时候他们不怕希特勒，不怕墨索里尼，他们决不会叫几个恐怖分子吓破了胆。不会的。阿马德奥说得对，他了解菲亚特的工人。顺便提一句，你们当中有一些青年可能不知道，阿马德奥十几岁就参加了抵抗运动，他是1947年进菲亚特的。当时你多大了？”

“十九岁”，阿马德奥回答，“我先参加了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后来参加了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

“是这样。你是1952年入党的。我还记得，我是在被解雇之后参加纠察队时认识你的。他的入党是保密的，我们不让他参加任何活动。当时这样做可不容易呀，阿马德奥一向就是个急性子。”祖科蒂友好地对他笑了笑，阿马德奥也咧开嘴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菲亚特当时因为没有他参加纠察队而有多大遗憾。当时我们知道要镇压了，所以尽量让还没有暴露的同志荫蔽起来。阿马德奥在米拉菲奥利一直干了三十年。他了解工人，工人也了解他。”

祖科蒂停了一下，开始回答阿马德奥的挑战。

“当然，这并不是说阿马德奥的意见是对的。阿马德奥讲到五十年代菲亚特的艰苦岁月。那些日子真不好过呀！年复一年，不断为征集签名进行战斗。谁要是签名竞选总工会的工会委员会委员，肯定会被解雇。被解雇后马上就上了黑名单，哪个公司都不会雇你。我们几千名同志移居国外，有的当临时工，今天在这里挣几个钱，明天又到那里挣几个钱。有些人在压力底下屈服了。我

记得被轧钢厂开除的保塔索同志。他不愿签名，他妻子也反对他签名，他家里有五个孩子。他知道自己会被开除，但是党要他这么做，实际上强迫他这么做，这我是知道的。我就是总工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当时是冷酷无情的。于是他签了名，后来就被工厂开除了。从此他就今天在这里干活，明天又被开除，周而复始。几个星期后，我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马戏团撤离后去打扫广场上的粪便。他干了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们只给了他五百个里拉。才五百个里拉！他找我诉苦说：“我们确实应该干下去，不能屈服，不能向任何人投降，甚至不能向家里人投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得自己有力气才行。”半个小时后，他就投河自杀了。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是他要他签名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①

祖科蒂象学校老师教书那么平静，似乎自杀、移居国外、饥饿、家庭仇恨都不算一回事。“那些年头真是灾难深重。1952年工会委员会里有70%是我们的人，总共达103人。但是八年后，只剩了30人。为了这30个人，我们得征集300个签名，一半是当候选人，一半是当监票人。^②选不上的马上被开除。谁在征集签名时被抓也要被开除。每次为争取一个同志当委员，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二、三十个同志被赶上大街。当时我们损失惨重，但始终没有被人踢出去。我们在委员会里的人从来没有少于30个。我们还有些象阿马德奥那样的“潜伏者”，告密者不认识他们，他们一直不出头露面，直到工人运动再次兴起。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又要讲这些你们这里好多年轻人不知道的老话呢？是我这个老头儿在缅怀往事么？不，同志们，不是的。”

他平静的声音突然变得刺耳起来，身体向前靠，每句话都象利

① 普尼奥和加拉维尼：《菲亚特的艰苦岁月》，第74页。这个故事是祖科蒂讲给普尼奥听的，书中许多其他内容也是这个来源。

② 同上，第17页。

剑似的触动听众的心。“不是的，同志们，这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党作出了政治决定，那就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管要忍受多大的痛苦，我们仍然要保住自己在工厂里的阵地。日子是不好过的。每个党的干部毫无例外都必须签名，尽管他知道其结果是被人赶到大街上。为了在四万工人中征集到三百个签名，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四个月。四个月啊！在1962年以前，我们只能找到几百个工人担任纠察队。^①但是我们仍然号召罢工，仍然设纠察线，仍然征集签名，这是用血汗和痛苦换来的。为什么？因为党的政治路线要求我们这么做。党的政治路线是头等大事。我们内部在路线问题上斗争也很激烈。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下午的会就象是闹着玩儿似的。我们内部也有分裂，也有斗争。许多同志认为我们不必参加竞选，应该钻到天主教工会内作工作，等风暴自然平息。这是一种识时务的工联主义的做法，但它是狭隘的做法。这样做风暴不仅不会平息，还会更加厉害。当时菲亚特工人的唯一希望就是依靠工人的团结一致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取得政治解决。我们要为团结一致的路线而斗争，党就要站在那里，让大家看得见，要敢于说话，选择恰当的问题，指出同资方合作的代价。当然组织工作是重要的，这是潜伏下来的人的任务。两种活动都不可少，否则我们不可能胜利，而我们确实取得了胜利。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要不是那条路线，我们在六十年代工人运动高涨时就会束手无策。”

祖科蒂变了样子。尽管他的姿势仍然是克制的，但是他的声音却变得引人入胜、响亮而坚定，句句话斩钉截铁。

“要是没有我们的存在，没有我们的领导，高涨的形势就会烟消云散。南方兄弟们的愤怒只会零零星星地在自发的爆炸中消耗

^① 普尼奥和加拉维尼：《菲亚特的艰苦岁月》，第8页。

掉,虽然激烈,但没有效果。而现在,这一切已导致在地方契约问题上的合作和团结一致,这个团结一致的策略,促使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劳工联盟的积极分子对本组织的领导施加压力。最后导致整个六十年代工会行业的集体谈判,然后就是全国性的合作,一直到1972年成立三大总工会的联合。这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从共产党为1972年成立统一工会联合会而坚持斗争二十五年的历史事实,对于了解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帮助。意共在工会内部的战略和它对天主教教会的战略是今天共产党所以成功的基础,也是为欧洲共产主义开路的榜样。这是有许多因素促成的。五十年代后期发生了工艺革命,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如汽车,钢铁,化工等,都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机器,以及更为复杂的生产方式。举例来说,菲亚特在机器、厂房和科研方面的投资象天文数字般地增加,从1951年的900亿里拉上升到1966年的9,270亿里拉,达十倍之多!^①就是拿美国的标准来说,这个数目也是惊人的。由于当时天主教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劳工联盟同资方合作,因此尽管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有了巨大增加,但工资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工作条件则明显恶化,工作过程分得更细,劳动纪律更加严格,监视加紧,更主要的是提高劳动强度。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的讽刺同意大利当时的现实相差无几。

与此同时,劳动力两三倍地增加。仍以菲亚特为例,工人从1962年的七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十四万人,增加了一倍,到1973年又增加到二十万人,等于1952年的三倍。^②大多数工人都来自南

① 普尼奥和加拉维尼:《菲亚特的艰苦岁月》,第250页。

② 同上,第230页。

方,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巨。农村的劳动尽管是艰苦的,工作时间长,一年到头永无间歇,劳累之极,但工种却是多样化的,有其自然的节奏和传统的速度。农村生活对人起保护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情味,给人们留下说闲话和喝杯酒的时间。南方人来到北方,最初感到晕头转向,十分恐惧,但很快就产生怨恨和起来反抗。1960年曾拍摄过一部电影,片名叫《罗科和他的兄弟们》。观众从电影中可以直接体会这些工人所受的创伤。电影拍出他们在贫民窟的凄惨生活,他们的异化和绝望,他们的暴力和反抗。

在这个时期,农民离乡背井的数目大得惊人,有约五百万人从南方移居北方,或到国外做工。当时的权势集团并不在乎,因为当时工业可以得到它需要的大量无知的、驯服的和十分、十分廉价的劳动力。

这些人最初是驯服的,但很快就开始反抗。他们一般脾气暴躁,易于动怒和采取行动,而且天不怕地不怕。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他们的斗争性,加上生产中的“赶快制度”和工头的蔑视,造成了爆炸性的局面。共产党是引起燎原的星星之火。老工人从新来者那里得到勇气。新来者从老工人那里了解到历史,学到知识和组织才能。在所有的共产党小组中,那些“潜伏者”在底下做组织工作,工会委员则代表党出头露面进行领导和宣传。野猫罢工开始增多,天主教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劳工联盟的工人增强了战斗性,举行了声援性罢工,并对他们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厂委员会活跃起来并走向统一。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会员直线上升,而其他两个工会的会员则急剧下降。同时,在谈判劳资合同时,工人愈来愈多地采取统一行动。由工会出面领导的罢工次数增多。1968年举行了五天总罢工,1969年举行了六天总罢工和二十多天的部门罢工(加起来总共200个小时),1970

年罢工第一次有了政治内容，工人举行了六天总罢工支持议会中正在讨论的改革措施。^①

1972年三大工会统一，这恰好就是在离婚问题上进行公民投票的时候。为了照顾那些最落后的成员，工会联合会和三大工会都没有正式表态，但无数的工会领导人作为个人出来支持离婚法。大多数的工会会员在前十年中彻底政治化了，热情地投入运动。因此可以说，妇联为公民投票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力量，并使胜利达到顶峰，而工会则为胜利提供了群众基础。^②

这些年的历史当然是聚集在这个大厅里的工会会员所熟知的。祖科蒂提醒他们注意工会联合会的重要性。

“同志们，要是没有组成统一的工会联合会，那么我们在公民投票中不会达成政治上的协议，成千上万的地方工会不可能有钱有人来举行集会、辩论会、示威和发传单，不可能把工厂委员会号召投反对票的公报散发到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千百万人手里。工会的统一是公民投票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统一的工会联合会是党在艰苦岁月里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结果。”

祖科蒂的语气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命令式的口气减少了，论证的口气增加了，有时几乎有点象是在哄孩子。

“党现在为整个意大利制订了一条政治路线，它象二十五年前在劳资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一样高瞻远瞩。这条路线就是‘历史性妥协’，就是天主教徒、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一起合作来拯救国家。

① 比尼亚米给作者的信。还可参见马里萨·马尔法蒂和里卡尔多·托尔托拉：《团结的道路 1943—1969》。

② 卢恰诺·拉马：《意大利危机中的工会》，第 288 页。这一集是重新印刷他在 1974 年 4 月 5 日第 14 期《再生》杂志上关于谈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立场的文章《工人运动和公民权利：离婚并不只是中产阶级的看法》。

卡萨莱尼奥接受了这条路线。”

“除了这一政策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当反对派？阻碍通过法案？天民党的右翼恰恰希望我们这么做。继续斗争派和自治派里那些犯左倾幼稚病的人也希望我们这么做。连宣言派都不要我们这么做，当然，阿马德奥也不要我们这么做。因此引起争论的并不是党的战略，而只是党的策略。阿马德奥说我们太软了，认为我们支持了别人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认为他讲的这两点都不对。第一，我们应该硬到什么程度？天民党右翼不愿同我们在一起，他们愿意我们当反对派，我们的条件要是太强硬，自由派和中间派都会跑到右派那里去。当然，扎卡尼尼和安德雷奥蒂^①是在搞政治讹诈。他们说，如果你们要价太高，我们在天民党内部就会打败仗。自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比原来可能允许的更迁就一些。第二，阿马德奥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不是事实。阿马德奥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过于夸张，但他从来就容易有点头脑发热。事实真相是，以菲亚特工人为先锋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在经济萧条时期，在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并没有受到多大挫折。我们的工人阶级受到的损失，小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②

为了制造气氛，他有意停顿了一下，用拳头敲了敲桌子，重复了一遍，“小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我们使老板们陷于困境，他们在那里狂叫！你们可以读读阿涅利和卡利^③的讲话！工资按生活费用定期调整的条款还在起作用！大工业不准随便解雇工人！大部分的失业者是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谁也不想把问题

① 当时扎卡尼尼是意大利天民党书记，安德雷奥蒂是意大利政府总理。——译者

② 我后来核实过这个声明，在米凯莱·萨尔瓦蒂所著《意大利的经济制度》第93页得到证实。萨尔瓦蒂的数字来自全国经济研究所。

③ 阿涅利为菲亚特的董事长，卡利为工业家联合会主席。——译者

缩小,尤其是我们党更不会这么做,但是大企业没能利用失业来搞垮我们工会,这仍然是基本事实嘛。大家好好想一想,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也许是第一次!”

“同志们,那又是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工会有力量。在法国、英国或美国,比我们力量大、钱多、人多的工会有的是。他们却失利了,我们工会做到的,他们却未能做到,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有我们的政治结构,我们党在议会里可以纵横捭阖,我们在许多城市有自己的市长,只要看看红色波洛尼亚,这是欧洲管理得最好的城市。我们还有许多在各大区工作的同志,我们管理的大区占意大利半数以上!同志们,我们管理了意大利人口的60%。这样的政治结构在资本主义世界找不出第二个!阿马德奥所斥责为幕后交易的议会手段,是搞政治,是纵横捭阖,是一种妥协艺术,就象陶里亚蒂一直说的那样:要学会搞政治。^①我们制止了许多不好的措施,为工会争取到发展的余地。我们在城市和大区的力量支持和保护了我们工会。工人们有怨言,因为经济不景气,日子难过,他们希望我们能创造奇迹。但事实上最卓越地站在保卫工人阶级第一线的仍然是我们的党。我们的责任,也是你们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他们看到这一点。”

祖科蒂说着说着,嗓门愈来愈高,象个老先知一样严词训责,

① 所谓搞政治,加强政治作用的实质是指意大利共产党反对经济决定论的传统。这是葛兰西在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标题含有重要意义,叫做《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他在文章中争辩说,“资本被人用来鼓励经济决定论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之前,俄国必须先要有西方式的文明(见约翰·卡梅特:《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第61页)。葛兰西一九三〇年在狱中为他的难友讲课时肯定地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也即经济)条件在欧洲已经存在了五十多年。他提出共产党人的出路在于“加强政治作用,懂得如何使用政治因素,不要那么怕搞政治”。这是同年葛兰西的难友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可参阅阿托斯·利萨:《回忆录:与葛兰西同狱》。

谁也不会想到这么衰弱的身体还有这么大的能量。但我忽然转念一想,其实年龄同能量并没有多大关系,要是激动起来,谁都一样。这时,他又突然放低声音,做了一个安抚和等一等的姿势。

“拿房租管理法来说吧。阿马德奥刚才说房租管理法已经废除了。这样讲表面上是对的,实际上是不对的。最高法院确实认为房租管理法不符合宪法,也就是说,把它废除了。如果共产党议员处在反对党的地位,也许就让它这样废除了。但是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同天民党在一起搞了另一个法来取代它,在议会获得通过。我今天在这里向你们解释一下。^①这并不是一条最好的法律,很大程度上要看谁去执行,但它至少使我们可以生活下去。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都灵我将是这条法律的执行者。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还将有一个附属于我们工会联合会的警察工会!想一想吧!我们正在军队里搞民主程序,在团、师、军事基地里选代表。想一想吧!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使第382号法律^②得到通过,盖上章和公开颁布。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一条法律是潜在的改组国家的最有力的工具,是在日常生活和经济中引进社会主义因素的最有力的工具。别忘了,我们现在管理着半数大区 and 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有了第382号法律,天民党要不改革就会完蛋。”

我感到迷惑不解:那为什么天民党要同意这一条法律呢?天民党的领导人又不笨。他们才不笨呢!那又为什么会同意制订对他们不利的法律呢?

① 房租管理法是意大利全国性的规定,被人称为“平均负担”,指房客和房东平均分摊。这种办不到的事引起了一片官僚主义混乱,各地法院对规定作不同的解释。

② 指地方权力法,规定地方至少有权办卫生、教育、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险,并可经营农业。由于半数大区由意共领导,因此,赋予意共相当大的权力。

祖科蒂好象知道我在想什么似的，他接着说：“为什么天民党会同意这一条法律呢？那是它对我们的支持付出的代价。要不，政府就会垮台，就要在大区问题上进行新的选举，这是宪法规定的。而天民党已经回避了三十年！阿马德奥的意见有多么不对！”

祖科蒂现在讲得愈来愈快，愈来愈有劲，对党的技巧大为满意。

“同志们，你们瞧，农民有这么一句话：你可以把马引到水边，但是你无法强迫它喝水。我们通过公民投票和选举中的投票力量，可以把天民党带到水边，现在我们就要让他们喝水。同志们，他们是不愿意喝水的，但是他们已经在那里喝起来了，我们强迫他们把嘴张开，他们每次只呷一小口。但他们还得继续不断地呷，每次的间隔还会愈来愈短。阿马德奥说我们的敌人在笑，我没有听到。我听到的是阿涅利明确无误地说：‘现在争论的是国内阶级领导权问题。赌注大得很。’^①如果阿涅利懂得这一点，我们为什么反倒不懂呢？我们党在国内已经拥有文化的领导权。我们正走在取得政治领导权的路上。沿着这条路，我们还将采取步骤以取得经济领导权，不管要化多长时间，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这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含义。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它需要有历史的预见性，能坚持不渝，有意志力和清晰的头脑。首先要有预见性，这样才会使我们变得勇敢和坚韧不拔，在困难时刻增强我们的意志。”

祖科蒂十分内行，他热情洋溢，才华出众，用充沛的活力和朝气以及有力的论据，象施行催眠术一样，把听众的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我当时想，老天爷，他已经有七十四岁了！可我原来还可怜他呢。这时他的低声慢语变成了宏亮的叫喊，在谈到天民党尴尬处境时，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讥讽。

^① 乔治·纳波利塔诺，《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4页。

“我们是怎样让天民党喝水的呢？是通过我们的策略，根据群众的需要，帮助群众参与政治，是通过民主，更多的民主，更多得多的民主！是通过分析各种形势，不管它多么复杂，抓住关键问题（不论它多么渺小）做文章，使天民党各级组织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按我们的方式投票。举个例来说吧。中央政府原来把应归大区所有的钱控制在自己手中，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全国所有的大区（不管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都组织起来，联合派了一个代表团去罗马。^①天民党主管的大区同我们的红色大区一样，也需要钱用，也等着钱用。罗马的天民党领导人有什么法子呢？是挡住自己的支持者吗？这样做很困难，很危险，当然他们还会采取拖的办法。对我们，他们可以拖上两三年，但对他们自己的地区（也包括我们在内），只能拖上几个月。他们最终不得不让步，他们非喝水不可。我们工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让天民党喝水。我们不是共产党人吗？我们学习辩证法，谈论辩证法，但我们必须运用辩证法，辩证地思考问题，找出天民党内部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为我们服务。”

他象个老祖父那样和蔼地微笑着，环视周围一张张的脸，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扬扬自得。

“好吧，同志们，我们又回到卡萨莱尼奥的问题上来。汉尼巴尔说得不错，他是为阿涅利的报纸、菲亚特的报纸《新闻报》服务的。但不能光这样来看他。他是个诚实的人，参加过抵抗运动，为人正派。他象莱维一样，有独立主见，他并不认为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了阿涅利。在我们看来，这是个矛盾，但这只是大矛盾里的一个部分，阿涅利陷进去的是比这更大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辩证地思考问题。想一想吧，阿涅利要使《新闻报》办得好，对他有

^① 翁布里亚大区委员会主席杰尔马诺·马里证实了这一点。

好处,就必须使报纸有信誉,看起来象是独立的报纸。要装假是不容易的,因此阿涅利也得找几个有点独立见解的编辑,一些象莱维和卡萨莱尼奥这样的人所共知的正派人。我们谁都知道他们是关心菲亚特的利益的,报纸总是用很大篇幅刊登阿涅利的想法。凡有损于菲亚特的消息只在第七版上不醒目的地方登那么一小段。但毕竟那一段还是登了嘛。凡是牵连到菲亚特的天民党大丑闻,《团结报》会用大字标题在头版登上满满三大栏,而《新闻报》只会在第三版登那么半栏。但毕竟登了,阿涅利是不愿意的,但关系到报纸的信誉,非这么做不可。当然,《新闻报》是支持天民党的。但是关键问题会不时出现,就象这次的公民投票那样,在这种时候,人格和信誉迫使莱维和卡萨莱尼奥反对天民党,反对阿涅利,反对教会。《新闻报》采取了强硬的反对态度。别以为它没有影响,它影响着成千上万的投票人。同志们,卡萨莱尼奥是盟友,不是敌人,是我们必须尊重、必须保护、必须爱护的人。你们今天早晨看到福泰布拉齐奥^①对卡萨莱尼奥的赞词,他谈到卡萨莱尼奥从来不乱扣红帽子来陷害人。文章十分动人。^②成百万的天主教徒投共产党的票,成千的共产党员去教堂做弥撒,我希望他们今天都为他祝福。”

祖科蒂停了一下,刹那间表现得有点筋疲力竭的样子。他语气变得温和起来,象孜孜不倦的老师。

“同志们,在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中间,在教会里,在天民党里,甚至在资本家的管理部门中,有几万、几十万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的各种问题上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是我们想让天民党喝水,我们就需要他们。如果我们要使意大利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我

① 《团结报》讽刺专栏的作家,福泰布拉齐奥是笔名,乃“铁臂”之意。

② 1977年11月18日《团结报》。

们就需要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和同盟军。如果我们要使工人阶级上台执政，那么必须使其他阶级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是至关重要的，同志们。如果我们要上台执政，我们必须学会执政，必须能够胜任！葛兰西教导我们：一个执政的阶级，必须考虑到社会上所有集团的利益，必须达成某种妥协性的平衡，必须准备牺牲某些眼前利益。^①他讲的是我们这些工会工作者，同志们。他警告我们不要陷于列宁所说的工会的经济主义，也即我们所说的‘行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遗留给我们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如果卡萨莱尼奥的朋友不去参加大会，我们更有理由去参加。当有些工人不参加纠察队时，我们不会说，某某人不去我也不去。不会的。我们会说，他们落后了，我们应当教育他们。对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也是一样。还有一件事。”

他的口气变硬了。

“红色旅枪击了卡萨莱尼奥，还说他们是处决一个国家的奴仆，听起来好象很革命，是吗？卡萨莱尼奥是国家的奴仆，菲亚特帝国的奴仆，尽管到处乱杀人并不好，我们当然不认为暗杀是一种政治武器，毕竟他们的人少了一个，没有多大害处，对吗？有人私下同情顽固不化的红色旅，那些象吉里亚诺^②那样的半土匪。这种同情是不对头的。当法西斯恐怖主义分子开枪打共产党人时，他们的目的是明显的。可是当左翼恐怖分子开枪打人时，目的就不是那么明显了。他们说是要迫使天民党采取镇压手段，从而暴露天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591页（英文版第161页）提到：“领导权的先决条件无疑是人们注意到处于领导地位的团体的利益和倾向以及某种平均互让的存在，也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团体要作出经济上的牺牲……”

② 吉里亚诺是个西西里的强盗，被称为意大利的罗宾汉。他劫富，但也杀工人，同罗宾汉劫富济贫不一样。

民党的法西斯面目。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吓唬人民，使人民易于接受法西斯提出的加强镇压措施的要求。他们是要扰乱社会秩序，搞得鸡犬不宁，政局不稳，就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智利计划搞的那一套。红色旅要是真革命，那为什么不把压榨工人的资本家打死？为什么今天工会力量强大了，党的力量强大了，前进了，他们就要这么干呢？同志们，因为他们是在反对我们，就象法西斯反对我们和我们的路线一样。他们是在推动天民党向右转，推动天民党搞法西斯，使我们不能再同天民党合作，使我们的战略遭到失败。他们开枪打卡萨莱尼奥，就是开枪打我们。我们要心里明白，我们要抵抗。到现在为止，我们抵制了他们。我们国家不象当年的德国，没有往右摆。^①如果我们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我们就会胜利。”

“同志们，我们党的伟大目标是社会主义。在实现国家的结构改革的伟大战斗中，第一步是争取进入政府。我们已经取得多次胜利，在这场最艰苦、最持久的战斗中，我们也会取得胜利。”

他停了一下，然后半下意识地、十分纯朴地说：“可我呢，同志们，我可不会再变年青了。”

他结束了讲话。房间里的空气凝结了，谁也没有出声。只有阿马德奥对他友好地苦笑了一下说，“讲得好，同志，但我只被说服

^① 在暗杀和绑架等恐怖活动的影响下，德国右翼力量加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全国都处于麦卡锡式的歇斯底里的支配之下。警察权力极大，公民自由受到严重侵犯，可参见1978年9月13日《华尔街日报》。该报记者费里克斯·凯斯勒对镇压的日益加剧作了描绘。他引用德国对镇压法投反对票的议员迪埃特·鲁特曼的话说，民主的危险并不来自恐怖主义，而来自民主派。德国人今天要到政府和科学院谋职或当自由职业者，都不得有任何的激进色彩思想。任何人只要靠近作案现场，就可以在不受指控或逮捕的情况下受到搜查和按指印。只要有一张搜查令就可以搜遍整个大楼。

了一半。”

会议休息时，我过去跟祖科蒂握了握手：“讲得精彩”。他笑了笑，心里满意，但用手摸了摸鼻子，作了个不太赞同的手势。

“尽力而为罢了。”他说。

“你们会怎么处理阿马德奥呢？”我问。

他困惑不解地看着我：“这同他有什么关系？”

“他不是起了破坏作用吗？他一定是你们的刺儿头，失败主义者……”

“他不是失败主义者。”祖科蒂尖锐地指出，“他是成熟的、有经验的好同志，他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有时他的话是对的。傻瓜才会把他搞掉。”

我点头表示同意。“但总得有个限度，不然怎么叫民主集中制呢？你们的会听起来象是个辩论团体。”

他生气地说：“胡说，党不是什么辩论团体。我们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宣言派搞分裂，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这叫集中。但是阿马德奥起来发言，这是民主。两者相辅相成。应当允许我们的同志自由发言。否则，怎么能制定一条正确的切合实际的路线呢？葛兰西说过，反对你的人讲的话也有对的成分，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并吸收这些对的成分。”

“我知道这句引言。”我说。看到他抬了抬眉毛表示怀疑的意思，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我们不应把科学的讨论看成是法院的审讯……”他的眉毛和下巴都放松下来。我对他笑了笑说：“我翻译过这句引言。我是第一个将葛兰西的著作译成英文的人，这一点已足够使我对葛兰西有所了解。”

他抓住我的两条胳膊，轻轻地摇了一下，热情地说：“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们。很抱歉我对你那么冷淡，因为多数美国教授不懂得多少东西，他们很有点讨人厌。他们想了解意大利走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葛兰西的名字。不管怎么样,请你原谅……”。

“没关系。你瞧,我还占了你的时间……”

“别说蠢话了,”他不再用您字来称呼我,“你问什么都行。”

“那好吧。为什么这个会没有妇女参加?菲亚特不也雇用女职工吗?”

“在管理部门有女的,但生产部门女的很少。当然翻沙车间是没有女工的。但在其他生产部门有女工。你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有妇女参加这个会。但是,今天到会的都是选出来的,恐怕工人们,甚至包括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相当落后。别忘记,这里来的人都是同工头和经理打交道的人,工头和经理中并没有女的,相反,都是些好色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你讲得有道理。”

我问他有什么介绍菲亚特的好书。祖科蒂回答说:“有好几本。我最喜欢的是一本叫《菲亚特的艰难岁月》,是两个同志埃米里奥·普尼奥和塞尔焦·加拉瓦尼写的。我给他们提供了不少资料。这本书收集了不少事例、统计表、大事记,以及我认为相当精彩的分析。你会发现这本书很有用。”

我向他道了谢,乘电车回到都灵的闹市。一路上祖科蒂的形象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他多么能干,可他还不是省一级的领导人,而只是个次要干部,只是意共千百个干部中的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强调的民主。他所理解的民主,不是大多数欧洲人所认为的议会主义,而是象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由人民在自己的组织中发表意见和参加管理。托克维尔^①在一百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可欧洲到目前这样做的还不多。

^① 托克维尔是1805—1859年法国的出版家和政治家,著有《美国的民主》一书。
——译者

那天晚上我同《新闻报》的记者克劳迪奥共进晚餐。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信教信得几乎着了迷，也是天民党的坚定支持者。（但他说，“在离婚问题上我投了反对废除离婚法的票，天民党真是蠢透了。”）我在波洛尼亚时，佩德拉齐把他的名字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同佩莱格里诺红衣主教接近的人，红衣主教刚退休，不多会客，但克劳迪奥可以帮助安排。”

克劳迪奥高兴地同我打招呼。他的脸天生一副忧郁相，令人想起爱德·摩洛^①，连作风也有点象，比较实在和严谨，同意大利新闻界风行的文人散漫作风恰成对照。

“好消息，我的朋友！佩莱格里诺红衣主教明天三点钟在瓦洛都灵纳斯见你。他很容易疲劳，但他会见你的，因为他不能拒而不见一个在文科利的圣彼得罗教堂受洗的人。”

“但我明天要到伊夫里亚去见贝塔齐主教。”

“正好路过瓦洛都灵纳斯。你只消用美国式的神速赶路就行。你的约会是在几点？”

“我九点坐公共汽车去，约会是十一点。”

“那就雇辆出租汽车，司机可以在伊夫雷亚等一两个小时，贝塔齐不会占用你更多时间。回来时司机顺路到瓦洛都灵纳斯把你放下，他就开车回来，你去吃饭，然后见红衣主教，事完坐公共汽车回来。顶多不过二万里拉。这是值得的，只化25个美金就在一天之内抓到一个红衣主教和一个主教！”

我们用愉快的同志般的心情一起就餐，期待着翌日的收获。在吃巴罗洛和波洛尼亚式的宽面条时，我谈到那天下午的会议和祖

^① 爱德·摩洛(1908—1965)生前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广播员，1937年任该公司驻欧洲办事处主任。——译者

科蒂的讲话。

“我看他给你的印象相当深。我对他很了解。他好多年来都是地方上的烈士。人不坏，就是有点生硬，按你的说法叫做正直，是吗？这个词用得对么？”

“对，跟上时代的新词。”

“但你要知道，你不能把他讲的每句话都当成福音来听。”

“你是指他当时没有被开除或被列在黑名单上？在我听来，当时的情况很有点象美国的麦卡锡时期，政府帮助资方反对工会，联邦调查局到处搜捕共产党人……”

“那是毫无问题的，我们的五十年代同你们的五十年代一样。”克劳迪奥举起一根手指警告我说，“问题不在这里。祖科蒂有些事漏掉没讲。这就是1948年在天主教人分裂出来后，总工会还能得到80%的工会选票。十年以后就只剩了20%，下来了一大截！理所当然这是由于政府帮助资方，以及资方采取强硬手段……。但这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选票会下降这么多。不完全是这样，当时工人们自动脱离总工会，因为总工会反对马歇尔计划。共产党一再号召罢工，反对马歇尔计划，这是犯了个大错误。难道你能想象菲亚特的工人会起来反对美国贷款、美国食品和美国的定货？简直荒唐。这是意共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错误，他们知道这一点，是俄国人让他们这么干的。俄国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我们两个人之间说说，我认为陶里亚蒂之所以逐渐同俄国人拉开距离，与其说是由于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报告，不如说是由于刚才说的这件事。”

我问到美国的压力。

“美国从来都施加压力，这人人知道。美国迫使加斯贝利违反自己正确的判断，在1947年把共产党人赶出内阁。”

我告诉他说，佩德拉齐认为加斯贝利和陶里亚蒂是无意中成

了伙伴。加斯贝利抵制了美国和梵蒂冈，而陶里亚蒂抵制了俄国人和意共中的强硬路线派。我问他是怎么想的。

“喔，这方面可说的很多。例如，加斯贝利阻止了梵蒂冈 1952 年把法西斯分子安插到罗马市政府里去的计划。教皇庇护十二世大为生气，从此没有再接见过加斯贝利。^①至于对美国人，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需要贷款，需要合同。祖科蒂所提的那本关于菲亚特的书中有一段写美国大使鲁斯夫人同菲亚特头头维多里奥·瓦莱塔会晤，她直截了当地告诉瓦莱塔，若要得到美国定货，先得看菲亚特的反共工作做得怎么样。瓦莱塔给了她一份菲亚特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备忘录。^②共产党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己犯错误，而共产党的回升则是由于菲亚特犯了错误，这一点很有讽刺意义。”

他停了一下，抬起眉毛。他向我表示，他是客观的。我说：“说一说菲亚特犯了什么错误。”他乐意地点了点头。

“错误可多了，不光菲亚特，所有的……唔，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家都犯了错误。他们都是些老古董，法西斯时代教育出来的，尽管经历了战争，可什么也没学到，都是些正统的波旁王朝保皇党，思想停留在过去。他们什么都不会忘记，也什么都不会学到。他们十分贪婪，他们的利润飞速增加，但他们连一点面包渣也不肯给工人。这样就使天主教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劳工联盟都垮台了。你瞧，这有多蠢！赶快制度和加强监督也起了同样的作用。由于非共产党的工会因循苟安，资方可以顺顺当当地使劳动条件日益恶

① 德加斯佩里和庇护十二世的故事可参见彼得·尼科尔斯所著《意大利，意大利》第 119 页。

② 普尼奥和加拉维尼，《菲亚特的艰苦岁月》，第 172 页。谈话的全文载吉安·贾科莫·米戈内所著《美国在欧洲称霸的背景》一书，推测是从菲亚特档案里抄来的。

化。但从长期来看，这却是致命的，破坏了这些工会的声誉。博德拉托警告过他们，但是他们不听。”

“博德拉托？”

“圭多·博德拉托，都灵的天民党议员，我的好朋友，为人十分聪明好学，现在在天民党理事会里地位很高，同扎卡尼尼接近。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你应该见见他，我来给你安排。”

“看来象是一个帮助天民党喝水的人。”我重述了祖科蒂的譬喻。克劳迪奥很欣赏地笑了起来。

“不坏，不坏。即使不是事实，也蕴藏着真理。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又在工会中东山再起了，这导致成立工会统一联合会，为离婚法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也为之后发生的一切铺平了道路。意大利的政局概括说来就是天民党的一连串失败，这是因为天民党太狂妄，菲亚特太无情，资本家太贪婪，总的说来，统治阶级太没有作为，因此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我对这点感到高兴。”

“告诉我，克劳迪奥，你为什么不是共产党员？”

“你知道，我很喜欢他们，我的一些好朋友参加了党。可是不行。他们是乌托邦空想主义者。他们同你一样，认为人性是可以变好的。你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启蒙运动和世俗主义的顶峰。对你们来说，人是衡量万物的准绳。而对我来说，上帝才是准绳。人性本恶，是禽兽，只有受到宗教的开化才会变得文明起来。由于上帝的慈悲，人才能成其为人。你瞧，我怎么能当共产党人呢？”

“那你又为什么同他们一起工作呢？”

“因为他们是严肃的。他们的政策对国家有好处。”他顽皮地笑了笑说：“此外，现在愈来愈多的共产党人参加了教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竞争可以迫使天民党更新，使教会更新。在这个阶段共产党的影响对各方面都有利。这也可能是上帝的旨意。你感到好笑，你很有礼貌，但你心里在暗暗好笑。然而，教皇

约翰和陶里亚蒂一样，都是能跟上时代的人。明天你会看到佩莱格里诺和贝塔齐，这是两代人，都十分信教，又都十分现代化。你会看到天主教有多么复杂。”

“象菲亚特的高级轿车？”我开了句玩笑，但克劳迪奥却无动于衷。

“一点不错。你会看清楚的，”他文质彬彬地、宁静地说，“你会看清楚的。因为无论从遗传学来说还是从环境来说，你都是罗马人。你懂么？”他热情地拍了拍我的手臂。“否则一个美国人怎么会了解我们呢？”

同佩莱格里诺和贝塔齐会晤的情况，前面已经叙述过了。但克劳迪奥绕着圈子讲的有关原罪的话，并没有使我忘掉祖科蒂或阿马德奥。两年后意共在大选中丢失了四个百分点的选票，使我想起了阿马德奥的疑虑。就在这两年，祖科蒂对五金工人阶级觉悟的信心得到了证实。

在米拉菲奥里会议后两周，五金工人于1977年12月3日在罗马举行了一次示威，这次示威实际上使政府垮了台。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在3月16日，也就是莫罗被绑架的那天，成立了多数派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因莫罗遭绑架而引起的一连串事件，最后导致1979年6月3日的大选。工会马上看到意共选票下降会促使雇主们对工人进行反击。1977年6月22日五金工人在罗马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并把示威变成重要的政治警告：不要走回头路。工会的怀疑马上得到了证实，在重新谈判合同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菲亚特的斗争尤为激烈，因为菲亚特从来都是所有企业的标兵。菲亚特打算通过谈判合同来削弱工会力量的意图未能得逞，但阿涅利并不就此罢休。他利用公众对恐怖主义的反感，扩大了攻势。1979年10月9日，菲亚特以“劳动中偷懒，不遵守纪律

和不诚实”为由开除了六十一名工人。第二天，米兰的阿尔法·罗梅奥工厂又开除了四名工人。同时菲亚特宣称由于各工厂已变得“无法管理”，停止招雇工人。^① 尽管工人们并没有直接被指控为搞恐怖活动，但开除的时间恰恰是在红色旅发动袭击的五天之后，^② 并且指控被开除的那些工人有暴力行为的提法，显然是影射这些工人搞恐怖活动。

有一位评论员说，这次开除“有可能是意大利劳资关系向反革命方向转变的开端……由恐怖主义引起的紧张气氛，显然使菲亚特认为可以同工人进行一次较量，并且开始破坏工人的团结和斗争性，而工人正是由于团结和有斗争性，才能这么强大。”^③

对工会的攻击就是对意共的攻击。菲亚特狡猾地设下了圈套：如果工会联合会和意共出来维护被开除的工人，那么就可以指控它们同恐怖主义有勾结。如果接受对工人的开除，那么又可以被指控为同阶级敌人合作，从而削弱它们对工人的控制以及鼓励工人成立独立工会。^④ 菲亚特间接地暗示开除工人是得到工会同意的。

工会和意共作了强烈反应，它们全力支持工人，同时不断表明它们反对恐怖主义。他们让每个被开除的工人发表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声明。与此同时，杰拉尔多·基亚罗蒙特和阿达贝尔托·米努奇等意共最高领导人发表了重要声明，把菲亚特的攻势同国家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米努奇特别注意菲亚特的经

① 黛安·约翰斯通 1979 年 11 月 6 日文章，〈在这些年代〉。

② 四年内发生了 128 次对菲亚特管理人员的暴力行动，计：3 人死亡，17 人受伤，58 人的车着火，30 人受到各种袭击，18 人的办公室着火。在着火前五天，米纳菲奥里负责工会关系的塞萨尔·瓦雷托膝盖被人打伤，翌日，菲亚特的一位顾问皮埃尔·卡洛·安德雷奥莱蒂的腿被打伤。材料来源同上。

③ 同上。

④ 独立工会的数目在增加，虽然它们的罢工更有破坏性，但是由于是超政治倾向的，所以对制度的危害不大。1978 年 1 月 30 日《纽约时报》的报道。

济地位,指出菲亚特目前的攻势虽可以说同五十年代相同,但力量对比已经起了变化。不只工会已经联合,而且菲亚特还面临市场的日益收缩。从1970年以来,菲亚特产品的销售量从占意大利全部汽车销售量的75%下降到53%,在欧洲市场上从8%下降到3%。菲亚特公司把宝压在政府会支持公司压服工会上。①

天民党想诱骗意共支持政府,散布谣言说它这样做是得到意共默许的,从而使人们在政治上不信任意共,就象菲亚特散布对工会的不信任一样。贝林格对付这一阴谋的态度是公开表明意共反对这样做,并立即在两个方面开展斗争:第一,在退休金和救济金、住房、生活费用等问题上维护人民中较贫困阶层的利益;第二,开展维护和平的斗争,特别是围绕北约国家部署美国新导弹的问题开展斗争。②

11月16日,仲裁人宣布菲亚特开除工人是不合法的,除了判菲亚特罚款外,还要菲亚特补发工人已扣的工资。菲亚特付了钱,但拒绝让工人复工,并对他们提出新的指控。③ 工会联合会宣布11月21日举行总罢工。总工会的卢恰诺·拉马说,罢工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答复菲亚特的攻击。④ 有相当一部分报刊支持菲亚特的目标,即重新确立资方在工厂中为所欲为的权力,但对菲亚特的做法却有怀疑,认为带有挑衅性和不利于生产。⑤

① 杰拉尔多·基亚罗蒙特:《怎样回答菲亚特》,载1979年10月19日《再生》杂志第40期。并可见参阅阿达尔贝托·米努齐所著《菲亚特期待什么?》,载1979年11月3日《团结报》。

② 1979年11月5日《团结报》上所载贝林格的讲话。

③ 1979年11月18日《共和报》。

④ 1979年11月18日《团结报》文章《拉马解释为什么举行罢工》。

⑤ 1979年11月19日《共和报》社论;佛朗哥·朱斯托利西:《菲亚特的内内外外》,载1979年11月25日《快报》第31—32页,以及1979年11月《欧洲》杂志的社论和报道。这些报道的态度都有利于菲亚特,尤其是《欧洲》杂志的社论大肆吹捧阿涅利。

这种怀疑是完全有根据的。菲亚特漠视仲裁人的判决不出三个月，意共利用菲亚特的攻势向公司和政府发动了反击。它在两条战线上斗争，一是恐怖主义问题，一是菲亚特的经济效率问题。在第一个方面，意共发动菲亚特在都灵的各个部门举行一系列的反恐怖主义集会，工人有计划地邀请警察和警察工会、法官和市长的代表，以及邀请当地的政治家、律师（有一家报纸统称之为“有文化的人”）参加工厂里的集会。

《共和报》记者圭多·内皮·蒙多纳很兴奋地报道说：“我一般不大去菲亚特，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及与会者的经验，我可以肯定地说，会议有一种镇静和共同参与的气氛……表明工人运动和民主制度的结合已经成为现实。”

“大家本能地（我可以说是几乎是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有出现大规模镇压的危险性……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恐怖主义是要诱使官方采取高压手段作为答复，从而为工人运动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准备条件。”

“这意味着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将严格的纪律和效率同民主程序联结起来的政治路线，必须有群众的广泛支持，而这种支持恰恰可以在工人阶级中找到。”^①

同一家报纸的另一位专栏作家马西莫·里瓦形容意共的反攻还另有针对性，这就是明确维护菲亚特和汽车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里瓦提到米努奇文章中所说的关于菲亚特的困难和市场收缩问题，赞扬意共提出在菲亚特举行大型生产会议的建议。意共争辩说，提高利润的道路不是靠削弱工会力量和削减工资，而是使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改善工艺。阿涅利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只

① 圭多·内皮·蒙多纳：《反对菲亚特的恐怖活动》一文，载1980年1月27日《共和报》。

能同意。里瓦说：“功劳应归于意共的创议，也应归于阿涅利没有给他们吃闭门羹。”

里瓦并没有忽视反攻的教训。“共产党在菲亚特问题上，是想表明意共已经不可逆转地从反对派的立场过渡到从执政党的立场考虑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赌注是很大的……意共的领导人想在都灵具体证实他们关于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到可以成为全国执政阶级的论点。”^①

1980年3月31日，六十一名工人被解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菲亚特要想顾全面子，提出允许部分工人复工，但工会态度强硬。不管结局如何，可以明确看出菲亚特的攻势已经受挫，正在瓦解之中，这对意大利的政局会有重要影响。

^① 马西莫·里瓦，《贝林格和律师》，载1980年1月27日《共和报》，律师是指阿涅利。里瓦还指出贝林格和阿涅利在抵制意大利参加欧洲货币体系而受到的损失问题上会找到共同的立场。

第八章

为什么天民党这匹马开始喝水

政治就是寻求一致，但政治技巧则要善于对事物加以区分。如果有人认为天民党只是一个代表大企业和梵蒂冈的党，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天民党是今天梵蒂冈支持的党，但并非梵蒂冈在战争结束时需要的那种党。为了了解梵蒂冈当时需要什么样的党，后来得到了什么样的党，我们还得从1919年开始作一回顾。

1870年教会关于不参与选举的政策失败后，教皇庇护十世勉强同意天主教徒参加投票。第一位“天主教”议员是1904年从贝尔加莫选出的。但过了九年，1913的亨底罗尼协议才承天主教参加政治活动的力量。后来又过了六年，才在1919年由唐路易吉·斯图尔佐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党，即人民党。^① 尽管斯图尔佐本人是个教士，但梵蒂冈仍然认为它不能完全控制这个党，部分原因是梵蒂冈对于天主教徒直接参加政治行动感到疑虑不安。因此，它决定支持墨索里尼，听任墨索里尼镇压人民党和其他政党。

教会的支持马上得到墨索里尼的报答。拉特兰条约以及规定罗马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的协议，承认了梵蒂冈的主权，给了梵蒂

^① 在1913年举行的所谓普选制(没有妇女参加)的第一次大选时，天主教选举联盟领导人真蒂洛尼伯爵同乔瓦尼·戈利蒂总理达成了支持政府候选人以遏制社会党人的协议。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日记》第36—37页(英文版第93—94页)。

冈很多钱和用以支助天主教学校、医院和其他各种福利机构的津贴。作为交换条件，教廷同墨索里尼合作，为埃塞俄比亚战争、为意大利出兵西班牙支持佛朗哥以及为1941年反苏战争祈求上帝赐福。当然，在诸如组织青年和一般的教育问题上，双方是有磨擦的。当时墨索里尼还不同意在意大利出版雅盖·马里坦的著作，是乔瓦尼·蒙蒂尼神甫(后来的保罗六世)出了力，才使马里坦的著作得以翻译出版。1938年教会抵制反犹太法一事也十分明显。

法西斯的失败大大损害了教会。从1942年起，梵蒂冈就开始考虑战后的世界形势并看到天主教党的用处。教会要建立这样一个党真是易如反掌，因为在法西斯统治下，在所有的社会机构中，唯有教会的权力，包括钱财、房产、同人民的联系和代理机构，都原封未动。有一个代理机构叫天主教行动会，表面上是作为社会组织而建立的，实际上是起了保护教会不受法西斯侵犯的作用。其领导人如路易吉·杰达等，通过全心全意同法西斯合作而得到法西斯的青睐和让步。他们同教皇庇护十二世一样恶毒反共。庇护十二世把天主教行动会看成是可以由梵蒂冈完全操纵的未来天主教党的当然核心。1943年8月杰达写信给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表示天主教行动会可以支持他，交换条件是天主教行动会可以打进宣传机构(当时新闻报道要受检查)，并得到其他的政治好处^①，这是建立新党的第一步。

庇护十二世当时没有把阿尔奇德·加斯贝利考虑在内。加斯贝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奥地利立法议会内主张收复意领土的议员，后来是人民党党员，战时在梵蒂冈任职，地位不高。但他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对事态发展的看法比梵蒂冈现实得多。

^① 泰奥多罗·萨拉：《意大利天主教行动会愿同巴多利奥政府(1943年8月)合作》一文，载1972年《现代史评论》第4期第517—533页。

他知道杰达名声不好，许多天主教团体，如北方的工厂工人和天主教的游击战士，仇恨法西斯的工会会员，以及聚集在朱塞佩·多塞蒂、乔治·拉皮拉和《社会纪事报》周围那些知识分子和教士，他们由于梵蒂冈同墨索里尼妥协而蔑视教廷，都不会接受名声不好的杰达。于是，加斯贝利将这些团体集结起来，并同原人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米兰天主教徒的一个保守、然而反对法西斯的强大团体合并在一起。这个新党就叫天主教民主党。这个名字很响亮，因为它就是1919年人民党左翼的名称。

加斯贝利手段圆滑，他既避免同杰达发生冲突，也避免同教会统治集团中的反动阶层发生冲突。同时他又赢得如蒙蒂尼那样认为教会需要洗刷其亲法西斯丑史的高级教士的支持。加斯贝利做到了既为教皇服务又不从属于教皇。因此天民党得以参加1943年成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成为六个反法西斯政党之一。

1945年春，根据天主教历史学家彼得罗·斯科波拉的说法，梵蒂冈接受天民党为天主教徒的党。^① 鉴于加斯贝利当时已是同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把他所建立的党强加于梵蒂冈。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天主教内有很大一部分人，由于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和反德游击战争，并由于法西斯在梵蒂冈的默许下造成的灾难而热心政治，他们通过加斯贝利将这个新党强加于梵蒂冈。由拉皮拉和多塞蒂所代表的社会思潮有一个时期在天民党内控制着百分之四十的力量。陶里亚蒂就是向天民党中的这一部分人提出联合路线的。他得到的报酬是1946年6月2日举行的关于君主政体的公民投票。共和政体以微弱多数取胜，赞成的一千二百七十万票，反对的一千零七十万

^① 彼得罗·英格拉奥：《群众和权力》，第56页。我对天民党的分析多半要归功于英格拉奥。

票。这个差额来自天民党的左翼。天民党选民分成两派，二百万人赞成共和政体，六百万人赞成君主政体^①。梵蒂冈拚命想搞君主政体，意大利的大企业和英美的最高司令部也是一样。他们未能得逞，因为天民党内有25%的人背叛了。这种背叛行动有利于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同教会和睦相处的政策。

天民党同大企业的关系，正如它同梵蒂冈的关系一样，情况十分复杂。象《每月评论》那样把天民党说成是“典型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党”^②也是过于简单化了。意大利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圭多·卡利称天民党为“小资产阶级政党”。要说他同菲亚特的阿涅利都支持天民党，那并不是由于天民党了不起，而是找不到更好的党了。^③有一个情况是事实，并且是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企业始终未能在意大利组成一个群众性的大党。^④阿涅利和卡利同天民党的关系不很融洽，他们信不过天民党的左翼，并且对天民党的贪污腐化不满。六十年代后期，阿涅利和卡利曾玩过一个花招，想转而支持以乌戈·拉马尔法为首的共和党。1976年大选前，流传着阿涅利和卡利打算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议员的谣言，但由于这样做过于冒险，最后两个人都缩回去了。^⑤有一位敏锐的评论员对我说，拉马尔法因为感到受骗而向左转。不管真相如何，我后来

① 乔治·博卡：《帕尔米洛·陶里亚蒂》，第447页。

② 1977年6月《每月评论》，第2期。这个提法是在编者对前一期卡尔·马扎尼和马克斯·戈登所撰《维护意大利人》一文的“答复”中。

③ 吉多·卡利：《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

④ 葛兰西认为大企业一般并不需要自己的党，见葛兰西所著《狱中札记》第1750页。“大企业轮流利用现有政党，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党……他们关心的是决定性的力量平衡……。”葛兰西补充说，大危机时期除外。

⑤ 乔治·加利：《对意共的看法》，第114页；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135页；切尔索·吉尼：《变化中的意大利》，第526页。这些谣言是有根据的，但最后还是决定同天民党搞在一起。贾尼·阿涅利的兄弟翁伯尔托参加了竞选，在天民党的选票上当选为议员。

得悉，天民党的高级领导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依附于大企业主的。

我坐在赫苏广场四号天民党总部圭多·博德拉托的办公室里。博德拉托是个议员，也是当时天民党总书记和多塞蒂原来的门生贝尼尼奥·扎卡尼尼的亲密顾问。我知道多塞蒂有许多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因此我对天民党现领导人忠于大企业有点好奇。我对博德拉托说，我认为“历史性妥协”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同天主教徒是否合得来，而在于天民党是否准备在国家控制投资的问题上同大工商业斗争。博德拉托转了个弯回答我，口气颇带挑衅性。他说，“西德总理施密特有一次对我说，他认为天民党在战后的意大利完成了三大业绩，即：使天主教民主化，使民主派自由化，以及支持反法西斯，从而孤立了新法西斯分子”。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博德拉托心里十分明白，天民党在费尔迪南多·坦布罗尼政府中同新法西斯分子眉来眼去，在离婚法的公民投票中也同新法西斯分子搞在一起。他知道我了解这些情况。他讲这些话不过是要转移目标，我用沉默加以对待。过了好一会儿，他补充说，“我们要做的第四件事是使共产党懂得什么叫民主”。我说，“这正是共产党用来讲你们的话。”我们都笑了起来。我又补充一句，“这也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投资问题。”

他坐在转椅上，手里玩着裁纸刀，用平静的心不在焉的声调说，“历史上我们同重工业的关系是有起伏的。早年加斯贝利同工业家联合会的科斯塔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人们称之为加斯贝利—科斯塔时期。^①我认为加斯贝利这样决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

^① 安杰洛·科斯塔(1901年生于热那亚)1945—1955年任工业家联合会主席。他以坚决维护工业家利益和不愿对工人作任何让步著称。

不是经济上的考虑。他知道意大利需要美国的帮助，而象路易吉·艾瑙迪和安杰洛·科斯塔这样的人是美国所能接受的。加斯贝利同陶里亚蒂一样，并不精通经济。他只是跟着走，主要想取得美援。”

“六十年代，中左政府进一步推行国有化，尤其是在电力部门。工业家联合会是抵制的，我们大干了一场。今天嘛……”，他拖长了声调，“今天我们是友好的。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我认为他们需要我们甚于我们需要他们。不管怎样，我认为关系是友好的，但不能说是热烈的。”

他文雅而有礼地表示不愿再多说了。我们转入政治性问题。我说形势发展很快，在我来到意大利的三个月中，天民党的中翼和右翼领导人在向左转，也就是说，转向扎卡尼尼的立场，1977年7月的六党协议应看成是个起点，而不是合作的最高限度。他同意这一点，但指出天民党大部分中层领导人不愿意再往前走。“我们要是走得太快，就会犯错误，对我们、对国家都会造成灾难。”我表示意共看来也认识到这一点（他点头同意），但是事态的发展正在把他们包围起来。工会难以驾驭，恐怖主义和失业都是爆炸性问题。他又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显然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并且懂得国家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和危急，任何措施只要在政治上行得通就应认真加以考虑。

博德拉托担心天民党中层领导人反共是完全有理由的。我在同波洛尼亚的科莱托和天民党米兰大区书记阿尔贝托·加罗基奥等人交谈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天民党都灵大区书记西尔维奥·莱加虽然坚决支持博德拉托，却不愿同意共合作。这些中层领导人加强了最高层的不调和派，如阿明托雷·范范尼、埃米利奥·

科隆博、马里西诺·鲁莫尔和多纳特·卡廷等人的力量，但这些人受莫罗的威望牵制，而莫罗是得到安德雷奥蒂和扎卡尼尼的支持的。博德拉托充分意识到天民党内的均势是靠不住的。右翼力量加强的标志是1977年至1978年冬天天民党内部的一场尖锐争论。当时以米兰议员马西莫·德卡罗利斯为首的约九十名议员要求同共产党摊牌。^①但莫罗以谋略制胜，成立了多数派政府。

多数派政府于1978年3月16日成立。就在当天红色旅绑架了莫罗。他的惨遭暗杀破坏了天民党内的均势，打乱了一切政治计划。天民党右翼力量强大起来了。社会党在克拉克西的领导下开始对意共采取强硬态度。联盟的破裂虽然由于两位教皇相继逝世和一位总统的辞职而推迟，但最后终于发生了。1979年6月3日举行了新的选举。

使意共大为惊异的是它在都灵这样的工业区选票下降。我想起了阿马德奥的警告。意共主要在原籍南方的工人中选票下降，南方人的阶级觉悟比较低。意共在青年中的选票也从1967年的40%下降到25%。^②妇女选票保持原状，部分原因是意共在通过堕胎法问题上进行了斗争。意共选票下降的原因很多，我认为其中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内在原因，是意共在1975年和1976年的巨大胜利之后，干部力量和党的组织力量分散。

共产党员分得很散。听起来一千二百万张选票（即三张选票

① 1978年10月29日《全景》杂志。并可参阅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156—158页。要详细了解德卡罗利斯的立场，可阅弗朗切斯科·帕拉迪诺所著《如果意共参政》中的长篇谈话，第105页。

② 1976年大选之后，选民年龄降低到十八岁，从而增加了350万新选民。也就是这批青年最感失望，他们脱离了意共。参议院要求的投票年龄较高，从参议院选举中看出了这种趋势。意共在参议院只减少了2.5个百分点的票，而在众议院却减少了4个百分点。

中有一张是投意共的) 数字庞大, 近两百万党员这个数字也很动人。但是, 意共的选民和党员多数来自居民中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受过很好训练、缺乏自信的阶层; 意共党员中25%是农业雇工和家庭妇女, 45%是工厂工人^①。学生、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政府雇员和艺术家总共只占 20%。这样的力量要影响社会各阶层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要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却嫌不足。天民党恰好相反, 其大多数党员是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

1975年共产党在市政和大区选举中的胜利, 使干部的紧张程

① 意共成员和社会成份的数字可参阅《党的组织情况统计数》(1974—1978)第 11 页和15页。

	党员总数	女党员人数
1974	1,643,716	387,072
1975	1,715,203	405,424
1976	1,797,596	433,775
1977	1,797,489	437,308
1978	1,772,425	438,979

意共1977年党员社会成分百分比:

工人	40.08	职员/技术员	6.92
农业雇工	5.30	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	2.34
佃农	1.88	学生	2.09
自耕农	3.53	家庭雇工	0.70
手工业者	5.34	家庭妇女	10.27
店员等	3.50	领退休金者	17.37
小商人	0.28	其他	0.31

意共对它的干部作了一次社会调查, 这对一个政党来说是个值得注意的步骤。更重要的是它发表了调查结果, 在1979年12月9日《团结报》上发表了《意共干部图表》。意共干部中40岁以下的占65% (其中半数是30岁以下), 接近半数是在六十年代入党的。其中三分之一以前当过工人或农民, 有一半以上的人父母是工人或农民。一半以上的人工资少于一个技术工人的工资。61%已婚干部的配偶有职业。这份调查颇受人们重视, 三个月后天民党也作了类似研究。

度达到极限：他们必须提供市长、市议员、妇女干部以及市、区政府的各种行政管理人员。都灵市市长原来是个记者；波洛尼亚和罗马的市长原来都是大学教授，翁布里亚的大区主席原来是个外科医生；意共那不勒斯的大区书记原来是个精神病医生。意共把年老和年轻的干部都用尽了：负责都灵房租管制的祖科蒂已经七十多岁了，卡拉布里亚的合作社领导人是二十三岁。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二十来岁的男女青年身居要职，他们工作时间很长，边工作、边学习。在波洛尼亚我遇见一个新当选区委组织员的二十六岁青年。他开车送我去参加一次党的集会，他将在会上作报告。他事先写好了草稿，因此报告开头部分很顺利。但是讲了几分钟后他的思路就乱了，前言不搭后语，脸部表情呆板，最后心灰气馁地坐了下来。有一个同志批评他准备得不好，语气温和但很严格。

回去的路上，这个新干部抱怨说，“他的批评是对的。但对他来讲发表演说不成问题，他在工会工作很长时间了，……是个老手。”而这个“老手”也只有三十岁。

意共不断在培训干部。弗拉托切的党校每年培训大约一千五百名学员，每期一个星期到七个月不等。学员全部住校，学习很紧张。学员至少有半数直接来自工厂，都是一些有相当实际经验、能读会写的男、女党员。有些人在到弗拉托切学习之前还从来没有看完过一本书。还有六所规模较小的同类学校，分布在意大利各地。学员都是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学习期间还要付给他们工资以赡养家庭，这是个很花钱的事情。弗拉托切的教员从原来四个人增加到六个人，其他学校也一样，1978年可期望培训出四千到五千名干部，这个“收获”甚为可观，但离需要仍相差很远。^①

^① 从1975到1978年有16,415名学生参加了七个党校学习(其中三个是在1977至

意共干部人数在增加,与此同时,天民党内“不调和”派却在减少。事态的发展使他们改变了看法。例如,意大利西北部的弗里乌利区在1976至1977年期间发生一连串可怕的地震。世界各地送来了几百万美元的现金和供应品。罗马某部的一名天民党官员用这笔钱资助建筑业投机商,结果被人抓住。这件丑闻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为了转移读者对该部的注意力,有的报刊指摘地方当局违反法律,密谋策划扣住供应品不发给灾民。该地区某镇的天民党镇长勃然大怒,打算辞职。当地的共产党议员却加以劝阻,并敦促他出来同指控人对质。他们两个人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为他们不加调查、不作登记就发放救济物资共同承担全部责任。^②镇长还生气地说,“我当然是干了违法的事。有人找我说他有六个孩子,我就发给他六条毯子。我没有让他签字画押,我没有把发放清单一色打印六份,我也没有派个警察去核对。我违了一百次法,违犯了一百条法律,但是我不象罗马那个部,我自己没有拿一分钱。”这位镇长和他的朋友同意共的关系就不再疏远了。

西西里中部一个小镇的另一位天民党镇长告诉我,1975年该镇选举由十二人组成的镇议会,有两名共产党人当选。其中一人是国营电视系统的工程师,很有学问,总是帮助镇长做文字工作,帮他出主意等。镇长很信赖他,每次到大区办事(大区由天民党控制),他总带着这位共产党议员同往。两人组成了反对天民党官僚统治的统一战线。上述两位镇长都有不少强硬路线的支持者,后者也不免因为天民党同意共的有效合作而受到影响。此外,不少天民

1978年建立的)。这些学生中有2,800个女生。此外,从1955至1977年,大区和省举办了3,823次训练班和讨论会。党校出版三十九种出版物共发行500,000份,直接发给学生,其中八份出版物(发行138,000份)涉及“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思想和行动”(见《意共组织情况统计数》第93—94页)。要了解各党校的简介和地址可查阅《意共年鉴》附录第14页。

^② 1977年9月20日《前进报》。

党干部对意共在地方政府中的廉洁奉公印象很深。如果人们考虑到意共有一千三百名市(镇)长,这些人同社会党人一起统治着意大利大多数的市镇(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三),人们就能看到他们对天民党的压力是不会间断的。^①

随着人们对事态的反应采取向左转的立场,天民党内也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逐渐消除了对意共的敌意。有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1973年夏天,那不勒斯发生了一场霍乱大恐慌。当时发现了不少霍乱病例,死了几个人,大家担心传染成灾。人们纷纷涌向医院和医疗站,到处找医生打防疫针。天民党市长和市政府不但不立即采取行动,购买药品和组织注射防疫针,稳定人心,相反地,他们只是推卸责任。

共产党的区委领导人伦佐·拉皮切雷拉对我说,“简直叫人没法相信。”他原来是一位精神病专家,年已半百,瘦瘦的个子,满脸操心忧虑的神色。“市长不见了,负责卫生的官员也不见了。各医院的院长都不来上班,市政府出于恐惧而解体了。真糟糕。只有我们左派——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工会工作者没有惊惶失措。”

“我们接管了工作,动员我们的医生,并让他们再去发动他们的同行。我们派了一车一车的同志去罗马,去求情、游说,购买血清。我们让医疗站继续开门,还借用市政府的其他楼房增设一些点,派同志去帮助管理,让警察出来维持秩序,动员护士和她们的助手帮忙打针。不过几个小时,全市都知道有人在管这件事。我们通过电台广播了我们所做的一切,还让工会去散发传单和召集会议,不一会儿,到处都排上了长队打防疫针。几天之后,局面完全控制住了。市长和市政府的人又露面了,一切看来又恢复了老

^① 意共在全国 8,068 个市长中占 1,362 个(16%,但在五千人以上的市镇为 27%)。五千人以上的市镇左翼组成市政委员会的有 47%。见《意共年鉴》,1977 年版第 30 页。

样子。”

拉皮切雷拉严厉地笑了一笑。“其实不然，老百姓并不健忘，一年后在离婚法问题的公民投票中，那不勒斯有55%的票支持离婚法。就是这个那不勒斯，原来是全国最反动的堡垒之一，1946年有80%的人投票支持君主政体，1972年还有20%的人投法西斯政党的票！我对你说吧！这简直是一场地震！”

几乎没有一个大城市或大区，不发生一些使人们向左转的事件。在翁布里亚，围绕着反对关闭特尔尼钢铁厂而进行了斗争。在弗拉拉，围绕着反对关闭制糖厂而进行了斗争，还动员了甜菜种植者参加。在都灵进行的是反对菲亚特的斗争。一些全国规模的大斗争，如离婚法问题的公民投票、总罢工、三大工会联合成统一联合会等等，都涉及全国各个地区，推动人们稳步地向左转。即使1979年的选举也没有改变这一趋势。意共丢的票是给激进党和其他左翼派别赢去了。天民党保持原状（它丢了0.4%的选票），但事实上，天民党是唯一的失败者，它原估计选票会从上次42%上升到43%。新法西斯党丢了1%的选票。老百姓愈来愈老练了。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说，民主力量起了作用，它对旧结构施加了压力，扩展了自己的力量并正在突破旧的框框。民主是共产党战略的关键手段，照耀着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扩大民主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正在进行的地方分权。它对教会和天民党内部强硬路线派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现在意大利全国划分成十五个普通大区 and 五个特区。特区包括西西里、撒丁岛和沿着阿尔卑斯山脉的三个边界区（从东到西为：居住着法兰西少数民族的瓦尔达奥斯塔区、德意志少数民族众多的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区和靠近南斯拉夫住有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区）。

设立大区是意大利共和国宪法所要求的，但直到七十年代宪

法的规定才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压力下,于1975年7月22日(在天民党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具体化为第382号法律。又过了一年,即到天民党在大选中失利之后,才于1976年7月24日颁布法令实行上述法律。该法令是共产党和社会党要求安德雷奥蒂政府为得到这两个党的支持付出的代价。

第382号法律的通过,是意大利自1947年制订宪法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尼科尔斯把功劳归于南尼,他把大区的设置说成是“从潜力来看,是中左联合政府通过的最重要的措施”^①。该法律当时已成为梵蒂冈要加以考虑的大问题,影响到对政府和教会协议的重新谈判(离婚法公民投票以后谈判已开始进行),以及影响到教会拥有的卫生和福利设施^②。这个法律也许会成为迫使天民党这匹马喝水的最为重要的事件。离婚法问题上的公民投票和随后举行的大选,把天民党这匹马带到了水边,现在它不得不勉强呷几口水,最终它会认真地喝起来。

马里博士向我解释了这项法律的重要意义。马里是个外科医生,现在是翁布里亚区意共执委会主席。翁布里亚大区的首府是佩鲁贾,位于罗马和佛罗伦萨之间。

翁布里亚有两大史迹:它是伊特斯坎文化的一部分,在希腊文化形成之前,那里的手工艺就有了很大发展,它又是十三世纪伟大“异教徒”阿西西的圣方济的出身地(圣方济认为教会应该是穷困的),后来他被一位精明的教皇所驯服,受命建立新的修士会,叫做方济格会。

①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212页。

② 把政府和教会协议的修订同第382号法律的实施联在一起,使教会处于守势。

翁布尼亚是一个有七十八万居民的贫苦地区，人口逐年略有下降。它虽位于罗马的北部，但由于主要是农业区，六十年代以前生产上还一直实行实物地租（这种制度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只比奴隶制略高一些），因此它同南方地区的共同点更多。翁布里亚在特尔尼有几座炼钢厂，它们兴建于1915年，主要生产战舰用的钢板。但这些钢厂都没有经过现代化的改造，生产规模缩小了。那里反对资方关厂和要求保持就业的斗争从不间断。那里的褐煤厂也遇到类似问题。褐煤矿敌不过石油资本的竞争，但从社会角度来说，它是有积极作用的。

由于这些斗争，加上贫穷，因此翁布里亚一直在向左转。1970年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在该地区得到近60%的选票，取得控制权。在制订地区性经济计划方面，翁布里亚是开路先锋。早在1953年，左翼的意大利总工会和社会党的意大利劳工联盟共同组织罢工；五十年代末，天主教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也参加进来。1963年，这些工会在该地区联合搞了一项经济计划，为所有政党，包括天民党所接受^①。

尽管翁布里亚是个“红色”地区，也许正因为它是红色地区，因此当地教士都强烈主张政教合一。这是我到佩鲁贾拜访一位亲戚时发现的，我那位刚满二十岁的侄子保尔（他的祖父是我的叔叔）在生日时收到一辆菲亚特汽车作生日礼，他开车带我到离佩鲁贾东北四十英里的小村子拉斯切奇亚去。我的两代祖先都埋葬在那里。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秋天早晨，我们驱车穿过亚平宁山脚。保尔是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是个敏捷伶俐的青年，我们很快就争

^① 要了解有关翁布里亚共产党历史和现状的有趣讨论，可参阅拉斐尔·罗西所著《红色区的意共》。

论不休。我惊奇地发现他尽管年轻，但他的立场却比我刚才讲到的主张政教合一强硬派还要右。我问他是否许多学生都同他的思想相同，他说不然，很少人象他一样，多数人已为世俗主义，为美国书刊、电影和音乐所腐蚀。

他的反共是出自内心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把他父亲之死归罪于俄国人。他父亲、即我的堂兄，参加了意大利军队，二次大战期间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打过仗。意大利军队当时缺少食品、军火和衣服。1943年他受了伤被遣返回国。1960年保尔三岁时，他父亲死于心脏病。他家里人都认为死因是战时缺衣少食。保尔说，“我父亲从此没能把寒气从骨头里赶出去”。不论保尔还是他家里人，却从来没有怪罪墨索里尼把意大利军队派到俄国去。

拉斯切奇亚是一个很小的农业村，位于离古比奥镇几英里的小小山谷中，圣方济在那里把一头贪婪的狼驯服成温和的狼兄弟。我们找到了墓地，那是四周围着白杨的田园诗般的地方，但战时被炸过，后来经过修整，因此许多记录已经散失，墓碑已经移动，墓志铭也已风蚀得看不清了。尽管如此，在位于一座古塔的村办公室里，我们找到了从1700年以来的全部出生和死亡记录。我们化了两个小时查阅登记簿上的蹩脚的拉丁文记录，同难以辨认的缩写和难懂的文体打交道。我们在登记簿上找到了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可惜时间过得太快，我们只能怅然离去。

我们回来时正好赶上我同马里博士的约会。保尔让我在大广场内一座古老优美的宫殿前下车，这里是翁布里亚意共区委会所在地。我在那里会见了马里博士和意共区委书记、中央委员吉诺·加利。加利是个轮廓明显的人，态度自然，象许多优秀的组织工作者那样善于倾听别人意见。马里四十出头，样子很灵活，有一张爱思考问题的漂亮面孔。他的职务等于美国的州长，需要政治和管理

技能。我问他是否对放弃外科医生专业感到遗憾,他说一点都不,因为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很激动人心并且很有价值。

他的办公室是一间奇大无比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上画着圣经里的犹大。落地长窗一直通到大理石的地板上。一张大书桌堆满了文件、卷宗和小册子。会客室一角的咖啡桌旁放着黑皮革的新式电镀椅子。尽管房间那么大,但柔和的光线颇有亲切感。古老建筑同新式家具的结合,表现出传统和变革的浑为一体,显得端庄而宁静,使人感到有意大利的风格。

我送给马里一份刊载着我维护意大利共产党文章的《每月评论》杂志。他送给我一本翁布里亚1944至1970年的历史文献。^①他和加利都懂英文,但我们用意大利语交谈。

我向他说明我准备找一些材料,使乔治·纳波利塔诺所著《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②一书的理论观点变得有血有肉。书

① 多年来意共在出版界十分活跃。1953年意共建立了联合出版社,代替原来的社会文化出版社和再生出版社。从那时起,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二千种以上的出版物,发行量为1800万份以上。从意大利的标准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可参阅最近出的《联合出版社总目录》(1953—1979)。

联合出版社还直接负责八种报刊的出版,即:《马克思主义批评》(1963年建立,政治理论和哲学刊物);《政治与经济》(1970年建立,经济刊物);《社会改造》(1955年建立,教育刊物);《民主与法制》(1960年建立,法律和社会问题刊物);《历史研究》(1959年建立,历史刊物);《妇女与政治》(1969年建立,妇女问题研究刊物);《国际新闻杂志》(1964年建立,国际政治刊物);《电影艺术》(1960年建立,电影研究刊物)。可参阅赫伯特·洛特曼介绍联合出版社的文章。

意共还有其他许多不是由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例如《今天的党》(1978年建立,供干部阅读的月刊)。还有许多地区性杂志,其中有些水平很高,如《社会》(1977年波洛尼亚出版)和《新社会》(1973年都灵出版)。还有工会和合作社出的大量刊物,其中多数是在意共推动下搞的。最后,还有意共机关报《团结报》(1924年由安东尼奥·葛兰西创办)和《再生》,它是杰出的理论周刊(1944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创办)。

② 乔治·纳波利塔诺是意共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他向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作过两次谈话(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都发表在《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

中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地区主义，人们都说第382号法律十分重要，因而我来向他请教。他轻轻地笑了几声，坐下来开始介绍情况。

“你应该懂得意大利各个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这种由于背景、地理和历史的不同所造成的地区差异的力量。意大利受到过无数次的入侵，产生了意大利人彼此间强烈的自卫性地区观念。我们第一要忠于本家族，包括同三代或四代祖先的亲戚在内。其次忠于本乡本镇。然后忠于本省。最后才不怎么强烈地忠于本国。直到今天，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西西里人、罗马人、皮德蒙特人的想法简直相隔好几个世纪。西西里人夸耀他们比英格兰早六年，即在公元1060年就被诺曼底人征服过。他们为征服他们的人感到骄傲，就象罗马人为自己征服人家感到骄傲一样。

马里将身体往前靠了一靠，手弯成杯状，似乎里面装着我能看得见的思想。“这种差别反映在各个方面——语言，风俗习惯，民间传说和行政管理等等。都灵两百年前就有有效的行政机构，但那不勒斯到现在还没有。巴勒莫有二千五百名清道工，比人口多一倍的米兰还多三百名，但米兰很干净，巴勒莫却不那么体面”。

加利插进来笑着说，“我可以给你讲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地区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中左政府时期的三位总理是范范尼、莫罗和鲁莫尔。范范尼是托斯卡纳人，精力充沛，好挖苦人，脑子灵，很自信。莫罗是巴里附近的阿普利亚人，高个子，慢动作，一副苦相，难得微笑。鲁莫尔是威尼托人，热情友好、循规蹈矩。他们领导的政府地方色彩如此鲜明，以至一位英国记者写文章说，一个是托斯卡纳中左政府，一个是阿普利亚中左政府。一个是威尼托中左政府。人人都认为这个记者真聪明。”^①

马里笑了起来说，“我记得这件事，这个例子很妙。地区之间

^① 从彼得·尼科尔斯所著《意大利，意大利》第56页中得到证实。

的民间传说和习俗是很厉害的。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死不泄密还是黑手党的主要武器。都灵至今仍然以艺术首都自居。锡耶纳的巴利奥节是举世闻名的。到现在为止翁布里亚北部的马尔凯仍被人认为是出会计师的地方，因为在教皇统治各国时估价财产和收税的人都是马尔凯人。尽管教皇统治的那些国家在一百年前就不存在了，但罗马至今还有句谚语说‘宁愿家里死人，也不愿马尔凯人敲门’。我们讲到但丁和意大利语言的形成时常打趣说这是‘用罗马人的嘴讲托卡斯纳话’。事实上但丁是佛罗伦萨人，托斯卡纳是他用的方言。几百年来，多数意大利人仍沿用地方语，彼此听不懂。有的地方两个相隔只有二十公里的村子就听不懂对方的话。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尽管由于大学教育、高速公路和电视的普及，情况在起变化。”

马里打着告诫性的手势说，“请别误会，我并不反对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反，我认为地方特色仍在塑造我们的文化乃是件好事。办得最好的一些报纸是十来个城市的地方报。最出色的作家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如罗马的莫拉维亚，弗拉拉的巴沙尼，那不勒斯的德菲利波和西西里的加西莫多。我们的地区和市镇传统是力量的源泉。波洛尼亚有最古老的大学，佛罗伦萨有但丁和美第奇，罗马有凯撒大帝和塞克斯都五世，帕尔马有它的公国，米兰有它的斯菲尔扎，乌尔比诺有拉斐尔等等，几十个、几百个城镇各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区主义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因此1947年大家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将这一内容写入宪法”。

马里站起身来走到书桌旁，拿了一本小书回来。“我把宪法第117条念给你听。三十年后在这一条的基础上形成了第382号法律。宪法赋予地区立法权。请注意，立法权是指各地区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主权，地区制订的法律同议会制订的法律一样有效。规定的范围是什么呢？可以说几乎囊括有关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

方面。我可以给你引证一下宪法条文，宪法上指明归地区管辖的有：‘选区，城乡警察，各种交易会和市场；公共福利，卫生和医院；职业学校、专业学校和教育补贴；地方博物馆和图书馆；城市建设；旅游业和旅馆业；有轨电车和区内公共汽车线路；房屋建筑和沟渠及地区性公共工程的维修；航运和沿湖港口；矿泉和温泉；采石场和泥炭沼；狩猎；内河捕鱼；农林业；手工业’。以上是宪法第117条。第118条还规定国家可以授予大区和市政府以其他职权。”马里合上书说：“这就是你们美国人早就在各州和各市实行的地方分权。如果你掌管了警察、福利、卫生和教育的，就等于掌管了居民通常同政府打交道的全部事务的90%。但这只不过是个开端。”

马里目光变得热切起来，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尽管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它为地区制订和实行经济计划敞开大门。所有的制造商和国营工业都必须同我们合作，因为他们的工厂需要道路、自来水、下水道和电力，这些统统是在地方或地区管辖的范围内。然而，我们最有力的手段是对农业的管辖权。例如我们这个区在台伯河上游的特韦雷高地是种植烟叶的地区。几百年来都由大公司向农民确定收购烟叶的价格。近两年来，我们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里，现在是由他们定价。往常烟草公司就会要政府帮他们同合作社斗争，向合作社施加压力，但在这里就行不通。政权在我们手里！”

加利一直在注意着我的反应。他说：“在你们看来这是一件小事，但这预兆着将来的发展。要是有一百万件这样的小事，就会使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向发生变化。这就是乔治·纳波利塔诺所说的将社会主义因素引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含义。”

马里又补充另一个论点。“统治阶级十分意识到我们的潜力。于是，中央政府就破坏法律，放慢向地方移交职权的步伐，并扣留应归我们支配的经费。例如，医疗站现在归我们管理。去年归中央

管理时，医疗站到手五十亿里拉。但今年到现在为止，中央政府只给了我们十亿里拉。他们在骗我们。部里不是拿四十亿里拉去支付那些应该解雇的人员，就是干脆扣了钱不给我们。扣压了经费，我们就办不成事了。这样地区主义的思想就会失去信誉。”

“你们难道无权收税？”我问道。

“基本上无权。大区 and 市政府可以按百分比从国家预算中拿到一些经费。此外，由于中央将有关职权下放到地方，按理说我们应该拿到中央经管时支付的费用。而且，我们按理还能拿到拨给一些不起作用的、可以撤销的机构的经费。例如，有一个机构，名义上是为了照顾1984年在索马里牺牲的战士的寡妇。这当然是一个让少数人可以拿钱不干事的机构。”

马里又回到书桌旁，递给我一个大开本的小册子，标题是《翁布里亚地区政府公报，1977年9月7日佩鲁贾》。他说“我们在1977年7月重新印刷了宣布第382号法律生效的法令。在这本册子的32页上有一个单子，列举六十二个人人都同意应该取消的机构。请注意，这还只是开头。没有人知道这种毫无用处的机构和办事处究竟有多少。共和党人乌戈·拉马尔法当财政部长时说，在他的部里这样的机构有三千个以上。最近天民党的内务部副部长说有五万四千个。纯粹是照顾关系，无法计算的浪费。那笔钱应该是归我们的。”

“那你们怎么能够弄到手呢？”我问道，“这些机构是天民党政府整个政治机器的组成部分，它又何必取消呢？那不等于是政治上自杀吗？”

马里和加利都高兴地笑了起来，就象我是一个聪明的学生。

“好，”马里说，“你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天民党不能再走老路，它必须改革。它不愿改革，但是不能不动。”

“那是为什么呢？首先，它为什么要让第382号法律通过呢？”

我可以理解它为了作出蛊惑人心的姿态而让法律在形式上得以通过。但是它又为什么要通过那个将法律付诸实施的法令呢？”

加利说：“是我们让他们干的，我们党把第382号法律作为支持安德雷奥蒂的交换条件之一。”

后来我发现这并不是全部答案。我在一本攻击第382号法律的文字晦涩的天主教杂志上找到了答案。我在波洛尼亚圣心大学校长朱塞佩·拉扎蒂的接待室里等着见他，看到桌上放着十来本报刊杂志。我碰巧拿起《意大利教士评论》，其中有篇文章《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评价》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在这时候侍者来叫我，我在脑子里记住这一期是1977年第12期。同校长谈完话，我经过圣心大学内修女们办的一家书店，运气很好，那里有这本杂志。

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那篇文章很没味道，^①但另外一篇关于第382号法律及其产生经过的文章却很有价值。它解释说：二十世纪初梵蒂冈的智囊把地区主义作为反对加富尔支持的世俗国家的武器，从此之后这一政策就成了天主教的政治传统。^②到立宪议会召开时，原来的理由和传统成了天民党的组成部分。由于当时社会党也是强烈的地区主义者，因此关于建立地区制的宪法第五部分就通过了。

然而，当天民党在1948年大选中取得绝对多数后，加斯贝利并

① 这篇文章是改写了葛兰西的“替代”理论，即由于人们在斗争中觉悟提高，因此马克思主义将在人们的“一般见识”中代替宗教的位置。作者的结论是教会必须更新，不让它再走下坡路以阻止葛兰西战略。作者希望现在还来得及，这是这篇文章中最有讽刺意义的，尽管并非作者本意。

② 这篇文章是莫代纳大学法律系教授卡拉奇尼写的。他认为地区主义曾是斯图尔佐的人民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目标。这项建议在天民党1944年出版的《天主教的主张》一书中所发表的纲领中正式提了出来。

不愿削弱自己领导的中央政府。随着年岁的流逝，共产党和社会党在“红色地带”(指中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取胜，天民党认为更没有理由要保留地区制。当时除了翁布里亚的共产党人外，有不少共产党人不能马上看清地区主义的潜力。

功劳主要应归于社会党的老资格领导人彼得罗·南尼。^①他把地区主义(同电力工业国有化一起)作为参加六十年代中左政府的条件。经过一拖再拖,1970年5月16日通过了第281号法律建立地区制,但法律措辞很含糊。1975年1月又通过了新的第382号法律,以“完成行政职能的移交”,其实那时还没开始移交。当时委任马西莫·赛维洛·贾尼尼教授主持一个小组委员会,研究移交工作如何进行。^②

这时共产党和社会党已在六个地区拥有多数选票,在另外三个地区也有相当影响。他们迫使政府采取行动。1976年大选结果使他们有力量强迫政府真正贯彻第382号法律。所以加利说“是我们让他们干的”这句话在策略上是对的;但是,他暗示这是共产党的长期战略的结果,却并不符合事实。

马里还同我谈到了地区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的问题。举例来说,地区议会是个立法机构,类似美国州的立法机构,有权制定法律,其条件是这些法律同其他全国性法律、其他地区法律或意大利宪法不发生冲突。为了防止这些法律同全国性法律发生冲突,在罗马设有主管各地区的专员,专门管理这方面的问题。至于同其

①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236页。

② 在奥古斯托·巴尔贝拉所著《地方政府和国家改革》中有第382号法律全文和一个很长的介绍。

他地区法律和宪法冲突的问题，权力主要在内阁，对内阁的决定，可以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马里说，事实上内阁僭取了权力，它不是去决定这些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而是去决定地区法律的是非曲直。既然有关权限的问题堆积如山，成百起上诉有待裁决，向地方转移权力的步伐也就放慢了。

另一个主要冲突是属于财政方面的。中央政府在宣布给各个地区拨多少款之前，先要求地方制订计划。这显然是颠倒了先后秩序。要是事先没有作计划，即使钱拨下来了，也不能动用，变成了帐上的“未用余额”，实际上这样的钱永远到不了地区手里。马里告诉我说，他们在翁布里亚费尽心计制订计划往上送，以便支用拨款。他们的“未用余额”只有二百亿里拉（约合二千二百万美金），而西西里累积的“未用余额”已经达到几千亿里拉。

马里对中央官僚机构之无效和冷漠十分恼火。他说，“意大利官僚机构之庞大程度被人夸大了。如果研究一下统计数字，就会发现若按人口比例计算，意大利政府的工作人员比其他欧洲国家要少相当多。^①但我们的官僚机构的劳动生产率却低得惊人，这是因为裙带关系。”

加利插嘴说，“请你注意一点，我们共产党人并不反对给亲属谋差事，因为在意大利不这么做可是大逆不道。我们若有空缺，当然宁愿找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而不愿让给天民党。但他们总得称职呀！天民党把职位都给了从来不上班的人，这些人连发薪的日子都不肯自己来，打发个亲戚取走工资口袋完事。”

“除了没有效率，还妄自尊大，”马里接过话头说，“一个小小的

① 1979年12月22日至23日《经济学家》第273期的文章《公务员多得象山一样》，它提供每1000人中公务员的人数：意大利 12.8；西德 14.3；法国 14.6；英国 21.3。

文书就代表政府，代表当局。你若对他的态度提意见，他就会说：住嘴，要不我去叫警察。他还真能这么做，因为从法西斯时代沿用下来的法律规定，凡对当局表现不尊重就是行为不端。”

我问道：“那么你们怎么知道你们地区和城镇的官僚机构不象罗马那样呢？”

“问得合理，”马里说，“是存在这种危险。但到现在为止趋势是相反的。我们的人都是干工作的，我这么说不光指左翼工作人员，而是指所有的人。办事也比较公平。我们确实愿意把工作交给左翼的人去干。但是，如果天民党的工程师比共产党的工程师更称职，那就让他去干。这里人人都干活，因为我们自己以身作则。我工作很忙，加利也是。在意大利典型的机构里，第一把手完全靠政治关系，什么事都不干。他有个助手替他管理一切，这个助手又有个助手才是真正干工作的。三个人干一个人的活，这就使大家都泄了气。我们尽量提倡一种集体精神。”

加利急切地打断话说，“我们共产党人已经表明能做到什么。波洛尼亚三十年来都由左翼执政，被公认为即使不是欧洲管理得最好的城市，也是意大利管理得最好的城市。在意大利，“红色波洛尼亚”已成了口头禅。它是左翼的骄傲，也引起右翼的妒忌。三十年来没有出过丑闻！我不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城市堪与它匹敌，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做不到，我们唤醒周围人们最美好的品德：大公无私、服务精神、联系群众。我知道，听起来我们好象是一队童子军，但你要知道，”加利讽刺地说，“童子军的道德观并没有错。”

我告诉他说，“我在罗马时也是童子军。我国的共产党也为此受到过嘲弄。”我接着想搞清楚一个疑问：天民党政府既然知道红色地区的发展会损害自己的政治机器，为什么要帮助红色地区呢？我问道：“罗马为什么要给你们钱？你们说他们想贬损红色区

的信誉，还说他们欺骗你们。那么你们将如何让他们改变态度呢？”

马里脸上的表情简直同浮士德里魔鬼靡菲斯特一样，眼睛半闭着，鼻孔一煽一煽，带着冷笑，颇为自得地说，“喔，我们会把钱弄到手，很快弄到手。”加利轻声地笑着，我看得出来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

马里说：“要是罗马的天民党不把欠地区的钱拿出来，天民党就会分裂成两半。现在各大区中红色、白色旗鼓相当，六个是红色地区，六个是白色地区，还有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白色地区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同我们完全一样，都是有关财政、管辖权限、实际执行等问题。我们红色地区有一条铁的纪律，就是绝不单枪匹马同政府作斗争。我们绝不这样做。我们总是联合在一起。我们在任何特定的问题上都同白色地区协商，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要求，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找政府。政府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可以拖上两三个月，最后还得退让，否则他们就会失掉他们自己人的支持。他们可不敢冒这个风险。”

我问他们是否有一个全国地区执委会、理事会之类的机构。

马里说，“没有。现在为时还太早。一切都还是非正式的。波洛尼亚区议会议长纳塔利塔·圭拉是天民党人，很讲道理，为人坦率，相当聪明，也很正派。他是红色市长雷纳托·赞盖里的好朋友，他懂得我们大家必须团结合作。我要是遇到问题，就打电话问他是不是也遇到类似问题。我们交换一下意见，提出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他就打电话找全国各地的天民党区主席。我就去找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主席。我们非正式地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我们就一齐到罗马去。”

马里用手指轻轻地叩着鼻子说：“我们靠嗅觉来辨别形势。天

民党党内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中有不少好人。他们支持我们的建议。有些人是野心勃勃，我们就同他们做交易。有人欠政治债，我们就去找他们。在任何一个特定问题上，我们都搞联合行动，让政府阻挠不了。”

加利把马里送给我的那本翁布里亚历史书拿了过去，翻了开来说，“你必须懂得，教会和天民党内部有不少有能力的人，他们想对天民党进行改革。他们把地区看成是革新天民党的工具。你听听我们地区天民党议员的话：‘我们天民党在翁布里亚十五年来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我们可以同地区站在一起，试图改变目前的政治均势，但只能同地区站在一起。’”^①

“这位议员叫弗兰切斯·马尔法蒂”，马里说，“他是天民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共同市场执行理事会轮到意大利当主席时，政府曾挑选他去担任。顺便说一下，刚才引的马尔法蒂这句话是加利早在六十年代初《再生》杂志上写的文章中提到的，当时党在地区问题上还相当落后，你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②

“在第6页上。”加利说，“我把页码给你写在扉页上。”他随后看了看表说，“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马里开车送我回旅馆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汽车在石子路颠簸着。他对我说：“在分手之前我还要谈最后一点。迫使政府违心行事的最主要因素，是群众的压力，特别是工会的压力。例如1970年的总罢工推动了改革，其中包括通过有关地区的第一个法律。来自居民委员会和市长们的压力也很大，不管这些居委会委员和市长属于那个党。在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党派倾向在基层不起多少作用。在医疗站、学校和福利等问题上，天民党人同共产党人

① 卢乔·巴龙奇尼：《翁布里亚的共产党》，第362页。

② 吉诺·加利：《翁布里亚：平原斗争的经验》。

一样有战斗性。你要是访问波洛尼亚，你就可以看到，联合和领导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功，不管罗马如何捣鬼、限制，扣钱不发。你一定得在那里耽一段时间，我明天给赞盖里（波洛尼亚市长）挂电话，告诉他等你。”

红色波洛尼亚也许是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最大广告。波洛尼亚已成为欧洲大陆优秀市政管理工作的旗帜，并且象个商标一样，“红色”“波洛尼亚”这两个词通常是连在一起的。西德的《明镜》周刊称“波洛尼亚实现了城市更新的梦想”。法国的《共和之路》周刊说“波洛尼亚在不断制造新闻”。在大西洋彼岸，连反共的通讯工具也不得不流露一点点敬佩之意。《纽约时报》说它“有效和民主”。《新闻周刊》写道：“到处都认为波洛尼亚是欧洲管理得最好的城市”。^①然而，有些赞词也把波洛尼亚比作罕见的红色“岛屿”，波洛尼亚人摒弃这种看法。赞盖里教授在他漂亮的市长办公室里请我喝茶。他的讲话使我对问题看得更透彻。他平静地说：“我们不是一个孤岛。我们是意大利的一部分，就象都灵、罗马或那不勒斯一样。我们并不是拓荒者。有些做法是我们创造的，有些也是学来的。我们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搞的农业工人联盟是采用迪·维托里奥二十世纪初在巴里附近的阿普利亚地区采用过的方针和办法，请想一想，当时他只有十几岁！居民委员会是我们开始组织的，后来佛罗伦萨又作了改进。我们搞城市规划的思想是从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学来的。”

我们用意大利语交谈，间或夹杂几句英文短语。赞盖里是一个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学家，他学英文是为了研究亚当·斯密，里

^① 所有引言都来自马克斯·亚吉、罗杰·马勒和西尔·斯密德所著《红色波洛尼亚，管理一个城市的共产党人》一书的序言。

嘉图，马歇尔和凯恩斯等人的思想。

赞盖里说：“波洛尼亚的确是个小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力量雄厚，市民意识很浓。^①这个城市和地区过去有伟大的进步传统。不管怎么说，我们这里的大学是十一世纪建立起来的，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波洛尼亚一直是闻名的学问之城，就象歌德所说的受人尊重，学识出众。第一个社会党议员是1892年在波洛尼亚当选的^②他既是巴枯宁的追随者，又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他笑了笑说，“当时已经采取了联合的立场。1914年波洛尼亚的市长是社会党人，1920年的市长是共产党人。波洛尼亚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都是反抗墨索里尼的中心。游击战士中，艾米利亚人有五万，其中牺牲的就有六千人。我们战后的第一任市长朱塞佩·多扎是一位伟大的游击战领导人。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有不少有利条件。但主要还在于每次大区选举我们共产党人的得票数都稳步上升。我们的得票数占总票数的50%，社会党占10%，因此在市议会六十个席位中，我们占了36席。而天民党则相反，他们在都灵和佛罗伦萨执政二十五年，结果于1975年给赶下了台。问题很简单，我们的所作所为得到人民的拥护。”

波洛尼亚所做的就是关心市民生活。它开创了市民在上下班高峰时免费乘坐公共汽车的制度。五年来公共交通客运量增加了50%，从而减少了小汽车的使用，也消除了道路堵塞的情况。（有一位天民党市议员抱怨说，“公共汽车快把小汽车从马路上赶走

① 赞盖里同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韦塞和尤金妮亚·吉诺韦塞的谈话。

② 安德烈亚·科斯塔(1851—1910)。他1879年从无政府主义者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甚嚣尘上的“转变”打开了意大利劳工运动历史的新阶段。赞盖里所提供的科斯塔传记见《意大利工人运动：人物志 1853—1943》第二集第109—120页。

了”。)3岁至6岁的儿童中,送入幼儿园的在1975年为77%,1978年则上升到接近90%。^①3岁以下婴儿半数入托儿所。智力发育缓慢或残废的儿童都已吸收入学,贫民窟似的特种学校都已经关闭。老人被送到海边或山上度假,由于基金有限,由居民委员会确定先后次序,因为居民委员会最了解居民的情况。

区法律是严格的。禁止对不动产进行投机买卖,房屋建筑基本上没有被拆掉,而是翻修。翻修期间住户安顿在居民点特设的临时安置所,使他们不致脱离原来的环境。^②开店可领执照,各居民点都有足够的商店,这同那不勒斯大不一样,那里七千人的居民点连一家商店也没有。消费合作社是有组织的,并同省里的生产合作社挂钩,因此波洛尼亚的食品价格要比其他大城市低3—5%。^③

该市各方面的统计数字给人印象很深。1951年至1953年同1971年至1973年相比,人口约增加了1/3,住房面积增加了一倍,教室增加了三倍,娱乐设施如足球场、游泳池、篮球场等增加了十倍。^④花园和公园的面积按人口约平均为九平方码^⑤(比罗马和米兰多一倍,比那不勒斯多三倍)。^⑥在卫生方面,二十年来医院床位增加了一倍(每千人十二张床位,全国平均数为每千人七张床位)。^⑦巡回医疗队,包括一支精神病医疗队,依次到每个居民点进

① 亚诺·马勒和斯密德:《红色波洛尼亚:管理一个城市的共产党人》,第96页。

② 同上,第61页。

③ 同上,第92页。

④ 雷纳托·赞盖里:《波洛尼亚的工会:恩佐·比亚吉同雷纳托·赞盖里的谈话》,第140页。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其中40页是赞盖里的谈话,约140页是他关于波洛尼亚政策和管理的作品。

⑤ 一平方码合0.836平方米。——译者

⑥ 赞盖里:《波洛尼亚的工会:恩佐·比亚吉同雷纳托·赞盖里的谈话》,第46页。

⑦ 同上,第140页。

行疾病预防工作,为居民化验、照X光和接种疫苗等,重点照顾孕妇和幼儿。尽管这方面进展很大,但许多设施仍然供不应求,因此还制定了将来的发展计划。在波洛尼亚,一切都是按计划发展的,包括住房、教育、卫生、交通、公园、商业网点,老年津贴等。

三十年来,红色波洛尼亚一直是卡在罗马天民党政府喉咙里的一块骨头,时常使天民党在其他城市的行政管理受到责备。他们采取阻挠和破坏,以及经济上的有意刁难,来进行反击。例如,意大利全国都有为学习落后的学生进行课余补习的制度,以帮助他们参加考试。1972年罗马为此派了二十五名教师到波洛尼亚,而派去米兰的却多达二千人!(米兰人口为波洛尼亚的三倍)1974年又削减为十四人。① 中央政府欠波洛尼亚的款项累积为一千三百一十亿里拉,为该市全部债务的四分之一。②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波洛尼亚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赞盖里将他的政绩归功于意共的统战方针以及它所信守的民主参与制。赞盖里认为居民委员会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发展,可以同工厂工人委员会和区域自治等量齐观。居民委员会始创于1964年,受到各党的普遍支持(十八个居民委员会主席中只有七名是意共党员),年复一年,居委会承担了愈来愈多的任务:他们主管分配福利金,修房,视察学校;他们主管休假和幼儿入托的先后次序。过去

① 亚吉、马勒和施密德:《红色波洛尼亚:管理一个城市的共产党人》。

② 赞盖里同作者的谈话。政府对市政的财政政策混乱不堪。全国预算对经费作了全面分配,然后再分到各市镇。由于预算下达很迟而工资需要及时支付,因此各市镇先“借用”预算拨款,也就是说,借自己的钱用。他们可以以7—8%的利息向国库借钱,但国库所借的钱不得超过去年拨款的50%,因此各市镇要以高达20%的利息向私人银行借款。意大利有八千市镇,每年赤字总额达30—40亿美元。如果财政政策协调得好一些,那么赤字可以大大减少,甚至全部消灭。可参阅亚吉、马勒和斯密德所著《红色波洛尼亚:管理一个城市的共产党人》。

堆在市长办公桌上的问题，现在由居委会解决了。波洛尼亚的居民也许是世界上政治觉悟最高的居民。^①

人民明显地直接参与政治。^②外国记者注意到人们一群群地自动集结进行争辩或讨论。星期天，大广场上挤满了发表意见的人群。他们不是激进派，也不是站在肥皂箱上夸夸其谈的街头演说家，而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往往是两三个朋友或几个陌生人在那里议论开了，过路人就停住脚在旁边听，有时也参加进来，很快就有十来个人卷了进来。有的人带着孩子出来散步，在那里站一会儿，听到辩论的中心议题，于是夫妇俩在继续散步的时候也跟着讨论起来。

有一天我在圣佩特罗尼乌斯教堂对面的大广场上度过整个下午。广场上的辩论很活跃，有时也很尖锐。大家互相交换意见，十分吸引人。那里不存在什么“治安”问题，稀稀拉拉地有那么几个警察，到处是留着长发的青年，带着真诚友好的表情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参加交谈。这是司空见惯而又引人注目的现象。前一天，我在“150小时”办公室门口看到有几百个青年工人在举行示威。该市通过了一项法律，为了提高在职工人的技术，工人可以上150小时的夜校而工资照付，这个办公室就是为此而设立的。我搞不清楚这次示威提出什么要求，但示威队伍阻碍了交通。有五、六名警察在一名警官的带领下，竭力在为汽车疏通道路。他们态度友好，采取温和劝说的口气。“同志们，请你们靠里边站一站。你们这样叫我们很难办。”有一个人站在大楼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喊道：

① 红色波洛尼亚政治水平之高，无疑成为1977年一些极端主义团体和某些法国知识分子向该市挑衅的主要理由。从赞盖里所著《波洛尼亚1977：同法比奥·穆西的谈话》中可看到波洛尼亚的强大防务。从马利亚·马乔基《四月的马克思之后》可以看到对波洛尼亚以及对意共全党的强烈袭击。

② 安德鲁·考普坎特：《波洛尼亚：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

“对。同志们，靠里边站。”有两三个人在抗议：“别理他，站到外面去，站宽一点，挡住交通，楼上的人就会注意我们了。”

这些挑动者没有得逞。示威者靠里边挤过来，他们显然采取同警察合作的态度，但并非出于畏惧，而是出于通情达理。队伍外围有几个示威者在笑着同警察说俏皮话。

我把自己见到的情况告诉赞盖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我们的警察队伍很了不起，懂专业，受过良好教育。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有的还上过大学（意大利全国40%的警察只上过初中）。^① 市民们尊重他们。警察则感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分子。我们组织罢工或示威时，警察就会来问我们的组织者：‘你们要我们帮什么忙？’我们对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也投桃报李。”

当我讲到广场上的气氛时，赞盖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我们交谈时，他一直彬彬有礼，应答如流，但总有点若即若离。这时他的语调变得热切起来。“你看到了民主的进程在起作用。它象……”他略微往前靠了一靠，搜索着恰当的词语，“它象毛细管一样遍布全市。民主进程的中心——心脏——就是居民委员会。我永远不要忘记1964年在隔壁大厅举行第一次全体居委会会议时的情景，我们当时有十四个居民委员会，男女委员有二百八十人。”

他面孔放光，一只手朝上弯着，象托住了空气，用心在寻找恰

① 由于恐怖主义的原因，警察的重新组织、工会化和“非武装化”成为意大利的一件大事，而共产党在斗争中居首位。警察工会最主要的组织者是佛朗哥·费代利，可参阅他所著《警察工会》以及阿尔贝托·贝尔纳蒂所著《警察制度的改革：非武装化和工会化》。最近对意大利警察进行的有历史意义的调查是罗马诺·卡诺萨所著《从1945年到现在的意大利警察》；安杰洛·多尔西的《镇压机器：警察》和法比奥·伊斯曼的《维持秩序的力量》。关于现代意大利警察在生活中所具有的政治和社会整体感，可参阅贾恩卡洛·莱纳尔等著《警察的作用》和山德罗·梅迪奇所著《警察的生活》。

当的词汇来解释。“你瞧，有人把居民委员会说成是草根，但这个比喻不好。可以说它们有如地被植物，你明白吗，就如覆盖大地的常青藤，它们的卷须纵横交错，到处都是。你抓住一头就可以带起一大串。”

“每个居民委员会有二十个委员，其中一部分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进行更替。每个居民点总有百来人当过居委会委员。此外，一些当过工厂委员会委员的工会会员也在当地居住；居民中有市政府的雇员，如教师、公共汽车调度员、卫生和住房检查员等等；还有店主、小商、退伍的陆军军士等等，这样你就有那么五、六百个有组织经验的人。只要想一想他们每个人都去做四、五个，八、十个人的工作，那么在居民点的一万五千个成年人中，他们就占了三、四千人。”

他举起一只手，似乎我会冲昏头脑一样，接着说，“当然，我们不能夸大，不能说谁都不吃不喝光谈政治。但我们不能缩小他们的作用。他们都参加投票，数字是惊人的。你知道意大利90%以上有选举资格的选民都参加投票。在波洛尼亚，这个数字高达95%，简直令人不能相信。如果考虑到有些人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去投票，那就是说，基本上波洛尼亚人人都投票。”他带讽刺味道地朝我笑了一笑。“美国人会相信这个数字吗？我看到报上说，美国合格的选民中只有半数投票。”^①

我说这个数字好象少了点，但我不愿把话题从波洛尼亚引开。我问他波洛尼亚同教会关系如何。

“不怎么热烈，但还友好。在莱尔卡罗红衣主教掌权时期，我

^① 1978年3月16日《圣胡安星报》。以华盛顿为基地的美国选举研究委员会曾报告说1976年参加总统选举的有选举权的选民为54.4%，从1960年的63.4%有所下降。卡特当选总统是由27.2%的选民选出的。有三千万美国人从来不投票，因为他们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不满。

们同教会有磨擦，但教皇约翰改变了态度。此外，波洛尼亚天主教徒投共产党票的比投天民党的多，教会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①

我对赞盖里说，意大利国内外有不少左翼人士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城市的有效管理，是帮了资本主义的忙。马克思称之为“阴沟里的社会主义。(sewer socialism)”欧洲有许多城市是由社会民主党管理的。那些改革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本身，美国的新政曾进行过许多改革，但资本主义却比过去更加强大。^②

“我了解这一点，”赞盖里用意共中央委员的权威口气说，“我看到过这些论点、怀疑和批评。坦率地说，我认为大多数的批评者思想僵化。”

“改革可以起两方面的作用。美国的新政是用改革来加强资本

① 下面是波洛尼亚公社在两次全国大选中得票情况(根据1979年6月6日《晚耶报》):

	1979		1976
意大利共产党	45.15	意大利共产党	46.7
意大利社会党	7.81	意大利社会党	8.0
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4.13	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4.2
意大利共和党	4.56	意大利共和党	4.5
天主教民主党	24.95	天主教民主党	27.3
意大利自由党	2.68	意大利自由党	1.7
意大利社会运动	3.68	意大利社会运动	4.4
全国民主联盟	0.26	全国民主联盟	—
意大利保皇民主统一党	0.94	无产阶级民主联盟	1.2
激进党	4.76	激进党	1.8

共产党和社会党所获的53%的选票中，至少半数来自天主教徒。天民党的选民中至少有25%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非天主教徒。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注明，意共在1979年大选中丢掉了4%的选票，但在波洛尼亚只丢掉1.5%。天民党在那次大选中同上次取平，但在波洛尼亚丢掉了近2.5%，看来意共和天民党在波洛尼亚都把选票输给了激进党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② 可参阅1977年6月《每月评论》第17页编者的看法。

主义制度,以保持基本现状。如果天民党本身搞改革,清除贪污腐化,它就会强大起来。如果天民党改革税收制度,那就会使国家更加巩固。(对天民党来说,)改革是一个过程的**终端**。”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改革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在争取改革的斗争过程中,我们训练人民组织起来和进行自我教育,从而使我们能超越现状。对贪污腐化现象和税收办法等等的改革,可以提供社会资本,使我们减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共产党通过实行民主来教大家学会民主。意大利人正在学会不再害怕统治当局,抛弃固有的逆来顺受思想,学会自己站起来。如果波洛尼亚市政府的办事员官气十足,人们就抱怨;他们去叫警察,因为他们知道警察是自己人。”

“问题的根本在于权力。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差别不在于渐进主义和改革,而在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意志,在于使用权力的意志。我们正在大区和市镇取得权力,运用权力。不仅是我们的党员,而且是我们的人民,各阶层的广大群众在学习运用权力。这就是参与制的全部内容。”

“我们的问题很多。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危急状态。青年的失业问题使他们陷于绝望,最终导致恐怖主义。即使我们掌握了全部权力,工作也很难办。何况我们在同天民党分享权力,而天民党并不心甘情愿,这就使工作更加难办。我们的做法也许行不通,但我们在试验。”

我们分手时他送了我一本书,书名叫《波洛尼亚市长》。我问他是否放弃自己学术前程而感到遗憾,他迟疑地笑笑说:“所有的作家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在这本书上找到答案。”

那天我在旅馆房间里坐到深夜,我发现这本书是红色波洛尼亚市长赞盖里表明自己信仰的声明:“我的一生经历是无比奇妙的

……一个城市是人类社会的缩影，它反映出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但它首先是人为生活而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可是它往往转过身来打击自己的创建人，散发臭气，使生活变成负担。把城市还给人民，尤其是还给那些最需要它但却往往受到排挤的老人和儿童，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我想波洛尼亚的老人和青年生活要比其他地方稍微好一点……我想这里人民受到的重视要多一点。当个市长是不容易的，常常会陷入绝望之中。我工作十分忙碌。每天工作时间延得不能再延，影响了我的私生活。但是我所得到的要多于我所失去的。我得到人们的友情和了解，从而得到了支持。在一个人们对感情十分吝啬的社会中，我得到的远远超过我应得的。”^①

^① 赞盖里：《波洛尼亚的工会》第29—30页。

第九章

如何盗窃一个国家

1976年当意大利的几个执政党被中央情报局、洛克希德和埃克森收买的丑闻揭露后，加拿大唯一神教会的一个和平主义者团体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如何收买一个国家》。^①但买者要有可买的，就得有卖者出卖。国家属于谁呢？林肯说国家及其机构属于居住于其中的人民。既然中央情报局，洛克希德和埃克森收买的不是意大利人民，而只是个别政治家和官员，那么推理来说政治家必然窃据了国家。因此，《如何收买一个国家》必然以《如何盗窃一个国家》为前提。

“如何”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舞弊^②。威廉·格拉斯顿说过，波旁王室在那不勒斯的政府把不公正变成了一种政府制度，而天民党人三十多年来则把舞弊建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其代价是使国家遍体鳞伤，而天民党自身付出的代价则是选票逐步下降，以及共产党在1979年前选票稳步上升。可以说，共产党向全国显示出它有资格执政，而天民党是没有资格的。

在意大利，舞弊并不是零零星星的受贿问题。它象毛细管一样

① 奥拉齐奥·巴雷塞和马西莫·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262页。

② 原文为 corruption，亦可译作“腐败”、“贪污”、“腐化”、“贿赂”等。——译者

纵横交错，同整个社会结构交织在一起，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方面，无不受到它的影响。舞弊是一种传染病，其为害罄竹难书。最近出版的《天民党合股公司》一书的作者奥拉齐奥·巴雷塞和马西莫·卡普拉拉声称，单单列举天民党那些众所周知的丑闻，就足有一部百科全书那么厚。有些是微不足道的，例如邮票事件。有些则令人眼花缭乱，例如洛克希德在一次交易中同时向总理、^①国防部长和空军参谋长行贿。

邮票事件是这样的。1961年乔瓦尼·格隆基总统访问秘鲁，为纪念此行，发行了三枚印有南美地图的邮票。秘鲁大使指出邮票上印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的早已过时的旧地图，因此意大利政府下令将邮票统统收回。不知怎么搞的，命令下达三天后才公布于众。就在这三天里，知情人凑足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把当时每套只值二百零五个里拉的“玫瑰色的格隆基”邮票买了下来，这套邮票马上成了集邮者收集的珍品，每套价值二十五万里拉^②。

至于出卖一艘所谓“过剩”驱逐舰给帕罗迪法巴里斯公司一事就不那么漂亮了。公司买进时只化了十万里拉，一转手就以六千五百万里拉卖出。^③还有一件事是政府为“赔偿”阿基莱·劳罗在二次大战中损失的船只而送他四艘自由型轮船作为“礼品”。劳罗是支持和帮助法西斯打世界大战的。他是个军火商，曾经是墨索里尼政权的支柱，也因此被盟军政府关进战俘营。战争一结束，意大利人重新掌权，他获释后回到他在那不勒斯的政治基地。他后来

① 这位总理的代号是“羚羊皮匠”，据说他不是鲁莫尔，就是莱昂尼。

②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91页。这些知道内情的人运气真好，他们把弄错了的邮票贴在信封上寄了出去（大概是寄给他们自己的吧），结果每套值九十二万里拉。见萨索尔所编《意大利邮票目录（1976）》第168页。

③ 同上，第190页。

促使“人人党运动”^①右翼议员支持加斯贝利。“报酬”不久就送到了他手里。^②

这种时而出现的、在特定情况下舞弊的例子是哪个国家都在所难免的。社会可能为此提供了方便条件，却并未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现象。尽管应该受到指责，但不象意大利的有组织舞弊那样危害国家。最低级的舞弊是搞裙带关系，徇私情和用人唯亲。文官制度简直是开玩笑。考试及格与否往往早已内定。要谋一个职位必须先找好关系。安插熟人在政治生活中是家常便饭，到处都一样。但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总指望受惠者能尽职。在意大利却不是这样，最糟的一些政府雇员甚至不上班。

同裙带风平行的乃是拉拢收买之风，即政府给一些好处，不是为钱，而是为选票，或是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帮忙。它不完全是受贿，而是不消自己化一分钱，就能得到好处，拿公家利益当人情。这些好处通常都是行政性的，例如批准在禁区修建房屋，或将假冒残废的人列入领取福利金的名单。意大利总工会领导人布鲁诺·特伦廷说，有的村子领取盲人救济金者竟然包括汽车司机和地方足球队队员。

《快报》曾经揭发过一件行政当局给好处的突出例子。它透露说，罗马教廷的三位高级官员被批准免缴个人资产特别税。^③这三位贵人为：教皇庇护十二世的侄子朱利奥·帕切利亲王、斯塔尼斯劳·佩切伊伯爵和菲利波·塞卢皮·克雷申齐侯爵。他们作为哥斯达黎加、马耳他和圣马利诺驻教廷的大使，在梵蒂冈担任外

① “人人党运动”系二次大战后的一个蛊惑人心的反动政党，时髦过一个很短的时期，后来该党的选民都转而投天民党和意大利社会运动的票。

② P·A·阿伦姆：《那不勒斯战后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第281页；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32页。

③ 见1958年3月30日《快报》。

交职务。梵蒂冈自1947年起，曾根据他们的外交职务，要求让他们享有外交使节的免税待遇，但遭到几任财政部长的拒绝，因为这三个人实际上都是意大利公民。然而在1958年，财政部长决定准予免税。谁也不会认为安德雷奥蒂受了贿，同样谁也不认为财政部长突然慷慨起来。这里面有政治上的交易。^①

一般来说，这种好处数目不大，但既然受到恩惠的人有几百万，加在一起就相当可观了。例如，为使农民留在农村种地，法律批准向农民提供小量津贴。著名经济学家路易吉·斯帕文塔教授告诉我，按当时人口统计，农民为五百万人，而领取津贴的却有六百万人。^② 这些津贴与其说是起经济作用，不如说是起政治作用。每一份津贴的金额很小，每星期只有几美元，对生产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它有助于减轻穷人的困难，同时可以保证天民党得到一堆选票。

有两个领域拉拢收买之风和浪费十分严重，即公共机构和国有化企业。公共机构不是指邮局和军队等，而是指福利、社会保险、工人抚恤金、退伍军人津贴、孤儿救济、保健津贴、农民津贴等机构。据佛朗哥·卡佐拉称，1977年这类机构总数有四十九个，它们在三十年内花了二百零四万亿里拉（按1974年价格计算约合三千亿美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所著《天民党合股公司》。

② 当时斯帕文塔是随口说出来的，并没有列举项目。1976年的人口统计中直接经营土地的农民（即除短工和佃农外）为1,834,000人。恩里科·普列塞在他所著《南方农业和劳动市场》中引用了1969年统计局数字：农业主和联合农业主为2,676,000人，农业工人1,316,000人。彼得罗·英格拉奥在《群众和权力》第25页提到领社会保险金的有2,350,000人，领退休金的有2,238,000人。领取不合理的退休金成了财政支出的一个巨大负担。意大利估计有2,100万工人，领退休金的有1,200万。许多人同时领两三笔退休金并且有人还在继续工作，从而破坏了退休金的管理。全国社会福利会1980年赤字估计为250亿美元。见皮耶罗·福尔图纳所著《结果令大家没有退休金？》，载1979年9月1日《时代》杂志。

元)。^① 埃米利亚尼估计1977年花在“国家设置”的福利机构上的钱(即不算给家庭的钱)约为两万亿里拉,花在保健方面的约八万亿里拉,其中半数在医院支出。^② 总起来说,这些机构每年要经手或花费大约二十万亿里拉,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和一笔供拉拢收买之用的巨款,天民党垄断了这些机构的所有职位。卡佐拉的研究表明,最高行政机构的人员中,每一百人有六十名是天民党人,六名是共产党人,十二名是社会党人。^③

在意大利的二十个部中,十四个部监督由四万家代理机构和办事处组织的网经管的的活动。大多数的代理机构和办事处全然不起作用或部分不起作用。它们只是输送或监督资金的使用,很少干实际工作。例如泰拉诺瓦指出,意大利孤儿院、养老院、贫民院、改造所等各种机构总共有床位401,392张,其中公家经营的只有34,958张,其余都在私人或宗教团体手中,它们按床位向政府领取津贴。^④

既然有这么大显然可以滥用职权的领域,自然经常发生丑闻。如六十年代米兰的富拉尼尼医院一位内科主治医师尼科洛·阿廖塔成立了一个照顾肺病儿童的私人防治所,收到的津贴是每天每人2000里拉,他又以每天每人800里拉的数额把病儿“转包”给三一

① 佛朗哥·卡佐拉:《天民党权力的剖析》,第91页第7表。这本书是部很重要的研究著作,1979年出版。我同时还用了费尔迪南多·泰拉诺瓦所著《福利的力量》和《意大利福利问题白皮书》以及维托里奥·埃米利亚尼所著《受贿的意大利》中的材料。

② 埃米利亚尼:《受贿的意大利》,福利部分见第30页,卫生部分见63页。

③ 卡佐拉:《天民党权力的剖析》,第114页,第14表。有1/3的人政治上不易鉴别,因此表内的百分比为:天民党38.5,意共4.1,社会党8.4。

④ 埃米利亚尼:《受贿的意大利》,第32页。这些机构的分布本身就是荒唐的,只有1/4的床位是在南方。南方人口实际上只占全国三分之一,但贫困的人要比北方多得多,要求救济的人也许半数是在南方,因此这就意味着有几万儿童和老人被人从当地遣送到北方去,而没有亲友探望的希望。同上,第33页。

神教会的神甫。后来由于他不肯把津贴增加到每人每天 1100 里拉,才被神甫告发了。①

住在政府经营的福利机构里的人并不比在私营机构里好多少。意大利八千个市镇各有一个公共救济所。1970年这些救济所化了380亿里拉,其中有110亿是管理费。而领救济者每天拿到的救济金只有45个里拉,当时约合七美分。意大利全国劳动人民孤儿救济院的开支是每天每人8000里拉,但把孤儿分到居民家里去照管每天只需2000里拉,因而这个孤儿救济院限制本院收管的孤儿,也许只占应收孤儿的半数。通过这种办法它成为一个拥有1030亿里拉资财和180亿里拉业务“赢余”的金融帝国。它利用这笔财产,象私人公司一样把钱借出去,搞地产投机,以7%的低息存在关系户银行,银行拿这笔钱以20%的利息借给它的主顾(包括市政府)。舞弊的机会相当多,这种机会也很少被放过。国家审计局多年来注意到全国劳动人民孤儿救济院的惊人活动,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②目前这个机构预定要撤销,它的职能转给地区,但迄今为止它一直在抗拒清算。

伴随着各级裙带风和拉拢收买风的,是直截了当的行贿,或者象意大利人所说的“赠送令人开心的小信封”,从送给估税人大笔贿赂直到洛克希德和埃克森付给内阁部长们和空军将领们巨额报酬,不一而足。我们这里指的不是那些零敲碎打的贿赂,而是长期的有组织的行贿,如埃克森行贿一案,从1963年到1972年至少有九年之久。③

贿赂和佣金同天民党内裙带关系和拉拢收买的结构交织在一起。尽管罪证确凿,看来检察官却从来没有找到罪犯。举例来说,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

② 埃米利亚尼:《受贿的意大利》,第60页。

③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254—256页。

在那不勒斯发现,有人伪造该市的规划图。在罗马总部档案里保存的复制图上,有些地区涂了深绿色,即指由于土壤条件和缺乏下水道等原因,禁止在那里修建楼房。而在那不勒斯的地图上,绿色变成了黄色,黄色标志着盖楼可以不受限制。其结果是:1967年发生3次塌方,25所房子彻底塌毁,出现11处地层断裂,8处下陷,3911所楼房和街道遭到损害;1968年32所楼房倒塌,12次塌方;1969年25所楼房倒塌和3次塌方。三年内总共死9人,重伤37人。由天民党参议员西尔维奥·加瓦之子安东尼奥·加瓦主编的一家省报厚颜无耻地报道说:“这是因为有些行政官员患严重的色盲症,把黄色看成了绿色。”^①

在帕尔梅罗,黑手党同天民党紧密勾结。该市在1959至1963年五年内总共颁发了4305张盖房执照。其中80%给了5个黑手党的代理人。^②阿格里琴托是修建在渗水的土地上的城市,法律规定楼房高度不得超过25米。但大区的政府官员却特别批准修建高达54米的大楼。由于大楼的重压,1966年7月19日发生一次可怕的塌方,破坏严重,伤亡很大。据拉伊蒙多·米尼奥西博士的调查,发现在颁发准许证和审查方面有一系列不正常的犯法行为,他把这些调查送到司法部门。结果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牢,而米尼奥西博士却从此断送了自己的前程。^③

在政府机构内部,贿赂已经制度化了,所得的金额部分纳入政府官员的腰包,部分归天民党。它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众所周知,但如同盖房准许证一样,难以证实。只是偶而有某一丑闻被

① 阿伦姆:《战后那不勒斯政治和社会情况》,第36页。其中刊登了1968年和1969年的统计数字。1967年的统计数字和加瓦的引语可阅埃米利亚尼所著《受贿的意大利》第114页。

②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17页。黑手党搞到手的执照有1,563张,其中半数都发给一个名叫朱塞皮·米拉佐的砖瓦工。

③ 同上,第118页。

人拿到确凿的证据，如香蕉案就是其中的一起。香蕉公司是外贸部下面的一个政府代理机构。它从持有执照的进口商的税款中，定期抽取佣金，每一公斤香蕉抽十里拉。香蕉年进口额为一亿二千五百万公斤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可以收到十二亿五千万里拉的佣金。著名作家埃内斯托·罗西写道：“人们发现香蕉公司是天民党最慷慨的资金来源”。后来因为香蕉批发商协会书记本人牵连在内，他害怕当替罪羊而揭露出来。①承担罪责的是盗窃集团的下层人物，他被判了三年徒刑。他的名字叫佛朗哥·阿韦杜蒂，一度是外贸部长朱塞皮·特拉布基的秘书，后来特拉布基提拔他当香蕉公司的总经理。②

在罗马，人人都知道真正犯罪的是这位部长、参议员特拉布基。特拉布基继续当部长(和非正式的资金募集者)，直到1965年在另一件进口骗局中受到指控。这次是关于墨西哥烟草案。③但是天民党控制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判定特拉布基无罪，但因为表决的差数很小，在法律上无效。于是，众议院和参议院举行联席会议，以决定是否取消他的参议员的豁免权。④

天民党在辩论中团结一致。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天民党书记、前总理马利亚诺·鲁莫尔一直引人注目地坐在特拉布基的旁边。特拉布基说，他“确实做过不是违法而是超越法律的事”，他“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有关的立法已经“过时和前后不一贯”。天民党议员雷纳托·德兰德罗说外贸部长“无意害人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另一位来自撒丁岛的年轻天民党议员、宪法教授弗朗切斯科·科西加因担任首席辩护人而出名。他的论点是“只有部长才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60页。

② 同上，第164页。

③ 同上，第163页。

④ 同上，第166页。

有权决定当局的某个行动是否同法律相符”。要是他的学生这么回答，他肯定会给他们不及格。

1965年7月20日投票结果，461票赞成对特拉布基起诉，440票反对。但法律规定必须取得绝对多数票(476票)才能对议员起诉，于是特拉布基被释放回家，逍遥法外。值得注意的是总理阿尔多·莫罗在辩论中的发言，他直截了当和狂妄地说，谁也不能对天民党起诉。^①

舞弊的必然结果是有组织的犯罪日益增多和肆无忌惮。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例子可以作为典型。一次，突然有大量廉价汽油投入黑市，由于供应量很大，当局以为是用油罐车运去的。但这些油罐车又能藏到哪里去呢？供应怎么会源源不断呢？最后经济警卫队的一位机灵的队长认定汽油的来源不可能是油罐车，而是炼油厂。他核实炼油厂大门警戒森严，那么汽油又怎么出去的呢？他在炼油厂找了个职位，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发现了秘密：原来是利用救火喷水系统把油运出去的。他们把大吸水管子的水统统放光，装满汽油，让汽油往反方向流。装油车在离厂门一英里多路处，通过大阀门装油。这是一项庞大的行动，要有几十名工人参加，还必须得到好几层管理人员的默许。

美国城市对有组织的犯罪同政治的联系并不陌生。但在意大利南部，几百年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已经通过内亚波利坦的“卡莫拉”和西西里的黑手党而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系统。

“卡莫拉”起源不明，似乎是两三百年前在内亚波利坦监狱里开始组织起来的。十九世纪中叶，波旁王室统治者对它加以庇护，用它作秘密警察，反对争取意大利统一的自由党人。据阿伦姆教授称，1862年“伦德蒙特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它，但没有

^① 奥丽亚娜·法拉奇：《历史性访问》，第296页。

能把它消灭,因为卡莫拉为了保存力量明显地‘转入政治’……,自1945年以后,一些匪帮和歹徒开始搞敲诈活动……他们同政治家的勾结十分简单,他们为政治家提供选票,交换条件是他们的活动受到保护。”^①那不勒斯的政治巨头,主要是劳罗家族和加瓦家族,不是天民党的成员,就是天民党的右翼同盟者。

黑手党则不仅仅是敲诈,它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黑手党源起西西里,以巴勒莫为中心。战后由于五百万南部人到北部找工作,因此黑手党扩大到罗马、都灵、米兰等所有主要城市。但尽管如此,它最有力的据点还是西西里,它那里已经同天民党的政治缠在一起,就象它当年同法西斯政治缠在一起一样。

黑手党(原文为MAFIA)又名“荣誉社”,是一个古老的组织,大概有一千年的历史。MAFIA这个字既非意大利语,也非拉丁语。有人说是起源于阿拉伯部族MAAFIR的名字,这个部族在公元前1060年诺曼底人征服意大利之前曾统治巴勒莫。根据这种假设,它原是一个劫后余生的阿拉伯人反对诺曼底征服者的自卫组织。后来沿袭下来成为居民的自卫工具。^②

不管传说如何,现实情况是黑手党从封建时代起一直同权力结构,即大土地所有者,商人、皇家官僚等勾结在一起。它是秘密团体,以家庭、氏族和打冤家为基础,实行彻头彻尾的男权主义。它崇拜暴力、男子气概和权力。黑手党的谚语是:“统治要比搞女人强”。法新社驻罗马记者帕特里克·默耐指出,OMERTA这个字常常同黑手党连在一起,它原意为“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气”,也就是说,要强有力,说话算话,永不背叛、永不告密。后来含义有所

① 阿伦姆:《战后那不勒斯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第60页。

②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292页。

延伸,成了死不泄密之意。^①

随着意大利的统一,北部工业家同南部封建势力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联盟。黑手党大规模地进入政界,反对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政府、省政府官员和全国性的政治家,如南部的议员和部长。法西斯时期它的组织形式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墨索里尼派了一个省长切萨雷·莫里去搞垮黑手党。莫里的绰号叫“铁省长”,因为他开始时逮捕了黑手党内的一些爪牙,他自己也就借此爬到上层,同法西斯的部长,包括原巴勒莫的陆军部长安东尼奥·迪乔治勾结在一起。这时墨索里尼已经停止追查黑手党,并且把莫里名升实降,进了参议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盟军进入西西里之后,黑手党顺顺当地改换了门庭,得到了美军和战略情报局的帮助。美军和战略情报局利用黑手党收集情报和做组织工作。黑手党的组织变得更加强大。^②战后它同一些政治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勾勾搭搭,但在1948年大选后,它最终确定同天民党建立关系,此后一直保持在天民党内的影响,黑手党在政治结构内爬得最高的是乔瓦尼·迪焦亚。在范范尼当天民党书记时,迪焦亚任副书记,他从1958年起就当议员,在三届内阁中出任部长。他在安德雷奥蒂内阁中当海运部长,一直到由于“金船”事件被迫辞职。金船事件是指一家私营公司从日本买回三艘船,再加价一倍转租给政府。1976年都灵法院判定迪焦亚同黑手党勾结。^③

黑手党用恐怖和恫吓手段维持控制。如果说人们把黑手党当自己人一样去保护,那纯系胡说。人们这么做是因为受到威胁和

① 帕特里克·莫内:《贝林格的意大利》,第83页。

② 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294页。

③ 1977年11月15日《全景》杂志。

出于恐惧。他们感觉不到国家的保护。他们看到国家和天民党成了黑手党的秘密帮凶。要想击败黑手党，不能单靠警察局，即使警察局是正直的也无济于事。只有靠动员群众的力量才能把黑手党击败，这一天正在到来。

除了黑手党这种特殊情况以外，上面讲到的舞弊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并不罕见，只是意大利更为厉害而已。六十年代初又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舞弊的潜在可能性比其他各种舞弊行为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这个领域就是国有化企业。今天，国有化企业占全国经济的50%，其中包括90%的造船业，75%的钢铁业，80%的化工业，45%的机器制造业，30%的纺织业和几乎全部银行。在意大利，“国有化”包括国家拥有的企业和国家参与的企业，它的范围比其他西方国家广泛得多。^①

国有化范围之广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法西斯的遗产。由于法西斯政权热衷于自给自足，它搞了不少工业，还把那些濒于破产的企业接管过来。第二个因素是加斯贝利有意推行的政策。他曾在1948年说过，“银行、出版社、大工业和农业用地，基本上仍掌握在反教会的人手里”。^②如果这些人转向别的党，天民党就可能遭到孤立。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加斯贝利就计划搞公有经济。1953年建立了全国碳化氢公司，它控制了石油和天然气。这是第一家政府代理机构。在整个六十年代中，又增设了一系列代理机构。^③

这种舞弊的潜在可能性，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既为政治权贵们

① 莫内，《贝林格的意大利》，第134页。

②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41页。

③ 同上，第142页。

提供高官厚禄，又同私有企业搞多种交易，一切都为天民党增光。天民党资金愈来愈充足，拉拢收买之网大张，以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捞取选票，犹如太阳能使地面上的水变成蒸汽一样。这些肥缺的分配近乎滑稽。举“西西里支助小企业公司”为例。公司的花名册上有108人，官比兵多，分配的情况是：当官的42人（计总主任1人，副总主任1人，主任3人，行政总管12人，副总管13人，办事处经理9人，副经理3人），职员34人，雇员32人。

意大利共和国派往巴勒莫的地区检察官透露说，公司里最高的五个职位每年每人的工资、福利、奖金和其他特殊津贴合六亿三千万里拉，而当时一个众议员的实得工资一年只有一千二百万里拉，即使加上福利、津贴、车贴等等，一个议员要社会负担的总共为三千万里拉左右，只占该公司经理开支的十二分之一。^①这说明为什么赚大钱的位置要轮流担任。从1967至1973年的六年中，该公司有六个总主任，都是天民党人，^②其中三人另有其他政府职务。其中一人是奥诺弗里奥·尼切塔，是地区的总会计师，几乎从来没有在公司里露过面。还有一个人是马尔切洛·罗迪诺，一周只在公司上两天班。

这家公司还投资或贷款给十几家随时可能倒闭的小企业。从1967年建立以来的六年中，这家公司的管理费和收不回的贷款共达1060亿里拉，比议会拨给它的全部资金还要多，也许在滥用公款方面打破了国际上的最高纪录。^③

这家公司还只是个小型代理机构。象矿业公司这种中型代理机构所管辖下的企业共有雇员三万二千人。1977年因其总亏损三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219页。

② 六年为期似乎是标准的做法。根据卡佐拉所著《天民党权力的剖析》，居高位的人员中61.4%任期不满六年。见该书第107页表11。

③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220页。

万亿里拉而破产清算。《共和报》说，这笔费用为“意大利正在向国际货币基金乞求的贷款总额的五倍。”^①

至于全国碳化氢公司这样庞大的国有化企业，那么国家要对付的是具有内在动力和战略的名符其实的主权实体，它们内部又有着不受公众监督的天民党部长、总理和总统们设立、任命和庇护的封建诸侯国。有点同美国前不久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相类似。全国碳化氢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恩里科·马太操纵价格，欺骗政府，收买报刊，还设法使格隆基当选为意大利总统。乔治·加利在马太的传记中写道：“马太可以不受公共监督，任意积累或发放从垄断得来的巨大超额利润……他很懂得权力……他就是这样毒化了整个政界。”^②

意大利权势集团充分意识到马太的作用和影响。马太死后，他的密友、意大利商业银行行长、一位有声望的知情人拉法埃莱·马蒂奥利说：“他教会了他的接班人如何收买意大利共和国。”^③

那些把一系列的代理机构（这些代理机构的缩写，如全国电力公司缩写成ENEL，全国钢铁公司为FINSIPER，使外国人十分头疼）当作自己的采邑一样来管理的权贵中，马太不过是最锋芒毕露的一个罢了。国有化企业和私营工业公开为政府官员、众议员和参议员提供职位。保持兼职最高纪录的也许是都灵的天民党参议员泰雷西奥·古列尔莫内。1950年共产党曾要求通过“不准兼职”法，用以制止此类舞弊。他们集中攻击的目标是古列尔莫内，后者却用半抱怨半求情的语调说，“你们如果也象我一样要养活一大家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235页。

② 同上，第190页。

③ 欧金尼奥·斯卡尔菲和朱塞皮·图拉尼：《老板们》，第48页。全国碳化氢公司至今还牵连在丑闻中。最近一次是1979年12月卷入当石油中间人收了几千万美元的佣金和贿赂案中，沙特阿拉伯在意大利议会准备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取消了合同。牵连进去受调查的有许多政府高级官员，政界高级人物和企业界的高级经管人员。

子人，你们也就不会这么坚持不准兼职了。”^①

原来古列尔莫内身兼都灵三家大银行的董事长，两家制造厂、一家造船厂、一家出版公司、一家液化气设备和批发公司、一家联号零售商店和一家私营信贷公司的董事长。他还兼任三家大信贷机构和都灵电话公司的董事，在三家报纸拥有股份。他还是罗马报业协会的名誉会长。^②

几乎所有这些职位都薪俸甚厚，而且都可以安插人员。古列尔莫内的活动量和活动范围表明他要么是一个做买卖的天才，要么是一个善于利用政治地位的精明人，他是天民党全国执行委员和天民党财经委员会主席。

意大利人把这种种舞弊行为统称之为“幕后政府”，但也许叫它“政府的地下世界”更能表达其含义。除了共产党以外，意大利所有其他政党和机构，包括梵蒂冈在内，都同“幕后政府”有瓜葛。梵蒂冈拥有主权国家的地位，有利于资金非法外逃和外汇投机买卖。“幕后政府”需要大小官员不断地对执法制造障碍。从掩盖钱财方面的丑闻到掩盖政治上的丑闻只差一小步，两者往往是一股道上跑的车。意大利的政治是没完没了的水门事件。

今天意大利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共产党同天民党共享政权，意共能否抵制金钱的诱惑力。社会党1963年至1970年参政时，没有能够抵制住这种诱惑。据《泰晤士报》记者彼得·尼科尔斯说，社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80页。1953年2月15日议会通过了不得兼职的法律，禁止议员在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中任职。政策要求议员都填写声明。但是二十年后，半数的议员连声明都懒得写，见该书第95页。

^② 同上，第80页。具体来说，古列尔莫内是巴尔比斯和古列尔莫内银行董事长，都灵借贷储蓄银行董事长，隆巴尔迪和马伊纳尔迪银行董事长。他是萨米斯药品公司董事长，都灵—萨伏纳港务公司董事长，新人民出版社董事长，考格利埃贸易和天然气、液化气及设备公司董事长，劳埃德地中海轮船公司董事长，佛罗伦萨借贷公司董事长，科涅零售网董事长。此外，他还是意大利海外工人信用社社长，都灵电话公司主任，都灵互保公司主任，意大利非洲学会会长。

会党内除了南尼等少数几个拒腐蚀的人以外，许多高级人士都“要求并从‘幕后政府’分到一份好处。社会党参政不久，一位赞成社会党入阁的天民党左翼领导人不禁为他们的行为悲叹：‘人们也许说我们天民党人腐败，愿怎么说都行，但是我们是为了选票才分配职位和好处的。而社会党人只管自己捞到好处和官职，连选票都不管’。显然一种是把舞弊当作可资利用的手段，另一种则是直截了当的舞弊。”^①

不少天民党的发言人，如波洛尼亚的科莱托，认为共产党人一旦进入政府，同样会被舞弊征服。他们申辩说，“幕后政府”并非天民党首创，意大利许多地区早就存在“幕后政府”。作为个人来说，意大利人在私人关系方面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不诚实，但是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公职人员的诚实感。他们在外国统治下生活了好几个世纪，因此形成了对政府不信任的传统。例如，他们认为偷税漏税是一种成就而不是一种耻辱。^②法西斯利用了这些传统，使裙带风和拉拢收买之风更加普遍，把政府的舞弊行为提高到新的水平。意大利战败并为盟军占领之后，舞弊之风更盛。盟军不仅同黑手党和老法西斯分子做交易，还使大批的货币、食品和供应物资充斥庞大的黑市场。天民党接收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这个社会使人人面向自己的家庭，为维持生存而挣扎，默认弱肉强食的道德标准。

这种论据也有道理。但是反对天民党的理由主要是，天民党不但不同舞弊的传统进行斗争，它的政治领导人反而抱住这种传统不放。在1947年的制宪会议上，保皇派和右翼分子抓住这种舞

① 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114页。

② 这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是很普通的。美国税务局估计每年逃税约300亿美元左右。

弊行为攻击和动摇政府。西西里的一位众议员、分离主义的领袖菲诺基亚罗·阿普里莱想削弱拟议中的宪法，对许多天民党领导人提出了大量的指控。他对格隆基(后来当了共和国总统)说：“你当年在墨索里尼手下当副部长时，衣衫褴褛，现在却成了百万富翁。”^①

新法西斯分子至今还在利用舞弊问题，对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施加影响。我到拉戈莱奥帕尔多看我出生的一幢古老的公寓时，就碰到这种情况。三个工人正在院子里吃午餐。刚搭好的巨大脚手架矗在那里供他们粉刷楼房。一个年约六十岁、牙齿已经掉完的干瘪老头坐在台阶上用力咀嚼三明治。其他两个工人四十来岁，正轮流喝酒瓶里剩的最后一口酒。

我把我的身世告诉他们，还说了说我当时住在这里时的情景。他们问了些有关美国的情况，我也问了几个有关意大利的问题。我发现他们一周工作六天，一月只挣30万里拉，折合80美金一周。我感到工资数目不大，就问他们有否参加工会。

“呸，工会！”其中一个壮实友好的大个子说，“工会的人最坏。他们拿走你的钱，管你生活，告诉你几点钟去干活……就是他们把国家搞坏了。”

“你准是投安德雷奥蒂票的吧，”我同他开玩笑。

大个子唾了口吐沫说，“他？这个骗子？我就是瞎了眼也不会投他的票。”

“那你要是不投天民党的票，又投谁的票呢？”

他正了正身子，向我做了个法西斯敬礼。我吓了一跳，然后假装狠狠地抓住他的背心(他也这样干过我两次)摇晃他的身体。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8—19页。

“你怎么敢给我敬这种礼，我告诉过你，我爸爸是从这里逃亡出去的。墨索里尼进行了一场愚蠢的战争，把国家都搞垮了。你怎么什么也没学到。”

这个工人笑了，有点害臊。他的同伴，尤其是那个老头也拿他开玩笑。他把脚在地上划来划去，眼睛不好意思地看着地上，随后死劲瞪着我说，“好吧，好吧，但是不管你会说什么，墨索里尼可不是骗子。他死了以后，他的老婆拉切莱太太还得靠政府养老金过活。要是安德雷奥蒂死了，你就会发现他至少是百万富翁。”

三个星期以后，我在火车上遇见一个大学生，他私下显然有点同情红色旅。他也用差不多的话把墨索里尼同当时的意大利总统、后来在洛克希德丑闻上被迫辞职的莱昂尼加以对比。

意大利社会为“幕后政府”付出的最终代价是外国的干涉。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埃克森、洛克希德、中央情报局)对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有强大的影响。1963年至1972年期间，埃克森公司驻意大利的代表温琴佐·卡扎尼加，替埃克森公司散发了四千六百万美元，换来的是埃克森石油公司从延期付税、炼油厂减低税率、提高向意大利碳化氢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售价、进口石油的额外定额，等等，得到约六亿美元的好处。^①（卡扎尼加由于他在此案中担任的角色而短期入狱服刑。）

洛克希德在意大利行贿的总数没有统计，只知道它在几个国家一共花了两亿美元。中央情报局二十年来花了近一亿美元的捐款，大部分给了天民党。^② 这些经费都是悄悄地分发的，在特定的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207页。J.M. 布莱尔在他的关于石油的书中详细地谈到这种让步，见《石油的控制》第96页。

② 1976年2月16日《乡村之声》上所载派克的报告《福特总统所不愿你谈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情况下为了特定的目的分给特定的人。还有大笔大笔的钱是公开给的,为数一亿美元的第一笔贷款是1947年1月给的,使加斯贝利得以将共产党从政府中驱逐出去。^①三十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给了十五亿美元的贷款,同意方达成心照不宣的谅解,即安德雷奥蒂政府不进行重大改组。^②

意大利广泛的舞弊,成了研究这一课题的人的谚语。美国石油工业第一流专家说,意大利的情况“不但说明了阿克顿勋爵的著名格言^③,并且还可以证明这个格言的逆定理:腐败即权力,绝对的腐败即绝对的权力”。^④共产党之所以对选民有号召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廉洁”。除共产党外,意大利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够得上“廉洁”二字。梵蒂冈也不例外,许多丑闻梵蒂冈都有份,它也没有少拿外国私下塞给的钱。例如,1948年意大利总工会的分裂和天主教工会的成立,主要的幕后策动者是梵蒂冈,并且得到美国劳联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部分支助,还可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⑤

各级教会都受到这种风气的传染。例如,可以把搞裙带关系一词直接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欧金尼奥·帕切利)头上。他的三个侄子朱利奥亲王、卡洛亲王和马尔钦托尼奥亲王都有美差。朱利奥是哥斯达黎加驻梵蒂冈大使、罗马银行(意大利人称之为“散发香烛气味的银行”)的行政顾问。卡洛是梵蒂冈市的总顾问,罗马教廷产业、天主教教育总会和五、六家教皇所辖的其他机构的法律代

① 安东尼奥·甘比诺:《战后历史》,第263—266页。一亿美元的贷款是进出口银行给的,还附带许多限制。

② 应该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贷款给交了会费的成员国,但是大家出钱,由美国控制。

③ “权力即腐败,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败”。

④ 布莱尔:《石油的控制》,第96页。

⑤ 约瑟夫·拉帕洛巴拉:《意大利劳工运动:问题和前景》,第57页;塞尔焦·图罗内:《意大利工会史(1943—1969)》,第189—193页。

表。马尔钦托尼奥·帕切利是意大利航空公司和比昂第面粉公司的董事长。^①三位亲王都卷在涉及梵蒂冈代理机构,尤其是教皇救济会的丑闻中。

教皇庇护十二世为了替梵蒂冈及其下属机构弄到缺货的食品,在1944年建立了教皇救济会。后来几年,救济会的势力愈来愈大,把救济对象扩大到难民、流亡者、弃儿、渔牧农民的所谓“工会”联合会以及职业学校等等。目前它拥有三万名雇员和二十万名志愿人员。救济会从各国,特别是从美国接受食品和金钱,施舍给穷人。几乎从建立伊始,它就卷入了丑闻。如美国给救济会运去救济穷人的几百万公斤面粉,严格规定不得出售或用于交易。然而比昂第面粉公司就把面粉拿到市场上去公开出售。

美国大使馆对开头几次丑闻只是睁一眼闭一眼,但后来觉得实在太过分了。1958年9月20日,它正式要求意大利外交部作出“解释”,可一点用处也没有。唯一的反应是三天后《罗马观察家报》讲了话,但并不是对指控作出答复,而是说明教皇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家报纸关心此事的原因,在于马尔钦托尼奥·帕切利亲王担任比昂第面粉公司的董事长,而教皇救济会的行政顾问是卡洛·帕切利亲王。^②

救济会既然没有受到阻拦,就继续干这些勾当。1970年暴露了另一件丑闻。教皇救济会操纵了用给第三世界的优惠价从共同市场买来的白糖和黄油。它先将货物运到维也纳,以避人耳目,使人搞不清货物的最终目的地,然而不上税就运到了梵蒂冈(梵蒂冈可是个主权国家),最后在意大利市场上用高六倍的价格出售。^③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关于朱尼奥见第227页,关于卡洛见第47和56页,关于马尔钦托尼奥见第49和94页。

② 1958年10月4日,卡洛·法尔科尼所著《新道路》。

③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50页。

1978年罗马银行(朱利奥·帕切利亲王是该行的行政顾问)陷入一件外逃资金的丑闻中。银行的财务经纪人是受到梵蒂冈完全信任的银行家米凯利·辛多纳。梵蒂冈的财政监督是保罗·马尔钦克斯主教,他利用辛多纳搞货币投机。最后一连串的丑闻被揭发出来,把好几家银行都牵连进去。辛多纳逃到了美国,正在打官司,以免被引渡到意大利受审。^①

罗马银行的行政委员会中还有另一位教皇的亲属,即教皇保罗六世的兄弟卢多维科·蒙蒂尼,卢多维科也是天民党议员,但他不怕不得兼职的条款,他兼任国际救济管理总署的董事长,又是布雷西亚圣保罗银行的行政顾问,同时是意大利信贷所、公共工程总公司和阿马蒂电力机械公司的行政顾问。^②

教会同天民党的关系既然如此密切,这些丑闻往往也会影响到天民党。1967年西西里银行破产,亏损四百五十亿里拉,审计人发现天民党有六亿二千五百万里拉的无担保贷款。教会密切参与这家银行的经营管理,这家银行的金融顾问乔瓦尼巴蒂斯塔·萨凯蒂侯爵是圣灵银行的董事长,西西里银行的两位董事阿斯塔主教和特立维亚主教都是梵蒂冈外交使团的成员。有些无担保贷款的线索一直可以追到天民党的一些政治家和巴勒莫的埃内斯托·鲁菲尼大主教的双亲。^③

教会内最容易舞弊的是主管福利和孤儿救济的机构。他们的

① 辛多纳后来跳出油锅又入了火坑。有一次他在美国因由他控制的弗兰克林银行亏本,被人指控犯诈骗罪。在预定1979年9月审讯之前他忽然失踪,过了七十五天又重新出现,他声明说被人绑架。1980年3月在审讯时检察官指出辛多纳是去了一趟意大利,然后用假护照回来,推测是去同黑手党商量。1980年3月27日宣判他有罪。关于做假护照事见1980年3月2日《美意关系进展情况》,关于判决书事见1980年3月28日《纽约时报》。

②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57和84页,埃米利亚尼,《受贿的意大利》,第77页,这一章的标题是“教皇的兄弟修建营房”。

③ 同上,第223—224页。

经费来自各个途径，难以监督。他们还同腐败的政府代理机构作交易，常常不知不觉地、或心照不宣地参与一些骗局，三一神教会的神甫从阿廖塔医生那里“转包”患肺病的儿童，就是一个例子。但很多情况都要由教会机构本身负责。

象彼得·尼科尔斯这样并没有一丝反教会偏见的人对此也予以严厉的批评。他写道：“多数虐待儿童的丑闻牵连到由神甫、修女或接近教会统治集团的人经营的机构。这些人假装做善事，实际为赚钱。最严重的案子发生在普拉托、卡利里亚和罗马，典型地表明这种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残暴行为是同某种经济算盘结合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人们常常能通过慈善事业赚大钱，可以从公共开支中得到儿童保育费，再扣食品和服务的费用，有时是同监督部门合谋的，也有时根本没有任何监督。”^①

虐待儿童的情况有大量的文件证明，有些例子令人毛骨悚然，例如格罗塔费拉塔的法官在听了详细的告发后，授权警察搜查科隆巴修女经办的圣里塔救济会。警察报道说：“打开宿舍的门，我们看到可怕的景象，在臭气熏天、令人作呕的房间里，十五个孩子睡在八张床上。他们双脚用破布捆着，往后举着的手臂用链条锁在铁床头上。可怜的孩子就这样一动都不能动。他们孤零零地锁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关照。由于链条和绳子妨碍血液循环，他们手上脚上都有磨破和红肿的地方。”^②

在审讯科隆巴修女时，揭露出她每天可以从每个孩子头上得到二千五百里拉的收入，但她的实际支出只合每人三百里拉。除此以外，还有海外捐款。1967年1月，她共收到六十二万七千里拉的捐款。她在这个月内花在二十五个孩子身上的食品才八万二千里

① 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224页。

②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34页。

拉。科隆巴修女办圣里塔救济会十八年，这十八年里死了十三个孩子。她的保证人和保护人弗拉斯卡蒂的路易吉·利韦尔扎尼主教已卷入此案，并受到刑事起诉，但很快起诉就被撤销了。科隆巴修女被判有罪，但行政当局赦免了她。^①

类似的丑闻削弱了教会在反对第382号法律斗争中的地位。教会现在处于被告地位，因为规定实行第382号法律的行政法令使这个法律“装上了牙齿”。争夺的对象包括孤儿院、养老院、精神病院、穷人救济院、妇产门诊所、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其他的慈善性“宗教”机构。这些机构为数多达四万个，服务对象七百万人。这对安插亲信、施加思想影响和募集捐款来说，是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

对意大利教会统治集团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如何解释第382号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了解一下伊夫雷亚的路易吉·贝塔齐主教同意共总书记贝林格交换信件的情况。在佩鲁贾，杰尔马诺·马里博士向我说明了这一点。

马里问我有没有看过这两个人交换的信件。我说看过。马里于是解释道：“关键的钉子埋在信的末尾。主教吁请意共不要把宗教机构当成‘人质’。贝林格向他保证意共并无此意。国家的一切机构都将置于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因此教会的影响可以在机构内得到发展，有关方面的多元主义是机构内部的民主所保证的，但教会要的是一切由它控制，教会对内部的民主是过分敏感的。”

我突然插了一句话，“就象党一样。”

马里轻松地说：“敏感，但事实上情况并不一样。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至少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并且愈来愈民主。而教会从来就是专制的。我们没有教皇，他们可有！不管怎么说，按照贝塔齐和

^① 1971年12月29日《信使报》。

贝林格的提法，争执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文法上两个前置词的冲突：到底是教会要的多元主义的机构，还是要机构内的多元主义。”

“嘿！两个前置词提法上的冲突，”我开玩笑说，“真是你们意大利人把外国人搞糊涂的典型办法。”

马里笑着说，“当然贝塔齐和贝林格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在解决冲突。他们只是把冲突讲了出来，也就是说，让大家都知道，然后迫使对方进一步阐明立场。贝塔齐说，你若有权，就应该聪明而温和地使用你的权。地区现在有解释第382号法律的权利，而且教会必须同我们打交道。这就使我们可以其他问题上对强硬路线派发生影响，也为进一步的讨论开了大门。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很好的例子。”

马里站起身来走到书桌边，拿了一份翁布里亚地区杂志《翁布里亚纪事》1976年2月号回来。这是一本136页厚、九英寸长、六英寸宽的标准开本的杂志。“古比奥的切萨雷·帕加尼主教对意共进行过激烈的攻击。我们把他的攻击以及天主教内跟他意见不同的人对他给教区公开信的评论文章都翻印出来。在社论里我们引用佩莱格里诺大主教致教区公开信来答复他。这份杂志已经卖光了。”

他把杂志递给我接着说，“你可以看出来他强调的是教会有义务帮助穷人、孤儿、病人和残废者，并且说教会做这些事只要公众负担微不足道的开支。但这些多半是吹牛。教会办慈善事业可以从政府拿到津贴，而往往这些钱有一部分成了天民党的竞选经费。最糟糕的例子是全国妇幼保健总署。它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妇产保健机构，其中许多是宗教团体经办的。1969年和1970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丑闻。前罗马市长、负责罗马市妇幼保健署的天民党人阿梅里戈·彼得鲁奇因挪用资金被起诉，^①但他后来被宣判无罪，实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36—137页和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223页。

际上人人都知道他有罪。舞弊的代价是人民偿付的，我们的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二，在欧洲居首位。南方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四十八。在那不勒斯1970年高达千分之六十四。”^①

“但从长期来看，重要的不在教会的丑闻，而是宪法第七款所规定的政教分离。教会要维持其代理机构是为了权，可以安插人员，影响居民和控制社会。我们所要的则是你们美国一直就有的，即把宗教变成个人的私事，而不是国家的公事。”

从长期来看，政教分离不仅要修改过去教会同政府的协议，并且还要取得大家的一致赞同。对人民来说，只要社会服务性机构办得好，他们对由谁经办并不关心。在波洛尼亚，教会基本上放弃了福利事业，因为市里办的更解决问题和管理得更好。教会内部对宗教机构的重要性有不同看法。象贝塔齐这样的主教会议派更多地关心精神和道义的价值观念，而主张政教合一的强硬路线派则想保持天主教的社会服务机构。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同共产党妥协。

由于人民看到天民党三十年统治的结果，因此“幕后政府”同样使天民党易于受到抨击。一位社会党议员安东尼奥·焦莱蒂在1975年说过一句公认的定论。他说：“意大利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和经济纠缠在一起，习俗和丑闻、工业政策和‘幕后政府’搅在一起，简而言之，就是新封建主义的兴起。问题在于天民党和国有化企业的大亨们勾结在一起。”^②

意大利的经济在流血；由于“混乱、舞弊、盗窃以及讹诈和暴力

① 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223页。百分比中不包括出生时死亡率。如那不勒斯36,465个生下来的婴儿，有2,370个活不到一年。

②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235页。

等各种不法行为”，千百亿里拉浪费掉了。^①说这句话的是洞悉内情的前意大利银行总裁圭多·卡利。尽管他本人不是心甘情愿，但也陷在天民党制造而又无法驾驭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之中。

“幕后政府”的腐败和浪费，卡住了意大利经济的脖子，造成资金匮乏。浪费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无端消耗资金；另一方面，对现有资金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幕后政府”的花费究竟多少，无人知道，但无疑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几十亿美元贷款多好几倍。众所周知，仅矿业公司一家的亏空就达四十亿美元。^②从意大利外逃的资金要比贷款数目高出很多，估计有350亿至500亿里拉。偷税漏税的总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

意大利的经济学家、立法议员和舆论界人士对这些事实和数字，都了如指掌，但存在一种宿命论的倾向。他们认为“幕后政府”始终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意大利人统统腐化了。然而，共产党人激烈驳斥这种陈词滥调，认为这是对人民群众毫无根据的诬蔑。他们列举了波洛尼亚和各工会，不仅是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还有天主教的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社会党的劳工联盟，他们在过去十年中曾经把五十年代劳资合作时期被雇主腐蚀了的工会领导人抛开。共产党人还列举了1976年参加共产党候选人名单，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不少党外独立人士；共产党列举的参议员中有20%是独立人士，众议员中有7%是独立人士。他们还指出，在那不勒斯、都灵、罗马、威尼斯和其他十来个城市中，意大利选民抛弃了贪污腐化的政府。^③1979年11月罗马市长阿尔甘的表现是对意共的道德怀有信心的最有力的证明。朱利奥·卡洛·阿尔甘原是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237页。

② 同上，第235页。

③ 《意共年鉴(1977)》，第30页。

罗马大学艺术史教授，他是社会党圈子里的人。1976年左翼在罗马取胜时，共产党接受他当市长，尽管共产党当时在市议会中占有四分之三的席位。当1979年阿尔甘因病辞去市长职务并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时，他申请加入共产党。他说：“没有共产党，意大利的民主就不能得救。……我看到了共产党有很高的道德水平。”^①

“幕后政府”是可以击败的。除了人民群众阶级觉悟在提高以外，即使在天民党和教会内也有要求改革的运动。这些运动往往由反共人士领导，他们意识到贪污腐败会把选民推向意共。例如，在弗里乌利地震之后，反共的“圣餐和解放会”，组织了募捐和救济队，他们诚实无私，工作很有效率。意共欢迎竞争，条件是反对“幕后政府”，反对贪污腐化。这就是文化领导权的含意。

许多怀疑派争论说，贪污腐化现象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并且形成传统，要消除它是乌托邦的空想。共产党人的回答是：只要人民群众了解情况，他们什么都能干。事实上，也只有人民才能完成某些任务。例如，意共现在着手进行一场政府不敢抓的斗争，那就是同黑手党的斗争。

在勒佐卡拉布里亚的法院里，我坐在记者席上注视着一件划时代的审讯，一边坐着意大利总工会的地区书记乌戈·那波利，另一边坐着砖瓦工会书记阿蒂利奥。事情是这样的，两个黑手党人因殴打阿蒂利奥而被捕，总工会要求有权同阿蒂利奥一起作为受害者进行申诉。如果争取到这一权利，那么凡同黑手党作斗争的各工会组织者和成员以后都可以有权得到工会的全力支持。全国的新闻记者和电视台摄影记者都出席旁听，说明这一案件的重要。

审判厅不大，高高的天花板，音响效果十分良好。四周墙壁已

^① 朱利奥·卡洛·阿尔甘，《申请入党的时刻》。

年久失修，墙皮大块大块地脱落，油漆也已褪色和掉落。这是破旧镇上的一所破旧建筑物。记者席后面用高高的木栅挡着一群站着围观的群众。前面是律师用的长桌。左边靠墙摆着检察官的高桌，右边是被告席。中间高高地放着三张法官用的高桌，中间的一张桌子比两旁的桌子高一大截。旁边安着记录用的小桌。

在法官席的上方墙上悬挂着一个雕刻的大十字架，下面的题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使我想起华盛顿最高法院大厦三角墙上刻的字，又联想到莫斯科的法院或许也自称有类似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权力在对真理致敬，在全世界大概都一样。

穿着黑袍的三位法官简直可以拿来作研究角色用。首席法官长得象埃尔·格列柯^①画的人像，又高又瘦，前额突出，脸上是严厉和清心寡欲的神色。右边的法官粗壮个子，红喷喷的双颊象喝醉酒一样，灰白的头发理成平头，这在意大利是罕见的。左边的法官是个小胖子，头发象一束束稻草，他带着一副夹鼻眼镜，拘谨的嘴巴，很象乔叟^②笔下大惊小怪的修道院院长。有人事先告诉过我说，这三个人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反动的，首席法官的政治态度不清楚。我对那波利说，我猜那个撅着嘴的小圆胖子大概是反动的，那个红润粗壮的家伙大概是进步的。那波利悄悄说正好相反。

面对法官的这几位律师却实在是这场有待裁决的斗争的象征。为黑手党辩护的是三个衣冠楚楚、保养很好的中年人，他们象省里的政客一样能言善辩，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是政客。代表工会的是一男一女两位律师，女人出庭当律师本身就是新鲜事。男的穿一套灰色的旧西服，是本区新当选的共产党议员（意共也象黑手党一样，把重炮都搬出来了）。他虽然表现对法庭很尊重，但发言

① 埃尔·格列柯，西班牙画家（1541—1614）。——译者

② 乔叟，英国诗人（1340—1400）。——译者

尖锐锋利。那位女律师三十岁左右，穿戴比较整洁，她相当自信，业务上很内行。

四名警察把带着手铐脚镣的被告押进法庭。穿黑袍的检察官开始宣读以预审为根据的起诉书。这两名黑手党被告在一个大的建筑工地上袭击阿蒂利奥，用小口径管子打他。阿蒂利奥回击时，其中一人抽出手枪对准阿蒂利奥，另一个人还继续打。检察官引用了刑事条例，还引证了袭击者当时讲的话：“让你知道黑手党的厉害”，“你以为可以称王称霸，实际上你不过是个下流的告密者”，“下次再让我们在这里抓到你，就把你阉割掉”。工地的领班目睹被告的打骂，他作证说，他认识这两个人，是出名的黑手党人。检察官最后说，“如果阁下允许我这么说的话，那么这次袭击无疑是预谋的。黑手党的目的是恫吓工会。被告说的话已足以证实这一点。被告是反对工会的大阴谋的工具。阁下，我认为黑手党正在受到审判。”

那波利高兴地把身体欠来欠去，小声说：“尽管他是个天民党人，可真是个好人的。当然警察在向左转，工会开始有份量了。”他笑着说，“这些混蛋该倒霉了。”

我看看这一高一矮两个黑手党青年。两个人长得都很结实，穿着干净的蓝西服。这两个无足轻重的无赖都显出充满信心的样子。要不了多久，他们这么轻松的原因就弄清楚了，原来那个作为主要目睹者的工地领班收回了证词。现在他由一位警官护卫着坐在法庭前面的椅子上。

接下去的审讯非常有意思。首席法官讲起话来语调亲切友好，时而又带点斩钉截铁的口气。见证人则采取对抗的态度，很善辩，常常打断法官的话。他倒不是无礼，但是也不害怕官方。他会说：“这可是你们的话。”法官做了个默认的动作说：“那就用你自己的话讲讲看。”法官一步步地迫使这位工地领班回到原来的立场

上。“你现在说不认得这两个人，可你形容他们的样子很确切。”领班说：“那是因为警察形容过他们的样子。”“但是有人证明看到过你同他们一起喝酒，有好几个人证明了。”“也许有那么几次。”“有五十次吗？”“没那么多！”“不到四十次？”“我记不清了。”“总不下十次吧？”领班绷着脸承认了。法官于是转过身来对文书说：“你这么记，问话是‘在袭击前你认识不认识被告？’答复是‘认识’。”文书是个二十来岁、胖乎乎的青年。他很努力地在记，但记得很慢。

经过两个小时精疲力竭的盘问，法官使原证词讲的事实全部重新得到确认。整个过程中，无论检察官还是律师，都没有插嘴。最后警官把领班带走，作为重要见证人予以保护性拘留。

法官说：“下一个问题是总工会要求以被害人同等身份参加审讯和申诉。我刚才已经宣读了双方的辩护词。诸位还有什么要说的？”

黑手党的一名律师起来讲了十分钟，集中讲一点，即这次袭击只是开玩笑，是青年人的任性。耍态度。当然这是可悲的，被告应该受到惩罚，但何必要小题大做呢？他坐下来以后，他的一位同事又起来用蛮不讲理的态度讲了十五分钟。他指出这次审讯完全是工会和唯命是从的警察捏造出来的一出卑劣的闹剧。谁都知道地方警察都参加工会，因此都要讨工会的好。这是由共产党在后面牵线的傀儡戏。黑手党是被硬拉进来的，其目的是制造新闻，为举行这场审讯的把戏提供借口。

第三个律师站起来。他表示完全同意他尊敬的两位同事的意见。他请大家看看力量对比，竟然要有四个警察来押两个小伙子。这四个成年人都带着打开枪套的左轮手枪，象是对付突击队的袭击，简直是胡闹。两个不懂事的娃娃打了一个他们讨厌的家伙，这同工会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这同黑手党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黑手党干吗要去管工会的闲事？黑手党难道这么

笨，相信这两个呆头呆脑的小马驹？再说，“黑手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是用来吓唬孩子们的。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套。

于是女律师站起来讲了三分钟。这件事不是开玩笑。袭击者掏出过手枪，完全是预谋。

共产党议员讲了五分钟，他指出被害人之所以挨打，就因为他是工会组织者，这一点连打人的也承认。工人成立工会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因此工会有权参与影响工会利益的诉讼。他可以引用先例来说明，例如有关某个卫生部官员的案子中……法官打断他说：“我已经读过你的陈述，这个先例不适用于本案。”那波利坐在我边上哼哼。议员于是向法官鞠了一个躬，结束他的论点说，本案应当根据其本身的法律依据来判断，但是工会显然已经卷入本案，因此工会的利益应受到保护。

法庭宣布休会讨论。我们这一伙人，包括副警官南多在内，都到附近的咖啡馆喝啤酒和吃快餐。副警官说，“这件案子对黑手党是莫大的讽刺。前不久他们还炫耀自己的权势，公然宣布他们怎么惩罚人。但现在黑手党的头头意识到人民当中有了一种新的情绪，不再那么害怕了。他们现在是低姿态，也许这次殴打不是他们下的命令，他们只下令说别让工人参加工会，于是这两个急于讨好的家伙就以为殴打工会大头头会受到嘉奖。这些笨伯。”

那波利说，“说不定他们会把这两个人干掉。”

南多摇摇头说，“不会，黑手党头头不愿再制造头条新闻。他们看到人们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电视台也加以转播。他们将采取低姿态。”

两小时之后，法庭重新开庭。首席法官宣读了一个长长的、字斟句酌的声明，时而引证一些显示学问渊博的引语，用了好多“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类的语句，强调宪法保障个人结社不受阻碍的权利，申言这件案子有特殊性，意思是说本案所作的决定并

不是作为先例。一直到声明快念完了，我们还搞不清楚到底会怎么裁决，但念到最后，简直妙极了，工会竟然被允许参加申诉。电视摄影机急速地转动，新闻记者慌忙用笔记着，我们的人都兴高采烈。

声明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黑手党。我忽然意识到工会律师也没有提黑手党，而是强调宪法权利，法庭也是在大谈这一点。但谁都知道黑手党这次明显地败在工会手里，并且是败在红色工会手里。电视台和新闻记者正在把这个信息传遍全国。

那天下午我在《团结报》记者恩佐·拉卡里亚家里做客。他正在发消息。他对我说，“卡洛，你要知道，今天这件事在你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们可是大事。恐惧感在消失。检察官不怕了，法官也不怕了，甚至那个领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再害怕了。他收回原来的证词当然是由于害怕，但最终他对法官还是说了真话。十年前他会一声都不吭。现在他怕法律比怕黑手党还厉害。”

“人们一旦看清楚黑手党言而无信，而工会却能说到做到，那么这些土匪也就此完蛋了。自然这不是今天或者明天、今年或者明年就能做到的事。……但在我死之前，黑手党就会成为历史古董。”^① 他是个乐天派。他在发完消息后说，“我的朋友，这一切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党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格局、政治气氛，这就叫做领导权。”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勒佐卡拉布里拉，在奥德赛中所形容的斯

^① 意共一直施加压力，要求采取反对黑手党的措施。如1979年11月23至24日意共在西西里的巴勒莫举行了一次反黑手党的大会，见1979年11月25日《团结报》上乔治·弗拉斯卡·波拉拉的文章《同黑手党斗争》。会上意共的两位主要领导人亚历山德罗·纳塔和阿吉勒·奥切托重申意共有决心粉碎黑手党，并点名批评没有尽职的天民党官员。天民党大区书记作为个人参加了大会，他要求不要点名，但未逞。

库拉^①和卡律布狄斯^②的卫护下穿过墨西拿海峡，但我所乘的不是尤利西斯^③所乘的单向帆船，而是顶风破浪斜驶向墨西拿的水翼艇。远处西西里的山峰隐现在迷雾中。我想起拉卡里亚讲到的建立了三十多年的政治格局问题，使我回忆起在米那菲奥利的菲亚特工厂参加的那次工会会议。老祖科蒂说过，工会有能力维护工人的实际工资，并且能在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的情况下抵制雇主的压力。这在欧洲是史无前例的成就。祖科蒂说到基本原因是政治格局问题。这次审讯又一次说明由于政治格局而产生的社会变化。

地处意大利落后南部一角的勒佐卡拉布里亚有百分之四十的居民仍然是文盲，而意共在那里作出了成绩。意共是个什么性质的党呢？那位议员免费为工人工作，把他议员薪金的一部分上缴给党；那位律师行业中少见的女性同男律师平起平坐；那个年迈还在辛勤工作的拉卡里亚。还有副警官南多（他还不是意共党员，但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还有那个对社会情况十分熟悉和热情的那波利。更为突出的是那个砖瓦工人阿蒂利奥，他挨了打还愿意出来指控黑手党。

在我那天会见的人当中，阿蒂利奥理所当然是新意大利的象征，是那些肩负起管理国家重任、从腐朽的阶级手里夺取权力的男男女女们的象征。但是，从外表来判断，那么这个长着一张傻呼呼的、粗糙的红面孔、眼睛缺乏光泽、几根短头发竖在长满斑点的头顶上的人，简直不可能当这样的象征。他肌肉发达、个子高大，有六

① 斯库拉是希腊神话中所讲的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海峡之间的卡律布狄斯对面的海妖。——译者

② 卡律布狄斯是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一个大岩洞，据说一日之间吞吐海水三次。——译者

③ 尤利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罗马神话中称为尤利西斯。——译者

英尺以上，穿着一件拖到脚背的薄外套，看起来倒象是个大口径榴弹炮弹；他的尖脑袋缩在两肩中间，又象个大肉桶。那天早晨人们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同志阿蒂利奥”，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象“匈奴人的国王阿蒂拉”。后来我费了好大劲才听懂他那口齿不清的话。这时我把他当成马尔侃^①书里描写的那个“拿锄头的人”“人猿的兄弟”。

水翼艇掠过海峡，墨西拿镇显得愈来愈大了，但是阿蒂利奥这个人物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我同他在一起呆过不少时间。他象是我的家臣一样跟在我后面到处转。对我提的问题，他的回答十分简单，讲话很费力。因此当我知道他在田里劳动之前只读过两年书，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但是，当我听人介绍说他是砖瓦工会的领导人时，我倒吃了一惊。我感到纳闷，他这么笨嘴拙舌，怎么能做领导工作呢？

但当我问起他挨打的情况时，他的舌头忽然灵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笨嘴拙舌是因为不好意思回答有关他个人的事。他说：“这两个人拿着棍子走过来，我起先以为这些小子们想开玩笑，我就喊了一句‘住手’，可他们开始骂我是密探，咒起工会来，还提到黑手党，我才意识到他们是黑手党人，是真的要干。所以我猛击了一拳，抓住一个人手里的棍子转过来打他。这个狗娘养的拔出枪来，我想他要发起疯来还真能开枪，所以我不再打了，只是用胳膊抱住脑袋，躲着棍子。他们打得我很疼，但没有伤到致命处，后来我就跑掉了。那个领班在一边看，还笑呢。我心想，‘狗屎堆，叫你笑’，别高兴得太早。他们以为是在同乡巴佬打交道。他们不懂什么叫工会，这些蠢狗屎。不管怎么说，我把那波利从床上叫起来，我们找到南多，就这么回事。第二天两个黑手党给扣起来了。他们

^① 马尔侃，美国诗人(1852—1940)。——译者

搞不清楚是谁告的。南多把领班弄去，他吓得够呛，就交代了。就这样三下五除二，事情就弄清楚了。”

那么他准备要杀这两个人么？现在他是怎么想的呢？

“当时我气得要命，可现在么……嗨，反正这就是生活。生气又有什么用。”他接着给我上了最了不起的一堂葛兰西理论课。“你瞧，这些人都是受压迫阶级的无知子弟，我们得开导他们，使他们懂得他们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把我们的价值观念输送到他们的脑袋里去。这就是思想上的领导权。生气不能教育人。你恨一个人，他也恨你。你吼，他也吼。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仇恨只会繁殖仇恨。迟早还得坐下来交谈，讲道理，这才是历史的前景。”他顺着这条思路继续说下去，语言生动，把复杂的政治术语和粗俗的俚语混杂在一起，什么辩证呀，毛细管呀，领导权呀，再加上“狗屁”、“操他娘的”、“硬梆梆地顶上去”、“肉包子打狗”、“扣底”等等。但一讲起政治，他的用词就是恰当和连贯的。在谈论到历史性妥协的必要性时，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对自己、对工会和党充满信心。他老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阿蒂利奥的这种信念只有教会的信念才能相比拟。这种对比再次使我联想到这两种对立的体制。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时代酝酿了三百年，进行了一场起解放作用的大革命。但一旦掌权，就变得腐败、狂妄、无情，最后犯下许多可怕的罪行，包括消灭整个民族，例如法国的阿尔比人和近东的十字军。它设置宗教法庭，出现过博尔吉亚的教皇，烧死异教徒。新教的出现制止了它的狂妄，但直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才使它有所更新。

共产党在欧洲的酝酿还不到一个世纪。1917年它发动了起解放作用的大革命。当苏共在斯大林领导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它就变得批评不得，十分狂妄，也犯下了类似教会犯过的那种令人反感的罪行。欧洲共产主义是类似新教的抗议行动，而阿蒂利

奥这样的人是它的核心。

这么对比来看可能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教会尽管有许多过错，但它在文化方面有很大影响。象佩莱格里诺和龙卡利这样的高级教士都是很有见地的人物。拿阿蒂里奥同这些人比实在是过于放肆。但是请想一想：这些杰出人物在孩提时代，只有九、十、十一岁，就被教会选中，送进神学院，受到爱护和文化的抚育，他们的物质需要可以得到满足。

共产党却把那些穷苦的、不幸的、没有文化的人教育成为有理想的人材。阿蒂里奥的顽强是非凡的，但是他的出身却是平凡的。此外，就象葛兰西所说的，共产党人干工作得不到“上天将会赐福”这样的支持和刺激。^①

我问过阿蒂里奥他入党有多久。他说：“才六年。在这以前同党没有过接触。”我建议他去党校学习。他笑着说：“他们也叫我去。但我这个人天资不聪明，看书有困难。”我既感动又不耐烦地说：“胡说八道，你顶机灵。我看得出来，党内的人很珍视你的经验。”他表示同意：“他们是这样看的。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要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我兄弟在德国做工，我还得照看他一家。我的姐夫死了。所以还有一家要照看，要照顾三个妇女和一大群孩子，这不那么简单。可谁知道？我的兄弟快回来了。”

匈奴国王阿提拉，砖瓦工阿蒂利奥，共产党员阿蒂利奥。

水翼艇放慢了速度，停在水中，船头朝着码头。从这里到车站乘火车去巴勒莫还得走好长一段路。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新秩序（1919—1920）》，第156—157页。“请看一看那些共产党员工人，他们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机器旁非人地劳动了八小时之后，还要无私地为他们的党、工会或合作社工作八小时。在人类历史上，他们要比那些不顾一切危险秘密参加祈祷会的奴隶和手工业者（早期的基督徒）要伟大得多。”但是，葛兰西没有想到还有那些维持家庭的共产党员的妻子所受到的寂寞和作出的牺牲。

第十章

拯救农业

对欧洲共产主义批评最尖锐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批评家指出,既然欧洲共产主义政府必须在市场经济之内行事,他们就得听任“大老板”的摆布。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在理论上这是个没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却有活动的余地。资本家们并不象理论上所断言的那么万能、那么顽固。

在意大利的情况下,意共同意大利企业在一个重要部门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农业。食品,特别是肉类,占意大利进口商品的大宗,^①也是贸易赤字、通货膨胀和里拉疲软的主要因素。尽管如此,意大利人吃得不如法国人好。提高农业生产率是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也是各个阶级所关心的问题。

意大利农业在上个世纪深受封建经营之害。直到今天,意大利南方人口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农业劳动力却占全国的一半。^②

① 杰拉尔多·基亚罗蒙特,《纲领性协议》。

② 恩里科·普列塞和乔瓦尼·莫图纳,《南方农业和劳动市场》,第171页表2。二十年来劳动力转移的数字是很大的。以下数字以百万为单位。

	1951		1971	
	总劳力	农业劳力	总劳力	农业劳力
南方	13.0	5.0	6.0	1.8
北方	6.5	3.7	13.0	1.8
共计	19.5	8.7	19.0	3.6

过去封建制度残余表现为一方面是巨大的庄园，另一方面是受压迫的佃农，其结果是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大地主将资金投放国外或北方工业，而佃农对运用新技术缺乏积极性。因此，从1919至1939年，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百分之九，大大低于人口的增长率。^③ 地里生产的粮食喂不饱当地的人民，解决的办法就是向外移民。1890年至1930年，有一千二百万人移居国外，其中半数在国外定居。^④

法西斯统治大力推行的垦荒政策(在沼泽地排水，修建水闸和堤坝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些好作用，二十年内增加了二百万英亩的沃土。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因而1936年，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拥有一些土地。^⑤ 但是法西斯统治的其他政策却对生产没有好处。当时推行的自给自足运动，单纯强调种小麦和谷物，以致山坡放牧地等不宜种粮食的地方也种了粮食。^⑥ 当局操纵粮价以筹措军费，还有中间商和加工商的剥削，缺乏资金。尤其是国家实行高压统治，禁止抗议和改良。二十年内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百分之一一点三，创历史上最低纪录。^⑦

在那二十年中，务农的人依然赤贫，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量一点都没有增加。^⑧ 绝大多数人只有在圣诞节、复活节、生日、结婚或类

农业工人总数减少五百万，但南方减少的比北方多一倍，总劳动力在南北两方的分布刚巧倒了过来，而全国总的劳动力却并没有变，证明有移居外地的或失业的人数，也可能是两者都有。

③ 见《意共年鉴1977年》，第129页。

④ 六百万长期移民中四百万移居美国。《美国统计摘要(1949)》第20页。《大英百科全书》第15册第466页。对1924年的研究表明意大利在国外定居的有四千万人，还有一千万人在国外出生，也就是说五个人中有一个在国外出生。(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2册第762页)

⑤ 普列塞和莫图拉：《南方农业和劳动市场》，第20页表1。

⑥ 《意共年鉴(1977)》，第131页。

⑦ 见普列塞和莫图拉：《南方农业和劳动市场》，第25页。

⑧ 《意共年鉴》，第194页表86。

似的特殊情况下才有肉吃。奶制品的生产受到限制。无论在北方,在威尼托,还是在南方,主食都是玉米饼,由于玉米饼缺乏维生素和动物蛋白,因此易得红斑糙皮病,这是一种由于营养不良而使人衰弱的病症。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已经衰弱不堪的农业更加荒芜,特别是对牲畜的摧残。牛、猪、绵羊、山羊、马等牲畜总数减少了百分之八十。^①战争结束时,完全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大量救济才渡过饥荒,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输送到意大利的各种供应物资多达二十亿美元。^②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本来应该可以激发意大利重建的进程,但接着冷战开始,改革遭到破坏,而南方实际上愈来愈沦为工业化北方的国内殖民地。直到1975年,由于共产党的压力,才通过了认真解决所谓南方问题的规划。那不勒斯是研究农业和经济的中心,因此我在南下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途中,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那不勒斯是波旁王朝的古都,现在成了南方社会结构中的定时炸弹。那里失业的人数有三十万,是南方全部失业人数的一半,多数是走投无路的青年。如果红色旅的虚无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这座城市就会爆炸。凡是同我交谈过的人,不论是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天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对我说同样的话:“随时都可能爆炸”。

那不勒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动派腐败统治的据点。但从1973年出现流行性霍乱的恐慌之后,人们开始向左转,1974年支持离婚

① 贾科马 阿切尔博,《1861年至今的意大利农业》,载《意大利经济(1861—1961)》,第122页;朱塞皮·马马雷拉,《法西斯之后的意大利》,第121页,和安东尼奥·甘比诺,《战后反对天民党政权争取解放史》,第57页。

②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29页。

法。一年后选举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上台。左翼接管的市政府是一个烂摊子，于是开始了艰苦的重建工作。失业者加大了压力。

我从罗马抵达那不勒斯的当天下午，失业工人占领了火车站，铁轨上站满了人，不让火车进站或出站。宽广的车站上喧嚣声震耳欲聋，大群大群的青年男女在那里高声嚷嚷、唱歌、乱挤、乱拥，或同他们的领队争论。他们的领队（多半是共产党人）半哄半求地说：“同志们，你们已经达到目的了！”“同志们，让火车开过去吧！”“示威很成功，请大家散开吧。你们的意见一直会传到罗马！”警察包围了车站，一位共产党警官控制着不让他们随意采取行动。警察很不安，但没有敌意。市政府的一位官员站在活梯上声嘶力竭地让大家能听到他讲话：“同志们，朋友们，市民们，请大家耐心一点。给我们一点时间。市里的事情乱糟糟……”。当我在加里巴尔蒂的巨大雕像附近搭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他的话还没有起多大作用。

比起欧洲其他城市来，那不勒斯南北两端贫富悬殊也许更为突出。这个城市紧贴着它那著名的海湾延伸得很长，从北边的波西利波一直到南边的波蒂西郊区。在偶然的情况下，我在一天之内参观了贫富两个极端。那天上午我到波西利波的休养区访问了卡洛·格雷科神甫，后来又去波蒂西的那不勒斯大学去赴下午才开始的午餐。

市区公共汽车沿着山坡上开凿出来的宽阔大道往上爬，左边是海湾，右边林立着一排排豪华的公寓，高高在上，凉爽而优雅。天主教会的休养地是一座整修过的贵族宫殿，阴凉高雅，富丽堂皇。格雷科神甫三十多岁，身材细长，穿着深色的裤子和灰色的高领衫，他长得象阿尔伯特·加缪^①。他是意大利青年神学家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的工作是想推动教会沿着“大公会议”的道路前进，是巴

^① 加缪是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作家(1913—1960)。——译者

尔托洛梅奥·索尔吉神甫所扶植和领导的一个非官方联络网。格雷科神甫讲起话来很随便，很详细。

访问后我又到波蒂西赴约，公共汽车飞快地在大道上奔驰，穿过市区，进入南城的居民区。气氛突然改变了：邈远的住房，拥挤的街道，狭窄的小巷。公共汽车拐弯时，车子离街角上的住房只有几英寸。到处是黑咕隆咚的手工业作坊，焊工、白铁工、木工、电视机和无线电修理铺等，以及小得可怜的食品店。人行道上不时有小孩或老妇人用木箱摆地摊，商品少得可怜：几包按支零售的香烟，一碗橄榄，十来条小鱼，几头洋葱和几个土豆。甚至阳光的照射也不能弥补这无情的贫困。这里就是失业工人居住的地方；火车站上爆发出来的怒火，就是在这里酝酿和点燃的，只是这里的怒火还处于受压抑的状态。

两个居民区的鲜明对照，使我自然而然地一再想到这就是灾难深重、摇摇欲坠的国家的象征，温暖柔和的天空和充满诗意的海湾使这种想法更加阴郁。我想起了格雷科神甫热切的面容，以及他所倡导的神学，即：耶稣会会士也应作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

格雷科神甫的神学并不是真正革命的，他永远也不会当游击队的教士。但是他坚定地相信反帝的大公会议派的观点，保卫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利益。他写过不少著作，介绍天主教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虽小但却不可忽视。他还敦促我同保守的高级教士讨论共产党同天主教对话的问题。格雷科苦笑地说：“教会的统治集团变化缓慢，……但还是在变。”

他解释说，教士的阶级出身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有助于教会统治集团的变化。过去大多数教士是农民出身，教会很少从工人阶级和商业阶级中发展教士。但总有少数人来自上层阶级（除长子之外的儿子），他们在教会内飞黄腾达，多数的主教和红衣主教就

是这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青年子弟都改为从商或学专业，由农民出身的教士填补空白，拿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叫做“有上升的余地”。这些教士都很虔诚，但同时教主会议派所强调的贫穷和压迫深有体会。这位耶稣会的神甫说，下届教皇也许是个保守派。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教士出身的变化和第三世界的份量增加，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的观点会居统治地位。

我们接着谈到意大利国内情况，格雷科神甫对经济问题并不很自信。他说：“我不是个经济学家，但我认为经济的关键问题是个民心问题。我现在不是以教士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在说话。我看到人们没有劲头，情绪低落。他们感到走投无路，受到剥削。他们尽量少干活。”

他虽然说自己不是经济问题专家，实际上他对农业情况十分熟悉。他只几笔就勾画出了南方问题的核心。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激进的改革看来迫在眉睫。封建地主无一例外都是法西斯分子，许多人外逃。战争改变了农民逆来顺受的态度，权力结构乱成一团，共产党进入政府并主管农业部。美国军队在无意中阻碍了改革。它为了便于入侵，招募了几百名意裔美国人搞情报，其中不少是黑手党人。战斗部队向前冲时，黑手党人留在后方，有些还在军政府中担任要职。格雷科神甫并不认为美国人有意这么做，他们只是出于无知。

我说他们不是完全无知。战争结束时我在卡塞塔的盟军总部工作过。当时我们的官员知道美籍意大利人中有许多人在美国参加过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但是黑手党还是些有用的人。他们懂两种语言，在意大利有家族关系，在村子里还有老关系，他们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人都认识，可以完成任务。再说，黑手党人还是超级爱国者和自由企业派。

到此为止，格雷科神甫和我都能达成一致看法。在关于美国

官员是否无辜这一点上略有分歧。我认为有些人是故意这么做的。但格雷科神甫不同意。他认为用小喽啰取代人们共知的法西斯分子是一种难以觉察的和不可避免的复辟。在当时情况下，有可能把县长关起来，而由他原来的秘书当警察总长。市长会不见了，他的表兄弟却会被捧上台。地主们在美军的保护下回来了，怎么会不这样呢？难道土地不是他们的吗？

当小农打算进行夺地斗争和组织合作社时，黑手党组织的治安维持会成员就殴打积极分子，杀害带头人。^① 由于暴力活动进一步扩展，军政府遂大力推行法律和秩序。于是在罗马达成了协议：政府将制定土改措施，但农民不得武装夺地。政府将推行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政府没收了一些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官员的土地，征用了未耕地，还尽可能地购买了一些土地。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地运动，同时还辅以法律，规定以极低的利率向贫农发放贷款。四百万英亩的土地分给了八十万农民，每人平均分到五英亩。^② 当然还有几十万农民拥有的土地大大低于平均数，它们被称为“手帕”地，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47年共产党被赶出政府。安东尼奥·塞格尼当了农业部长。1949年他委派老牌的法西斯同伙保罗·博诺米负责南方工作。博诺米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十分庞大而腐败的帮派体系。他重新建立了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农民组织“农业家联合会”，来分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农产品都由农业家联合会收购和定价，售给同它有关系的批发商和加工公司，联合会则拿取固定佣金。博洛米的人还控制了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拿贷款做人情和行贿。菲亚

① 关于意共1943至1946年政策中忽视南方农民运动的争论可参阅吉多·夸扎所著《意大利抵抗运动史》，第389—399页。

② 普列塞和莫图拉：《南方农业和劳动市场》，第27页注46。

特垄断了拖拉机的生产和销售；拖拉机往往太大太贵，效率不高。大石油产品制造商蒙泰坎蒂尼则垄断了化肥，售价昂贵，迫使农民欠下更多的债。他们答应给贫苦农民小量补助来堵住他们的嘴，并说服他们投天民党的票。这些津贴、高价、舞弊用的贷款和浪费掉的资本，都得要付税者承担。博洛米这伙人发展成为只能保证最低产量、可是能获取最多选票的体系。^①格雷科神甫说，“博洛米的人简直象奥吉亚牛厩里的牛，污秽不堪，将来也非得要由赫尔克里士那样的大力士去清扫，^②但这样做的首要条件是建立一个清廉正直的政府。”

在波蒂西，市内公共汽车停在老波旁王朝宫殿前门的小广场上。这座宫殿现在是南方农业经济中心的所在地。宫殿虽已破旧，但气魄仍然很大，有宏伟的拱廊、宽阔的石阶、高大的门窗。墙皮已经剥落，涂满了政治口号。我经过院子里的岗亭，走上一楼的门廊，俯视古老的御花园。花园小径两旁站着一排饱经风吹雨打、长满野草的半身雕像。那片看起来是作试验用的地种得很糟糕，在地的中央有一块已经犁过的田，里面到处散放着已经生锈的机器部件。一片荒芜贫瘠的景象，使人想起许多生产计划在诞生时就遭到夭折。

我找到了我的东道主、南方农业问题专家恩里科·普列塞教授。普列塞教授1942年生于卡拉布里亚，1965年在波蒂西毕业，后就学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发表过许多有关南方农业的重要著作。

我在一间阳光充足的大房间里找到了他。房间里放着两张木

① 巴雷塞和卡普拉拉，《天民党合股公司》，第167—176页。

② 引自希腊神话故事，相传奥吉亚王的牛厩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没有打扫，后为主神宙斯之子赫尔克里士用河水在一天之内扫清。——译者

头的书桌和一张大会议桌。还乱七八糟地放着文件柜、书架和碗柜。普列塞教授正埋在一大堆书籍、专题文章和油印品中伏案工作，还在同他的助手争论。他给我介绍时称那位助手为埃莱娜同志。他们两个人都是三十多岁，都很讨人喜欢。教授长着一头不听指挥的头发，态度显得很放松。那位助手则梳着一个光光的髻，说起话来很尖刻。他们两人都是宣言派成员，但普列塞更靠拢意共，而埃莱娜要比他左一些。他们带我到地下室的普通酒馆里吃午饭，那里的酒十分精彩，鱼汤也很可口。普列塞简略地向我介绍了意大利南方农业情况，同格雷科神甫的介绍十分相似。

“美国军队当时并不想保护法西斯，他们是不了解情况。”

埃莱娜打断他的讲话，“当然他们是了解情况的，你还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呢？但是我不责怪美国人，我是怪意共不该插手让大家停止斗争。”

普列塞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

埃莱娜说，“没错，是意共拦阻了大家的反抗。你知道这是事实。当时谁在当农业部长？共产党嘛！”

普列塞笑着对我说，“她整天都是这个样子。她恨意共。”

“不，我不恨意共，我在意共当了十五年党员。我恨的是贝林格。”

“我也不喜欢他。”普列塞转过来对我说，“埃莱娜讲的是事实。意共是干预了，制止使用暴力，当时合作社受到攻击，有人给杀害了。暴力愈来愈升级，意味着将会同盟军发生严重的冲突。共产党不愿情况这样发展下去。妥协的结果是自上而下进行土改。”

“这是古洛^①干出来的，”埃莱娜坚持说。

^① 古洛是意共党员，1946年至1947年任农业部长。

“当然是古洛干的。但他当时的意图是在分配了土地之后紧接着就搞合作社，让农民组织起来，政府在种子和机器方面提供帮助。”

埃莱娜说，“换个说法，就是重建资本主义。”

普列塞抗议说，“完全不对。强大的合作运动会破坏资本主义。你瞧瞧波洛尼亚市周围农村的情况。”

埃莱娜说，“这是摆样子。”

“得啦，埃莱娜。目前意大利已经有大约三万个合作社。他们的生产总值为八十亿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五分之三的合作社会是共产党领导搞起来的。每月还要增加几百个。他们的政治影响十分大。他们还在发展。”^①

我问道，“资金呢？”

“被博诺米那一帮人浪费盗窃的钱就已经绰绰有余了。现在给六百万农民颁发毫无用处的补贴，其中有一百万是虚数。每人五百元就有三十亿。但情况在变化，现在贷款控制得比过去严，还受到监督……”

埃莱娜尖刻地说，“可不是，贷款都给了有钱的地主。”

普列塞说，“是这样，但也不完全如此。现在的法律是根据亩数发放贷款的，显然大农场占了便宜。但小农也可以组成合作社，并按他们的土地总数取得贷款。法律上也是这样写明的。它给了我们很大的好处。而且，有些大区 and 城市现在左翼掌权，第382号法律又规定区、市政府有权制定农业发展计划，这方面大有可为。左翼组织的合作社半数在艾米利亚—罗马涅，也即波洛尼亚所在的大区。”

^① 安·克里坦顿：《意大利红色合作社的发展》，载1978年6月18日《纽约时报》，该文证实了上述数字，其中意共、意社会党和天民党领导的合作社都算在内。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约占总数的60%，半数在艾米利亚—罗马涅。

埃莱娜说，“富人愈来愈富。”

普列塞说，“产量就上去了。”

埃莱娜说，“你讲的话同意共一模一样。你不是宣言派的人。”

普列塞咧着嘴笑着说，“我是宣言派。贝林格太软了，但意共还是对的。我们需要增产，特别是肉类，肉是头号进口货。只要肯动脑筋，勤劳肯干，又有现代化技术，就能干出惊人的成绩。在西里中部有一个畜牧合作社，他们在创造奇迹。卡洛，我可以安排你去参观。埃莱娜，你知道这是真的，你去过那里。”

回去时，我们在过道里遇见一位长者。埃莱娜没有留步，而普列塞却停下来介绍，“这是奥古斯托·格拉齐亚尼教授。”普列塞亲热地说，“是我的老师，意大利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格拉齐亚尼教授又瘦又小，脸上带着探询的神情。

我问格拉齐亚尼，意大利经济还有没有希望。他平静地答道：“毫无希望。”“难道连搞历史性妥协也不起作用吗？”他摇摇头说：“为时已晚。”我问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回答说：“暴乱、杀人、无政府主义。我也不知道。”他的表情很宁静，说话都是当真的，他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已安之若素。普列塞察觉到我的不安，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格拉齐亚尼教授饱经沧桑，他已经近八十高龄，对事物持悲观态度。”

“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常有的，”我说，普列塞微微地笑了一下。

“是这样”，普列塞说，“但问题是，他的见解往往难得有错。”

有好几天格拉齐亚尼的话在我心头萦回。在意大利，人们常常发表悲观的预言，但这种预言一般来自极左派或极右派。红色旅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烂透，不可救药，必须加以摧毁。新法西斯主义者则认为共产党已经接管了国家，正在恶魔似地使社会解

体。但对这些人的悲观论调可以不当一回事。

意大利显然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人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意共的领导机构成员那波利塔诺曾对我说：“我不知道，意大利社会能否得到拯救，即使我们掌握全权，任务也会是十分艰巨的，更何况我们不会掌握全权。但是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试一试看。”格拉齐亚尼冷静自信的内行意见，使那波利塔诺的警告更加有力量。

格拉齐亚尼的话引起我的兴趣，因此在回到普列塞的办公室时，我问他格拉齐亚尼赞成不赞成武装起义？是否同情红色旅？普列塞说，格拉齐亚尼不赞成武装起义，也不同情红色旅，他认为红色旅是发了疯的傻瓜。格拉齐亚尼只是认为意大利经济如此失调，腐败之风已无孔不入，人们普遍感到无所依靠，因此不管什么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普列塞说，“拿我们宣言派来说，我们在战略问题上同党并没有分歧，我们只是不同意意共的策略。而格拉齐亚尼则认为意共的战略也是毫无作用的。”

“那么有什么替代办法吗？”

“没有，他认为没有别的替代办法。”普列塞说，“格拉齐亚尼认为社会解体是无可挽回的。”

“你显然不同意他的看法。”

普列塞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也许我只是要自己这么相信。我还想活。我还年轻，他已经老了，比我年纪大一倍。”

我说，“我跟他差不多大，可是我同意你的意见。”

“喔！你呀！”普列塞笑了起来。“你是个美国人，所有的美国人天生都是乐观派。”他说话的腔调倒象乐观，这是一种病态。“你听着，你不是讲数据么，在数据方面，我同格拉齐亚尼的看法是一致的，甚至在工作规划方面，我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据我看，意大利的经济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普列塞举肉类生产为例。意大利每年要花二十亿美元进口肉

类,还要花二亿五千万美元进口玉米和燕麦作饲料。这两样占了意大利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①据普列塞说,有些经济学家争论说,肉和工会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我认为他是说着玩的,但是前意大利银行行长、杰出的经济学家卡利也恰恰提出过类似的论点。他的论点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后期,工会在争取提高工资和工资调整条款方面取得了胜利,亦即:工资按生活指数上升的百分比自动调整。这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是,工人工资提高了,开始改善伙食。过去通常是一个月吃一次肉,现在一星期吃一次肉,有的地方,甚至一天吃一次肉。^②由于肉食短缺,肉价上涨。既然食品构成生活费用指数的主要部分,生活费用指数也随着上升。生活费用指数上升了,工资跟着上升;工资上升后,肉吃得更多,物价又上涨,指数再度上升,工资也再度增加,如此循环不息,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③

我认为这个理论大而无当。普列塞说这个理论纯粹是一种宣

① 1978年8月23日《意美关系进展》中的报告。这里的数字同以前的数字没有矛盾。1977年进口总额为120亿美元,其中食品进口占30%,近35亿美元。食品进口中肉类占75%,约25亿美元,大约为进口总额的20%。

② 尽管如此,意大利的标准要远远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1976年意大利按人口平均每人消费动物蛋白38克,法国人为64克。1975年差额缩小了,但意大利每人的配合量仍只有48克,当然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一句老话说波洛尼亚人吃一天的量,罗马人要吃一星期,而热那亚人要吃一个月。见约翰尼斯·巴尔堪·普鲁克特和罗伯特·普鲁克特所著《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阶级斗争和危机(1945—1975)》第24页。

意大利食品消费的问题十分复杂。一方面毫无疑问意大利人现在吃得比过去好得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完全是“欧洲”式标准。例如,1970年至1974年同1951年至1955年相比,每人平均吃牛肉的年消费量增加了三倍,猪肉增加了两倍,新鲜水果增加两倍。(见1979年1月18日《欧洲》杂志的《世纪表》。)这是乔治·阿门多拉经常强调的一点。但另一方面阿门多拉也指出“由于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和缺乏现代化的农业,”因此消费量的增加成了“收支平衡上出现赤字的原因之一”。见阿门多拉所著《共和年代》第18页。

③ 卡利是在1964年5月向意大利银行作的年度报告中提出这个论点的。英格拉奥在他所著《群众和权力》第14—15页中引用了卡利的话。

传手段。实际上衣服和住房的涨价速度同食品差不多；许多项目如电费、保健费、交通费上涨还要多。普列塞说，“尽管如此，还是有办法可想的。如果全部肉类都由意大利自己生产，对经济就会大有好处。这一点我们是做得到的。”

普列塞拿着笔和纸，查阅统计表，把数字算了出来。关键问题在于将小农组织成拥有一百至二百英亩土地的合作社。他估计只要有三万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投资十万美元，就可以不用进口肉、玉米和燕麦。所需的一百四十亿美元资金可以取自发给小农的补助金。^①

普列塞说，“一百四十亿听起来数字很大，但只要想一想，每年偷税漏税的款额高达二百亿美元，可见我们可以找到资金来源。”他带着讥讽的口气说，“我们该做的只是制止偷税漏税，停发补助金，让农民参加合作社，派诚实的人去管理生产。不该指责格拉齐亚尼，他认为这样做可能性极小。”

“那你呢？”

“我吗？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还可以试试看。当然要作艰巨的斗争，但是……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朝我苦笑了一下。“你要知道格拉齐亚尼真的想法吗？他认为现在国家的道德支柱已经被摧毁，人人都想坐享其成，过轻松日子，只吃饭不干活。他认为即使政局和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也已经为时太晚了。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和三十年的天民党政权已使人们变得自私和贪婪，要过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甜蜜生活，似乎甜蜜的生活就在眼前。”

他停顿了一下，把眼睛眯起来。“你又是怎么想的呢？各种迹象都证明格拉齐亚尼有理。我们的道德观念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

^① 《五金工会》专门出了一期关于农业问题的双月刊，足以证明总的来说意大利劳工运动，或者是意共正在克服不少劳工运动的通病“狭隘的行会主义”。见《五金工会月刊》，1975年2月13日号，第111—112期。

的自信心在下降。格拉齐亚尼认为这种破坏是无法弥补的，我却不是这样看。我认为如果人们看到自己的劳动可以起作用，那么民心就会重振，就会激起重建祖国的热情。我认为共产党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鼓起这种热情。他们是人民和国家的最坚强的保卫者，甚至连他们的敌人也这么看。这是惊人的成就。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这是左翼第一次作为民族的保卫者而屹立着。”

我向他介绍了我同格雷科神甫谈话的内容，告诉他格雷科神甫也提道德重振的必要性。共产党和耶稣会都在寻求同一个目标，这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但格雷科神甫相信只有宗教才能最有效地重振道德。普列塞点了点头说，“我知道，格雷科神甫有权这么说。我们欢迎在激发民心方面来个竞争，但是请你相信，我们的成果同他们相比是一百比一。”

我说，“你愈谈得多，听起来愈满怀希望。”普列塞笑了起来说，“这叫自我陶醉……但是……很少有一天没有叫我高兴的事。就说昨天在罗马附近的拉齐奥建立的那个合作社吧，一共二十三个人，有些是教师和律师，他们接管了一片未耕地就干了起来。^①你能想象么，是些律师！就象以色列的合作农庄。当然，推动以色列人干的动力更大一些，但是让沙漠开花结果也更艰巨一些。我们要有他们的那种献身精神，我相信我们会做到。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如果连共产党都做不到，那就谁也不会做到。”

我问道：“你常常讲意共的好话，那你为什么不是意共党员呢？”

“这……没什么。我们宣言派都是共产主义者，在摊牌时我们都会站在意共一边。我们并不反党。意共做出了伟大的业绩……，

^① 每周几乎都有新的合作社成立。英国电视台拍了一部报道一个合作社从建立到发展的情况，片名为《共产主义的面貌》。

但是我们认为意共过于迎合天民党。我认为在南方这样做是错的。天民党在南方搞依附关系，势力很大。我们必须打击它，这就是埃莱娜的主张。如果意共在议会搞秘密交易，人们会认为意共已经背叛，从而感到幻灭。”

阿马德奥对党曾有过类似的抱怨，这却是党外的反应。显然这方面的批评很多。我所接触到的宣言派都是能干而严肃的人，他们对意共没有恶意，但对意共可能使人幻灭感到担心。^①我很难作出判断。我认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它在整个左翼内部的工作很不深入。

我想起彼得·尼科尔斯在《意大利人的抉择》和彼得罗·英格拉奥在《群众和权力》中谈到的议会问题，前者是英国自由派，后者是意大利议会议长、意共的左翼。^②尼科尔斯指出意大利议会从1870年建立起，从来不象英国议会或美国国会那么有权。“议会从来只是一个反映其他地方作出的决定的辩论场所。”他引用了天民党议员皮耶罗·巴塞蒂讲的话。巴塞蒂谈到意共起了先锋作用，推动意大利发生变化。他说：“迄今为止，总是由政府制订法律和法令，议会最多不过提几条修改意见。现在情况颠倒过来了，以后将由议会制定法律而政府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③

① 约两年之后，意共在1979年6月大选中南方的选票大为下降，我想起了普列塞的预言。当时我没能见他，因为我大选后要去北方伊美雷亚，但是我在《宣言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重申他的论点，最后说“希望意共这次受挫能使它重新审查它的路线，以及工作作风。”见1979年6月20日《宣言报》。

② 他1979年辞职，由尼尔德·约蒂代替，这是第一次由妇女担任议长。尼尔德·约蒂是陶里亚蒂的第二个妻子。她任中央委员多年。意共要英格拉奥在1979年6月大选后继续担任议长，因天民党的政治家对他已经熟悉，喜欢他并且容易接受他当议长。但英格拉奥不同意，说议长席位是属于意共的并不是属于他个人的。他坚决辞职并要同意共发生冲突。这是意共内部“温和派”同“强硬派”矛盾的一个例子。

③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164页。

事实上巴塞蒂过于乐观。政府一再破坏议会通过的法律。然而议会力量在日益增强倒是真的，英格拉奥成功地加强了议会的权力。议会作了一些改革，其中之一是广泛地运用调查委员会。各党都在议会里作交易，议会在意共的战略中起着关键作用。英格拉奥说过：“我们如果研究‘历史性妥协’这一战略的含义，就会看到，归根结蒂，要对付意大利社会所面临的历史性问题，任何一个党单枪匹马是不够的。意共的战略断言，即使所有的党都参加也是不够的。从不受党派羁绊的统一劳工运动的成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统一的劳工运动甚至使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也能讲话。基层民主机构网的建立也足以证明这一点……”（黑体是英格拉奥书中原来就有的）。①

我认为无论是普列塞还是阿马德奥，对议会在意共战略中所占的地位都并不真正理解，而祖科蒂却懂得这一点。祖科蒂还提到了普列塞所强调的其他问题，即意共对天民党的迁就。在某种程度上，莫罗、安德雷奥蒂和扎卡尼尼都对意共进行过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讹诈，就象当年加斯贝利在订立拉特兰条约时对陶里亚蒂进行讹诈一样。他们说，把我们迫得太甚，联盟就会破裂。然而，我并不认为意共是软弱的，而是它宁可智取不以力胜，宁愿巧妙地从侧翼包抄，而不从正面进攻。关键在于取胜。我发现意共内部的左翼很愿意使用自己的头脑。

例如在勒佐卡拉布里亚时，那波利安排我同该地区失业工人委员会的组织者见面。这个人来自五十英里外的山区。我们是在上面所讲的法官在审讯黑手党案件休息时会面的。塞蒂莫同志原来是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闯将，得过大学物理学学位，喜欢毛泽东的小红书。

① 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166—167页。

他的思路很有条理，报告他的活动时讲了两个小时而不用任何笔记，但是常常引用毛泽东的警句。他多次领导过夺取未耕地的斗争，但他说他总想使他的行动有点“合法色彩”。他也挫败过天民党扣留“未用余额”的打算。^①我已经从杰尔马诺·马里处了解到市政府要上呈如何利用拨款的计划。由于许多地方没有懂计划的行政管理和技术员，未用余额只能存在银行里。塞蒂莫组织了几支失业技术人员的队伍，如工程师、建筑师、会计等。他们免费为市政府起草计划，等市政府拿到钱再给他们补发工资。塞蒂莫自己从意共勒佐卡拉布里亚区委领取薪金，但他向我保证党组织毫不限制他的活动和主动性。他显然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并且得到党的支持。他已经学会利用议会通过的法律，而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议会里有很大影响。我当时认为“历史性妥协”是一种可行的战略，但要付诸实施需要娴熟的组织技巧。意共在1979年大选受挫后，我仍然这么认为。只要技巧熟练，效果可以是惊人的，这就是我在西西里参观一个合作社时看到的情况。

同普列塞谈话后一个月，我站在西西里中部的小山顶上，俯视一个共产党合作社的农舍。萨尔瓦托雷·弗拉泰利奥站在我的旁边，是他到卡马拉塔—圣乔瓦尼杰米尼车站去接我的。他把只有两扇门的菲亚特小轿车停在砂砾路的中间，然后费劲地使他那六英尺高的身躯从狭小的车座上钻出车门。他把我带到山边上说“从这里可以看到全景。”这是一个山坡起伏的地区，合作社就在山下面。由于我们站的地方坡度较陡，离下面的合作社很近，连鸡

^① 意共对“未用余额”问题曾进行过正面斗争，企图把钱从南方开发银行转到大区手里去分配。见1979年11月19日《全景》杂志。意共的中心思想是要撇开银行，让大区去分配和管理基金。

和狗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一辆黄色大拖拉机在挖一个大坑，车旁站着一个人，时而给拖拉机手指点方向。他们看到了我们，对我们挥手，萨尔瓦托雷也向他们挥手。

“他们是在为我们的新房挖地基”，他十分高兴地说。接着我们又陷入一路上时断时续的争论，他要我在这里过夜，会见他的哥哥。

我说，“请你相信，对我来说，这可再好也没有了。但是我办不到。只今天下午有一班火车回去，我明天早晨必须回到大学，然后乘飞机去罗马参加五金工人大示威。这可不能不去！”

“那当然，这次示威规模很大，有历史意义！”

事实上这场争论是在巴勒莫开始的，前一天晚上萨尔瓦托雷的哥哥就同农会执行书记皮诺同志争执起来。普列塞事先向皮诺关照过了。皮诺是个瘦长的小伙子，二十六岁，穿着一件白色的高领衣。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在一旁可以听到电话里对方的抗议声。

“不，他不行，”皮诺毫不让步，“他只明天上午有时间。你听着，这不是什么别的美国教授，是个同志。他在美国还坐过三年牢。什么？他当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老天爷，他还翻译过葛兰西的书呢！那好吧！……好极了。”他放下电话胜利地朝我眨眨眼睛。“都安排好了，他明天要去阿格里琴托领许可证和银行贷款，不能改期。你一早六点乘火车去。他的兄弟萨尔瓦托雷八点半会到车站接你。下午一点有一班火车回来。”我向他道谢，他挥了挥手说，“这算得了什么，好，再见！”

“这是我们的房子”，萨尔瓦托雷美滋滋地又说，“我们准备盖五幢，现在盖三幢，明年盖两幢。我们现在有五户人家，外加五个单身汉，大家都住在那边一所大房子里。”他指给我看。“挤得象耗子似的。一家两间房，一间大厨房。将来我们把大房子留给单身

汉。有家的每户单独住一幢新房子。完全美国式的！有带澡盆和淋浴装置的洗澡间，还有自来水，我们还安装了热水管道，将来还准备安装暖气设备，……完全美国式的。”

他指着一间大谷仓说，“这是贮存饲料的。我们自己种饲料，用干草同高蛋白作物、苜蓿和罗马大豆混在一起。”他用指尖飞了一个吻说，“棒极了，营养十分丰富。”他讲起话来很流利，技术名词用得很得当。我问他，“你念了几年书？”

“念完初中。我们家很穷。我哥哥好不容易念完高中，他只比我多上两年学，可他现在什么都能看懂。我们的兽医也是受过教育的。我们都能读点书，但很困难，象这样一个地方，事情老是干不完。但我们的孩子……他们却飞起来了。有一家的儿子在罗马一家医院里当医生。他说他不愿拿西西里人作试验，但他实习完了就会回来结婚，他说北方的姑娘对人太冷淡。我的两个侄子正在大学里念书，我的女儿今年刚上大学，念的是考古学。真有意思，我的女儿学考古！”

他指着褐色土地上四长排用煤渣砖盖的矮棚子，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牲畜棚。你瞧，第一排比其他三排大，那里养着一百五十头牛。其他三排各养一百头牛。我们有可以养四百五十头牛的地方，只要把拴牛的架子拿掉，换上栅栏，就可以养同样数目的猪。但是现在养得还不多，只养了一百五十头牛和几十头猪。去年闹猪瘟，尽管我们的猪没有受影响，但我们饲养的品种容易受传染，所以我们把猪都宰了，现在正在繁殖抵抗力较强的品种。去年我们也不得不宰了许多牛，因为饲料不够。去年年成不好，太旱了。”

“那为什么不去买饲料呢？”

“划不来。天旱饲料价格高，并且买饲料就意味着国家要多进口饲料。现在国家在削减进口。……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有政治

责任感。”他说这些话是不自觉的，好象这是天经地义一样。我自忖这个初中毕业生可以让我们好多大学毕业生感到害臊。

后来我们参观牛厩时，看到一头十分健壮的公牛。“这是我和我哥哥出钱从法国买来的。花一百万里拉呢！”我问他喜欢不喜欢合作社的生活。他腼腆地笑了笑说，“简直象做梦。我从小就喜欢侍弄牛，喜欢闻它们的味道，同它们在一起。长大后我老想有个农场，养那么十来头牛。后来党推动了合作化。你瞧，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规模。”

“党和你大哥。”我说。

“我大哥就代表党。我大哥是党培养出来的。我们合作社里除了兽医外，全是共产党员，兽医是社会党员。我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都是投身阶级斗争、动员穷人反对富人和老板的共产党员。我大哥则不然，他不但忠诚，还有头脑，他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党员。你懂我是什么意思吗？他是改造世界的党员！我是改造西西里的党员。”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了解了这个合作社的历史。它是1969年萨尔瓦托雷的大哥领导创办的（我一直不知道他大哥叫什么）。弗拉泰利奥一家有四兄弟。土改时每人都分到四、五英亩的土地。由于辛勤劳动，四家把土地扩大到四十七英亩，另外还长期租用四十多英亩。政治因素促成了合作社的建立：1969年2月，意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要优先开展农村工作。会后，弗拉塔里奥四兄弟认为要做点惊人的成绩出来，因为当地的党员很少，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合作社的主意。当时有一幢房子和二十英亩土地跟他们的地连在一起。他们同邻居商量，要买下那幢房子，合伙经营自己的地和租来的地。

萨尔瓦托雷说，“我们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条件。只是大家象一个大家庭那样过日子。没有规定什么工作日和时间表。人人都劳

动，谁要病了，别人就把活接过来。就象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天爷作证，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以四兄弟为核心，合作社最后发展到十二个人，除了一个兽医，其余都是共产党员。一共有五户和七个单身汉，包括弗拉泰利奥家的两个小兄弟。这几年里有两个单身汉成了家，所以现在住在那里的是七户和五个单身汉，其中有两户住在镇上，经营合作社办的肉铺。萨尔瓦托雷说：“零售赚钱多。”肉铺的收入都归合作社，作为伙食和房租开支。兽医还为其他农民工作，他的收入也全部交给合作社。合作社还出租有驾驶员的拖拉机、十吨大卡车和联合收割机（都是美国造的），驾驶员的收入也都归合作社。

“我们自己生产百分之九十的饲料，和几乎全部的食品，如乳酪、肉、酒、蔬菜。我们上市场购买咖啡、糖和面粉。全部医药费和孩子的学费都由合作社开支。每年年底在扣留各项支出、利息和积累后，在成年人中不分男女平均分配收入。分得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或者买衣服、收音机、书籍，或娱乐、储蓄等等。合作社一直经营得不错，我们有时也有些小争论，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拆散。”

萨尔瓦托雷接着说：“头两年日子不好过。当地的财主和当官的都反对我们，搞破坏。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掌管‘南方开发银行’的人好象是拿自己的钱出借似的，他是个顽固不化的教徒，打心底里恨我们。真是可怜虫！后来共产党选票增多，我们开始有了点权，我大哥就把这个人给撤换了。现在工作顺利多了。我们增加了新的土地，一切正在向前发展。我们要多少贷款都可以到手。实际上我们现在争论的是该干些什么。”

萨尔瓦托雷停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这时他变得更加扭扭捏捏：“我是说……你是局外人，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帮我们的忙。”

“行呀，”我说，但他的态度使我感到纳闷，“你倒说说看。”

“是这样，如果我们牲口棚全满了，只需要增加很少一点成本就可以使生产翻一番。我们已经有了谷仓，机械，有了常用的家什。我们可以再租点地，也可以雇工。但如果我们雇工，我们不就成了资本家了？我是指雇工就是剥削，不是吗？”

我说，“当然罗。那又怎么办呢？”

“我们还可以从邻居吸收二、三个社员。加上他们分到的和租种的地，我们就可以增加三百英亩土地和增加几个劳动力。只要我们乐意，明天就能办到。”他捻得手指劈拍作响。“现在可以由我们挑选。因为我们办得好，现在谁都想参加。九年前我们让这些人参加，他们都不干。艰难的时候他们不肯来，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吸收他们呢？我说去他们的吧。”他提高嗓门，尽管他脾气很好，但还是很激动，“可其他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大哥也不同意。你说呢？”

我嗅到使他不安的原因所在，但我避开了话头。“还有别的做法吗？”

萨尔瓦托雷把脚在地上动来动去，偷偷地瞧了我一眼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找三个聪明勤劳的失业青年，都是共产党员，让他们当合作社的正式成员。”

“老天爷，就这样参加合作社！没有地，没有钱，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参加。”

我玩味地说，“那无疑是基督徒的行为。”

他尖锐地答道，“不是基督徒的行为，是共产党的做法。”

“那你大哥的意见呢？”

“他说现阶段这样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这下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不好意思。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少数派，只有一票，因此要寻求外人的支持。现在碰巧他的大哥不

在，他可以充分利用这位从海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葛兰西的翻译家来评价他的建议是多么有理，多么有阶级觉悟，多么符合马克思主义。我若赞成他的意见，就有可能改变决定。我有点不安和很受感动。

“萨尔瓦托雷，”我温和地说，“亲爱的同志，你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但请你考虑一下，你在问我的意见、问我的判断，而我是个陌生人。怎么能让我去反对你大哥呢？”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抬起眉毛，肩膀微微地耸了一下。这是个同其他人步调不一致的笨重大个子。我象喜爱自己的兄弟那么喜爱他。

“不，不，萨尔瓦托雷！我并不是在批评你，如果你要我不成熟的意见，那么我想你应该把你的邻居吸收进来。人们理所当然愿意参加办得成功的事，你何必为了九年前他们不象你那样有信心和远见而惩罚他们呢？”

“他们都是些顽固派，天民党里最糟的人。”萨尔瓦托雷喃喃地嘀咕着。

“但党要影响的恰恰就是这些人。你们是打算战胜天民党的。这是党的路线，这场比赛的名称，就叫做怎么才能让天民党喝水。”我把祖科蒂的说法讲给他听。“你们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扎实和坚定的工作会得到什么收获。你们在这个落后地区获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有两个共产党镇议员和一个友好的天民党镇长。这是很大的成就。你相信党的路线，你相信你大哥的政治嗅觉，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呢？”

“我想你是对的，我大哥是对的。”

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费好大的劲才放弃了他那略带乌托邦的想法。我又对他说，“听着，亲爱的同志，把你的邻居吸收进来，把生产搞好，帮助别人把合作社搞起来。只消五年或十年时间，你们

就能使西西里地覆天翻，从最保守的地区变成最先进的地区。”

萨尔瓦托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呼了出来，好象我使他开了窍似的。“上这儿来。”他突然说着，就踏着未耕过的田地跑下山去，又爬到对面的山坡上。他的腿比我长和有劲得多，我在后面跟着。等我赶上去时，只见他象现代的巴布亚^①一样站在那里，手指着前方。不远处有一块三面是坡的三角形凹地，这是大地女神的大腿和腹部。

萨尔瓦托雷说，“这个凹地可以修成一个小湖，我有一个理想。”

萨尔瓦托雷所详细描绘的理想，是格拉齐亚尼悲观论的一贴奇妙的解毒剂，就如合作社本身证明了普列塞计划的正确性一样。萨尔瓦托雷的理想是把凹地变成小湖，灌溉五千英亩土地，繁殖牲畜，使生产增加十倍到二十倍。同时把合作社变成研究和生产相结合的单位。据萨尔瓦托雷说，多数试验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脱离生产，因此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会对双方都有益，会创造不同一般的、独特的事物，开辟新的道路。

过去曾研究过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修湖是切实可行的，地基也可以，地下水位比较高，雨量适当。可以建土坝。但这件事后来就束之高阁。私人资本不感兴趣，政府没有经管这种事业的机构，合作社是干这种事的理想组织形式。但是萨尔瓦托雷不高兴地说，要等到西西里由共产党掌权才能实现他的理想，“那我就看不到了。”

我表示不同意他的想法。我认为第382号法律把农业管理权交给了地区，这就是答案。地区政府，即使是在天民党管理下，也可以受到意共的影响。如果合作社再增加点新成员，并帮着建立新

^① 巴布亚是征服巴拿马和第一个发现太平洋的西班牙人。——译者

的合作社，在合作社之间搞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那么五年、十年之内，他的理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同他争论时，他频频点头。最后他说，“是的，你说得对。既然天民党在动，那就不是不可能的。十年之内。”他笑着对我说，“你大概认为我思想有点落后吧？”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萨尔瓦托雷，请你相信我。象你这样的人在美国可以说是很先进的了。真的，很先进的人。”我想起了卡拉布里亚的阿蒂里奥，和我眼前的西西里的萨尔瓦托雷，他是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腼腆而谦虚的人，但对问题抓得扎实。他们用的是把粗话同政治术语混合起来的语言，有使人非信不可的权威性。他们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那次访问使我对意大利经济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以前我颇受经济方面老生常谈的影响，什么缺少资源啦，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啦，出口能力弱啦，在共同市场的许多领域缺乏竞争力啦，等等。事实上，意大利南部可以从意大利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变成最强大的支柱。组织合作社不是一项重大经济任务，而是一项社会和政治任务。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要复兴意大利的农业，社会和政治因素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

问题在于优先发展什么。用单位投资额来计算，农业比工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人们估计，在意大利的主要工业，需要五万美元的资金才能增加一个就业机会，而同样数目的钱足够资助能吸收十个成人的合作社。^①

政治条件已经具备，因为第382号法律已授予地区管理农业的权力。意大利每个地区都有条件制定可以在短期得到收益的计

^① 工业中用以增加一个工作岗位的资金数额出入很大。在资本密集型工业如石油工业可以高达六位数，起码要五万美元。

划。例如，尼科尔斯曾讲到卢卡尼亚地区雨量十分充足，可以供应五条河流，但这些水都浪费掉了，每年流入大海的水量达三百万立方米，没有用于灌溉。^①

问题不完全在于钱。棘手的是要改变人们的态度。体力劳动受到蔑视，农业劳动更被人认为是最低贱的。农村中最聪明、最有雄心壮志的男劳力都流向工业城镇。青年妇女宁愿嫁给工人。尽管大城市里的贫民窟糟糕得难以形容，但大城市本身却是激动人心的。农村情况必须改变，必须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建立电影院、图书馆、体育和文化中心。应该强调和宣传享有现代化设备的农村生活的好处。应该采取以色列对合作农庄的做法，让全国关心农业劳动的荣誉和尊严。

现在意大利有几十万青年男女深受失业之苦，他们准备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也有几万个象阿蒂里奥和萨尔瓦托雷这样的人可以为几千个合作社提供干部。合作化运动在艾米利亚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在许多大区中已经扎了根，在南方的发展也日益加快。^②而且，合作社强调它们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为意大利的出口增加了贸易量和新的市场。^③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树立一种凯旋的气氛，为合作化筹集资金和工具，鼓励青年一代，增强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尽管开头是缓慢的，但农业的彻底改造能使农业依靠自身的力量得到发展。一旦它显示出力量，那么萨尔瓦托雷甚至会使格拉齐亚尼感到吃惊。

① 尼科尔斯：《意大利人的抉择》，第248页。

② 克里坦顿：《意大利红色合作社的发展》。罗马省的农业工人夺了一个大农场的地，他们要求把一千英亩的未耕地给他们生产，作为部分的谈判条件。

③ 同上。《泰晤士报》登过一篇长文章注意到合作社的发展，认为从欧洲共产主义的角度，合作社对解决今后的经济问题有很大潜力。例如有的合作社集中同国外签订建筑业合同。这样意大利工人就不是个人到国外找工作，而是由合作社组成一个班出去。这些合同的价值从1975年的960亿里拉上升到1977年的2,170亿里拉。

第十一章

拯救经济

在国外,对意大利的欧洲共产主义流传最广的一种误解,是认为意共同菲亚特等大公司之间,即使没有公开的合作协议,也存在默契。它们相互论战使用低调,引起了这种误解。尽管低调是事实,但上述看法却似是而非。实际上,共产党人同大资本家之间在进行一场白刃战,这一点在意大利是人所共知的。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告诉我,“阿涅利和贝林格彼此扭着对方的脖子。他们在公开场合的微笑,是痛苦和虐待狂掺杂在一起的怪相。”

乔瓦尼(也称乔尼)·阿涅利是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人物。他是意大利战后复兴的王子,拥有一大堆高级形容词:他漂亮、聪明、讨人喜欢、有钱,对艺术、女人和高速汽车有鉴赏力。作为企业家,他体现了现代资本家所幻想的形象:精明,不安于现状,有冒险精神,做事果断,同时拥有巨大的财力。^①意大利总理可以换来换去,但在国际资本家秘密会议的最高层,总有阿涅利的地位,他是意大利的代言人。^②战后阿涅利的菲亚特多国公司塑造和统治了意大利以

① 拉莱·魏德莫斯,《在刀锋上:阿涅利的画像》,载1975年6月20日《骑士》杂志第25—30页。

② 资本主义世界最有影响的两个团体是三边委员会和巴尔德堡会议。戴维·洛克菲勒在布里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帮助下,在两个团体中都起关键作用,卡特总统就是三边委员会支持的。阿涅利是两个团体的常务委员。他还参加洛克菲勒大通银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

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以至经济学家称意大利经济为“菲亚特模式”。

意大利第二位公认的有势力的人物,是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①他同阿涅利一样有魅力,虽然各人特点不同,阿涅利精力旺盛,性格外向,好炫耀,喜欢出头露面。贝林格则比较含蓄,不喜欢抛头露面,性格内向。阿涅利象个电影明星,也许象罗塞诺·布拉西,而贝林格却象一个受折磨的作家,有人把他比作阿尔伯特·卡缪。两个人对女人都十分有吸引力,阿涅利在公开场合寻欢作乐,而贝林格却是个顾家的人,对妻子和四个孩子十分忠实。前者是个传奇式的个人主义英雄,是自由竞争社会的高级产品,而后者却把一切都归于集体,是“英雄的对立面”,是党塑造的专业党务人员。^②

贝林格早年就表露出他的才干。1943年他因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被墨索里尼监禁。1944年他受到陶里亚蒂的赏识,在党内青云直上。贾恩卡洛·巴叶塔谈到贝林格时说,“他年龄轻轻就当上领导。”^③1945年,二十三岁的贝林格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十七岁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二十八岁担任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三十一岁时他已是党的书记处成员和陶里亚蒂学院院长。陶里亚蒂学院是培训未来领导人的地方。贝林格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未来的组织者。

阿涅利和贝林格在战时和抵抗运动时期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阿涅利家族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开始发迹,阿涅利本人曾到俄国前线作战,并在隆美尔的指挥下在非洲打过仗。贝林格则一家都是

① 这是1978年春一次民意测验中排的队,莫罗列第三位。见米歇尔·李顿所著《红色旅内幕》第36—39页。这次民意测验是《世界》杂志向它的读者征询的。红色旅的创始人雷纳托·库尔乔列第五十位。

② 维托里奥·戈雷西奥:《贝林格》第二章。

③ 引言见同上书第5页,贝林格的经历见第167页。

反法西斯战士，本人坐过牢。

阿涅利和贝林格之间的差别说也说不完。然而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他们几乎是同年生（前者生于1921年，后者生于1922年），都属于上层社会，前者是由于有钱，后者是由于出身贵族（贝林格的祖父是撒丁岛的侯爵）。两人出生的皮德蒙特和撒丁岛，都以顽强不屈、勤劳苦干、意志坚强的现实主义闻名。首先，两人都十分爱国，有文化修养，为人严肃。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对我说，“阿涅利是个彻头彻尾的意大利人”。而阿涅利在谈到贝林格时说，“他是另一个严肃的意大利人”。^①

就象教皇约翰十三世和陶里亚蒂象征着教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样，贝林格和阿涅利是意共和大企业之间关系的象征。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形势的发展迫使天生的敌人达成妥协。鉴于意大利经济濒临崩溃，阿涅利、贝林格和他们的顾问们都充分意识到，除非采取激烈的补救措施，否则灾祸即将来临。红色旅的不断壮大和失业者的骚动不安，就是明显的警告。

“灾难”这个词可以用于任何一个社会。但意大利的危机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如果对阶级战争不加约束，那么可以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名句来说，很有可能最终会导致“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工人阶级（工会和左翼政党）的力量，迫使统治集团认识到应作妥协和让步。阿涅利在1978年6月对美国记者说：“我看没有哪个管理意大利的人能够反对共产党和工会……他们力量太大，而当前的领导阶级把国家管理得实在太糟糕。”^②

阿涅利意识到不能靠反对共产党来治理意大利，而国外却把

① 帕特里克·莫内：《贝林格的意大利》，第21页。

② 魏德莫斯：《在刀锋上：阿涅利的画像》，第31页。

这看作是阿涅利欢迎共产党入阁的迹象。甚至连阿涅利的朋友、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都没有抓住阿涅利立场中的微妙处。他报道说，“意大利共产党已经接受了现行制度，（阿涅利）说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政府之外。”^①然而，阿涅利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因为他看到无法把意共排除在外，他每个回合都同共产党斗。他说过：“我同他们斗是因为我不愿让他们过于强大。”^②他充分意识到同共产党合作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对社会的控制。1975年6月，共产党在市政选举中获得大胜，阿涅利毫不含糊地说：“我们面临着新的社会力量确立他们的领导权的企图。对大家来说，赌注是很大的。”^③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这就是：工人企图接管，我们资本家处境很困难。卡利仇视意共，但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1979年底，他在向《全景》杂志发表的谈话中说过，意共必须参加政府。^④

用资本主义的老办法，如削减工资、解雇工人和通货膨胀，解决不了意大利的经济危机。要弄清楚为什么这样，就必须研究意大利经济彻底衰竭的原因，这些原因是劳资双方都承认的。在意大利的论争中，使人感到鼓舞的是，争论各方都不那么虚伪。代表权势集团的圭多·卡利和乔瓦尼·阿涅利，代表工会的卢恰诺·拉马、布鲁诺·特伦丁和乔治·本韦努蒂，以及代表共产党的彼得罗·英格拉奥和乔治·纳波利塔诺，对经济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持相同的见解。^⑤

例如，他们一致认为，近十年使意大利经济遭到摧毁的世界性

① 魏德莫斯：《在刀锋上：阿涅利的画像》，第27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乔治·纳波利塔诺：《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4页。

④ 马西莫·里瓦：《工业家联合会：卡利谈意大利糟糕情况》，载1979年10月29日《全景》杂志第214—215页。

⑤ 这些人的传记。

持续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的“大炮和黄油”的财政政策。此外，意大利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衰退的影响。有这么一种说法：美国打一个喷嚏，欧洲就患感冒，而意大利则得肺炎。^①

他们也一致认为，意大利经济的软弱是天民党统治三十年来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使这种软弱性暴露出来。还有两个因素也加重了这种软弱性：国有化企业的腐败和实际工资的直线上升。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各方都强调其中的一个因素而缩小另一个因素。

圭多·卡利在1977年出版的《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②一书最能代表权势集团的观点。圭多·卡利任意大利经济的神经中枢意大利银行的行长多年。哈佛大学的保尔·塞缪尔森教授讥讽地评论说：“在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不得不努力对政府保持独立，但是在意大利，政府必须进行斗争，使它对中央银行保持独立。”^③

这句妙语确实道出了不少真相。卡利在经济问题上左右内阁，威胁各部部长，并控制意大利的发展战略。他1960年开始任银行行长，当时意大利经济处在繁荣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加6.6%，1961年高达8.1%。^④于是人人都惊叹意大利的“经

① 作者同斯帕文塔和拉比尼的谈话。

② 意大利出版家们搞了一种小丛书，一个个分别采访专家谈当前重要问题。卡利是由一位有名的编辑和记者欧金尼奥·斯卡尔菲去采访的。欧金尼奥·斯卡尔菲1968年至1972年任社会党议员，近来任《共和报》编辑。他同朱塞皮·图拉尼合编《快报》上的《金融信箱》，这是意大利商人们的圣经。两人还合著《老板们》，揭露天民党在国有化企业中任人唯亲和贪污腐化。

③ 欧金尼奥·斯卡尔菲和朱塞皮·图拉尼：《老板们》，第63页。

④ 战后只有西德和日本超过这个增长率。见马里亚诺·丹东尼奥：《解决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1951—1972)》第13页和彼得·尼科尔斯：《意大利，意大利》第167页。

济奇迹”。1975年他辞职时，意大利已陷于萧条。卡利对那十五年的情况了如指掌。至今他仍是权势集团的战略家。

卡利在书中详细地谈到在他任职期间从繁荣到破产的历史。他争辩说，在特定的国际形势下，经济繁荣是企业家魄力的产物，而衰退则是国有化和工会扼杀自由企业的结果。根据卡利的观点，意大利经济停滞的近因，与其说是由于国有化企业的腐败，不如说是由于工会在工资问题上施加压力，因为工会干预了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①

他认为在欧洲和美国，实际工资是缓慢地增加的，而在意大利，工会强使工资猛增。例如，美国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实际工资上升11%，而意大利则上升47%。^②工资调整条款保护意大利工人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会对工时和工作条件很有发言权（例如，菲亚特工人不允许加班）。其次，资方不能开除参加工会的工人。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成本，降低了利润。

低利润意味着低投资，原因有二条。低利润的结果是储蓄额下降，从而使资金短缺；其次，不论用什么方式积累起来资金，低利润都不能刺激投资。总的结果就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卡利说，这就是答案。^③

工会和共产党都认为卡利的论点有某些可取之处。阿索尔·罗萨教授在《团结报》上写道：“各种因素的总和引起了危机，这些因素妨碍社会体制重新取得平衡……其中有许多因素是我们的工会、我们的共产党、我们的学生和工人的斗争造成的。”^④

阿索尔·罗萨对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在他的著作里

① 吉多·卡利：《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第51—55页。

② 米凯莱·萨尔瓦蒂：《意大利的经济制度》，第97页表20。

③ 卡利：《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第80—83页。

④ 1976年12月2日《团结报》。

正面论述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名字是《两个社会》，副标题是《关于危机的假说》。他写道：

“好吧……是的，工人阶级、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斗争，也是造成意大利危机的核心问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推翻了旧制度，创造了超越这种制度的前提条件……危机是一系列战斗的产物，这些战斗说明处在被领导地位的阶级有执政的能力，而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却没有能力执政因而遭到失败。因此，在经济后果出现之前，先已出现了政治后果。”^①

意共正式表示同意这种看法。党的七人领导班子的成员乔治·纳波利塔诺在《外交季刊》上写道：“1968年以后，工资的急剧上升和公共支出的大量增加，确实是……造成意大利目前危机的因素……工资上升得很快（即使意大利平均工资现在仍低于西欧国家）……利润还是那么多，因此大大地挤掉了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②

但是他完全摒弃卡利关于工人的要求是意大利危机的主要原因的论点；相反，他认为应该由天民党人（以及他们在企业里的伙伴）负责。他们应该为连续三十年执政期间国有化企业的大量贪污和经济管理不当负责。纳波利塔诺接着提出了有力的指控：

“在工业有利可图和能自筹资金的年代，可用于投资的资源比现在要多，国家也给私人投资以相当大的支助，但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的自发抉择不是仍然没有解决意大利南方的发展和失业问题么？这种自发的抉择不是在事实上破坏了资源和严重削弱意大利的收支平衡么？南方给资本密集的工业以优惠条件，却严重地忽视农业和食品工业，难道这不是事实么？资金不是陆续不断地流入投

① 阿尔贝托·阿索尔·罗萨：《两个社会》，第47页。阿索尔·罗萨是罗马大学意大利文学教授，共产党的知名知识分子之一。

② 乔治·纳波利塔诺：《意大利的危机：共产主义的前景》，第790—799页。

机性豪华大厦，以至到今天象罗马这样大的城市还有成千套空的公寓卖不出和租不出么？石化工业和合成纤维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已经扩大到远远超过合理的市场预测么？这种工业管理不善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①

不只共产党人，自由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毫不迟疑地置权势集团于被告席上。例如欧金尼奥·斯卡尔菲在访问卡利时，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异议：“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的论点是片面的。你所说的工人的过分要求应为危机负主要责任的论点，在我看来是十分浅薄的，尤其不该是象你这样的人说的，因为你自己在内部对这个体制的逐渐腐败也助了一臂之力。”^②

卡利说他指的是危机的近因。贪污舞弊是从来就有的，他也同意国有化之后则有增无已。国有化企业已成了贵族的封地，卡利称之为“权力团体”，对“经济进行掠夺”。至于他自己的作用，则人人知道，他是权势集团的一分子，对过去的错误也有责任。现在问题很清楚，繁荣时期社会投资不足，学校、医院、住房、交通都被忽视了。^③

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在许多方面意见一致，多半是由于意大利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错误显而易见，天民党的责任是无可争辩的。

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是农业国。法西斯统治时期尽管为工业化作了努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意大利的农业比重仍略大于工业。战争的破坏加剧了这种不平衡状态，1945年农业几乎是工业的三倍。^④战后全民齐心协力恢复战时遭到严

① 乔治·纳波利塔诺：《意大利的危机：共产主义的前景》，第795页。

② 卡利：《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第55—56页。

③ 同上，第11—13页。

④ 《年鉴》第195页表87。

重破坏的经济。①到1948年农业增加了两倍，工业增加了七倍，服务行业增加了五倍。工业增长最快，但1951年农业仍占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五和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五。②

“经济奇迹”的舞台已经搭成。共产党被赶出政府，工会分裂和削弱了。马歇尔计划源源不断地把美元输送进来，共同市场出现在地平线上。1951年至1963年期间，由于从农村吸收廉价劳动力，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工业直线上升。三百五十万人离开了农业生产，拥进大城市的贫民窟，他们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如居住面积、学校、卫生设备和交通运输。③工业集中于出口，重点生产耐用消费品、汽车、电冰箱、洗衣机等。开道的是菲亚特，在几千公里的高速公路修成后，它打开了国内市场。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写道：“意大利踢着叫着，终于被拽进了二十世纪，从扮演农民变成扮演工业角色。”④但遗憾的是，正如斯帕文塔向我说明的那样，这种转变还远没有完成。

路易吉·斯帕文塔是罗马大学经济学教授，既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共产党人，但被列入共产党的候选名单并当选为众议员，因为他认为在意大利唯有意共是一个“严肃”的组织。他出生于意大利。

① 资本和劳力合作，当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参加了政府。许多雇主都是法西斯分子，这时姿态很低。现在的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卢恰诺·拉玛当时只有二十三岁，他回忆说，解放后第九天他就参加了第一个契约的谈判，发现雇主十分讲道理。他说：“当然，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是有武装的。”见拉玛所著《关于工会的谈话》第7页。

② 《年鉴》第211页表104。

③ 1963年至1970年这股趋势还在继续，只是慢了一些，有150万人离开农业队伍。总起来说，二十年内有五百万人离开农村。劳动力总数仍然持平。由于移民，1977年有一千万意大利人（五个中有一个）在国外工作，把赚的钱汇回来，帮助意大利的经济，而有钱人却把他们的资金流向国外。

④ 卡利；《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第11页。

利南部从事学术和政治活动的世家，在列入共产党候选名单而当选的大量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中，他是很典型的。

我们在众议院宽敞的大理石休息室里会见，靠墙放着供人们密谈时坐的椅子和黑皮革沙发，还有连在沙发上的小桌子。他四十来岁，身材修长，沉着镇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许这是他同一位英国女士结婚的原因，但也许是这一结合的后果。他是意共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他注意到意共只有象纳波利塔诺那样的领导人才懂经济，而党和工会的中层干部却都不懂经济。

“这就产生了问题：同志们认为主观意志和组织工作能够克服客观局限性。他们有时提出一个目标，然而客观局限性确实存在，只能克服到一定程度。”他笑了笑说，“同志们说这是‘资产阶级’观点；我回答他们说，我就是资产阶级。”

斯帕文塔思想集中，讲话精练，在意大利人中难得有这样的美德。他向我简要介绍了十几本研究意大利经济的必读书，其中包括卡利的著作。当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可能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棘手问题时，他大笑了起来。他半开玩笑，实际却十分认真地说：“人人都在谈论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意大利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卡利的谈话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意大利的情况可以用分裂症这个词来描绘，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一、经济上是工业国，二、有大量农业区，三、政府和政体在很大程度上还受1865年法律的限制。”^①

斯帕文塔同卡利一样，认为意大利当前困境的根源，在于意大利资产阶级缺少经营企业的头脑，从而为国有化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再加上政治结构腐败，刚刚国有化的工业变成了陷进依附关系

^① 卡利：《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第49页。

泥坑的“封建采邑”。1963年收归国有的公用电力公司就是这一过程的突出例子。这家公司效率之低已臭名远扬。电力公司的国有化是社会党促成的，社会党以此作为它参加中左政府的条件。在国有化过程中，问题之一是如何赔偿股东。社会党要求直接给股东发钱。权势集团的代言人卡利则坚持这笔钱应全部拨给被征用的公司作为资产。他怕将钱分给成千上万的股东会分散。

斯帕文塔告诉我：“你可以在《老板们》和《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这两本书里找到详细的介绍，这两本书都已经列在我给你开的单子上。”^①

斯帕文塔说，“我这里想说的不是电力公司国有化后由于贪污舞弊而更加没有效率，而是说那些在公司中居领导地位的企业家简直毫无经营的本事。他们浪费了股东的钱。这笔钱数目庞大，有一万五千亿里拉以上（约合二十亿美元），其中只有半数作为长期资金投入生产。其余半数都消耗在愚蠢的投机买卖上，且不说有些是自己用掉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总的说来，这里的企业界实在不配治国。”

共产党议员路易吉·斯帕文塔的苛刻判断得到大企业主的导师卡利的肯定。他对斯卡尔菲说：“我曾经希望这笔钱会为自由企业开创新阶段。我看错了。事实证明这些（被征用）的公司的负责人不能胜任这一历史性任务。他们的失败是意大利自由企业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挫折。我们正在为其后果付出代价，而且这种情况还得继续一个长时期。”^②

但这也是卡利的错误。对意大利来说，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卡

① 斯卡尔菲和图拉尼，《老板们》，第29页。

② 卡利，《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第86页。

利是自由企业最清醒的维护者，但也是这个人造成了自由企业最大的一次失败。

1963年以后，随着繁荣现象的逐渐消逝，国有化工业的低效率和腐败甚至到了无可估量的地步。当时经济已出现严重的紧张现象。公用部门除公路外，都无人过问，因此基础结构（铁路、邮政、电话、公共运输、住房、学校等等）摇摇欲坠，无法支持工业的发展。

工业发展处在危险的不平衡状态。工业分成两大部门。技术上比较先进、以出口为主的部门，产量增加，价格降低。而旧的经济部门则资金短缺，效率更低，只有靠抬高价格来弥补亏损。一般的消费者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必需品，而以较少的钱去买非必需品。例如在1953年至1963年十年繁荣时期，蔬菜价格上涨百分之六十，而汽车的价格则下跌百分之十。^①

同时，工资几乎固定不变，十年中工资每年增加不到百分之一，而产品和利润却大大增加。^②1962年，工人的不满终于爆发为一系列自发罢工，损失了一亿八千一百万工时。工资一年内上升了百分之十八。^③

在这个关键时刻，统治阶级犯了最大的错误。他们不是顺应形势拿出一点钱来（当时利润很大），而是傲慢地进行压制，从而使后来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他们对工人的战斗性的直接反应是采取资本主义传统手法：紧接着通货膨胀之后搞通货紧缩。^④意大利

① 巴尔堪·普鲁克特和罗伯特·普鲁克特：《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阶级斗争和危机（1945—1975）》，第23页。

② 同上，第27、29页。

③ 同上，1951年至1958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加5.3%，工业生产增加9.5%，利润增加8.6%，实际工资增加6%。后来四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6.6%，但工资不变。

④ 物价在1962年至1963年上涨7.5%。同上，第28页。

银行强制取消贷款。^①当时负责意大利银行的卡利向斯卡尔菲解释说，“限制性的信贷和货币政策会减轻工会的压力……”。斯卡尔菲打断他问：“你的意思是会加强雇主的抵抗？”下面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卡利：你讲得太露骨了。但答复是肯定的。

斯卡尔菲：这可贵地证明货币和信贷政策对社会和政治局势不会是“中立”的。

卡利：你还需要我把这一点告诉你吗？这连小孩子都懂得。

斯卡尔菲：现代的青年人是懂得这一点的，但许多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商人可仍然加以否认。^②

最初，雇主的反击是成功的，工会遭受严重挫折。1964年至1965年实际工资下降近百分之五，失业增加百分之五。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上升百分之十四点五，利润率也上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几乎接近繁荣年代。^③工资仍然压得很低，却加紧提高劳动强度，事故增多了，分工越来越细。同时社会服务和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

结果爆发了1969年的工人斗争，其规模大大超过1962年。这个时期，伴随着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群众大大地激进化了。而且，罢工已不同如一九六二年时处于自发状态，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高度地组织起来。损失了三百万以上的工时。^④差不多是1962年的二倍。工会充分控制着罢工斗争，工资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

① 物价在1962年至1963年上涨7.5%。同上，第28页。

② 卡利：《关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谈话》，第56页。

③ 巴尔堪·普鲁克特和罗伯特·普鲁克特：《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阶级斗争和危机（1945—1975）》，第28页。1966年至1969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上升6.1%。见丹东尼奥：《解决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第55页，表1。

④ 巴尔堪·普鲁克特和罗伯特·普鲁克特：《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阶级斗争和危机（1945—1975）》，第29页。

十四。① 随后五年里，工会通过罢工或罢工威胁，展示了力量，工资进一步增加了，上升率居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之冠：意大利为百分之二十七，美国百分之五，德国百分之十四，日本百分之十五。②

1975年产业工人的力量变得十分强大。他们的力量在于三大总工会组成的统一运动，即在普及各地工厂的民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下，建立了全国性组织“工会联合会”。工会的力量扩展到政治舞台，构成左翼于1974年在关于离婚法问题的公民投票中取得重大胜利的主要原因。

今天意大利的工会已取得相当的经济力量。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劳动条件(包括加班)，并日益控制劳动力的流动、雇用和训练。工资调整条款使工资随着生活指数自动上升，从而使削减工资的传统武器通货膨胀失效。工会力量的支柱是两个，一个是三大工会的团结；一个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力量造成的有利政治气候。

最重要的一点是，工会内部已不可逆转地提高阶级觉悟和加强独立思考。他们虽然是在各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战略指导下行动，但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策略。工会制定了“不得兼职”的规定，即工会干部不得兼任党的干部或参加政党的决策过程。这条规定有利于三大工会结成统一的组织。由于工会直接干预政治，这种独立性使工人阶级的策略有更大的灵活性。1977年12月的大示威是工会展示力量、独立性和政治见地的突出例子。三大工会的二十五万多五金工人到罗马示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改换政府和使共产党入阁。不出一个月，旧政府倒台，建立新政府的谈判开始了。

① 巴尔堪·普鲁克特和罗伯特·普鲁克特，《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阶级斗争和危机(1945—1975)》，第30页。

② 米凯莱·萨尔瓦蒂，《意大利的经济制度》，第97页。当时的数字是1962年的。1969年的数字差距有缩小，但仍然相当大：意大利百分之四十七，美国百分之十一，西德百分之二十四，日本百分之二十七。

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成熟，是它既能拯救经济而又不致堕入拯救资本主义的陷阱的一个关键因素。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药方是紧缩政策：削减工资和消费，削减社会和公共事业经费（卫生、学校、福利），以及将经济衰退的重担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头上。这是由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这些也是他们给意大利贷款的条件。

工会的答复指出，资本主义紧缩政策只是一条单行道，要工人作出牺牲，资产阶级则照样做生意。工会不反对人人作出牺牲。他们愿意不增加工资，以换取在经济方面有力的发言权。他们支持共产党的战略，即将小农、店主、手工艺者和小商结合起来，组成联盟，以便从大企业手中夺取经济的控制权，而用工资问题上的让步作为交换条件。

纳波利塔诺说：“同通货膨胀作斗争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也意味着要抑制劳动成本。不应该把这一点看成是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唯一问题，但这也是为得到必要的投资、扩大生产基础、发展南方和增加就业而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工会已经公开承认这一点。”（黑体是作者用的）^① 他向《曼彻斯特前卫周刊》概括地谈到这种立场说：“我们支持冻结实际工资，以增加就业和投资。”^②

尽管工会感到不安，但并非不愿用放弃增加工资来换取对经济的控制。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卢恰诺·拉马在1978年2月的一次重要谈话中说，工资增加过多造成失业，过份僵硬地保护就业会损害工业的复兴。^③ 拉马的立场引起他同天主教劳动人民工会

①② 1978年1月23日《曼彻斯特前卫周刊》。

③ 拉马是1978年1月24日向《共和报》发表的谈话。关键的一段话如下：“资本家认为利润是独立的可变物。近年来工人和工会反驳说工资是独立的可变物，劳动力也是独立的可变物。好吧，我们在理智上必须诚实，应该宣布这些都是胡说，因为在开放性的经济中，一切可变物都要彼此相依。”见约翰斯通发自罗马的报道，载1978年3月8日至14日《在这些年代》。

联合会领导人之间的磨擦，并使一些外国观察家断言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违背了工人的利益，将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但拉马在谈话中尖锐地指出：工会必须全面控制劳动市场和投资。这不过是重申他的副手、前意大利总工会下属的五金工会的头头布鲁诺·特伦廷说过的话。

特伦廷指出，工人的建议“不可避免会导致对制度性质的变化，不只是使资本主义更加合理，而是会导致过渡性的经济制度。当集体……通过群众性行动、新形式的工人监督、传统代议制机构里的新关系以及基层新的民主形式……可以决定对投资的重新分配、决定重振今天受到工会运动支持的那些政策，那么谁也不能说这只是重建资本主义，或者是使资本主义更加合理。我是这样认为的，而意大利的资本家也很清楚，到那时候资本支配利润的权力将受到挑战。”^①

资本家充分意识到，从长期来讲这将意味着什么。卡利对拉马的谈话立即作出反应，他认为“这最终意味着工会要把权力扩大到管理公司的领域”。^②事有凑巧，《世界报》刚刚发表了对阿涅利的采访。阿涅利意味深长地说，也许象他这样的资本家成为工会雇员的时候就要到来了。^③

当然，这不过是俏皮话，^④阿涅利并不准备认输，但他象卡利一样明白，关键问题在于对经济的控制，因此“赌注是很大的”。

由于资本主义被称为追逐利润的制度，又由于公司作出的决

① 欧内斯特·曼德尔：《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第139—140页。

② 1978年3月8日至14日《在这些年代》。

③ 在上述引文中。

④ 一位多国公司的顾问奥雷里奥·贝切依作了相反的评论，也是说的俏皮话，他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共产党运气真好”。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说明大企业对意共表示满意。见1978年2月10日《新政治家报》。

定是以预期的利润为根据的，因此人们往往忘记企业的关键决定是如何投资。这就是控制经济的关键。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共产党要讲“分配投资”，而卡利要讲工会“管理公司”。这是因为双方都在向小企业主说话。小企业主并不关心投资，但他们对自己公司的管理权则是关心的。工会、共产党和社会党并不愿意管理公司，实际上意大利工会都拒绝为管理的决定承担义务，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自治不过是幻想。^①他们说：让企业家去作他们的决定吧，我们关心的是劳动条件。

当卡利企图吓唬小企业主使他们反对共产党时，^②共产党却对小企业主说：“我们并不反对谋利。你们把企业管好办好，就可以保住你们的报酬。但政府必须为民族的最大利益制定经济发展的大致路线，而不是为某一个大公司谋利。”

当然，要投资就要有资金。在这个问题上，怀疑欧洲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提出了最有力的批评：资金拥有者如果不能自由选择，他们是不会投资的。他们如果能够到撒丁岛的绿宝海滩投资修建公寓（利润率为百分之三十），就不会去投资修建公共住宅（利润率只有百分之三）。资本家会罢业，把他们的钱变成流动资金，或到国外投资，这样，经济也就被扼杀了。

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工业社会都需要资本，这是一条公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通过利润而形成的。共产党人同意应形成更多的资本。而且，一切经济学家，不论他们持什么见解，也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国外，都一致认为缺少资本即使不是意大利经济的主要问题，也是主要问题之一。

共产党的回答是，意大利经济内部就能产生足够的资本，并防

① 1979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所登关于西德“共决权”的文章。

② 卡利企图改组由大企业控制的工业家联合会，让小企业有更多一点的发言权。见马西莫·里瓦《贝林格和律师》。

止资本外流。① 允许资金外流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从1963年电力工业收归国有开始,意大利的有钱人有计划地将钱汇到外国。这种外流部分地受到合法性可疑的保护,包括所谓“银行保守秘密”的做法,即银行拒绝向财政部透露其主顾在国外的存款数额。据估计,外流的资金在三百亿至五百亿美元之间。自1975年以来,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制定了外汇兑换管理条例,说明政治决定还是保住资本的关键。②

比资金外流更严重的是由于贪污舞弊和依附关系而造成的浪费,特别是在国有化工业。就象第九章里讲到的,几十亿、几十亿的资金就这样消耗掉了。单是矿产公司一个机构浪费的总额即为意大利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的贷款总额的五倍。

但资金流失最严重的是偷税漏税,包括个人和公司在内。有人估计偷税漏税总额每年高达一百五十亿至二百亿美元,为工业投资总额的三倍。③ 上自索菲娅·罗兰④ 这样的名人(十亿里拉),下至波尔萨诺的砖瓦工(奥托·马伊尔,二千万里拉),都偷税漏税。公司是偷税漏税的大头。如固特异轮胎公司三亿七千九百万里拉,冶金轧钢公司一亿七千二百万里拉,丰泰德拉玛乔托莱拉公司一亿三千万里拉等等。偷税漏税者之厚颜无耻几乎令人难以置信。1978年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律师、百分之十九的医生和百分之十八的制造商宣称其净收入为二百万里拉(约合二千多美元),相当于一个明信片推销员的收入。随便抽查五百份纳税申报表的情况

① 关于资金来源问题,见保罗·贝兰的经典研究作品《生产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② 外汇兑换管理条例使投资者重新有了信心,因此近三年来有为数不大,但仍有相当份量的资金流回意大利。

③ 工业投资规定1960年至1975年每年平均六十亿美元,但1975年高达九十亿美元。见《年鉴》第38页表24和第218页表108。

④ 意大利著名电影明星。——译者

表明,欺骗政府的人多达百分之九十七,占人口的绝大多数。①

偷税漏税是资源的“出血症”,只有廉洁的政府才能治好这种病。即使采取温和的措施也会取得惊人的结果。例如在1973至1976年之间,政府对税收抓得略紧一些,个人交纳的所得税增加了一倍,团体所得税增加了六倍,同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了不到45%。换句话说,税收的增加并不是由于个人和团体赚钱多,而是逃税少了。②由于广泛使用现钞而不是用支票,使偷税漏税更加容易。事实说明,税收法之所以不能严格执行,问题在于舞弊。

经济危机同严重地缺乏效率和贪污舞弊直接有关。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要克服意大利农业的弱点,政治比经济更重要。对于工业来说却不然。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也许必须同美国的经济压力作斗争。然而也存在足以抵消的反压力。例如,阿涅利曾经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在意大利同共产党斗。但我同外国人谈话时,却努力说他们好话。我们必须在选举中击败他们……但我在国外讲话时,则尽可能地说他们的好话,因为我认为他们要比外国人设想的好。”③

阿涅利展望未来,着眼于要美国克制。如果共产党进入政府,那是因为拦不住他们。他不愿因此而遭到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从而损害意大利,也损害菲亚特的利益,加剧工人的愤怒和不信任,助长暴力造反的力量。

一贯追随美国领导的德国,现在也感到不安,它对使欧洲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中立的做法,愈来愈感兴趣,并发现意共是一

① 1978年7月4日《全景杂志》。最近的研究证实了我们所估计的逃税额。财政部长主要顾问朱塞皮·卡姆帕教授估计1977年工商业增值税的逃税额为61亿美元,即是上缴的增值税的一倍。见1980年3月3日《快报》。

② 1977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所载伊纳·李·塞尔顿《意大利的税收改革使三年内财政收入加倍》一文中财政部长菲利普·潘多尔菲的谈话。

③ 魏德莫斯:《在刀锋上:阿涅利的画像》。

个可靠的伙伴。而且，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工会力量强大，有阶级觉悟。危机的特点是对强大的工会有利。乔瓦尼·阿里吉的出色分析把这一点讲得很透彻。^①绝不能说欧洲共产主义关于“过渡经济”的思想注定会失败。我的运气不错，有机会同一位高级工业管理人员交谈。他同阿涅利打过交道，对意大利工业的历史和问题十分熟悉。天主教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地区书记安排我在一个北方城市采访他。

我们在一家旅馆的门厅里见的面。这个人五十五岁左右，穿着一套英格兰式的花呢西服，方方的脸，蓝眼睛，留着平头，这在意大利人中是罕见的。样子严厉，说话直率。他负责一家大公司的联合企业（也许有二万工人）。

我问他对意大利经济危机的原因怎么看。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主要原因在于世界性经济衰退，“我们受世界价格摆布。我们必须进口食品和原料，出口制成品。如果进口的价格上涨，譬如油价上涨，那么我们就要吃苦头。”我问他是否认为增加工资也是个主要原因。他说自然有关系，但主要的原因还要追溯得更早一些。他于是开始谈他的分析，同卡利、斯帕文塔、格雷科神甫、克劳迪奥和普列塞的看法是呼应的。他说这要怪意大利的企业家。他用了一句老话：“这些人就象波旁王室，什么都忘不掉，什么也学不到。战后我是最低一级的管理人员，只负责一个科，但工作不久就同上级发生了矛盾。”

他呷了一口咖啡，又接着说：“按理说工人若违章是要罚款的，

^① 乔瓦尼·阿里吉，《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第3—24页。他的论据太复杂，无法在这里引用，但是以实现利润为依据的。他认为1929年之所以经济崩溃，乃是由于剥削率太高（工人阶级受打击太大），工人不能享受高消费。现在的萧条是由于剥削率太低（工会现在力量大了），资本的积蓄不够补偿支出。阿里吉曾任米兰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譬如迟到、咒骂工头等等，我就不罚他们。我这一辈还没有罚过工人，而我管的车间效率不比其他车间低。上级把我叫去责问，‘你为什么不罚他们？’我说我认为不需要罚。我还认为既然白领雇员可以不罚款，那么罚工人的款也是不对的。他们对我说，‘白领雇员不罚款，因为他们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我说那么也应该对工人进行教育。我没有说他们是胡说八道。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我父亲可以同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讲道理，我认识的多数工人也都能同他们讲道理。他们完全出于偏见，还出于贪婪，老天爷，这些人可贪呢。当时正在经济大繁荣时期，他们是出得起钱的。好吧！他们在五十年代干了坏事，现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可不同情他们。”

我对他说：“美国最近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和总工会已经出卖给大企业，他们同阿涅利达成了默契，强制工人接受紧缩政策。你是怎么想的？”

这位经理哼了一声说：“简直胡说八道！菲亚特压榨工人最厉害，除非迫不得已，公司决不会给工人任何东西。阿涅利1966年开始接管菲亚特的事务，在工会强大起来迫使他让步之前，他一直照公司的传统行事。再说他可以让点步，他干得很漂亮……并且明显地是为了争取舆论。他每个回合都同共产党斗，同时也害怕共产党。他完全有理由害怕，因为共产党愈来愈强大。共产党是严肃认真的，他们主管的单位是廉洁的，人民愈来愈信任他们。”

我问他，“你投共产党的票吗？”

“不，共产主义太乌托邦了。谁也改变不了人的本性。我投天民党的票，但我站在那些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扎卡尼尼、莫罗、博德拉托等人一边。”

我征求他对意大利经济的看法，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外。他认为意大利经济比当前危机所显示的状况要强大得多。他说，“1977

年，我们的钢产量同英国相等。对于一个基本上缺乏煤炭和铁矿石的国家来说，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自然，意大利经济还需要新的动力，譬如，需要更多样化一些。我们必须改进技术，我们的研究力量太弱了。我们花在研究上的费用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西德为百分之二，美国为百分之二点五。在农业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地利用太阳能，扩大暖房，还需要增加核能，等等。”

这位经理愈谈愈兴奋。“我们在欧洲是有很潜力的。我们有竞争力，你看奥利维蒂机械公司和菲亚特。在欧洲共同市场销售的电冰箱，我们占百分之四十九。近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是美国或英国的二倍，同德国和法国十分接近。^①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潜力也很大。凡是我们的效率高的产品，销路都很好。例如，1977年我们销售的工作母机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为什么？那是因为机器都由管得好、效率高的中型工厂生产。我们搞得最糟的是国有化工业，因为贪污舞弊，搞裙带关系。我们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廉洁的、向前看的政府。”

“南方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农业象个没娘的孩子，需要有人照料。即使在这方面，农业的落后也要由工业负责。六十年代政府曾以低利发放贷款来刺激投资，结果是造了好多资本高度密集的大联合企业，我们称之为‘沙漠里的教堂’，它们对解决失业起不了多大作用。错是错在没有搞基础结构，没有建立小工业和修理业等网点来利用石油制品和生产出来的钢铁。这些大官们尽搞舞弊，安插亲信，把南方的发展搞得不象样子”。

“你是指对于刺激意大利经济来说，政治比经济更重要吗？”

^①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在1978年8月13日《曼彻斯特前卫周刊》转载）中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数字为：英国和美国百分之二十七，意大利百分之六十，德国和法国百分之七十。

“我还没有这样想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现在人们情绪低落。必须改变现状，打击贪污舞弊、结党营私和偷税漏税等现象。”

“那么你认为共产党是一种力量？”

“当然。他们廉洁，严肃认真。这一点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他强调意大利管理得好的工厂在欧洲工业中有竞争力，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最近我在1980年6月1日闭幕的日内瓦造船技术交易会的报告中看到一些材料，惊人地证实了上述事实。参加交易会的有六十多个国家，意大利同伊拉克、澳大利亚和巴西都签订了巨额合同。意大利造船工业的规模在世界市场上占第四位（继美、苏、法之后），1981年的销售额估计为七十亿美元。

意大利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方面有振兴和增长的巨大潜力，但经济因素同政治因素完全交织在一起。乔治·纳波利塔诺在最近出版的《半渡》一书中写过一个很长的序言，其中写到1979年6月的选举，他回顾了党的路线，并且用他在五年前的演讲和文章说明党的路线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的基础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我在竭力如实地加以说明的。

在我们分手后，我问一位工会朋友，这个经理是否很典型。他说不，不很典型，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在经理阶级中肯定有一部分人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对危机十分关切，对共产党的正直印象很深。这些经理人员虽是少数，约占百分之十到十五，但他们在天民党内的影响要比他们的人数大得多。我的朋友笑着对我说，“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我这是指天民党的工会工作者。由于他们的缘故，我们得到了天主教会统治集团中的进步人士的多方支持。这股思潮乃是莫罗和扎卡尼尼的力量所在。”他停了一下说，“你当然知道莫罗有可能当下届总理。”

“我听人说过，大家都认为他当总理很好。”

“是这样，意大利需要有一段安宁的时期，各种派别都能在一起工作。莫罗是合乎理想的。他受到共产党的尊重，得到所有政党的信任。并且他能控制天民党。要是没有莫罗，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不出四个月，莫罗就被杀害了，政治因素显然比经济因素重要。

第十二章

对位法的政治(1978—1980)

根据各方精心安排的计划,1978年意大利的政局应该是一出温和的电视剧,并略带悬念:共产党会进入内阁吗?天民党那匹经常被牵到水边、难以控制的马最终会同意喝水吗?

历史是捉弄人的。平静的1978年成了意大利多灾多难的一年。天民党强有力的主席遭到暗杀;一位总统由于贪污而辞职;两个月内死了两位教皇;五金工人举行了两次史无前例的示威,直接干与了政治进程。迄今仍能感到这一连串惊人事件对政局的震动。

工会的两次示威规模庞大,每次约有三十万人参加,这就象有一百五十万钢铁和汽车业工人走在华盛顿街上。危机时期以示威来划分阶段(第一次在1977年12月,第二次在1979年6月),这一点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当代意大利政治的主角。意共只有表达工人阶级的感受才能起作用,只有同工人联系在一起才有力量。

我乘着大轿车去参加第一次(1977年)示威。由于市中心的交通已经封锁,好让预期的人流通过,车子只好绕道而行。12月1日有几十列火车专列、几百部租用的大轿车和几千部汽车拖车通宵达旦地开向市区。三支主要的游行队伍从不同的集合地点出发,

浩浩荡荡地围着城转，最后在圣乔瓦尼教堂两边的广场上汇合。四面八方的小队伍都汇合到大队伍中。我在车上看到一队青年过马路，把车辆给拦住了。我原以为他们都是高中学生，后来我才看到他们举着失业委员会的红旗。

这次示威既是一个高潮，又是一个起点。1976年6月大选以后，天民党需要得到意共的支持才能继续执政。为取得意共的支持，它作了一些让步，如通过第382号法律。对天民党的右翼来说，每一次让步都应该是最后一次。但对意共来说，每一次让步都只是下一次让步的踏脚石，是最终导致意共入阁的一个过程。这是一场双人小步舞，意大利人人都看得很清楚。指挥这场舞蹈的是天民党的老政治家、曾五次担任总理的天民党主席阿尔多·莫罗。莫罗过去是一个强硬派人物，他公开表示十分厌恶共产党。但他懂得天民党在1974年公民投票以及在随后的选举中失败的含义。因此他出于不得已才同共产党达成了几次协议。最后一次就是1977年夏季的所谓“六党契约”^①，明确地提出具体改革方案。^②由于改革没有付诸实施，因此五金工人举行示威以示严重抗议。

我到教堂时，太阳已经出来，万里碧空，冬日的阳光显得苍白但仍受到欢迎。目光所及处，一张张扭过头去的脸，在讲坛四周围成大圆圈，象是起伏不定的波涛。示威者并不是全家出动，因此很

① 包括天民党、意共、社会党、自由党、共和党和社民党。

② 杰拉尔多·基亚罗蒙特：《纲领性协议》。协议全文在第51页附件中。建立这一套改革的政治掮客是莫罗，他在这方面技巧之熟练使他的朋友称他为外交家，而他的敌人说他是伪君子。极左翼说，既然改革会有损于天民党的徇私情的做法，那么莫罗这么做并非出自真心，他是想使意共卷入议会的圈套里削弱它并使它脱离基层群众。极右翼说莫罗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出卖给了意共。不能否认莫罗有两面性，但看来在这件事上他把对国家的效忠置于对本阶级的效忠之上。可参阅在莫罗被害后发表的斯卡尔菲采访他时他所作的长篇谈话《关于权力的谈话》。

少有孩子参加。人们的态度温和而坚决。红幅标语上的口号都是政治性的：打倒危机政府，打倒失业，击败恐怖主义，工人阶级掌权，我们不执政就罢工。最后一句口号可并不是空洞的威胁。三大工会的五金工人都同意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整个劳工运动的支持。

示威获得巨大胜利，促使政府倒台。意大利共和党主席乌戈·拉玛尔法率领各小党提出动议，撤消对安德雷奥蒂政府的支持，这个动议得到社会党的附议，意共也勉强予以支持。一月政府倒台，莱昂尼总统责成安德雷奥蒂重新组阁。

拉玛尔法要求共产党参加政府，这一要求得到社会党的支持和共产党的口头支持。实际上共产党认为提出这一要求的时机尚未成熟，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是教会统治集团内部和天民党中层干部对共产党的强烈反抗会破坏改革。第二是由于1975年和1976年的选举胜利，共产党干部力量不足，当时需要派几千名干部去参加竞选和担任行政职务。如果有一年多的喘息时间，就可以使共产党新取得的行政机构取得信任和经验，并争取时间再培养几千名工人，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弱天民党和教会的反抗。

然而共产党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12月2日的工人阶级大示威表现的战斗性，迫使他们采取要求入阁的强硬路线。尽管如此，谁都知道他们最后还可以让点步。一、二月间，阿尔多·莫罗、贝尼尼奥·扎卡尼尼和朱利奥·安德雷奥蒂等三巨头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妥协。共产党的专家将参加计划和规划工作。在议会里，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将从弃权转为投票支持政府。实际上，共产党从此将作为立法联盟的参加者，正式起谘询作用，直接和公开地参加决策。报纸上马上把这种妥协称之为“多数派政府”，即指天民党和意共已经跑到一起来了。然而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典型的莫罗式解决办法。这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家、一位擅长

模棱两可的辞句的能工巧匠的一揽子交易。这种模棱两可的辞句既能安抚双方，又能消除障碍。在天民党和意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莫罗创造了一个新词：“平行的合流”。这种提法可能使欧几里得在坟墓里不得安宁，但是人们懂得他的用意是指这两者永远不会碰头，但它们必须在一起干。

1978年至1979年政局发展的电影剧本已经成型。首先，1978年3月，共产党在立法机构中将成为政府的一方。然后，待天民党的中层消化了这一步，共产党将在1979年初进入内阁。天民党这匹马最终将要喝水，历史性妥协即将成为现实。由莫罗编写的这个剧本，将由编剧人自己去开拍，因为剧作者同时也是制片人；天民党牢牢地控制在莫罗手中。莫罗作为天民党主席，还有两名位居要津的门徒，即总书记扎卡尼尼和总理安德雷奥蒂。1978年12月六党已同意由莫罗出任共和国总统，扎卡尼尼当天民党主席，而安德雷奥蒂继续担任总理，另由一位莫罗的坚决支持者当党的总书记。强有力的三人执政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四人执政，再加上保罗六世的默许（已有保证），这个剧本不可能出毛病。共产党入阁看来已成定局。

莫罗是这次妥协的关键人物。他有足够的威望使天民党中层跟他走，因为他们知道莫罗即将担任总统，相信他不会让共产党接管政府。如果他作出妥协，那是为了爱国，不是谋私利。他作为反共人士，为最后一步打开了大门，因为他意识到民族利益需要搞“历史性妥协”。唯有莫罗这位领袖能够保持天民党的团结一致，同时还能让共产党入阁。只有他能让天民党这匹马喝水。他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唯有他能使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保持稳定。

莫罗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成了破坏稳定者当然的打击目标。1978年3月16日，就在多数派新政府即将建立的当天，红色旅绑架了莫罗，在绑架的过程中，杀死了他的五个随身警卫。这次行动

执行得十分周密,标志着意大利恐怖主义的最高峰。

在意大利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恐怖集团中,红色旅是组织得最大最好的一个。①意大利的恐怖主义是六十年代末欧洲到处出现的恐怖主义现象的一个部分。不少观察家将这个现象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柏林的一位德国教员曾经对安德鲁·科普金说过:“不论对我们还是对美国人来说,越南是一切的起点。别忘了我们还是个被占领国。当时我们把自己看成是美利坚帝国的前哨,而这个帝国当时正在亚洲占领更多的领土。”②很多欧洲人都不赞成越南战争,法国人称这场战争为“外部的法西斯主义”。

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证明了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德国恐怖主义的早期思想家霍斯特·马勒讲过,“我们‘非法’活动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帮助美国开小差的人到法国、意大利或瑞典去。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欧洲到处发展关系。”③《晚邮报》的自由派新闻记者阿尔贝托·龙凯伊发表意见说,意大利恐怖主义是“东方的平均主义迷信同美国的任意性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两种势力结成一种带爆炸性的混合体。”④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再生》杂志编辑

① 1979年2月18日《纽约时报杂志》,第29页。柯蒂斯·巴尔·佩帕所著《占有者》。作者报道意大利估计有二十一个右翼和一百一十六个左翼团体都带着象“无产阶级武装核心”“第一线”“红色抢劫队”“共产主义作战队”等名称。这种反复使用“红色”“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等词造成人们思想混乱,使他们把这些团体同意共等同起来,这当然对意共不利,尤其在投票时受影响。还需要指出一点,在左翼恐怖活动增加时,新法西斯团体的袭击减少。这一情况使人怀疑不少右翼团体参加了或渗透进左翼组织内部。不管这些团体的意识形态和目标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社会上制造不稳定。1980年1月佛朗哥·奥里吉纳里奥制了一个表,表明几个进行武装斗争的“左”翼团体从1970年以来的变化情况。尽管部分材料来自卡洛·菲奥罗尼未经证实的主张,但不管怎样,有参考价值。见1980年1月13日《快报》上的图表。

② 安德鲁·考普金德:《欧洲恐怖活动,恐惧吞蚀了灵魂》。

③ 同上。

④ 1977年12月10日《晚邮报》上阿尔贝托·龙凯伊的文章。

阿达尔贝托·米努奇对美国具有更深的影晌。他说，美国福利国家的模式同快速的工业化相结合，正在破坏传统的文化。他认为出现了一种对中产阶级影响特别大的神经质的社会。^①在意大利居住的著名天主教小说家莫里斯·韦斯特赞同米努奇对社会性质的看法。他说，“除非你在那里生活，否则你不可能相信意大利这个国家疯狂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相信这个国家的基础有多么不牢靠。”^②

不论人们对因果关系有什么看法，人人都认为舞弊、受贿、裙带风、关系学以及骇人听闻的官僚主义，为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韦斯特还说：“结果怎么样呢？人们完全丧失信心，大家都十分玩世不恭，倒退到采用最原始部落之间的暴力方式……所谓的‘自发性无政府主义’理论在这种玩世不恭和幻灭的气候下最容易找到追随者。唯一能医治这个政治实体疾病的是动一次大手术……对无业青年和在拥挤不堪、师资力量薄弱的大学里那些没有出路和愤怒的学生来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有诱惑力的福音。对他们来说，未来不过是一片废墟。”^③

红色旅的虚无主义是货真价实的。他们不仅认为国家应该摧毁，甚至认为现存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必须连根全部拔掉，其途径是内战。1978年3月查获的一本六十页厚的手册中概括了上述看法，它把意大利共产党当作主要敌人，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走狗，打击无产阶级的豺狼。^④从缴获到的文件来看，它的第一号打击目标显然是贝林格而不是莫罗，只是因为贝林格警卫森严，因此莫罗成了替死鬼。另外还破获了一本注明日期为1978年9月的三十二页

① 阿达尔贝托·米努奇：《恐怖主义和意大利危机：同克莱姆谈话》，第32—34页。

② 莫里斯·韦斯特：《作为历史遗产的恐怖主义》，载1978年4月25日《骑士》杂志第77页。

③ 同上，第78页。

④ 米歇尔·莱顿：《红色旅内幕》，第36—39页。

文件，再次证明红色旅对意共的仇恨，这份文件制订了莫罗死后恐怖活动逐步升级的战略。^①

绑架莫罗显示了红色旅的力量；而对他的处决却表明他们的极端软弱。红色旅的力量在于他们的纪律性、组织能力和有效的保密措施。一万六千名宪兵、一万八千名警察、四千名边防警卫和几百支陆军部队，进行大搜捕达五十四天之久。有六百七十万人受到搜查，三百三十万辆汽车和卡车在六万二千个关卡受到检查，还有三万五千所房子受到搜查，五千九百艘船只受到检查。进行了一千二百次集体性逮捕。抓住了许多搞小偷小摸的罪犯，犯罪率急速下降。犯罪行业如此倒霉，以至一度谣传说，如果再不释放莫罗，黑手党就要把监牢里的恐怖分子杀死。^②但关于莫罗的下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过了几个星期，就在搜索的过程中，莫罗向天民党的领导人和他的私人朋友发了一连串信件，提出将他同被捕的红色旅领导人作交易的各种建议。政府拒不让步。于是5月9日，莫罗的尸体被塞在汽车车尾的行李箱内，丢弃在罗马市中心天民党总部和意共总部之间的路上。

在居民中间以及在官僚机构内部，即使不说是同红色旅勾结，显然也多少存在某种带保护性质的中立。有人估计红色旅专业恐怖分子“正规军”不超过五百人，分散在几个大城市；还可能大约有大约一千名“非正规军”，作为后备的第二梯队。但也许有为数达三万以上的居民在默默地帮助他们，不向他们提出疑问，还成为他们招募人员的对象。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告密。

各种恐怖主义组织是1970年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头目都是些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狂热分子。红色旅的创始人雷纳托·

^① 1978年11月3日《欧洲》杂志所载罗伯托·基奥德的文章。

^② 奥丽安娜·法拉西，《莫罗死后》，第11页。

库尔乔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一位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佛朗哥·费拉罗蒂说：“库尔乔和他的许多支持者都是老式的、保守的天主教家庭出身。他们基本上都是信教的，他们狂热地参加政治和暴力行动。”^①有许多成员原是共产党员，随着意共的壮大，他们要求激烈变革的期望也增长了。然而历史性妥协是个长期战略，性急的人感到幻灭，于是有的脱党，有的由于极左的观点和行动而被开除出党。七十年代初他们纵火和扔炸弹。到1974年前后，转为采取绑架或开枪打人腿等暴行。暴力活动一步步升级。红色旅的袭击次数在1974年为48次，1976年上升到1,198次，1978年又上升到2,365次。五年中增长了五十倍。^②

随着暗杀和伤人的次数增多，公众舆论从漠不关心转为憎恶。1977年底，卡洛·卡萨莱尼奥的被杀引起了极左派的分裂；莫罗和随身警卫的被杀更进一步引起内讧。红色旅发现自己完全陷于孤立。他们原来希望用莫罗的生命来释放被监禁的恐怖分子。但政府态度十分强硬，拒绝谈判。政府的决定受到六党的正式支持，尤其是意共。为防止政府动摇，意共宣称如内阁对红色旅妥协，它就撤销对内阁的支持。红色旅的主要目标是要获得战士的身份，一旦被捕能被当作“战俘”来对待。由于这一目的未能得逞，他们就处死了莫罗。但莫罗的处决引起了红色旅内部的分裂，有些恐怖主义

① 1978年5月15日《新闻周刊》第43—49页《红色旅内幕》。1980年2月28日发表的巴杜阿大学神学院的一份92页的研究报告以及1980年3月2日《快报》上朱塞皮·尼科特里的文章都谈到天主教狂热分子牵连在内的程度。尼科特里文章的标题是模仿忏悔《神甫，我扣了枪机》。

② 佩帕：《占有者》。在意大利十一年的恐怖活动中（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有200人被杀，500人受伤。见1980年1月21日《全景》杂志第32页载瓦莱里亚·甘杜斯和克劳迪奥·萨贝利·菲奥莱蒂的《一个接一个的恐怖活动》。也许略能使意大利人感到宽慰的是纽约市每天平均有4.5个人遭到暗害。但一般都不是出于政治原因。

分子开始将情报透露给警方。① 1978 和 1979 两年，警察进行了紧张的逮捕，尤为重要的是在物理教师朱利亚纳·孔福尔托的寓所里逮捕了两名恐怖主义分子阿德里亚纳·米兰达和瓦莱里奥·莫鲁奇。在壁柜里发现了私藏武器的地方，其中有一挺蝎式冲锋枪，后来证实这就是杀害莫罗的武器。②

朱利亚纳·孔福尔托声称她过去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恐怖主义分子。她只是为了对她的朋友弗朗哥·皮佩尔诺表示友好才留这两个人过夜。他们四个人都曾经是极左团体工人权力派的成员，皮佩尔诺同奥雷斯特·斯卡尔佐内和托尼·内格里一起担任过该团体的领导人。内格里 1933 年生于帕多瓦，是个神童。他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帕多瓦大学的教授，是极左翼出谋划策的领导人，他在大学里组织过几次有关政治战的讨论会。有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说，“内格里的研究所是大学里自治派的堡垒，只有那些带秘密标记的人才能进去。”③

自治派是自治工人组织的成员，起这个名字的目的是要强调它独立于“官方”的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天主教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劳工联盟以及它们的联合领导机构。自治派尽管主要由失业青年和学生组成，但在工人阶级内部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完全醉心于暴力，包括杀人在内，但不象红色旅那样采用秘密方式杀人。自治派主要是找机会同警察冲突，或用手枪和燃烧瓶去捣毁和破坏工会集会。他们往往组成小分队，到会场时不带手枪，而由一个女同志在现场分发手枪，用完后，再把枪交给另一个分队，如此循环不已。④

① 关于红色旅内部分裂情况，见马尔科·文图拉 1979 年 6 月 19 日在《全景》杂志第 52—54 页撰文《红色旅反对红色旅》。

② 武器库里有两挺机关枪，五把手枪，四个雷管，两件防弹背心，和几百发子弹。

③ 1979 年 4 月 22 日《快报》。

1977年9月,自治派在波洛尼亚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队伍通过市中心时,示威变成暴乱,出乎市政当局的意外,他们开始砸店铺,打行人,吓唬老百姓。1977年11月他们又打算再来一次暴动,但市政府、意共和工会这次都已作好对付的准备。五千名警察和五万名工人把示威队伍围在只有几条街大小的地区内,并把他们困在那里,直到可以慢慢驱散他们。自治派逐渐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任何同情。⑤继续斗争派后来同他们破裂并对他们进行了谴责。1977年12月,工人在罗马示威时,通知自治派说,可以允许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参加示威,但要受工会纠察队的搜查和护送。自治派拒绝了,他们后来在大学校园内举行了游行,警察把他们包围起来,一直到游行解散为止。对1979年6月的大示威,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参加,只是在游行队伍的周围搞一些打了就跑的袭击。

自治工人组织的前身是工人权力派,1973年工人权力派在罗索利那举行的会议宣布解散。据检察官彼得罗·卡洛杰罗说,解散是假的。实际上工人权力派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是秘密组织,即红色旅;另一个是合法组织,即自治派,统一由托尼·内格里领导。内格里有双重身份,他的公开身份是自治派的理论家,同时他又是战略组织红色旅的秘密成员或头头。⑥

1979年4月7日内格里被捕,引起了全世界知识界的抗议,其中包括法国的雷蒙·阿隆和欧仁妮·雍内斯科以及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乔治·沃尔德、保尔·斯威济和詹姆士·奥康纳。⑦内格里辩护说,他经常抨击红色旅,他之所以受到起诉是因为他激

④ 皮诺·布翁焦尔诺:《自治派:孤立的巢穴》,载1977年11月22日《全景》杂志第37—38页。

⑤ 同上。

⑥ 1979年4月22日《快报》。

⑦ 汤姆斯·西汉:《在滑雪面具后面的意大利》,第20页。

烈反对共产党。^①他指控检察官卡洛杰罗当了意共的马前卒，他在给《快报》的信中说，他无意要“当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及其代理人的俘虏”。^②

开始时，内格里的指控颇有份量，^③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抗议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人们发现被查获的红色旅文件是在内格里的打字机上打的。^④更为严重的是，一位美国专家奥斯卡·托西教授判断说，在莫罗被绑架期间，莫罗家属接到过红色旅的一个关键性电话，这个电话几乎可以肯定是内格里打的。“这位不知名的打电话者和内格里教授的声音属于同一个人的可能性高于百分之八十。”不仅如此，还有四位意大利专家断定这两个声音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不否认内格里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托西因此认为，这几位专家的结论使他的判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可能性)更有把握，“误差的可能性已大大缩小”。在那以后，几个被捕的恐怖分子决定交代，其中有两个人卡洛·菲奥罗内和卡洛·卡西拉蒂的交代都牵连到内格里。卡西拉蒂原来是个匪徒，他交代的动机值得怀疑。但菲奥罗内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他说他对莫罗遭到暗杀十分震惊(当时他已在狱中关了三年)，他决定坦白交代。但是内格里否认他们对他的指控。^⑤

① 红色旅和自治派都把意共当成他们的主要敌人，保罗·霍夫曼：《汽车推销员在意大利挨炸》，载1978年5月1日《纽约时报》。

② 1979年4月22日《快报》。

③ 同上。

④ 1979年5月22日《快报》。

⑤ 关于托西情况，见1979年12月6日《团结报》。关于菲奥罗内和卡西拉蒂情况，见1980年2月4日《全景》杂志。内格里在2月25日同《全景》杂志的谈话中反驳了对他的指控。2月20日被捕的“都灵纵队”的头头帕特里齐奥·佩奇在交代他如何在红色旅领导人马里奥·莫雷蒂的率领下参加绑架莫罗的情况中，帮了内格里的忙。佩奇说电话是莫雷蒂打的。这样对内格里参加密谋的指控就站不住了。尽管他还因为参加“武装起义”仍然关在狱中。佩奇的榜样有感染作用。

意大利的司法程序是很复杂的，拖的时间很长。在审判之前，所有的事实都不公布，甚至在审判时也未必公布。但内格里和他的朋友们在煽动恐怖主义一事已无可怀疑。汤姆斯·西汉教授在《纽约书评》上写过一篇比较公平和深刻的文章，说明内格里如何坚持使用暴力和立即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也许象内格里的律师声称的那样，现在内格里已经放弃了这一立场，但是这位教授已无法把血还回原处。”⑥

从长期来看，极左翼内部的反感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在意识形态上一直反对恐怖主义的宣言派现在谴责红色旅是法西斯。过去支吾其词把红色旅称为“走错了路的同志”的继续斗争派，在卡萨莱尼奥遭谋杀后开始同红色旅分手。卡萨莱尼奥的儿子安德烈亚一度是继续斗争派的成员，他曾经向记者发表过一篇感人肺腑的谈话，把谋害他父亲说成是毫无正义可言的卑鄙罪行。他不同意他父亲的政治观点，但他说他父亲是一个好人，是个有人格的保守派。他不应该吃子弹，这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这篇谈话在继续斗争派的报上发表，引起了尖锐的争论，有人说无辜的人注定要在阶级战争中遭难。⑦在莫罗遇害之后，再没有人企图为此辩护。有些很接近地下组织的自治派也谴责这次谋杀。意大利

有更多的人作了交代。4月至5月有200个恐怖分子遭到逮捕。（见1980年4月15日《纽约时报》和1980年5月4日和18日《快报》）。其中罗伯托·桑多洛证实天民党副主席的儿子马里科·多纳特·卡廷是恐怖分子，并且指控他父亲卡洛·多纳特·卡廷在1980年6月得到当时总理科西加的警告后帮助他儿子逃走。多纳特·卡廷这位在天民党代表大会得胜的反动联盟的组织者最初说他已经两年没有同他儿子联系，后来又在议会质询时认错并被迫辞职。见1980年5月31日和6月1日和3日《纽约时报》。

⑥ 汤姆斯·西汉：《在滑雪面具后面的意大利》。西汉是支加哥洛约塔大学哲学教授。他意大利语讲得很流利，1978年在罗马任教。他修订了在“意大利恐怖活动：一种交易”中的报道。

⑦ 考普金德：《欧洲恐怖活动》。

和其他国家对恐怖主义的价值观又重新进行了研究，恐怖主义的一位早期思想家霍斯特·马勒也许总结得最好。

马勒 1970 年被捕后，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思考问题和观察。在莫罗被绑架的几周之后，他在狱中向一个美国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

“武装的恐怖主义不能实现革命的诺言，也不能象中国、古巴或越南的游击队那样改善人民生活。例如意大利的红色旅会引起镇压，但它却不可能保护工人不受这种镇压……这些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掌握在最反动的势力手中的小卒子。

……利用国家来为大家做好事、谋福利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要找出一种办法，使我们做得比‘他们’好，亦即我们要作好提出要求的准备，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和建设更美好的社会。”^①

社会腐败、青年失业和学生灰心丧气等问题，为恐怖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人们看到政府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之前，红色旅远非就此完结。使人恼怒的原因比比皆是。意大利半数失业者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其中半数是大学毕业生。有的学生说，“干吗毕业？这是自找麻烦。还不如跟你的朋友在大学里待着。”1977 年，在七十万个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即七万一千人，愿意毕业。

但是恐怖主义的吸引力在减少，它达不到预计的目的。无端杀害莫罗使人们清醒。红色旅并没有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即通过交换“战俘”而使它被承认为“交战的一方”。但是他们的次要目标，即破坏“历史性妥协”，却暂时达到了。莫罗的被害大大地破坏了国家的政治机器。暗杀莫罗也就搞掉了天民党内开辟历史性妥

^① 1978 年 5 月 1 日《时代》杂志第 26—31 页《折磨中的国家》。

协道路的脆弱的支撑点。莫罗一死，他耐心编制的电影脚本几乎马上就开始垮掉。天民党内的反共派加强了，莫罗死后五天部分市镇举行选举的结果，也使反共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

5月14日，有百分之十左右的选民进行地方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与1976年相比，共产党丢失九个百分点的选票，天民党和社会党各增加四个百分点左右，新法西斯主义者则丢失二点五个百分点。^①人人都感到莫罗的被害对天民党有利，对意共不利。在那极度痛苦的五十四天内，中翼和右翼报纸强调的主题是，恐怖主义系共产主义的产物。都灵的一位宪兵上校说：“共产党是恐怖主义之母。共产党三十年来一直宣传不定期的阶级战争。现在他们说阶级战争对于取得政权并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子女不相信他们。”^②

这位上校的话并不确切。社会学家和政治观察家研究了恐怖主义者的情况，结论是：他们当中天主教家庭和有钱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并不比共产党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少。但在群众心目中，就象这位上校的观点所反映的那样，认为天主教和财富同暴力无关，而共产主义则可以同暴力挂上钩。

莫罗的被害和地方选举动摇了天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原来四人执政的天民党，实际上出现了天民党主席和总统两个空缺。不管这四个职位怎么安排（譬如说安德雷奥蒂当总统，扎卡尼尼当天民党主席），反正党内左翼是不可能递补这两个空缺的，充其量只能接受两个中间派，但莫罗的路线就会改变。天民党议会党团领袖弗拉米尼奥·皮科利立即对《时代》杂志的长篇谈话要求取

① 保罗·霍夫曼：《意大利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得胜》，载1978年5月16日《纽约时报》。

② 考普金德：《欧洲的恐怖活动》。

得领导权和实行新路线。^① 根据他的看法，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客观上使他们同共产党分道扬镳，天民党应同社会党“在求同的基础上努力合作”。这是用外交方式提出反共路线。皮科利正确地判断了力量对比：六月底扎卡尼尼就会来讨好他，请他当天民党主席。

贝蒂诺·克拉克西对皮科利的邀请反应迅速。这时克拉克西已搞垮党内的最后一个对手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主编保罗·维托雷利（原因是维托雷利不同意克拉克西对莫罗惨案采取的路线），并牢牢地控制了社会党。克拉克西对莫罗问题的政策是表里不一的。其厚颜无耻，使人瞠目。他一方面作为社会党总书记支持政府拒绝同红色旅讨价还价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以个人名义公开号召同红色旅进行交易以拯救莫罗的生命。莫罗遭暗杀不久，他开始对其他政治领导人进行影射攻击。他曾经对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说，“有人就是愿意流血。他们但愿莫罗不回来。”^② 密特朗曾重复他指责别人的话。

他凭借这种表里不一的圆滑手段，继续留在多数派政府中，同时却同天民党和其他党内的保守势力勾勾搭搭，想重组中左政府，即六十年代曾由社会党人和天民党人组成的政府。但以前的中左政府是同天民党左翼（由莫罗组织的）结成联盟，而现在则要同天民党的右派阿明托雷·范范尼、安东尼奥·比萨利亚和马西莫·德卡罗利斯等人结盟。卡洛·罗塞拉在《全景》杂志上写道，“扎卡尼尼……的敌人没有一个不同意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有联系。”他还补

① 1978年6月25日《意美关系进展》，在几天之后重新转载了皮科利的谈话。

② 莫罗被绑架曾写过五十三封信，有的已公布，有的始终没有公布。信中攻击许多人希望他死。这些由他书写的信明显是强迫他写的（后来发现了好几封别人写的底稿）。克拉克西对书中许多诋毁都是同意的。见1978年9月12日《信使报》。密特朗8月间对《欧洲》杂志的谈话中谈到此事。《信使报》摘要转载，包括引言中密特朗所讲的话。

充道，这样做已经被人称为“亲善行动计划”，其目的是要恢复天民党同社会党以及其他世俗政党的合作。这个行动计划的主角是贝蒂诺·克拉克西……下面还有一大串人，从以范范尼为首的天民党保守派势力一直到翁贝托·阿涅利（乔瓦尼·阿涅利的弟弟）的技术专家们……意大利社会党正式否认有此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获得美国大使馆的赏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并且得到里佐利的报纸和因德洛·蒙塔内利的《新日报》的赞同。^①

右翼对克拉克西是称赞的。新法西斯分子拉法埃莱·德尔菲诺说，“他是个好人，是个十分好的人”。右翼势力的主要发言人蒙塔内利写道：“意大利社会党是我们亲骨肉。”罗西·卡雷尼尼和马佐塔等天民党右翼领导人公开支持克拉克西的计划。罗塞拉引用马佐塔的话说，他计划在天民党内部建立“一个中间集团，其目的是取得意大利社会党的政治谅解”。克拉克西感到他有必要公开声明否认说，“随着意大利社会党的愈来愈强大，我们是在向左而不是向右走。”^②

社会党的目标之一是选举一位社会党人当总统。克拉克西认为他可以让天民党右翼支持一个反共的社会党人当总统，这样扎卡尼尼也会跟着走。德尔菲诺告诉《全景》杂志说，他和天民党内外的其他右翼政治家已经向克拉克西许下支持社会党人竞选总统的诺言。到1978年6月中旬，克拉克西已经活动了近三个月，似乎很有希望。在十二月总统选举之前，他还有六个多月可以搞政治交易。如果皮科利当上天民党主席，那么选举一个反共的人当总统就会使历史性妥协从此完蛋。随着法国左翼联盟的破裂，意

① 卡洛·罗塞拉：《布翁焦尔诺，贝蒂诺》，载1978年8月1日《全景》杂志第30—32页。

② 同上。

大利共产党的失败即使不会使欧洲共产主义倒退几十年，也会使它倒退好几年。

但右翼和美国都高兴得太早了。共产党并未一蹶不振。1978年6月15日早晨，意共通知安德雷奥蒂总理，除非莱昂尼总统立即辞职，否则意共将撤销对政府的支持，让政府倒台。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意共会走这一步。然而事后一想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莱昂尼有辫子叫人抓住，天民党也保不了他的驾，接连不断破获的丑闻都牵连到他、他的朋友和亲属，甚至有人指控他卷入了洛克希德贿赂案的丑闻。^①

一位著名的记者卡米拉·切德尔纳写过一本书叫做《乔瓦尼·莱昂尼：一位总统的生涯》，书中对据说的莱昂尼滥用职权，胡作非为，利用地位谋私利和贪污受贿等作了大量揭露，确实堪称天民党腐败的写照。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这本书销售了十三万册，在意大利广为流传。接着到五月份，《快报》杂志以文件为根据，指控莱昂尼在少交所得税，特别是他那价值百万美元的宫殿般住宅“皱园”少交了房地产税。罗马人高兴地给这件事起个绰号叫“皱门事件”。^②

15日傍晚，莱昂尼辞职了。当时电视正在向全国转播世界足球赛实况，他出现在荧光屏上，申明自己无罪，说他作为总统是一

① 1978年6月26日《时代》杂志第38页《一位“诚实”人辞职》一文中提到洛克希德贿赂案。洛克希德公司为出卖十四架运输机，在1965至1968年期间贿赂了一些官员，包括空军总参谋长法纳利将军，国防部长塔纳西和绰号为“羚羊皮匠”的总理。当时有三个人当过总理：鲁莫尔，莱昂尼和莫罗。由于最后一个不可能是嫌疑犯，因此前两人中总有一人犯了罪。两人都宣布自己无辜，但两人都以贪污腐化闻名。莱昂尼同洛克希德推销员勒菲勃兄弟是好朋友，已发现这两兄弟同法纳利和塔纳西在一起犯罪（后来这些人都获假释）。

② 切德尔纳被检察官起诉为诽谤国家首脑罪，后来没有再起诉。1980年4月2日《意美关系进展》。

个“诚实的人”，同时宣布辞职。克拉克西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大吃一惊。共产党竟没有同他打招呼。正如《全景》杂志指出的，共产党这一下使克拉克西“苦心策划了一百八十天的阴谋”付之流水。但克拉克西并没有就此完蛋。紧接着，天民党右翼议员卡雷尼尼就代表一个大的集团宣称，“我们将投票赞成克拉克西提出的任何候选人。”《全景》杂志有先见之明地评论说：“共产党唯一的一张牌就是要选出一位不效忠于这位书记的社会党候选人。”^①

当时举行了有一千零十个人参加的选举大会来选举意大利的总统，其中包括所有的众议员、参议员和二十个大区的代表。从6月29日开始的投票，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一天。同时在幕后进行了紧张的交易。最后，克拉克西付出很大的代价才取得胜利，让一位社会党人当总统，但这个人却完全反对克拉克西的政策。扎卡尼尼和安德雷奥蒂在天民党理事会中得势（皮科利支持了他们，交换条件是由他当天民党主席）。新总统众所周知是支持莫罗—贝林格路线的。

当选总统桑德罗·佩尔蒂尼是一位八十二岁的抵抗运动时期的老英雄，意大利宪法的制订者之一，曾任众议院议长。他毕生献给社会党，过去常常同陶里亚蒂斗争，但从来不是反共分子。意共的一位领导人乔治·阿门多拉（他曾经当过意共的总统候选人）说：“我同佩尔蒂尼没有别的关系，总是斗争……但总是充满深情……”。^② 意共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写道，“佩尔蒂尼是一位不调和的社会党人。我希望他会成为一个不调和的总统，事实上我确信他必然会这么做。”^③

① 1978年7月4日《全景》杂志。

② 帕斯夸尔·诺诺编，《乔治·阿门多拉：同佩尔蒂尼不需要诉诸法律》，载1978年7月18日《全景》杂志，阿门多拉死于1980年6月5日。

③ 同上。

佩尔蒂尼以创历史纪录的 832 票(投票总数为 955)当选总统,只有极右派投票反对他。他的当选在意大利很得人心。有人称他是世俗教皇约翰。他当选后立即树立了刚正不阿的榜样,而人民并不是视而不见的。他去都灵为双亲扫墓时,拒绝空军为他派专机,而买了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机票。飞抵都灵机场时,一位官员带来了扫墓用的花,他坚持立即付钱。①

佩尔蒂尼的夫人卡拉也成为范例。她拒绝当第一夫人,拒绝搬进总统府,拒绝主持茶会和接受传统的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可以有一间办公室和雇用两个秘书)。她继续在杰梅利综合诊所的吸毒治疗中心当心理学医生。她说:“我从来没有让桑德罗托起我的病人的手。我认为我也没有必要管他的那些事。”佩尔蒂尼总统轻声笑着说:“我一直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当然我不能拒绝妻子的自由。”

佩尔蒂尼当选时,卡拉五十七岁。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在那时结识了桑德罗)。她过去是社会党的积极分子,曾经担任意大利妇女联盟机关报《我们妇女》的编辑,后来当过意大利妇联的领导人,曾坚决主张妇联自治。她在五十一岁时又重新到大学去当研究生,选修青少年心理学,献身于同吸毒作斗争。她相信自力更生,性格开朗。她从来不怕手里拿着高脚酒杯照相。她看到右翼攻击她“穿紧士服的第一夫人”和“女权主义的总统夫人”等怒气冲冲的评论就感到好笑。但作家和教师们为她拒绝担任《我们妇女》中称之为“花瓶”的角色而鼓掌。作家巴里斯总结了大家想说的话:“这才是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尽管意大利过去家族和特权观念很深,但是我们终于看到现在的意大利珍重人们的工作,而不是人们的地

① 帕斯夸尔·诺诺编:《乔治·阿门多拉:同佩尔蒂尼不需要诉诸法律》,载 1978 年 7 月 18 日《全景》杂志,阿门多拉死于 1980 年 6 月 5 日。

位。”^①

佩尔蒂尼一家的正直和勤劳,为全体意大利人树立了榜样。意大利人十分需要这样的榜样。而这位新总统的影响则还要深远得多。尽管总统一职主要是礼节性的,但总统仍有三项重要的特权:总统是武装部队的首领;他发布举行大选的公告;他挑选总理——更确切地说,是要求某一个政治领导人组成一个议会可以接受的政府。如果有一个党在议会里拥有明显的多数,那么总统的最后一项权力是毫无意义的;但如果没有一个党取得多数,而需要搞联合政府,那么总统的权力就是重要的。

天民党的总统绝不会委任左翼当总理,他宁愿宣布“提前”大选。但佩尔蒂尼会毫不迟疑地挑选左翼当总理,而且事实上他马上就这么做了。战后历史上,意大利第一次有可能出现不是由天民党组织的政府。

如果左翼组织政府,这对于习惯于把自己的职位当成采邑来“占有”的天民党政治家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各部大约有二百至三百个高级职位,薪俸优厚,受人尊敬,对政策和人事安排都有相当影响。天民党自然不愿意放弃这一切,到手一半总比一无所有强。因此组织联合政府的压力已不单关系到国家利益,而且也涉及天民党政治领导人的利益。

因此,到1978年7月底,尽管莫罗遭到暗杀和克拉克西未公开宣布就开小差,莫罗—贝林格政策看来又重新上了轨道。然而,8月6日教皇保罗六世逝世。保罗是赞同莫罗的政策,但它的继承人是否继承他的政策却是一个未知数,8月26日选出了新教皇约翰·保罗一世,从他的背景和支持者的情况来看,回答是很

^① 帕斯夸尔·诺诺编:《乔治·阿门多拉:同佩尔蒂尼不需要诉诸法律》,载1978年7月18日《全景》杂志。

清楚的：坚决不同意！

教皇的改选是莫罗—贝林格战略的巨大挫折。梵蒂冈对天民党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共产党在群众中可以抵制梵蒂冈的影响，他们早就这么做了。但在天民党内部，他们几乎束手无策。右翼将会更加强大和咄咄逼人，动摇分子会破坏中间派的队伍，机会主义分子一旦跳上反共的乐队车，左翼力量就会削弱。在这六个月中，意共的政治路线第三次受到严重的创伤。除非出现奇迹，这一创伤是很难愈合的。

但天佑神助，约翰·保罗一世当选三十三天后就去世了。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大转变，10月16日，同一批红衣主教的会议竟选出了一个同他的前任几乎完全对立的教皇。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然是反共的，但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第一次发表演说就谈到教会应避免纯政治问题。

历史性妥协的概念看来又将卷土重来。但天民党内受到的侵蚀太深了。右翼得势，安德雷奥蒂看风使舵。他不经商量就开始独自作出重要的决定。他任命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将军领导反恐怖主义别动队。达拉基耶萨是个极端保守派。这个别动队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尚令人怀疑。他的任命被新闻界称为“小政变”。^①安德雷奥蒂还不经商量就任命了国有化企业的几名高级负责人。^②共产党开始提出警告（纳波利塔诺在9月，阿门多拉在10月相继提出警告），但安德雷奥蒂显然决心采取挑衅态度。^③12月，天民党企图冲淡六党关于农业问题的协议。最后在12月12日，安德雷奥蒂背弃了他向社会党和共产党作过的允诺（答应等六个月以后再

① 1978年8月20日《快报》。

② 1978年11月19日《国家晚报》。

③ 恩里科·贝林格：《克里姆林宫的友谊》，第23页。

考虑参加欧洲货币体系)。他得到议会的批准，签署了参加欧洲货币体系的协定。^①

1979年1月31日，意共撤销对政府的支持，朱利奥·安德雷奥蒂政府垮台。安德雷奥蒂打算组织新政府，但无法战胜天民党内反对意共入阁的力量。意共则非入阁不可。佩尔蒂尼要求有影响的小党共和党领导人乌戈·拉马尔法出来组阁。

拉马尔法有两种组阁办法。一种办法是组成包括共产党但排除天民党的五党政府。这样的政府必然引起天民党的一致反对，因此是十分不稳定的，他只拥有微弱多数，只要有几个人背叛，马上就会完蛋。第二种办法是将共产党和天民党都排除在外，答应给共产党一些在政府中居第二位的职位（担任政府部门的副职）来换取共产党对政府的支持。这样一个政府可以从天民党左翼议员中获得相当多的赞成票，并可以使拉马尔法能够着手进行艰巨的任务，以清除贪污舞弊和依附关系等歪风，并减少偷税漏税现象。

这两种办法的关键在于取得社会党的赞同。人们知道共产党赞成第二种办法。但克拉克西不干。^②他判断社会党可以在损害共产党和天民党的情况下得到胜利，他要求举行大选。1979年3月2日，拉马尔法在同克拉克西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后决定洗手不干，于是佩尔蒂尼只好重头做起，他宣布在1979年6月3日举行大选。

这次竞选运动突出的一点是，从极右翼到极左翼，所有政治力量都集中攻击共产党。有些做法十分狡猾。例如5月，中左倾向的《快报》在大选前夕发表了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柏的长达十五页

① 1978年12月14日《宣言报》和《信使报》。

② 1979年3月5日《信使报》。

的文章,并注明由于波柏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在意大利几乎无人知晓。这里隐含的一层意思是指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称霸,不让波柏的文章发表,而《快报》是在弥补这一缺陷,让人们了解真相。^①同一个月,平时批评天民党的中左倾向的《全景》杂志对扎卡尼尼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把扎卡尼尼认为大选后天民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将组织政府的看法放在引人注目的地位,采访记用的标题是《欢呼天民党克拉克西政府》。^②

对共产党人各种攻击相互补充,意共似乎陷于孤立,民意测验也这么说。当时预计天民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会增加三到五个百分点的选票,意共的选票会下降四个百分点。出人意外的是估计小小的激进党有可能增加四个百分点以上的选票。^③由马尔科·帕内拉领导的激进党是个杂牌党,吸引各种只看单项问题的选民,如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使用微毒麻醉品的人、嬉皮士等等以及对大党感到幻灭的人。他们一般是青年人。1976年他们选出了四名议员,这些议员在议会里吵吵嚷嚷,阻止法案的通过,作风十分粗鲁。

我到意大利去采访了这次大选,在大选后的次日早晨向《民族》周刊寄出了下面一篇通讯,但由于收到得太晚未能发表。

[1979年6月4日罗马讯]昨晚纳诺瓦广场异常热闹,激进党在举行竞选集会。随着夜幕的降临,选举结果不断报来,广场上青

① 马尔切洛·佩拉:《卡尔·波柏和他的思想》,载1979年5月27日《快报》第70—87页。

② 扎卡尼尼在1979年5月1日《全景》杂志上的文章。

③ 詹保罗·法比奥:《六月就会这样过去》,载1979年5月8日《全景》杂志第40—42页。瓦莱里娅·甘杜斯:《我并不高兴,但投你的票》,载1979年5月15日《全景》杂志第52—56页。

年人愈来愈多，愈来愈放纵。选举结果证实了民意测验部分是正确的，激进党取得了进展，意共失票，但天民党和社会党成绩都不太好。

那个巨大广场曾经是古罗马人为举行模拟海战而放水淹没过的，现在看来象是菲里尼电影里的一个镜头。夜色柔和，月亮高高地挂在圣阿格尼丝教堂圆形拱顶的上空。一幅用来报告选举结果的30英尺长70英尺宽的长方形巨幅白幕遮住了广场中央的喷泉，银幕上印着各个政党的名字和各党在1976年大选得票的情况。

银幕前是为摇摆乐队用的舞台，上面挂着扬声器。一群男女青年站在两架高梯上掌握选举结果的报道。舞台的一边在高高的钢管支架上放着聚光灯和电视摄影机。

挤满广场的几千名青年情绪高涨，热热闹闹，但并不喧嚣或吵嚷。广场上看不见警察的影子。人们的行为相当检点。午夜两时，多半的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清晨揭晓的最后结果肯定了大选的趋势。激进党的选票从1976年的1.1%增加到了3.4%，比原有的四个议席增加了十四个。其他党没有一个增加这么多。虽然百分比不大，但同别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却意义重大。这些因素是：同1976年相比，总票数下降了3%，白票空前增多，人们投白票是表示他们对所有的政党都感到厌弃。激进党在竞选中主张摒弃一切政党，这种左倾不可知论显然在意大利青年的心里引起了反应。

但好几家报刊认为意大利已经右转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共产党失票最多，从原来的34.4%下降到30.4%，但右翼政党并没有赢得意共失去的选票。天民党丢了一席，选票下降了0.4%，新法西斯党从6.1%下降到5.3%，他们的票被自由党（实际上是个保守党）拿去了。自由党从1.3%上升到1.9%。中间派得到一点好处，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从6.5%上升到6.8%。

社会党保持稳定，从9.6%上升到9.8%。极左派增加了一点

五个百分点。共产党丢失的票实际上分给了激进党和一些极左政党。这些迹象表明青年并没有向右转，而是对各大党感到厌烦。

结果是形成僵持局面，同以前的力量对比十分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失败者是天民党。他们曾经希望从莫罗的被害和人们对恐怖主义的仇恨中捞到好处，能多得几个百分点的选票，从而能使右翼联盟上台执政。但现在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同社会党人联合组成中左政府，或者同共产党妥协，拼凑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这次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梵蒂冈的审慎中立。此外，美国官方保持沉默。总起来可以说，欧洲共产主义尽管受到打击，但仍然很有生气。

只有一位意大利的评论家乔治·加利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天民党是大选中真正的失败者，但这已是两个月之后了。加利写道：“决定大选的事实，是天民党没有能获得大多数……天民党的选票从1963年以来就一直停留在38%和39%之间。”^①

在大选后的头几天，几乎所有的意大利和外国评论家都由于对意共的受挫过于兴奋而没有进行仔细的思考。报纸用大标题宣布历史性妥协的死亡。《时代》杂志欢呼“打得晕头转向的失败”，“锤子和镰刀降了半旗”“欧洲共产主义失败了”。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之后，现实又占了上风。意共损失重大，但不是决定性的。意共同天民党仍然势均力敌。尽管天民党谋求同克拉克西结合，但克拉克西不敢这么做，共产党变成反对党。由科西加拼凑的政府步履维艰地勉强撑持，因为没有一个党愿意再来一次大选。突出的事实

^① 1979年7月23日《全景》杂志。

是意共丢失的选民仍然留在左边，投了激进党和极左翼的票。此外，弃权率之高是给各大政党的一个警告。

从长期来看，意共的损失对意共倒是有益的。它得考虑一下象都灵的阿马德奥、那不勒斯的埃莱娜和罗马的卢恰纳·卡斯泰利纳等人的担心。意共必须更多地关心失业问题，必须加紧青年工作和加强对北方工厂的南方工人的教育。同时，也还有些有利因素，如梵蒂冈保持中立，妇女没有动摇，老工会工作者仍然可以信赖。而且，凡是意共工作做得好的地方，选举结果还是对意共有利的。贝林格经常引用的典型例子是阿普利亚的加利波利镇，意共在那里领导的一系列斗争使群众变得激进，选票从1974年的32%上升到1979年的40%。^①

大选后一个星期，欧洲议会举行第一次普选。意共保持了阵地，在个别地方如撒丁岛，还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天民党丢掉一点五个百分点。社会党上升一个百分点。然而最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并不表现在意大利，而表现在德国。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只得到41%的选票，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几乎得到50%的选票。^②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远比意大利的天民党反动，欧洲的天平肯定倒向了右边，比数为255比155。欧洲共产主义内部存在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对欧洲共同体的态度，意共把西德社会民主党当作盟友，而法共则把它当成敌人。西德社会民主党在同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较量中所处的软弱地位，打开了意共同西德社会民主党之间合作的前景。

天民党一开始对意共受挫兴高采烈，过后意识到自己受到相

① 这种趋势仍在继续。意共在1979年10月14日的部分市政选举中得46%的选票。见1979年12月3日《团结报》刊登的贝林格在南方会议上的讲话。

② 1979年6月12日《共和报》和《新闻报》。

当大的挫折。许多象天民党主席弗拉米尼奥·皮科利这样的中间派,看到僵持局面依然存在。为了加重天民党进退两难的处境,工人阶级举行了规模庞大的政治性示威。最初并不打算这样做,尽管示威不是没有政治背景的。许多大公司原来盼望意共政治上大败,天民党可以不受约束地重新执政,因此它们故意拖延,不同工人谈判新合同。早在大选之前,被激怒的工会就号召于6月19日举行总罢工,目的是解决经济问题。

大选的结果使罢工变成一次政治抗议示威。罢工极为成功,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巨大的示威游行。规模最大的是1979年6月22日罗马的示威。

一年半之后,我再次坐上公共汽车到圣乔瓦尼教堂两边的广场上去。我再次在那里漫步,混杂在人群中。我不禁将这次示威的气氛和形势同1977年12月的那次示威作了一番比较。两次示威相隔二十个月,在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被暗杀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在加深。但是这次群众的情绪远比前次欢乐和开朗,当时群众的情绪严肃而坚决,也许因为现在是夏季……也许因为有几万妇女儿童在场。这里是一眼望不见尽头的人群,浩浩荡荡,无边无际,估计约摸有四十万人左右。

示威充满着狂欢节的气氛,有几个用五加仑汽油桶改装的大鼓,还有几百面旗帜和横幅,一个四英尺高的大钟装在轮子上,发出低沉和沙哑的啜啜声。队伍里有小丑,还有两三个业余杂技演员。广场上设有出售食品、汽水和啤酒的小摊。人们举着有工会缩写标志的三角旗,锤子和镰刀旗帜之多,看起来象是革命已经取得胜利。

这种兴高采烈和纵情欢乐的情景,这种满怀信心和显示力量的感觉是如此地出人意料,以至我望着到处可见的“老板们,6月3

日不会使我们后退”口号时，感到这不是在挑战，而是在宣布一个事实。三大工会的领导人都讲了话，总工会的卢恰诺·拉马讲出了大家共同的感受，他说：“当心，老板们，你们是在同整个工人阶级打交道”。对我这个美国人来说，最令人惊奇的是有天主教徒、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混杂在一起的工会，出于本能同意共站在一起，他们认为意共丢失选票势必会使雇主们对工人采取冒险性的进攻。

天民党没有忽视这个教训。几个月后，甚至天民党右翼领导人也开始争取意共支持组织多数派政府，但为时已晚。意共正忙于整顿内务。1979年下半年，党内进行了多次讨论，其高潮为1979年11月14日至16日的中央全会。意共最高机构重申历史性妥协战略，并认为六月大选的结果是一次选举上的挫折而不是政治上的失败。通过广泛讨论，确定了意共在今后几个月的两项主要方针，即：采取放手帮助失业工人、领取养老金者和贫苦居民的政策；围绕美国在欧洲部署新导弹问题，大力开展争取和平与裁军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通过发动人民来重振国家和管理国家。^①

中央委员会当时开会，计划召开下面几次会议：1980年1月在都灵举行一次菲亚特工人的会议，1979年11月底在巴勒莫召开一次反对黑手党的会议和1979年12月初在巴里举行南方问题会议。其中巴里会议由于贝林格出席而特别值得注意，他在会上强调必须迫使政府使用议会已经批准供南方的几项工程使用的款项。他还大力呼吁天主教徒、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问题上团结一致。^②

① 1979年11月16、17、18日《团结报》报道了会议情况。会上的主要报告都详细地转载，包括基亚罗蒙特关于国内政策的报告。还发表了贝林格的总结报告和四十多个中央委员的发言（中央委员总共有175个）。

② 贝林格《一个广泛的联盟》。

意共关于导弹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应先同苏联谈判。意共的立场得到全国广泛响应，因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有三分之一将部署在意大利。撒丁岛的所有政党都已公开表明反对导弹。^① 意共的立场对诸如意大利天主教劳动人民联盟和“伸出救济的手”等天主教组织也有很大的号召力，甚至一些坚决反共的组织，如“天主教行动会”和“圣餐和解放会”，也采取同意共平行的立场。据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赞成先谈判。教会在不少地区组织“祈求和平”的示威。^②

然而，科西加总理于1979年12月6日迫使议会通过部署导弹的动议，虽然有近半数的议员反对。就象一年前意大利参加欧洲货币体系时的情况一样，天民党当局再次无视国内的广泛反对。科西加是在社会党内克拉克西派的支持下勉强通过上述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克拉克西在党内是少数派。^③ 意大利的决定对美国的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美国随后得以在1979年12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顺利地通过了它的建议，尽管荷兰和比利时持强烈保留态度，并且是“在经过尖锐的争论和大大冲淡了公报原稿的情况下才通过了决定”。^④ 显然，如果意大利投票反对美国，那么美国的建议还会进一步受到削弱。然而，部署导弹的问题现在仍在日程上，在今后四年（即部署导弹所需的时间）还会对意大利的政局起深刻的影响。

① 1979年11月17日《团结报》所载《各政党反对在撒丁岛部署核导弹》。

② 1979年12月3日《团结报》所载阿尔切斯特·圣蒂尼《天主教运动的呼吁：要谈判，不要导弹》。

③ 1979年12月7日《晚邮报》。标题为《科西加得胜，社会党分裂》。这是萨尔诺·托尼奥蒂写的长篇报道，详细介绍意大利社会党内部的斗争，并表明克拉克西是少数派。

④ 1979年12月13日《纽约时报》所载弗洛拉·刘易斯的《北约通过部署导弹和推动谈判的计划》。

总而言之,正当1月1日迎来了新的八十年代的时候,欧洲共产主义,尤其是意共,由于受到严重的创伤,看来需要较长的恢复时期。伦敦《经济学家》也许是英语世界中最出色的保守派杂志。1979年12月29日,这家杂志七十年代的最后一期用蔑视的否定态度作了这样的评论:欧洲共产主义选择了多党主义,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相信它”。

然而不出一个月,形势急转直下,意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于掌权。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苏联的入侵使原来缓和的局势紧张起来,而开始了新的冷战。它对意大利政局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并且具有很大的讽刺意义。

人们公认冷战的重新开始会冻结意共的前景和破坏欧洲共产主义。意共也承认这一点。确实,由于马歇和法共支持苏联入侵,《经济学家》幸灾乐祸地谈论欧洲共产主义的死亡。它在1980年1月12日一期的目录中写了这样一句:“走呀……走呀,……欧洲共产主义走在消亡的路上(见第51页)”。在第51页,关于欧洲的第一篇大文章的标题就是“正在消失中的欧洲共产主义”。文章的第一句话是“阿富汗之剑把欧洲共产主义劈成了两半”。^①但这种蛊惑人心的高兴话讲得太早了。意大利政局的发展恰好与他们的期望相反。卡里略和贝林格都谴责了这次入侵。《团结报》头版的社论愤怒地指责入侵违反了“工人运动的某些最优良的传统,即:维护和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革命不可输出,坚定地维护以和平的政治方式替代军事方式来寻求解决办法……(入侵)给已经富有爆炸性的世界形势增加了新的紧张和危急因素。”^②

社论也攻击了美国以往的政策是在制造冲突气氛。在这以后,

① 1980年1月12日《经济学家》。

② 1980年1月27日《团结报》。

贝林格作了详细的分析,列举了美国的下列政策:美国国会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攻击,把苏联排除在中东的解决方案之外,在印度洋建立美国舰队,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以及布热津斯基所谓刺激军备竞赛是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的论点。贝林格说,尽管如此,美国的政策不能作为苏联入侵的借口。贝林格明确表示意共所遵循的路线并非中立,也不是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与此相反,意共的路线是积极支持欧洲的利益,首先是欧洲的和平。他抨击那种把意共谴责苏联入侵看作是入阁手段的观点。

除了少数顽固分子外,大多数评论家都相信贝林格说的是真话,贝林格的讲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不是由于意共采取了新的路线,而是由于意共在一个对苏联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使中间派相信意共在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贝林格坚持维护欧洲利益的立场在他的同胞中引起了深切的共鸣。尽管意大利人热衷于“美国生活方式”,却并不赞赏美国的外交政策。人们认为美国的政策不稳、幼稚、笨拙。左翼认为美国政策太横蛮,右翼则认为“太软”和混乱。欧洲自主的概念很有吸引力。

甚至在贝林格讲话之前,意共对苏联入侵的立场已为科西加总理1月底对华盛顿的访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据《共和报》主编欧金尼奥·斯卡尔菲说,科西加曾明确告诉卡特总统,没有意共,就无法治理意大利。^①

科西加之所以这么说,是受到意大利事态发展的压力。天民党竭力要拉社会党组成新的中左政府。克拉克西是愿意的,但他

^① 1980年1月28日《共和报》载欧金尼奥·斯卡尔菲文章《他讲的是撒丁话,不是天民党中派的话》。科西加此话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但也不是完全无影踪,他同贝林格是表兄弟。但卡特并不为科西加的动机或同贝林格的血缘所感动,他重申美国反对意共。

的要价是由他当总理。正当天民党举棋不定时，社会党内部在克拉克西支持美国导弹建议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从而失去了组阁的可能性。^①另一件大事是菲亚特对工人的攻势遭到失败，意共对都灵的恐怖主义问题和菲亚特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反击（请看第七章）。

尽管出现了阿富汗事件，但突然之间意共似乎有可能进入政府，关键在于1980年2月16日罗马天民党代表大会的结果。一度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天民党右翼领导人曾表示他们原则上将不否决意共入阁。一位自由派评论家说，“这一惊人的声明有可能导致就建立民族团结政府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②其他人则认为上述表示是假的，事实果真如此。

在天民党代表大会上，右翼勉强同部分中间派建立联盟。扎卡尼尼、安德雷奥蒂和科西加的左翼和中左联盟取得百分之四十二的票数，并且得到绝大多数列席大会的人的支持，虽然列席票是按比例发给天民党内各派成员的。因此，大会代表（多半是干部）中各派的百分比同那年在天民党成员中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十分接近。^③右翼和中右联盟取得57%的票数，但这个联盟很脆弱，由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组成，他们甚至连发表一个联合决议都达不成一致意见，最后大家同意在一个共同的前言下互相支持对方的决议案（总共有三个）。^④这个前言明确反对在政府一级同意共合作。

① 即使在1月14日会议之后，观察家们已看出最后会成僵局，因为在导弹问题上的争论已经使意大利社会党分裂。见1980年1月12日《经济学家》。

② 乔治·罗西：《天民党向右分化》。见1980年1月28日《共和报》。

③ 这42%的票有重大意义，因为民意测验表明天民党的中层（多数代表是中层干部）比基层和领导层都要反共。由于代表大会的结果，基层会进一步左转，这很可能意味着潜在的分裂。

④ 天民党的中间派亦称莫罗派，因为他们追随莫罗同意共合作的路线，尽管半数人反对意共。莫罗死后这一派分裂成由扎卡尼尼、安德雷奥蒂和科西加为首

福斯特·德卢卡在一篇文章中评论说：“莫罗没有继承人……天民党内的反莫罗派又回到了原来的反共立场上，重新拼凑成多数，甚至把象德卡罗利斯这样的极右派也包括进去……”^⑤

所谓的前言派控制了3月选出的新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动摇不定的弗拉米尼奥·皮科利当选为天民党书记，这是他在莫罗被暗杀后运用手腕达到的高峰。共产党的路线受到重大挫折，中间有两个重要插曲，第一件事是极右派为争取某些中间派，不得不“在原则上”放弃在意共问题上使用否决权。第二件事是天民党内的冲突如此激烈，以至出现了分裂的幽灵。天民党的国防部长阿道夫·萨尔蒂说，“在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在天民党内部看到分裂的细菌。这是恶兆，我极力想把它忘掉。”^⑥右翼的顽固态度使它的反对者联合在一起，控制了42%的票数，澄清了许多问题。过去不少天民党政治家把同意共合作看成是保住自己的职位和用人权的手段。现在他们意识到国家的前途处在危急中，就象扎卡尼尼气愤地向兴高采烈的右翼代表所说的那样，“你们这些人正在使民主制度陷于瘫痪。”^⑦

3月19日意大利社会党撤销对政府的支持，科西加政府辞职。^⑧前言派想成立政府，但佩尔蒂尼总统毫不犹豫地挡住了他们，要求科西加（他属于42%的少数派）重新组阁。科西加同社会

的中左派和以皮科利为首的中右派（在代表中约占24%）。右翼联盟是由多纳特·卡廷、鲁莫尔和科伦波推行的，拥有15%的代表。他们同反动的范范尼和比萨格里亚搞在一起，后者有14%的代表。除了反共是共同的以外，这些集团之间的分歧十分尖锐。

⑤ 福斯托·德卢卡：《莫罗被害使继承人空缺》，载1980年2月21日《共和报》。马西莫·德卡罗利斯卷入辛多纳的案件中，辛多纳假装被绑架的那次曾去意大利见了德卡罗利斯。

⑥ 加埃塔诺·斯卡尔多齐亚在1980年2月19日《晚邮报》上的撰文。

⑦ 皮耶罗·桑松纳蒂：《扎卡尼尼的警告》，见1980年2月21日《团结报》。

⑧ 1980年3月20日《纽约时报》。

党人和共和党人协商，取得了两党的支持。^① 前言派陷入了困境，他们难于否定天民党的一个大人物（皮科利是不会跟着走的），于是新政府成立，罗马人很快送给它一个绰号“科西加二进宫”。由于右翼未能阻止科西加第二次组阁，因此他们在天民党代表大会上的成功变成了一次代价高昂的胜利。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社会民主党书记彼得罗·隆哥强调指出了科西加二届政府的暧昧之处。他说，“这是向历史性妥协过渡的政府。”^②

科西加的态度可能有暧昧之处，而前言派却不然。多纳特·卡廷在6月地方选举竞选中开展了一场铁拳运动，首先是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恶毒地攻击意共。他说，意共的革命思想应对恐怖主义负责，恐怖主义的领导人都是意共的子孙。这纯粹是蛊惑人心的煽动。因为许多恐怖分子的领导人如红色旅的创始人雷纳托·卡廷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而且意共已经在全力开展反恐怖主义斗争。此外，这种攻击是不负责的，因为它在这个问题上破坏了民族团结。然而这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受到梵蒂冈并非有意的支持。民意测验预报天民党的选票会增加，意共的选票会大大下降，失去那不勒斯和都灵等由左翼管理的大城市。^③

地方选举决定在6月8、9两日举行。选举前两个星期，爆发了一件大事。有人证实多纳特·卡廷的儿子马尔科·卡廷是一个恐怖主义者和逃犯。更有甚者，由于事先受到科西加的警告，他的父亲帮助他逃往国外。所有意大利人，包括共产党人，都原谅这位父亲袒护儿子，但很少有人原谅科西加和多纳特·卡廷隐瞒他们

① 1980年4月4日《圣胡安星报》所载美联社从罗马的报道。

② 1980年3月24日《时代》（意大利出版）。隆哥是在三党联盟已开始形成但尚未组成科西加政府时讲的话。

③ 关于多纳特·卡廷和他的竞选，见1980年5月12日《全景》杂志。关于民意测验见1980年5月4日《快报》。

的牵连。^① 6月选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选举结果没有使天民党高兴。尽管天民党比1975年地方选举增加了一点五个百分点的票,意共失去两个百分点,社会党增加一个百分点,但左翼联盟控制的大城市一个都没有丢(意共在都灵增加了两个百分点,社会党增加了四个百分点;意共在波洛尼亚增加了一个百分点,社会党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由于天民党竞选时在反共问题上做文章,因此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同1979年6月选举作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天民党丢了一点三个百分点。意共得失相当,在北方得利,在南方失利,总共丢失十分之三个百分点的票。社会党得利最多,增加了二点八个百分点,^② 克拉克西取得胜利。有人预言他会在1981年的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清洗左翼反对派。^③

最不好的现象是投弃权票和白票的人数增加了。1975年为11%,1979年增加到13.4%,1980年又增加到17.5%。在一个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参加投票的国家,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对现行政治体制深为不满。其次,天民党丢失的票都到了极右派手中,即新法西斯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和意大利自由党。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在扎卡尼尼强调的民主进程的逐渐瘫痪,将会对意大利的未来产

① 关于多纳特·卡廷的撒谎,见1980年5月31日《纽约时报》。科西加以11票对9票免于该党议会党团质询,但票数不足以免除他受议会全体的质询,见1980年6月8日《快报》。

② 意共从激进党得到大量选票,因为激进党没有参加选举。三党得票比较如下(载1980年6月10日《国家晚报》):

	1980	1979	1975
天民党	36.8	38.1	35.3
意共	31.5	31.8	33.4
意大利社会党	12.7	9.9	12.0

③ 预言是在选举前说的,当时估计克拉克西会取胜。见1980年6月1日《快报》。

生不利的影响。^①

总之，僵持局面依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意共和欧洲共产主义未能兴旺发达，但也决非垂死。重要的是，尽管由于欧洲向右转，尽管受到 1978 年至 1980 年变迁的创伤，意共及其主张仍然守住了阵地。欧洲共产主义将会持续下去。

^① 关于统计数，见 1980 年 6 月 10 日《意美关系进展》。

第三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前景

第十三章

理论与实践

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对人类的进步危害甚大。这种说法原意是纠正庸俗的实用主义，但它却夸大了理论的作用，导致在理论问题上钻牛角尖，以后又受到斯大林的歪曲，把死背教条合法化了。理论是可贵的，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指南，取得新发现的主要工具。这个道理在物理学领域中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在其他各种知识领域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同阿基米得斯、哥白尼和达尔文一样重要。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在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首要地位。歌德有句名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用歌德的话调和一下列宁的名言，看来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

在各种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不是最小的。只要看一下本世纪中在它的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重大革命运动，就可以肯定这一点。但它绝不是无所不知的。即使象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有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初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可能长期顶住资本主义世界的切齿仇恨而保持生存，但它却生存下来了。资本主义的纵容使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政策最后导致1938年在慕尼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为希特勒打开了通往东方的道路。当时有哪个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理论)的历

史学家能预言三年之内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会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联合起来推翻希特勒和他的同盟者呢？又有谁会想到帝国主义的马会被迫到容忍社会主义生存的河边去饮水呢？

谁又能预言殖民世界会用快得令人眩晕的速度土崩瓦解呢？在发生慕尼黑事件那年的圣诞节，本书作者在阿拉哈巴德作尼赫鲁的座上客。我们详细地谈到印度的独立斗争。那天晚上谁也不可能让我们相信印度会在十年之内获得自由。我们这两个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没有哪一个会认为印度有可能不经过英印之间的流血冲突而获得自由。历史是会捉弄人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前景是不会缺少惊涛骇浪的。

欧洲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思潮的出现，在全世界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七十年代出版了不少书籍、专题报道和文章，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和重要性。右翼的批评往往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把这种新思潮看成是莫斯科麻痹西方的马基雅弗利式花招。这些批评家有不少人好几年来一直认为中苏冲突是假装的，其目的是使西方解除武装。对他们来说，欧洲共产主义是特洛伊木马。

意大利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保守派，如奥古斯托·德尔诺切教授和安德里亚诺·勃劳索拉教授，不怀疑意共的诚意，而是怀疑意共的分析。他们争辩说，欧洲共产主义者一旦进入政府，他们的紧缩政策就会得罪群众中的广大阶层，而这就会迫使他们采用强制性的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右翼批评家同左翼批评家如《每月评论》的编辑们或欧内斯特·曼德尔如此合拍，颇有讽刺意义。曼德尔的《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一书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了如此有系统和有说服力的攻击，以致别的批评者在一段时间内无话可说。曼德尔在《马克思主义前景》1979年冬季号上发表过该书

的摘要,本书作者也曾于1979年10月在《每月评论》上为该书写过书评。

曼德尔的论点是清醒的和学术性的,它们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极妙的结构。他的论点既是政治和经济的,又是军事的,尽管曼德尔在军事方面太轻描淡写,全书220页中,只有最后一页半讲军事问题,还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一。他讲的重点是:如果意大利真正出现一次革命,那么美国“在政治上不可能”进行军事干涉。但他的前提是有毛病的。他设想的是“重复越南式的冒险”,其实,西班牙内战的相似之处倒更多一些。如果意大利因为恐怖主义、罢工和暴力而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那么意共最怕的并不是发生军事政变。意大利共产党人相信群众会奋起击败新法西斯分子,就象西班牙共和国当时要不是受到外来干涉,本来可以击败佛朗哥一样。外来干涉以墨索里尼空运摩洛哥部队开始,接着是希特勒康道尔军团,十五万黑衫军再加上资本主义大国对共和国的武器禁运。谁能担保美国会认为“在政治上不可能”悄悄地利用代理人干涉,甚至直接进行干涉?苏联会乖乖地袖手旁观么?难道不会有热核冲突的危险吗?即使这种可能性并不大,难道负责的革命者能漠视这种风险吗?曼德尔藐视战争危险,但他的观点是很危险的,同毛泽东把美国看成纸老虎的评价十分接近。不管这种评价是对是错,反正不应当用这种假设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革命的慎重必然使人们给美国的国际“讹诈”留一个“保险系数”,但巧妙的策略可以缩小这个系数。

曼德尔在政治上指控欧洲共产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认为上层的官僚们构成“工人阶级应该加以摧毁的……著名的‘国家机器’”,他强调“间接民主的代议制度(如议会)同直接民主的示威和机构之间容易发生冲突,从长远来看,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认为文化领导权只是神话,他写道:“如果相信资产阶级国

家的教育制度能为马克思主义所支配，那就是相信神话故事”。

否认文化领导权是曼德尔的理论脱离周围世界现实的明显例证。今日的意大利只有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伸向整个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遍布整个社会。学生中多数积极分子，不论是意共的党员和同情分子、社会党的党员或同情分子，还是比意共更左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各级学校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教员属于这一类，包括我在罗马的两个亲戚，一个教小学，另一个教中学。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投天民党的票，但都同意共党员合作，尊重意共党员，听取意共党员的意见。在意大利，三个人中有一个投意共的票，再加上其他的左翼团体，比例接近二分之一。意共党校不讲授圣经，但每个天主教大学和学院都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曼德尔的其他一些政治论点也是有懈可击的。他把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分割开来的论点，经不起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一再强调这两者都应根据情况来加以利用。罗莎·卢森堡曾详尽地谈过用议会外措施来支持议会活动的重要性，以及用后者来支持前者的重要性；这恰恰是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做的事情。直接民主正在意大利开花结果，工厂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都对所有的人开门，不论是否工会会员或政党党员。从最严格的字义来说，它们就是“苏维埃”。卢齐亚诺·格鲁皮和彼得罗·莫格拉奥曾经指出，议会本身能起反对行政机构的进步作用。曼德尔对自己的主张加了限制词。他说：这两者“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调和的，但这只是遁词。我们现在讲的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凯恩斯的口头禅说得好，“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曼德尔把“国家机器”限于统治集团的最上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居然作出这样的分析，未免奇怪。象军队或天主教会这样的官僚机构，是国家内部的一个完整的实体。上层统治集团通常确

实是在制订政策和统治一切，但随着阶级觉悟的提高，这种情况就会改变。这是“革命形势”的一个方面；也只有这样才成其为革命。当下层阶级的群众或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有了阶级觉悟和组织，上层阶级就陷于孤立，悬在空中。这是意大利正在出现的情况。曼德尔说欧洲共产主义者否认社会的阶级基础，意共每天的行动否定了曼德尔的这个前提。

欧洲共产主义者一再声明，谁也不能靠愿望来取消阶级斗争。他们敏锐地意识到阶级的存在，对阶级的构成和阶级内部的阶层作了最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他们的政治战略的基础，他们的政治战略就是谋求同其他集团结成联盟。如果他们不能从阶级立场上来识别人，那他们在政治上怎么进行工作呢？曼德尔也许不喜欢欧洲共产主义者所做的工作，但我们必须承认欧洲共产主义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在经济方面，曼德尔比较站得住脚，但他的论战态度仍然损害了他的论点。他争辩说，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存在，欧洲共产主义的各项改革——国有化、税收、控制投资和防止资金外流——都只能加强现存的资本主义结构。这种说法只有在资本家处于控制地位时，才是对的。象国有化这样的改革是一把两面有刃的宝剑，它既可以用来反对工人，也可以用来反对资本家，要看谁从国有化工业得到好处。可以象英国工党政府那样将煤矿和钢铁厂国有化，再把廉价的产品卖给汽车制造商，而由纳税人承担亏损。天民党三十年来在意大利就是这样干的。

在现代世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愈来愈有必要。政治和经济的分界线变得愈来愈模糊；国家由谁控制就象经济由谁控制一样重要。这里曼德尔用未经证实的假定来辩论。他写道：“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是保障资本家的财产，维护资本和生产剩余价值。”谁能反对这一点呢？但如果国家不再完全控制在资本家手中，如

果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出现某种双重政权，那么不管生产关系如何，在短期内国家可以控制并改变经济。从长远来看，政治和经济必然会合在一起，但长期总是由短期构成的。

曼德尔对意共“拯救意大利经济”的纲领批评最为尖刻。既然意共也认为意大利的经济必须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范围内活动，那么拯救意大利的经济就意味着拯救资本主义。这个论点的前一部分是他在理论上最有力的论点。再说，既然国际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国家存在欧洲共产主义经济，那就没有可以用来驳斥他的证据。但是仍有一些有份量的推测，本书将在后面谈到。

关于这个论点的后半部分，则有一些过硬的事实可以使人对曼德尔的提法表示怀疑。举例来说，类似西西里弗拉泰利奥式的合作社如能在意大利大量推广，以致意大利可以不再进口肉类，这将是拯救意大利经济的一个重大步骤。人们也许会问：如果把省下来的外汇用在国有化的钢铁工业和电力网的现代化方面，那么是不是也在加强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呢？要是工人在一个政府中拥有实权（在食品问题上拥有直接权力），而这个政府又控制了能源、食品和钢铁等高地，这会对制度产生什么影响呢？到那时候，究竟是由阿涅利和其他的私人雇主来定调子，还是由工人阶级来定调子呢？布鲁诺·特伦廷认为将由工人阶级来定调子，而曼德尔却说这种“前景是乌托邦的空想。我们至少可以说历史的判决有利于我们的论点，而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论点。”但是，过去是未来的前奏；对欧洲共产主义来说，陪审团现在还在审判厅外讨论，并没有宣布判决。

“拯救经济”问题是曼德尔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又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争辩说，把阶级利益当作民族利益，是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说：

“所谓的‘普遍利益’意识形态，亦即必须把‘国家命运’放在首位来考虑的意识形态（贝林格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些讲话中多次使用过这两个短语）明显地同十九世纪大英博物馆之狮^①的古老理论是不相符合的。后者的理论认为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且不说他话中的挖苦，曼德尔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资本家习惯于把他们的利益同大家的利益等同起来，而欧洲共产主义则用同样的骗人话来把工人引入歧途。他说：“这是幼稚、伪善和傲慢的混合体。”资产阶级使用“民族利益”一词无疑是为了迷惑人。但是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占人口的压倒多数，当他们说“民族利益”确实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时，那就不是要花招，而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再说，这种不言自明的真理，在今天的意大利已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事实。自法国革命以来，多数人民第一次承认左翼是民族整体利益的保卫者。这是文化领导权的一个方面，而曼德尔却将它称为“神话故事”。曼德尔对今天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不接受让干部、党员和选民受自治训练的革命含义。这个过程对人民群众，包括对国家的强制性机构中的人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在瓦解上层人物的统治，而曼德尔又错误地把上层人物同“国家机器”等同起来。

曼德尔在他那本书的最后一章《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里，想把欧洲共产主义置于死地，也就是说，企图“证明”欧洲共产主义同列宁无情地揭露过的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德国修正主义完全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来说，没有那种打击更具有毁灭性和决定性。他说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同考茨基的“消耗战略”是一样的，而“消耗”战略则是考茨基用来反对“进攻”战略（拉尔夫·米利

^① 指马克思。——译者

班德称之为列宁的“武装起义政治”)的。这同葛兰西把“阵地战”同“运动战”加以区别是一样的。既然葛兰西赞成阵地战，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把他称为先驱者。但曼德尔却不同意，他说葛兰西是列宁主义者；对于葛兰西来说，阵地战只是走向武装起义的准备步骤。

曼德尔把考茨基的看法强加到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头上。考茨基把“资产阶级的力量说成是位于社会主体外的堡垒”。曼德尔说，这种形象是“完全错误的和机械的”，因为资本主义不限于此；“资本主义还指挥着设置在‘堡垒’周围的无数机关枪阵地。这些阵地恰恰位于被认为是正在包围这座堡垒的社会主体之中。这种防御体制不允许工人长期集结和包围它。”

任何通过各个击破的办法来突破防线的企图都必然遭到失败，因为这种进攻会导致“无情的正面较量，而这恰恰是上述战略本来想要避免的”。

贾尔斯·马蒂内特在《夺取权力》一书中分析过被包围的堡垒的形象。曼德尔否定马蒂内特的书，尽管他认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对“消耗战略的最有条理和最精确的描述”。其他人，尤其是《每月评论》的编辑们也用这本书来说明为什么消耗战略行不通，他们认为即使堡垒在这里或那里被打破缺口，资产阶级总有时间恢复元气和修补缺口。

这个比喻同所有的比喻一样有它的弱点，即只能给人以启发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从教学的观点来看，这本书可以用来反对曼德尔的立场。因为意共现在已经占领了一些机关枪阵地，而迄今并没有引起正面的冲突。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的一个具体目的，就是要确保终于被打开的缺口是无法修补的。意共正在破坏那些使统治阶级可以恢复元气的条件，拿马蒂内特的话来说，这些条件就是“习惯势力、对权势集团的

尊重和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已经说明，意大利的这些旧结构正处于受到削弱和瓦解的过程。

尽管本书作者不同意曼德尔的理论，但他的书有两个独特的优点。第一个优点是，特别在谈到意大利的情况时，可以说这本书提前发出了警告，要意共注意前进途中的各种陷阱、危险和进退两难的局面——1979年6月意共在大选中受到的挫折就是例证。第二个优点是书中谈国际政治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中，曼德尔的论战语调变缓和了，教条主义减少了。

在全球范围内，曼德尔把欧洲共产主义看成是辩证的进程，它既是斯大林主义的果实，又是斯大林主义的对立面。它在帝国主义世界中是反革命的，但在社会主义世界中是进步的。他在《欧洲共产主义的三张脸》一章中，研究了运动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苏联官僚集团和西欧工人阶级的关系。在第一个方面，他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完整地体现了同本国资产阶级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政策……共产党领导的这种反革命作用，在1936年至1938年西班牙共和国时代可以找到先例……（在目前革命前危机时期）这样的条件下，它标志着比过去更尖锐和更公开的阶级背叛”。

在第二个方面，他认为现在存在“克里姆林宫的畏惧和仇恨。欧洲共产主义支持多元政治和民主自由的言论，在东欧和苏联受到很大欢迎，这倒并不是因为它们加强了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它们被看成是代替当前政治统治的办法……正因为这样，欧洲共产主义在克里姆林宫心目中，在客观上具有强大的爆炸潜力。”

在第三个方面，他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活力无疑开拓了工人民主的领域……我们现在愈来愈多地看到批判性的问题代替了一系列生硬的教条”。这种思想自由削弱了西方的新斯大林主义，对各国的革命者都有好处，因为它扫清了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只是旅途中的一个小站，对真正的共产党

人来说，除了列宁主义和第四国际的道路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

我不同意他的第一点看法，但觉得他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看法很能发人深省。然而对曼德尔自己来说，他把这三点联在一起倒真正使他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欧洲共产主义要真是阶级合作的遮羞布，为什么各国的资产阶级都要那么顽强地反对它呢？要是欧洲共产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危险，同时还破坏克里姆林宫对老百姓和卫星国的控制，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强烈地同它斗争呢？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到处利用社会民主主义对欧洲共产主义开刀呢？

曼德尔的答复是，资产阶级并不害怕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或思想，而是害怕群众，因为关于阶级斗争的言论会使群众产生更高的期望。群众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会把穿杂色衣服在欧洲共产主义的吹鼓手推开，转向真正的革命领导，即第四国际。这种解释的弱点是，它假定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很聪明，而这当然明显不是事实；或者是假定这些领导人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有什么结果，而这种假定又是很成问题的。正是这些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在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新途径接近群众，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加强工会，鼓励女权和生态运动，推动失业者、学生和退休者的群众性行动，鼓励在工厂和居民区成立苏维埃组织，以及采取在某些方面来说可以使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感到高兴的竞选政策。

统治集团难道是笨蛋吗？他们并不相信欧洲共产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他们曾经满不在乎地允许英、法和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进入政府，但他们却拚命反对欧洲共产主义。他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支持”乃是绞索式的“支持”。阿涅利使尽一切手腕和力量同意共和工人运动斗争，这一点从最近菲亚特发起的对工人和工会的进攻就足以证明。阿涅利直率地说过：“我

们面临的是新的社会力量打算夺取领导权。对有关各方来说，赌注都是很大的。”

亨利·基辛格也许为人可鄙，但他并不笨。他看出欧洲共产主义使他所珍视的、给了他权力和财富的制度面临危险。他大动干戈地选择可以损害意共竞选运动的时刻发表攻击欧洲共产主义的电视讲话。如果并非亲共的约翰·保罗二世竟会容忍欧洲共产主义，那并不是由于他认为欧洲共产主义会加强使他感到失望的不公正的经济秩序，而是因为欧洲共产主义动摇了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有利于使这些国家自由化，提供了建立比较公正的经济秩序的希望。

从曼德尔自己的表现来看，他应该给欧洲共产主义一个机会。他承认欧洲共产主义扩大了工人民主的领域，削弱了东方和西方的官僚机构。那为什么不再往前走一步，按表面价值接受阿涅利和意共的话呢？为什么不象哥白尼那样去看各种力量之间明显存在的关系，而要象托勒玫^①那样，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本轮^②错综复杂地套着另一个本轮呢？

曼德尔提到第四国际，这至少提供了部分答案。本书作者把欧洲共产主义看成是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产物，而曼德尔则把它看成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概念的最后结果。他写道：

“苏联的‘民族救世主义’（这是托洛茨基的提法）……后来导致‘民族共产主义’的繁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共产主义之

① 托勒玫，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著有《大综合论》，主要论述宇宙的地心体系，主张地球居中央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环绕地球运行。——译者

② 托勒玫认为，每个行星在一个小圆上做等速运动，这个小圆叫做本轮。——译者

纱,从采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编织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托洛茨基以其先知般的天才,在一开始就懂得并指出了这一点。”(黑体是曼德尔用的。)

曼德尔是托洛茨基理论的首要宣传者。如果说托洛茨基也象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教条,这可不能算是对他不敬。他的框框成了束缚曼德尔的思想的紧箍咒。尽管如此,曼德尔对他的对手还是宽宏大量的。他在谈到东德持不同政见者鲁道夫·巴罗写的《抉择》一书时说,自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以来,这本书是在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出现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这句话是慷慨的赞词,尤其是这本书倾向于支持欧洲共产主义的见解。曼德尔补充了一些温和的斥责,这种斥责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即使(或者说特别是)对于象巴罗这样的重要理论家来说,先入为主的观点、偏见和假的意识,也有其一成不变的逻辑。假分类法的魔鬼安静地潜伏在必要分类法的天使背后。”

不管在理论上有什么考虑,反正八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对于证明欧洲共产主义是否行得通将有很大的作用,而意大利则无疑会成为主要的较量舞台。假定(这种假定看来是很有可能的)共产党在八十年代成为意大利政府的组成部分,那么关键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政府能不能生存下去,以及它能不能实行意共的纲领。

曼德尔对经济前景的忧虑有充分的根据。意大利的经济是面向出口的,而且原料要靠国外,因此特别经不起资本主义的经济抵制。本书作者肯定同意,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欧洲共产主义的试验从一诞生就会被扼杀。美国就组织过对古巴的类似封锁,只是由于苏联每天一百万美元的经济支援,才使古巴顶住了最坏的经济冲击,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也就慢慢地解除了,虽然美国还继续在进行封锁。然而,意大利经济要比古巴大得多,因此即使

苏联想援助，无疑也付不起全面支援的代价。

本书作者并不认为，如果意大利天民党、意共和社会党联合执政，美国能发动有效的封锁。曼德尔这样的批评家强调意大利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和不同得多。现在存在商业性的世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世界对它有强大的影响，但并不能加以控制。社会主义世界、第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都互相做买卖，包括资本转移。贸易条件可能有不平等的情况，但并不总是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社会主义国家对其本身的贸易条件有很大的发言权。即使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投资，例如阿涅利在苏联建立汽车工厂，其投资也要服从双方协议确定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会给欧洲共产主义经济以活动余地。例如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想同意大利政府控制的阿尔法—罗梅奥公司达成联合协议，菲亚特反对这个协议，而意共却支持这个协议。

如果我们从观察商业转到观察生产，经济自主的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本国的生产。第三世界的自主程度要差一点，但现在的趋势是各国都在走向更大的经济独立。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赞成欧洲共产主义，即使苏联采取敌视态度，但是中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许还有匈牙利，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一个新的意大利政府。我1977年至1978年冬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时，发现他们已经在根据这种可能性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也会给予支援，我在马耳他就发现了这一点。

1977年12月，我怀着童年时代听到的海侠和马耳他武士故事引起的浪漫心情，访问了马耳他。这个岛国没有叫我失望。瓦莱塔港口一层层的巨大碉堡气势雄伟，令人敬畏。修建这些碉堡的劳

动是惊人的。马耳他是个小岛，面积大约只有纽约市的三分之一，人口三十万。从岛上任何一角都能看到在天际闪烁的碧海。

马耳他位于地中海中心，居于西西里和突尼斯之间。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摇篮。除罗马外，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地方象马耳他这样深受西方文化历史的影响。欧勒·布莱德福的《伟大的围困战》和《盾与剑》两书详细介绍了一度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最高军事骑士团（人们通常称之为马耳他骑士团）所拥有和控制的这个战略堡垒。1965年瓦莱塔被苏里曼一世率领的强大的土耳其舰队所包围。骑士们打败了苏里曼一世，对六年之后土耳其在勒班托战役（塞万提斯在那次战役中打断了一只手）遭到的惨败作出了贡献。勒班托战役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伊斯兰教在欧洲扩张的结束。

在近代史上，马耳他是英帝国主义的战略据点。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还英勇顽强地为埃尔阿拉般的胜利、攻克北非和进军意大利保持供应线的畅通。核武器的出现使马耳他失去了战略重要性。1964年英国允许它独立，只租用了它的海军基地。1979年租约到期，最后一艘英国战舰回国。这个小岛从此不再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但它有着拉丁文和阿拉伯文溶合为一的语言，作为沟通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桥梁，在政治和经济上起着重大作用。1980年6月5日的《晚邮报》登了三篇有关意大利和马耳他合作的文章。

明托夫总理答应会见我，但我到的那天，他正巧同英国首相进行紧急会谈，离开了马耳他。我受到代理总理、司法部长约瑟夫·卡萨尔的接见。卡萨尔是一个小村庄里穷木匠的儿子，他自学成材，后来进法律学校念书，成为有名的律师。他骄傲地对我说，“我赚了好多钱，但我宁愿拿低工资搞政治。”马耳他工党的廉洁正直可以同意共媲美。

政府所在地设在皇宫旅馆。它是封建时代的一座雄伟宫殿，庭院中绿树成荫，还有几处喷泉。宽敞房间里的华丽装饰反映出武士们和后来的英国殖民总督的奢侈。卡萨尔五十来岁，老是皱着眉头，有一对深陷的黑眼睛，穿著文静，举止友好殷勤，讲起话来有点拘谨。他问我要茶、咖啡还是淡酒。我说都不想喝。他说，“那么我要喝杯柠檬威士忌酒，我感到有点累。”我说，“既然这样，那我陪你喝一杯。”

他坐在一张长条桌的一端，我和我的助手分坐在他的两边。我们谈到了欧洲共产主义。他不喜欢这种叫法，他认为这个名称强调欧洲，太受限制，但现在已经约定俗成。我告诉他说，左翼担心欧洲共产主义最后会变得同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他很不以为然地说，“真是胡说八道。我们尽管叫工党，但我们认为自己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改革经济制度，使之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动得很慢，避免使人有任何强制的感觉。但我们在动，并试图让全民都赞赏合作，提高社会觉悟和尊重劳动。例如，我们在改革高等教育，学生将来都搞半工半读。”我告诉他说，美国的安蒂奥克学院搞半工半读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他立即表示很感兴趣说，“请你把这方面的材料寄给我，我们如果举出美国的经验来，那就可以击败保守派的反对。”我问他反对派的力量大不大。他说，“够大的，尤其是天主教教士，我们不得不同他们正面进行斗争。我们在选举中一次次地把他们击败。最近我们想推行一套保健制度，包括堕胎在内，可是教士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指控说堕胎是第一步，再一步该是允许人无痛苦死亡。纯粹是撒谎。我在议会里发表了强烈的演说，斥责这种无耻的宣传。我们在私下告诉红衣主教，如果他们想搞破坏，我们会同他们对着干。他马上写信让教士们听话。”

他接着谈到了马耳他的外交政策。马耳他没有领土要求或称

霸野心。马耳他的主要目标是持久和平，撤除一切军事基地和舰队，使地中海脱离两个超级大国的敌对。他引用明托夫关于马耳他的一个口号：“要使马耳他从战争的堡垒变成和平的堡垒”。他接着说：“我们自认为从文化和语言来说，我们是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桥梁。我们力争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我们同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都非常好。我们也不介入阿拉伯同以色列的冲突。我们一直在努力发挥平息争端和调解的作用。我们是小国，但是也可以起作用。例如明托夫是受到卡扎菲信任的唯一的西方人，他们象亲兄弟一样。明托夫同他在一起时，他总是强调我们语言和文化中的阿拉伯成分。西方人认为利比亚领导人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但他是个能干的人，真心诚意致力于本国人民的福利。我们这里现在谁也不信教，但我们不能让宗教把我们同利比亚分开。马耳他有不少利比亚学生，我们在利比亚修了一个干船坞，并且正在培训不少技术人员。我们在技术上比起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来要差一些，但是在第三世界就算很先进了。我们能意识到第三世界的存在，以及它的需要和要求。我们懂得第三世界的问题。例如，谁也没有想到邀请第三世界国家参加赫尔辛基会议，因为会上讨论的是欧洲问题。但是我们建议邀请第三世界国家作为观察员参加。我们的建议得到采纳。”

我摘要记下来这一次谈话，但下面这些话我是逐字记的。他说：“我们感到同意大利的同志很接近。我们认为他们争取愈来愈多的民主这个根本战略是正确的，会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知道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和他谈到如果意共参政，意大利会受到经济压力的问题，尤其是在石油问题上。他指出利比亚、挪威和墨西哥都有很多石油，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抵制美国禁运石油的企图。马耳他当然会努力动员第三世界支持意大利人反对美国的强制手段。

我在马耳他停留了几天，以恢复我四个月来连续不断的旅行、劳神的一次次谈话、没有规律的饮食和熬夜积累起来的疲劳。我在英国人修的那条使人想起布里顿来海滨大道上漫步，爬上古老的碉堡或参观华丽的教堂，在兵器馆和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厅里消磨时间。

我时而搭乘公共汽车，时而作长时间散步，就这样游遍整个小岛，甚至包括邻近那个有新石器时代石碑遗迹的戈佐岛。无论围墙、房屋、谷仓，还是蓄水池，到处都是石头。那焦干的土地使新英格兰看上去倒象是热带。看到几百年来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我心里既感到压抑，又敬佩人们的坚忍不拔和毅力。太阳光暖洋洋的，很少让人感到炎热，人们又那么和气。我看不到有什么巨富之家。我发现在商人和小企业主中间有反对政府的情绪，但是在工人中则几乎看不到。在那几天里，日子过得愉快和清新。

我无目的地独自漫步时，常常想起那些我在意大利各地和欧洲几国首都遇到的男男女女，和回味那些比较重要的会晤。在这十几个星期里，我接触到这么多的印象、见解和经验，有些是在意料之中，有些则在意料之外；有些很有条理，有些刚相互矛盾；头绪多得使脑袋发胀。这时在宁静的回忆中，它们慢慢地开始在时间和地点上联成有意义的图案，在心灵之眼的前面构成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面。

在漫步中，我愈来愈坚信欧洲共产主义是当代历史的重要发展。约瑟夫·卡萨尔的谈话给我增添了不少信心。这位积极从事活动的政治人物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使我的结论变得更客观了。我愈来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在编造各种理论的知识分子，不再象葛兰西所挖苦的那样“给世界戴尿布”。葛兰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给一本尚未动笔的著作发了许可证。

在以后的两年里，当我伏案写到过去的事情时，我总是努力收集新的情况，并猜测一旦意共在几年后进入政府，将会有那些对抗的力量。那时也许是六党联合执政，也许是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和激进党以及其他几个小组织组成左翼联合政府，即使是这两种情况，我还会称它为“欧洲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府。

已经有证据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大概会给欧洲共产主义政府以政治和经济的支援。这些国家也许会单独行动，也许通过联合国集体行动，因为它们在联合国大会上居多数，在安全理事会内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英国《卫报》驻联合国记者简·罗森 1979 年 12 月 16 日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撰文，详细描述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并哀叹它们取得了领导权，可是他忘记了二十多年来联合国一直控制在美国手里。同欧洲共产主义更有关的是第三世界渴望建立消除贫富国家之间鸿沟的新经济秩序。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建立新经济秩序。

欧洲共产主义将成为其组成部分的这种新经济秩序，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也能得到相当一部分力量的支持。德国控制的欧洲共同市场对美国的经济霸权日益感到不安。在德国领导下组织的欧洲货币体系，是直接针对美国金融势力而建立的。在政治上，欧洲也愿意摆脱两大强国的争夺。这也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形势发展的压力下重新考虑它的抉择。安德鲁·扬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看来西德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战略，……同世界上民主进步国家开展新的贸易和援助格局……。”（引自 1980 年 11 月 18 日《圣胡安星报》）

在 1979 年 6 月 10 日至 11 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共同市场国家除意大利外，都在向右转。中右翼在欧洲议会约占三分之二的席位。在西德，约瑟夫·施特劳斯领导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得到

了多数选票。如果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力量进一步加强，肯定会在德国执政，其结果是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意共曾经向赫尔穆特·施密特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试探，没有遭到拒绝。英国盲目亲美的工党右翼在大选中惨败，同情欧洲共产主义的左翼力量在上升。万物都在变化，命运之神并未注定欧洲共产主义将不会得到共同市场的支持。

苏联也不一定会由于害怕欧洲共产主义的胜利将加强社会主义世界的不同政见者和危及苏联的政治结构而破坏欧洲共产主义。在威尼斯举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大会上，捷克人指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时所做的不过就是意共欧洲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但是，将来苏联将不得不同内部的自由化妥协。苏联的经济由于上面控制过严而受到损害。苏联只有通过进一步分权和放松极权的管理方法，才会使经济得到增长。这种经济措施必然影响到政治领域。这两者的结合体可能会赞成对于以历史性妥协为基础的意大利经济提供经济援助。

我把梵蒂冈的作用留到最后来谈，这种作用是今后任何权力方程式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我在第四章里已经提到，教会内部存在一种同现代资本主义拉开距离的趋势。这当然不是说教会将赞成现有的社会主义。但是梵蒂冈很想建立比较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将使制止浪费惊人的军备竞赛成为可能。约翰·保罗二世看来决心要改善第三世界的经济情况，这位教皇并非没有可能提出有关的倡议。世界上好多人已经作好了接受这种倡议的准备。

欧洲共产主义最大的反对者是美国。在我国，只有梵蒂冈是一支足够强大的独立力量，可以让美国听到并在某种程度上重视它的意见。梵蒂冈不一定要站在欧洲共产主义一边，也不一定要赞同或喜欢欧洲共产主义。只要它能容忍它就行了。

在世界的棋盘上，教会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因此梵蒂冈很有可能认为，同意共斗争和让意大利陷入动乱，是不慎重的。它甚至会认为，更公正的社会秩序，将使意大利社会在恐怖主义面前，以及在青年的愤怒和失望的面前，不会象现在这样脆弱。如果这些设想是对的，那么只要梵蒂冈对华盛顿说一声“别插手”，教皇的干预就有可能改变力量的对比，使美国不采取经济高压手段。

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和革命骚乱之中，新的经济秩序早就应该建立，欧洲共产主义提供了从现代资本主义和平过渡的希望。阿涅利说过，新的社会力量在争夺领导权，赌注是很大的。他指的是意大利，但是他的警句也适用于全世界。

用葛兰西的话来结束此书看来是恰当的。他在四十多年前写道：“确切地说，危机就在于老的正在死去，而新的还不能诞生，在这个空白点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病态的症状。”但是在今天，新的能够诞生，更公正的经济秩序会在缓慢和痛苦的演变过程中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病态的症状在蔓延，绝望的情绪在滋长。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结局未定的战斗中，绝望的情绪只会使人瘫痪，因而必须加以清除。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任务，也是欧洲共产主义的诺言。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